

中国梦·强军梦

民族的脊梁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抗战全面爆发暨新四军成立八十周年 征文集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民族的脊梁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抗战全面爆发暨新四军成立八十周年 征文集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编

开 本 170×240 1/16

字 数 270千字

印 张 17.5张

印 数 1—1000册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浙内图准字〔2017〕温22号

准印证号（浙）1507003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换来的经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是习近平主席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发出的时代号召。

卷首语

为牢记历史，缅怀先烈，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于2017年3月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开展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0周年、新四军成立80周年征文活动。征文内容和要求，即在三大主题下围绕：1. 人民军队的建立壮大，歌颂人民军队英雄事迹的相关文章；2. 温州抗日战争期间有关史实，以及全民抗战情况等；3. 新四军的诞生、壮大及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4. 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纵队斗争历史的有关文章；5. 学习、研究和宣传新四军的光辉历史，继承弘扬铁军精神；6. 人民军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丰功伟绩。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高度重视征文活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有关事项。通知下发后，各县（市、区）党史研究部门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亦积极配合，永嘉、乐清、平阳、瑞安等县（市），均发动有关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和会员积极撰稿，参与征文活动。他们中既有专业党史工作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有亲身参加过革命战争的退役军人，也有热爱党史军史的老同志、老党员，还有就读相关专业的高校博士研究生、在读大学生等。

广大热心党史军史研究的同志围绕征文内容要求，积极主动撰稿；有些专家学者则以主办方约稿的方式，纷纷如期发来稿件。有的读者投稿两三篇、五六篇；有的读者数易其稿，不断完善稿件内容；有的老干部不会用电脑，就一笔一画地在稿纸上写了几千文字寄给我们。这一切都让我们深受感动和鼓舞。纵览征文来稿，文章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有些稿件富有原创性，有思考、有认识、有归纳、有总结，有理论深度和学术思想。比如《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的特点和作用》一文，以大量史实分析了新四军如何在日、伪、顽三股

势力的合击下，在华中战场上坚持抗战，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并对当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予以有力驳斥。又如《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及其反应》，从战时民众心态的视角，以期更全面地反映历史原貌：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大致经历了自欢喜兴奋至辛酸失望的转换过程，并指出只有妥善处理战后社会民生问题，才能获得民心。如《铁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不但对铁军精神的起源和内涵作了阐释，还指出重温铁军精神意义重大，特别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影响深远。

有些稿件回顾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和浙南游击纵队、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及历史事件。如《江海风云汇青史》一文，以时间为主轴，记述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从山门出征的五百名指战员所谱写的壮烈史诗。又如《挺进赣南的南昌起义部队》，详实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南昌起义部队，挺进赣南途中经历的几次战斗并完成“赣南四整”的光荣历程。还有《军民奋战 共歼顽敌——藤桥战斗的作用和影响》《红军挺进师在凤林村》《溪山烽火——溪口村的红色纪实》等文章，对温州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种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均有所反映。

还有些稿件则是缅怀将帅、父辈的峥嵘岁月或回忆亲身军旅经历。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粟裕与浙南》《叶挺将军的史与诗》《浙南精英 开国少将——纪念陈铁君诞辰 100 周年》等文章，让我们重睹开国将帅们的风采和人格魅力。又如《五个终身难忘的建军节》《军旗高高飘扬在洞头岛上》《我是一个兵》《从军经历颂“铁军”》等文章，以作者自己在部队成长锻炼的亲身经历，有力见证了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的辉煌历史。

这次征文活动，按照三大主题进行，兼顾普遍意义的同时又突出地方特色。温州是一片革命的红色土地、新四军的策源地之一、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浙南游击纵队等革命武装都曾在此战斗过，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因此，征文内容中着重围绕人民军队、新四军的光辉历史、英勇事迹的同时，也提到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浙南游击纵队的有关文章以及温州抗日战争期间有关史实、全民抗战情况等，为征文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宽而不泛的范围，从而达到更好的征文效果。

此次征文活动为读者朋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园地、一个抒怀的平台，将大家汇聚到一起，缅怀先烈、重温历史、抒发情怀、学习传承，不仅活跃了学术氛围，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我市党史军史理论研究的发展。这次征文活动也是一次难得的深化学习、增进交流、坚定信念之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一场学习的盛宴，更是献给建军九十周年的一份厚礼！

目 录

卷首语·····	1
----------	---

学习传承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支柱作用 ——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 ·····	施光华 002
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的特点与作用 ——纪念建军 90 周年和新四军成立 80 周年 ·····	张亦民 尹福瑛 005
铁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杨苗苗 017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及其反应·····	李华文 031
周总理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张秋兵 049

将士风采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吴东峰 058
粟裕与浙南·····	郑昌儒 069
叶挺的将才和诗魂·····	刘志宏 077
浙南精英 开国少将 ——纪念陈铁君诞辰 100 周年 ·····	钱克辉 林子周 083
周恩来称赞金贯真是浙江金龙·····	金爱伦 090
吴毓与国共温州和谈·····	陈永华 杨 叶 096

深切怀念丁魁梅同志·····	郑润琳 100
丹心昭日月 大义薄云天 ——金哲海烈士的革命一生·····	金中恒 104
红十三军双枪女英雄金秀英·····	刘定卿 115
新四军烈士田守尧陈洛漣伉俪·····	陈学文 120
关榕烈士二三事·····	李大枢 126
追忆父亲的抗战岁月·····	洪成樑 130

红色记忆

挺进赣南的南昌起义部队·····	曾春生 136
“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而作·····	张俊士 140
青史言冲丹心 革命语励后代·····	陈 战 叶际飞 154
江海风云汇青史 ——记浙南游击根据地和出征的抗日壮士·····	吴松金 168
军民奋战 共歼顽敌 ——藤桥战斗的作用和影响·····	李岳松 177
红军挺进师在凤林村·····	郑志兴 184
溪山烽火 ——溪口村的红色纪实·····	李顺林 200
一个小山村的革命历程 ——记永嘉张溪陈周村·····	李志德 214
新四军军歌仍在回荡·····	南孔球 218
虎口逃生记·····	梅 明 221

军旅生涯

五个终身难忘的建军节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潘永淦 226
军旗高高飘扬在洞头岛上	张锡淑 232
我是一个兵	章宏波 236
从军经历颂“铁军”	胡文岳 241
我是一名战士	
——忆军营生活	李德夫 244

诗词采撷

诗词采撷	250
编后记	265

学习传承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支柱作用

——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

施光华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铁蹄压境势欲吞，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步步紧逼。中国军民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倡导实行并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直接间接相配合，形成波澜壮阔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即已说到：“长期而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犬牙交错、持久抗战。抗日战争值得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深刻，我在这里主要谈谈民主根据地在抗战中的模范和支柱作用。

抗日民主根据地，也称解放区、边区，到 1944 年春，全国较大的解放区有 15 个。除原有的陕甘宁边区外，14 个在敌后，由八路军、新四军、华南纵队军民合作从敌占区中开辟出来。14 个解放区是：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区、晋绥边区；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南区、淮北区、淮南区、皖中区、鄂豫皖区、浙东区；华南的东江区、琼崖区。这时解放区和游击区的人口，将近 9000 万，军队 47 万人，民兵 200 多万人，抗击敌寇侵华兵力 60%、伪军兵力 95%，建立县级民主政权 630 多个，专员公署 90 个、行政公署 22 个。到 1945 年春，又从敌人新占领区开辟了 4 个新解放区，全国解放区 19 个，分布于当时 19 个相关省份，人口 1.2 亿。占当时全国人口 4.5 亿的四分之一强。

延安是抗日战争时中国的心脏。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首府在延安，延安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心和觉悟青年、进步人士一心向往的圣地，也是抗战时期培养训练大批干部的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远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的进步青年，冲破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历经艰辛到延安或

敌后抗日根据地。延安有多所著名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仅抗日军政大学，即先后培训出数万青年骨干和部分红军骨干。一批批骨干在这些学校培训后，分别被派到敌后各根据地工作、战斗。延安窑洞陋室放光芒。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指示从延安发出。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59篇著作，有112篇是在延安陋室写就。抗战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人民活动中心。1941年10月，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代表有日、印、犹太、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及中国台湾、蒙、回、藏、彝、苗、满、汉等代表。

根据地是坚持抗战、民主建政的楷模。抗日战争的目的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一个目的两个方面，坚持抗战不允许半途妥协，民主建政不允许恢复压榨人民的旧制度。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积极主动地挺进敌占区，依靠和发动群众，抗击敌人，在敌占城市、据点、交通线外广阔地区，形成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代表、民主进步人士代表、中间派代表各占三分之一。日军报告中惊叹，中国有三个极为：“游击战极为巧妙，民众工作极为彻底，中共对于皇军极为危险。”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水上游击队，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原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生产自给、整风运动，一系列政策落实。内线中的外线，包围中的反包围，持久中的速决战战略战术的发挥。根据地军民在抗战相持阶段，历经严峻考验。敌人反复的“扫荡”“清剿”“强化清乡”“扩展清乡”。国内反动派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从旁侧击、从背后捅刀。投降派造成的“略走曲线救国”“浊流”，敌汪势力一起压向根据地。根据地尤其北方有的地方还遇上严重的灾荒。共产党、民主政府和人民群众却团结得更紧密，自力更生、共度难关、奋力抗战，创造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1944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书介绍：“数年来始终坚持京沪近郊与长江下游平原水网的游击战争，其艰苦奋斗精神，与北平以南之冀中十分区及天津以南之冀鲁边区军民一样，同样可为楷模。”国际友好人士冒着风险到根据地，有的还

亲临火线，与军民共艰苦，问她为什么？她说：“只想了解小米加步枪是什么力量。”

解放区呈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人心齐，泰山移。解放区处处洋溢团结战斗的气氛，尊干爱兵、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参军支前，涌现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例。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芦荡火种，鱼水情深。八路军、新四军是穿军装的老百姓，老百姓是不穿军装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盛行学习进步的风气。有人说，“战士和民兵心里都装有战略思想”，都懂得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在战斗实践中学习成长，“一颗红心两支枪”，学政治、军事、文化。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人人尊敬。解放区有一种乐观主义、充满生机活力的风气，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人民都懂得“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热烈而镇定，紧张而有秩序”。战斗间隙，只要情况允许，部队集合行军之前，军民汇聚村中打谷场，歌声嘹亮。从1944年春苏中军区攻克车桥战役开始，敌后各解放区分别开展攻势，在全国率先反攻。“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军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

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的特点与作用

——纪念建军 90 周年和新四军成立 80 周年

张亦民 尹福瑛

新四军是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条件下，继八路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之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的第二支抗日人民武装。不同的就在于八路军是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的主力红军改编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四军是坚持在南方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在华中开展敌后抗战的。

还有一个不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当局吸取华北失陷时军队与政府一起撤退的教训，而八路军在敌后抗战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验，蒋介石就在 1938 年 11 月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宣称抗战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阳沦陷为第一期，今后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并提出一个“整军建军计划”，将“国军”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军后方担任游击，三分之一在前线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这三个“三分之一”，实际上隐藏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主张。由于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降日本，大批“国军”变为伪军之后，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上面对的不单是日军，也有伪军，还有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顽固派。新四军就是在日、伪、顽三股反动势力的夹击中生存、发展、壮大的。这是中国抗战史和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史上独具特色的篇章，值得记载的一页。本文从上述特点出发，从五个方面作一浅释，供批评指正。

第一，就组建新四军的国共谈判看，集中反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抗战与反共的两面性，从而决定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九一八”时的“不抵抗”政策遭受国民党内部民主势力在内的全国人民压力下、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被迫抗战的。但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无视国共谈判，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的八月初，

才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决定派朱、周和叶剑英参加国防军事会议。8月11日，朱德在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会议上，就中国抗战的正面防御和运动战、游击战结合的基本作战方式发了言，并预言日军可能再走九一八老路，在上海方向肇事侵略。不出所料，两天后“八一三事件”发生，“国军”仓促发起淞沪会战。迫于战争压力，国共双方于8月22日就红军改编达成协议。中共于25日宣布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并率军东渡黄河赴山西前线抗战（朱德还任过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总司令，被授予上将军衔，周恩来为中将，叶剑英为少将）。但国民党当局直到9月22日，由通讯社发表中共的合作宣言，蒋介石于23日公开表示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谈话。实际上只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连“国共合作”的平等权利也没有，充分反映蒋介石的既要抗战又要反共的两面性。

至于新四军改编的谈判，比八路军的改编谈判更为复杂了。大家知道，红军主力长征后不久，坚持游击战争的南方红军就同中央失去联系了。1937年2月国共谈判开始后，毛泽东与党中央就关注着南方红军生存情况，一方面派人联络，一方面要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但蒋介石开始不承认南方有红军问题。国民党早在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同意国共合作抗日的同时，就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对中共武装采取“北和南剿”方针，对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进行秘密“围剿”，企图抢在国共达成协议前消灭之。

“清剿”失败后，国民党被迫承认红军游击队的存在，转而开始各地的地方谈判。在谈判中又企图借抗日之名，乘改编之机，以谈判作掩护，用各种办法消灭之：有借谈判之时，暗中包围，诱骗下山强制缴械；或以合作为名，行控制、吞并之实；或封官许愿，诱迫“投降”、“自首”；或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动摇游击队分离解体等，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各种办法无所不用其极。只是淞沪抗战开始后，为安定后方，需要更多人力参战，才同意坐下来谈判。

诚然，谈判是一个讨价还价，相互退让，最后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共对蒋的两面性是有所认识的，他既想利用抗战削弱乃至消灭中共势力，但反共又只能在内部秘密活动，因而迫蒋在抗战问题上作出让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同样，中共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退让外，只要有利于合作抗战，也是有条件地作出让步的，如在公布国共合作的方式上，虽然不给你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共也忍让了。在新四军的编制上，蒋介石起先图谋改造成为国民党直接领导指挥的一个军，并由国民党将领陈诚或张发奎任军长，中共断然不能同意。后来，经冯玉祥、李济琛等策划，推荐叶挺为军长，这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叶挺又毕竟是脱离中共十年之久的人，还应召赴延安向中央表示“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之后，才获准出任军长的，同时明确提出国民党不得干涉一切人事，不准国民党插入一人，坚持了共产党对新四军的领导权和敌后游击战争的独立性。经过近三个月的反复协商，中共方面在部队编制、行政领导、薪饷等问题上作了让步，同意新四军不隶属于八路军，由所在战区直辖，军以下不设师、旅、纵队，在南方设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等。1937年10月25日，在汉口宣布成立新四军，1938年1月10日，在南昌组织军部领导机构，指挥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部队集中整顿开赴抗战前线。接着，军部从南昌移至皖南岩寺，七月又迁到泾县云岭，直到“皖南事变”。新四军辖四个支队，共1.03万人，6千余支枪。江南各游击队组织成一、二、三支队，每个支队两个团，分属1-6团，江北游击队，其中以红28军作底子，人数较多，组成7、8、9三个团和一个手枪团。

新四军的成立与开赴前线抗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但是，这次合作抗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不同，这是一次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统一纲领的合作。虽然中共公开宣布放弃用暴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等“四项保证”和对国民党提出开放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要求”，但国民党顽固派根本就不是诚心诚意与中共合作，蒋介石的“老子天下第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这就决定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斗争是艰难复杂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

第二，新四军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有效地钳制了日军兵力，支援配合了正面战场，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

当时的华中，指武汉以东，长江南北两侧，北至陇海路，南至浙赣线，东至东海、黄海之滨的广阔地区。如果说，中国地图像只鸡，那么，华中部

分正是鸡胸，是中国的核心之所在。回顾日本侵华历程看到，日军在“七七事变”占领平津、华北后，就以南北对进（平汉、粤汉线对进，津浦线南北对进），中间突破（上海八一三事件）直逼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抗战的一大贡献，就是发动淞沪大会战，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的狂妄计划，值得称道。其实，这是作为一个执政党和国家首脑在国防问题上的起码责任，何况最后还是上海陷落告终，既不能夸大其贡献，也不能以大战役贬“积小胜为大胜”的游击战。

新四军集结开赴前线时，正是南京失守，日军在津浦线上南北对进发动徐州攻势之际。新四军江南部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调集三个支队的侦察兵和抽调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四月下旬深入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毛泽东得悉后于5月4日发出关于开展华中游击战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在侦察队出动之后，主力即可跟进，在皖南、苏南地区的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地之间建立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尔后分兵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带和北渡长江，开辟江北。

新四军各支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行动。当时活动在皖中巢湖东南的四支队九团二营，在蒋家河口设伏，歼灭了小股抢运粮食的日军20来人的首战胜利。接着，江南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领导下挺进苏南敌后粟裕率先遣支队于6月17日在镇江西面的韦岗伏击了日军车队，击毁敌汽车四辆，毙敌13人，伤8人；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领导下，开进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活动；三支队在皖南配合“国军”进行繁昌保卫战。国民党繁昌县长说：“在沦陷一半的繁昌主政，主要靠新四军的支持和帮助。”据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军委会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孟繁伦上报，新四军在东进的1938年前8个月中，对日作战171次，共毙敌1317名，伤敌1347名。诚然，由于新四军人员少、装备差、战斗规模作战力度方面难以同“国军”相比，但与敌展开麻雀战、伏击战、游击战、袭击日军据点、破坏敌人水陆交通与通讯设施，牵制与削弱敌人兵力方面，达到积小胜为大胜的目的，也是“国军”不能同新四军相比的。

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南指挥部相继成立，部队获得进一步扩展：五支队、六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新四军游击支队、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豫鄂挺进纵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等新的武装陆续组成发展，为“皖南事变”后扩建为七个师准备了条件。同时出现了新编五支队三打来安城、游击支队窦楼歼敌，豫鄂游击独立大队鏖战余家店，更有‘江抗’东进苏、常、太，激战黄土岭，夜袭许墅关，火烧上海虹桥机场等等光辉业绩，鼓舞着敌后军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尽管新四军在日、伪、顽夹击中艰辛曲折，但抗战大旗越举越高，敌后抗日武装越抗越强，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新四军人数不到全国军队总数的4%，却抗击侵华日军总数的20%，伪军总数的31%。

据资料显示：新四军八年抗战，对日作战2.4万余次，毙伤俘及投诚反正的日伪军47.8万人（其中日军11.4万余人）。新四军自身伤亡8万余人，其中团以上干部377人。在跨苏、浙、皖、赣、豫、鄂、湘七省的苏中、淮南、苏北、鄂豫边、苏南、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建立起8个行政公署，21个专员办公署，171个县的民主政府，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多万。这片国土东滨东海、西屏武当山，南抵闽浙边，北至陇海线，拥有上海、南京、杭州、徐州、武汉、安庆、九江、合肥等大中城市，是历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要地，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屏障，又是发展华南的前进基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八路军相呼应，既可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又使日军腹背受敌、首尾难顾，终成战胜日军的最佳战场。

第三，新四军结合华中自然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充实丰富了党的统战理论内容。

统一战线是毛泽东为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同样是新四军在敌、伪、顽夹缝中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生命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南京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接着，汪精卫出走降日，蒋介石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进而在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惨案，然后升级为1939年到1943年的三次反共高潮，甚至不顾民族大义，与汪伪勾结，祭起“曲线救国”的灵堂，不惜日、伪、顽同流合污，相互勾结，默契配合，欲置中共于死地。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逆转，共产党被逼进入1941-1942年的困难时期，抗日根据地缩小，新四军与八路军被迫裁员，抗日战争变得更为严峻。

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来源于对实践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党中

央和毛泽东从中国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关系出发，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系列总的原则政策与具体的策略方针，特别是对“皖南事变”的正确处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论，发展到完善成熟的程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到底是为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毛泽东为党规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工人、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队伍，广泛地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共产党组织，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成为人民的胜利；“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要正确认识他们同其他阶级、阶层间的矛盾在统一战线中的利害关系，争取其积极面，弱化其消极面，以巩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虽然有别于汪精卫为代表的降日派，但他们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主张抗日，一方面又摧残进步势力，保持着对日妥协乃至投降作准备（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就是只要日本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现状，即承认华北为“第二个东北”就可以停止抗日而和平共处）。反共是顽固派的既定政策，但又不敢公开彻底分裂，这种两面性为党的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依据。

为了开展同顽固派的正确斗争，毛泽东又提出“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讲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为要使胜利有把握，要有计划、有充分准备，要善于利用矛盾，选择好突破口，予以打击，这是斗争的局部性；“有节”，即休战原则，要审时度势，权衡利弊，适可而止。为了争取其共同抗日，在击退顽固派进攻之后，理直气壮地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使自己立于主动不败之地。总之，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是统一战线又团结又斗争策略思想的生动体现。在策略原则上还提出“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暂时斩而不奏”或“不斩不奏”等办法。

新四军创造性地实施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统战政策，最典型的体现在‘皖南事变’前的“佳电”和对“皖南事变”处理的整个过程。陈毅作为新四军

军委唯一副书记和后来的军长，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统战政策的模范。他在新四军导演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统战活剧，如1938年进军苏南期间，争取了纪振纲、樊玉林等头面人物和实力派，为开创茅山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和1940年间，为开辟苏北、发展华中，不顾个人安危，三进泰州城，争取了“两李”（李明扬、李长江）与中间势力陈泰运的中立，实现了“击敌、联李、孤韩”的计划，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皖南事变”前，国民党的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苏北反共失败后，国民党加紧了压迫新四军北移的步伐，于是在1940年10月19日发出“佳电”，要求有50万人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并在一个月内存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国军”利用新四军北撤的时机消灭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然而，不抗日而反共的蒋介石终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世人面前曝露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真面目。中共虽然失去了九千人的兵员，却获得了人心，中外人士纷纷表示同情与支持中共的正义立场。新四军从开始只许编四个支队，皖南事变后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一下扩编为七个师，在华中抗战中越抗越大，越抗越强，终于成为华中抗日主力军。“皖南事变”后顽固派反共之心不死，1943年春，韩德勤企图东西夹击洪泽湖西的四师，我新四军发起山子头反击战，生俘了韩德勤，当九旅政委韦国清报告陈毅后，陈军长亲自导演了“捉放韩德勤”的精彩活剧，韩德勤向陈毅保证不再反共，使苏北顽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从而改善了华中敌后斗争形势。

其实，新四军其他领导人都是统战工作的能手，彭雪枫开辟豫皖苏根据地中成功地争取了鲁雨亭、宋克实，魏风楼等诸多地方实力派、著名爱国人士、开明士绅和社会名流，并经中央转发了统战经验。李先念利用西北军、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取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张爱萍、江上青在皖东北的“援盛（子瑾）打马（馨亭）”中争取了盛子瑾的合作，打开了抗战新局面……如此等等，都为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

总之，回顾新四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史。通过新四军的抗日反顽斗争中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蒋介石是在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被迫“统”进来的。他眼看新四军、八路军日益壮大，心理很不舒服，既想反共摆脱统一战线，但无能为力，反共又不能彻底的反，

分裂也不敢脱离抗日阵营。他三次反共要同共产党闹翻，但共产党以巧妙的斗争手段，既沉重打击了他的反共行为，又牢牢拴住在统战阵营里，无奈地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既联合又斗争的道路走，硬是让他陪着共产党打败日寇的同时，也准备了自身灭亡的条件。这种光明正大，不可抗拒的英明斗争策略在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有谁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相比呢？

第四，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上实现了红军时期山地游击战向平原和水网地带抗日游击战的转变，与分散游击战到一定规模的兵团式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两个转变，丰富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内容。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人要生存发展，就要适应自然环境。打仗也一样，“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孔子语）足见适应环境对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新四军在改编前，被“国军”围追堵截进入深山老林，练就了长于打山地游击战的一手，改编后，进入长江南北两侧，既有丘陵山坡，更有江河湖海，练就平原水网地带作战的技能，适应华中敌后环境的战略战术。

新四军组建之初，国民党规定你在皖南、苏南、淮南地带活动，不能跨界越境，也不让你成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武装，实际上是套在新四军头上的“紧箍咒”，置你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心机。富有革命精神的新四军当然不能接受，必须冲出去，后来周恩来亲临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突破顽固派的限制，将部队开赴大中城市周围，水陆交通干线两侧和塘渚湿地的广大农村去，到“国军”不想去，不会去的地方去，到那些空虚的地方去发展，或被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去战斗，去宣传、组织群众，扩大影响，发展自己。事实上，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打的第一仗都是在这种环境中打的，四支队在蒋家河口的伏击战，一支队在韦岗的伏击战，都具有水陆交通线上的游击战的特点。《沙家浜》这个剧本更显示了新四军在芦苇荡里的斗争生活。新四军不忘作战环境改进战略战术，如淮南罗炳辉曾创造了平原上以伏击与运动游击为特点的“梅花桩战术”，其特点：一是部队宿营按三角形驻地部署，使任何部分都能机动作战，并对敌实施反包围；二是便于部队疏散隐蔽，也便于偷袭敌人；三是对来犯之敌实施多点打击。这一战术在实践中收到很好效果，

得到广泛推介和运用。说明新四军是一支颇具创新精神很有适应能力的人民军队，因而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无愧于铁军的称号。

华中根据地东临东海黄海这一特点出发，新四军早在1940年开始，在苏中军区就创建了一支以陶勇为司令员的“土海军”，她从开始的海防大队发展为海防团，又从一个海防团发展到三个团的海防纵队，在控制沿海港口滨海地区开辟水上交通线，负责敌占区解放区间的联络，护送干部、保护组织渔民下海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巩固苏中海防起了重大作用，被称为“斩不断的海上生命线，摧不垮的海上根据地”。

这支“土海军”还对浦东游击队南渡杭州湾到浙东开创敌后根据地发挥过重要作用。据资料记载，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曾有过一支200多人编为三个中队的海防大队。这个大队就是按照苏中军区海防纵队的经验组建起来的。主要任务是连接浙东与浦东之间的海上交通，以取得与军部的联系，同时保障舟山群岛抗战团体与浙东四明山根据地的联系，以巩固扩大海岛的对敌斗争，并帮助渔民在海上安全生产。这个大队从建立到北撤的四年多时间里，在海上大小战斗30余次，毙敌109人，俘敌40余人，收编了顽军一个连和部分海匪。1944年8月，海防大队一中队在大鱼山战斗中牺牲42名战士，毙伤日伪军80余人的壮烈场面告结束。后将这次战斗被誉为“海上狼牙山之战”。1945年8月，浙东纵队奉命北撤，海防大队完成1.5万人的跨杭州湾经浦东到达苏北的任务后，编入华中海防纵队第二大队。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海防纵队被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样从山地、丛林，再到平原、江河湖海的“土海军”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新四军首创了解放军的一个军兵种。

新四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同样具有适应战争发展的开创性。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新四军渡过1941—1942年的困难之后，1943年秋开始，华中敌后战场就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新四军的战略战术也从分散游击战向集团性运动战、歼灭战方式转变。比较典型的如1943年生俘韩德勤的山子头战役，就是以四师为主，集二师、三师的团队联合作战的；1944年3月的车桥战役，是一师指挥五个团的兵力展开的；1944年8月彭雪枫师长也是率四师主力西进收复豫皖苏地区的；1945年春，粟裕领导苏浙军区部队对顽军“围剿”的

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等，都是运动战与歼灭战相结合的范例，为最后战略大反攻作了准备。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是革命的熔炉。这里诞生过刘少奇、李先念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走出去一大批能治党、治军、治国能文能武的省部级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国现代史上 33 位军事家，其中叶挺、陈毅、粟裕、黄克诚、彭雪枫等九位就是纵横驰骋于华中抗日战场上走出来的。华中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区，新四军本着尊重知识和人才，吸收过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磨练造就了无数全国著名的各种各样、无所不包的专家学者，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知识分子阵容，可谓人才济济，从各条战线上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也为新中国作了杰出的贡献。

第五，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反攻准备了战场，是南征北战，迎接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实现“破敌、收京、入沪”计划的基地。

众所周知，1943 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好转，欧洲苏德战场上，苏军已转入反攻，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进入逐步进攻，日本已处于被动地位。日本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局势，从 1944 年开始集中 40 万兵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豫湘桂战役（日称“一号作战”）。蒋介石早在六年前说，今后抗战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反攻时期，就是六年过去未见其反攻作战行动，而在此次日军进攻的八个月中却丢失了包括洛阳、长沙、桂林、福州等省会在内的 146 个中小城市与大片国土，是抗战以来又一次“大溃退”。直到日军投降前一个月的 1945 年 7 月 15 日到 8 月 15 日间，国统区仍在日军进攻面前丢失 18 座县城，而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沦陷区收复 16 座县城。在八年抗战中，不曾见过国民党总的战略反攻行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对时局变化，及时提出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方针，并作为 1945 年的工作任务发出指示。这是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步骤。与此同时，党中央在“国军”豫湘桂战役败退后，作出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一是抽调八路军 359 旅一部于 1944 年 11 月从延安出发南下，抵达新四军五师驻地时，又增加五师的一部分，组成以王震、王首道为军政领导的“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准备同广东东江纵队会合，开辟以五岭为中心的粤湘

桂抗日根据地，构建鄂、赣、湘、粤间的交通，拓展华南抗日区域；二是抽调苏中新四军一部渡江南下苏浙皖边的浙西长兴县，成立以粟裕为领导的苏浙军区，旨在经营京、沪、杭地区，发展东南沿海，沟通闽浙赣，最后实施“破敌、收京、入沪”的计划。显然，这是中央赋予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和南下支队的八路军的重要战略任务。华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那么华中就是中国战场上“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集散地，特别是后期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之后，就是中国战场实施战略反攻的基地，可以北上东北，连接苏联盟友，可以南下发展华南、东南、扩展敌后根据地，可以沿海迎接与配合美国盟军登陆作战，最后战胜日本。

诚然，这个战略行动因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提前投降而未能实现。尽管中共对收京、入沪已作了具体计划，甚至上海、南京的市长和苏浙等省的省长也已公布，但在国共重庆谈判中，为了从战后和平建国的大局出发，不仅把原计划收回成命，还主动作出将南方八块抗日根据地让出交给国民党政府和新四军全部北撤的决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为了和平建设，在抗战胜利前后作出的一次重大战略转变。南下战略虽然没有实现，但在向北发展中却收获了一个东北，又显中共领袖人物的宏大战略思想。将抗战胜利前后的国共双方谋略，作一深层的比较研究，看看国民党在抗战后期，日本投降前又在做什么？再对比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后在做什么，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教育当代青年，甚为必要。

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了。这给蒋介石带来一个以“拖”为特征的“持久战”的贱价胜利与惊喜。在“国粉”们看来，抗战胜利的荣誉，自然是归国家领导人，属于最高统帅的蒋委员长。于是蒋介石成了“千古民族英雄”。这本来并无没有道理，问题是否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如今 70 年过去，“国粉”们对中共领导的抗战提出了种种质疑，要翻“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铁案的有之；以“国军”会战中局部胜利，贬中共游击战争“无用论”的有之；为蒋介石“抗战到底”的誓言辩护的有之；以蒋介石的“洋学生”贬毛泽东“土包子”的有之；甚至为“曲线救国”的汉奸论称道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里不是释疑之地，只想提出一个有共同认识却

有不同回答的问题，请“国粉”们思考：这就是不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弱国弱军对一个强国强军的胜利。这大概除西方人外没有人质疑。这样，我们总结抗战胜利的自身经验教训，都应该从这个基本特点出发。那就要问，创造这个基本特点经验的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又是一个可以撬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命运前途与国共两党分异的大问题，是既浅近又深奥的大学问，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为什么被帝国主义凌辱国到独立自强的转折要回答的大问题。

须知，历史是前后联系而有因果关系的，孤立地讲一段或以一些零星的史实加以片面的扩大渲染，抽去那些片断之间的逻辑关系，只能是主观的偏见，谈不上客观的反应。不要忘记，抗日战争前有国共十年内战，蒋介石称共军为“匪”，但“围剿”没有取得胜利，特别是红军长征中，几十万前堵后追的“围剿军”，仍然没能消灭红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有400多万正规军，又为什么不能战胜只有120多万的解放军？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批评蒋介石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事家，可惜章太炎没有看到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面前，内战内行也不成了。一个连“匪”的反对派也对付不了，又怎能称得上抗战英雄？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国共两党、两军的性质、宗旨、路线、政策中去找差异，让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来回答。

一位新四军后代，现国防大学校长刘亚洲上将曾对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评价说：“蒋介石是旧军阀的克星。毛泽东是蒋介石的克星。说什么‘胜不离川，败不离湾’，我的评价是四个字‘逢毛必输’。内战20年，生生锻出一支铁军，共产党无一地而夺天下，国民党坐天下而失天下。共军打国军，左右都是赢，国军打共军，横竖都是输。”这就是刘亚洲在“金门战役检讨”中的一段话。

值得称道的是，蒋介石尽管反共，但他毕竟是中国人。据资料显示，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挫败“联合国”军后，终于认输而推崇毛泽东，并对蒋经国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并表示要研究学习毛泽东。只可惜今天的“国粉”们仍然拿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身份，“以蒋压毛”，贬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值得深思。

铁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杨苗苗

【摘要】铁军精神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思想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一笔灿烂的遗产。铁军精神有其源远的历史和深刻的内涵，对当代大学生优秀品格的塑造、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继承、弘扬铁军精神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消化、践行铁军精神更是我们应达的目标。

【关键词】铁军精神；起源；内涵；启示；当代大学生

铁军精神的起源

想要深入了解铁军精神，必须追溯它的起源。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就不能深刻体会其涵义，更不能真正感受其力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继承、发扬铁军精神，否则，我们不管是自身学习还是教育后代，传递的都只是一具“铁军精神的空壳”。

（一）叶挺独立团

“铁军”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叶挺独立团。叶挺独立团于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成立，因在第四军中产生，1926年1月正式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为团长。叶挺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组建的一支人民军队，它信奉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政治上坚持军队革命化方向，组织上坚持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的先锋。

在贺胜桥战役中，叶挺率领独立团向吴佩孚军队发起进攻，攻至贺胜桥附近的黄家窑时，遇到刘玉春的第十一师这一劲敌，敌人炮弹齐发，独立团虽装备落后，但奋勇拼搏、坚持战斗，多次打退敌方。吴佩孚军队内部溃兵逃窜，第四军各部借这一有利形势继续奋战，攻克了贺胜桥。

此后，在汀泗桥战役和其他战役中，叶挺第四军独立团也表现了过硬的

军事实力。邓演达认为叶挺独立团是“战斗力最强，牺牲最巨，建功最大”的一支军队。能征善战、屡破强敌的强硬实力为其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二）红军

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1年4月，《中共闽北分区委第一次扩大会政治决议案》明确要求建立红军铁军。首先改造士兵成份，尽量的吸收纸工、船工、雇工到红军中去，但绝对不是强派，而是出于自愿，鼓舞工人阶级勇往直前的决心。其次，有系统的给指挥员与战斗员以政治教育，使红军中每一个分子坚定政治立场，启发群众斗争。建立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奋发其为阶级而拼命的决心，不避任何艰苦，与敌人抗争。在红军军纪方面，明令操练时要严肃整齐，上战场时要在指挥员指挥之下协同一致、冲锋陷阵。红军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在任何地方都要设法得到群众支持，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地位……，最后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与国民党的残酷斗争中，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铁军精神的基本内涵在根据地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中进一步构建起来，红军继承并丰富了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精神”。

（三）新四军

新四军是另一支重要的“铁军”。新四军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一部分红军被迫长征，而另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则留在南方坚持战斗。面对国民党的严酷镇压和“清剿”，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他们不屈不挠、顽强抵抗了三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为团结抗日，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终于达成将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福建、广东这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经国民政府与中共中央协商，决定任命叶挺为军长。1937年

12月25日，叶挺与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会议，意味着新四军正式成立。各路红军和游击队迅速集中皖南，与八路军共同开辟敌后战场，抗击日寇的侵略。

新四军继承了以叶挺独立团为核心的老铁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传承了红四军和红军游击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在八年抗战中进一步发展、发扬了“铁军精神”。

（四）人民解放军

继新四军之后，铁军精神并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得到了运用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广西第127师接到上级解放海南岛的命令。第127师的前身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历史最悠久的主力师之一。陈毅元帅曾评价它是“一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的钢铁部队”。该师从东北松花江畔一直打到南海之滨，征程万里，所向披靡。他们通过海上练兵，克服了晕船呕吐等的各种困难，弄懂了潮汐涨落的规律和测风、观云等气象知识，并且掌握了操舵、使帆等驾船技术和海上作战技能。许多干部、战士熬红了眼睛，磨破了手掌，泡肿了双脚，仍然坚持苦练，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迅速掌握知识，增大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抗日战争早已结束，他们本可以回到故土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但是他们仍然选择听从党的指挥，为全国的解放继续奋斗。这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对百姓的责任，对党的坚定信念。

铁军精神的出现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国民革命时期，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打击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了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肆“围剿”和疯狂镇压；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家卫国和洗雪民族耻辱；解放战争时期，为解放全国和维护民主共和；以及新中国时期，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法等战争。

总的来说，中国军人是为了解决内忧、抵制外患，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下，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投入到战争中去，而这些理想信念和强硬实力，逐渐凝聚成伟大的铁军精神。因此，铁军精神是在人民军队的建立发展过程

中逐步形成的。

铁军精神的内涵

铁军精神的内涵是其核心所在，也是支撑我们思想的重要精神支柱。铁军精神内涵丰富多样，我认为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一）热血爱国、不怕牺牲的精神

铁军作为一支冲锋打仗的军队，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气魄是给我们最直观的感受。“留书攻城”的故事一直被人们歌颂至今。北伐武昌之战，周士第指挥的“奋勇队”担任攻城任务。战前动员时，周士第带头留下一封家书、一包衣物和几块钱，表示为国捐躯的决心。他的举动鼓舞了其他奋勇队队员，都纷纷写下家书、留下遗物，以铮铮铁骨展示了革命军队的英雄气概。

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的英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其豪情壮举可歌可泣。孙国栋等在《不怕牺牲是铁军精神的根基》中写道：“铁军精神是新四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四军叶挺军长等高层领导人义无反顾，投身抗日，喋血战场，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死的精神，直接影响着全军的士气和斗志。”他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1940年10月，日军向皖南军部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叶挺负责指挥这场战役。面对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在战前誓师大会上，叶挺要求所有战士“要有与皖南国土共存亡的决心，要有为国家、为民族英勇牺牲的精神”。叶挺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镇定自若地问大家：“今天开的是什么会？”战士们回答：“战斗动员大会。”叶挺又问：“我们开会做什么？”战士们又回答说：“准备打鬼子。”叶挺再问：“打鬼子要流血牺牲，你们怕不怕？”回答：“不怕！”叶挺对全体官兵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我们为人民流血牺牲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怕死，就一定能够打败敌人的进攻。不怕死的举起手来！”下面的官兵齐刷刷地举起手臂。叶挺以身作则，用其豪情壮志和英雄气概感染了参战士兵，参战军队士气大振，战士们怀着一腔怒火和喋血战场的决心与敌人顽强拼搏，最终打破了日军对云岭地区的“扫荡”。

这些革命战士之所以能够冲锋在前、英勇斗争，是因为他们心中怀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首先，他们爱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们第一个站出来誓死保卫家园。他们是真正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出于对祖国和人民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一腔热血，奋勇杀敌，甘愿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心中的愿望。其次，他们相信共产党，忠于共产党，对党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包迪潮认为“党指挥枪”是铁军精神的灵魂。党指挥到哪里，铁军就打到哪里，抗击侵略，保家卫国，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作斗争，为人民谋利益，是最硬的“铁”。

（二）团结一致、共御外敌的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强大，四万万炎黄子孙面临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问题，而是种族灭亡的问题，正如国歌中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雪洗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新四军自觉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严重的民族危机，抵御外敌、民族解放、重获自由的共同理想把他们凝聚到一起，形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革命军队。

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才能形成同日军抵抗的强大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仅注重自己内部的团结协作，还尽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起来，真正实现全国人民的抗战。陈毅、粟裕等新四军将领不仅要求各级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社会情况，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宣传工作，通过登门拜访、书信来往等活动，争取到各地的开明士绅、社会名流、民族工商业者等，共同参与到抗日斗争中。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抗日联合战线中最主要的团结。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积极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努力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孤立国民党势力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这一战略方针为抗日争取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共同的信念将这个庞大的抗日群体凝聚得尤为坚固，众志成城，这为抗战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

吃苦耐劳、艰苦奋斗这一可贵的精神品质在铁军精神中尤为耀眼。这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优良美德的继承，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更是淋漓尽致地运用、丰富和发展了它。

井冈山时期物质极度匮乏，战士们吃红米饭、喝南瓜汤，有时候吃野菜、皮带充饥。睡的是门板，盖的是稻草。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红军依旧不放弃希望，正如《红米饭，南瓜汤》的歌词写道：“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大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红军官兵在敌人经济封锁下生活困难的情景，更反映出红军的乐观精神。

新四军战士王绍杰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坚持学习，他常说，一定要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艰苦朴素，从广东带来的一支钢笔和一根烟斗，用了多年仍保存很好。鞋子破了，王集成主任批准他换一双新的，但他不肯要，说这双旧鞋补一补还可以再穿二个月。他每个月的零用钱大部分节约下来，帮助有困难的战士和群众。有一次，政治部勤务员年荣光生病，王绍杰不仅亲自找医生来替他诊治，还买了鸡蛋面条，煮给他吃。这位战士感动得淌下热泪，说：“首长，您自己有严重的胃病，经常熬夜加班工作，从没有舍得自己花钱买鸡蛋吃啊。”与王绍杰类似的人物和事迹在新四军中随处可见。铁军的吃苦耐劳、逆境求生，外在表现为隐忍、平庸，实则是为后来的壮举积蓄物质和精神上的力量。他们心中有一个宏大的总目标，那就是民族解放，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眼前的艰苦都可以忽略。

（四）服从于党、党指挥枪的精神

铁军之所以能有效作战、所向披靡，一个重要因素是严格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党的决策和指挥坚决执行。一支强大军队的形成不仅要靠士兵的各项素质，还依赖于有一个强大的指挥中心，这是加强军队凝聚力、向心力以及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就是“党指挥枪”，他一直确认这是不可更改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解放为号召，制定革命斗争纲领，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英勇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南昌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一次武装斗争。1927年7月下旬，为了挽救革命，

武装反抗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同意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并派遣周恩来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认为国民党已经叛变，应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到蒋介石。贺龙在与周恩来面谈后欣然受命为起义军总指挥，并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贺龙在动员大会上同样告诉二十军官兵：“我们今天起义了，愿跟着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此后的井冈山和苏区革命斗争时期，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听党指挥，一次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

之前我有幸采访到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老兵杨作浩。1940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2月，担任中共浙南特委技术交通工作，前往浙东游击区打通联络渠道，将中央的指示带回来。此后他又被多次派往华中局进行联系沟通。他每次都能严格服从党的指挥，出色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在采访过程中，老人也骄傲自信地说他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抗战时期，不管是北方的八路军还是南方的新四军，都忠于党，无条件服从党。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和“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一原则。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全军进一步确立和健全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得到发展和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五）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精神

严明的纪律、优良的作风是铁军的一大特色，也是它能保持战斗力、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重要原因。彭雪枫率领的游击队在涡阳县时，明确规定了“五不走”的纪律：水缸不打满不走；地不打扫好不走；门板不上齐不走；借东西不归还不走；损坏东西不赔偿、不道歉不走。军队严格的纪律、良好的素质让百姓耳目一新，不仅没给当地百姓带来困扰，反而对他们大有贡献和帮助，因此被当地人民誉为“天下文明第一军”。

铁军的军纪和作风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得到发扬。1947年10月10日，毛

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即“双十训令”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军队统一的纪律被正式运用到军队中去，这对军队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早在秋收起义时三大纪律就已出现，192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林彪又加了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两项，最后成了八项注意。这些看似小小的举动，其中蕴含的意义是巨大的，细节之处可以看出大问题。部队士兵们做好事、存好心，对百姓真诚友善，真正融入到基层社会中去，自然就赢得了民心。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为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获胜奠定了群众基础。

（六）爱护人民、关心群众的精神

1925年，叶挺在《政治教育提纲》中强调，革命军是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民族解放、保护人民利益而斗争。只有爱护人民、为民谋利，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战胜敌人。人民军队能屡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和其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在中国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维护了广大农民的利益。据南京桤溪镇跃进村西舍自然村里80多岁的芮必贵老人回忆，陈毅曾担任新四军溧高县游击区政委，他军务繁忙，但总是抽空访问当地农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当陈毅得知6月正是苏南夏收夏种的黄金季节，如不及时抢种，将会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他随即主持召开干部会议，布置部队帮助农民抢收抢种，并身体力行。新四军不论长官还是普通士兵，都切实帮农民干农活、谋生计，他们懂得革命必须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而他们进行革命战斗的根本目的也是造福群众。这种和百姓同甘共苦的精神也感动了老百姓。农民们对红军、新四军也倾囊相助，并且许多百姓自身也加入到革命组织中来。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至今仍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员干部一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七）脚踏实地、勇于创新的精神

“朱德的扁担”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1928年朱德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许多基本的食物、生活用品短缺，温饱都成问题。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红四军发起下山挑粮运动，朱德也扛起扁担跟随队伍下山挑梁。朱德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比其他战士高而在一旁观看，他和普通士兵干一样的活。上到军官将领，下至普通一兵，红军战士的优秀品格不仅表现为战场上的英勇，还体现在平时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上。粮草不足他们就自己努力生产，军事技术不行就勤学苦练，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就是能做到。他们有崇高的理想，也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勇气。

脚踏实地并不等于循规蹈矩，铁军精神还有一大特色是勇于创新、与时俱进。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带领红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理论与实践、传承与创新的产物。在反“围剿”时，红军与国民党展开游击战，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毛泽东对士兵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不是懦弱，而是机动灵活。后来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有效遏制了日寇的侵略势力，这也体现了其创新精神。

（八）立足整体、统筹全局的精神

铁军精神中有一伟大之处就是其包容性。大革命时期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打倒帝国，除军阀”的口号下，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等人民军队联合国民党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当时国共两党虽然没有大的过节，但是能做到与其他党派合作，可看出其大局观念和整体意识。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为联合抗日，国共两党暂停内战，一致对外。此前，国民党曾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部分红军被迫长征期间，国民党继续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清剿”，使红军损失惨重。面对民族危机，共产党不计前嫌，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以大局为重、民族大义为先的胸襟和气度令人敬佩。

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赵凤藻带领一帮人进犯新四军驻地，结果，

他们不仅没有占得半点便宜，其独子赵保顺夫妇反被新四军俘虏。爱子心切的赵凤藻委派下属找新四军高级将领谈判，要求释放他儿子夫妇。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等接见了赵凤藻派来的代表。那位代表说：“只要贵军放人，愿先给贵军 10 挺机枪，100 支步枪，1 万发子弹，至于别的什么条件，请阁下提出，我们回去转告，遵照办理。”张副军长激动地反问道：“条件？什么条件！我们是抗日部队，大敌当前，只要共同抗日，枪口对外，我们就是朋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告诉赵凤藻，问他是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从民族大义出发，为民族大义着想，不要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只要他枪口对外，一致抗日，我们就能成为真正的友军。至于我军对待俘虏，一不会虐待，二不会滥杀无辜，除对人民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会宽大处理！”他又大义凛然地回答：“大敌当前，抗日是中国人共同的神圣职责，只要大家以民族大义为重，枪口一致对外，还有何仇何恨？”

国家危难之时，民族大义为先，私人恩怨在后，这种看问题看本质、抓矛盾抓主次的精神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

铁军精神对当代大学生的启示

铁军精神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如今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百姓温饱基本不成问题，以往战乱、贫苦的生活完全不能和现在相比。但这并不意味着铁军精神已经过时，相反，铁军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对我们依旧具有重大意义。铁军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支柱，是奋斗路上的一盏指明灯。

我认为铁军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对我们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尤为重要。大学生毕业后或者再经深造后，就迈入社会，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是一股马上就能注入社会的新鲜血液。因此，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养思想、政治以及各方面素质过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习铁军精神有利于当代大学生良好习惯和优秀品质的养成，

不管是对大学生自己的未来，还是对国家的未来，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1、学习铁军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大学生的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铁军精神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铮铮铁骨、为国捐躯”，这是在战争年代特有的爱国主义极端表现，非此无以报国。21世纪的世界总的来说是和平的，全球经济、科技迅猛发展。我国国内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得到保障，不得不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如今享受的一切优良条件都离不开先烈们的努力，中国的和平与繁荣富强都是他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先烈的爱国奉献精神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我们大学生应自觉继承、发扬这一铁军精神。

当代大学生一出生就处于和平安定、物质条件良好的社会、家庭环境中。从没经历过战乱之苦，没亲身经历过什么国家大事的当代大学生，对于“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几乎是没有深刻感受的。但爱国精神不能忘，先辈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可贵品质不能忘。大学生应学习铁军的责任意识，不能有“国家大事好像离自己很遥远”和“事不关己不痛不痒”的错误想法。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秉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切不可因个人私利做出损害国家公利的事。

爱国主义精神在任何时代都是绝对不能淡薄的，它关系到民族凝聚力的强弱，关系到整个国家未来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我们大学生作为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为中国的发展奉献一份力量。

2、学习铁军精神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大学生的团结协作和社会交往能力

当代大学生注重自我实现，集体精神和团队意识淡薄。一些大学生排斥与他人合作，过于看重与他人竞争，不想与他人分享胜利成果，这其实也是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经常性的独来独往导致他们的社交能力低下，而实践能力通常情况下和社交能力是成正比的，现在常说的“高分低能”学生大多数都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许多事情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是完不成的，只有通过与他人合作才能相互取长补短，取得更强的竞争力。在团队中与不同性格、习惯、特点的人合作能培养交际能力，而人际关系是合作的基础，良好的人际交往才能促成有效、愉

快的合作，因此社会交往能力和团队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当代社会对人际交往与合作的要求越来越高，许多企业单位都期望大学毕业生具有团队精神。因此，当代大学生在校期间，在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自身团结协作的能力，学会和别人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本领。一双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难折断，集体的力量不是简单的个人力量的总和，而是一加一大于二。在合作过程中我们难免会遇到摩擦，所以需要包容和理解，这也是锻炼大学生的胸襟气度、为人处世方法的很好机会。

3、学习铁军精神中的目标意识，大学生应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在物质条件得满足、不必为生活担忧的安逸环境中，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表现为对人生没有追求和动力。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理想，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而无所适从，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而迷茫困惑，最后碌碌无为，平庸一生。

我们大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一大特点是，既敢于做梦，不缺雄心壮志，又已经有一定的能力去完成梦想，因此，在这个敢想敢拼的年纪，如果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好的规划、能为自己设定一些目标，那么对大学生人生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理想信念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人们行动持久的精神动力，对未来有憧憬才有动力，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红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坚信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革命道路，坚定不移地为解放事业作斗争。正是因为有解放全中国的崇高目标，所以他们能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大学生不能安于现状，应有长远的眼光，树立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

4、学习铁军精神中的顽强拼搏精神，锻炼大学生的意志力和抗压能力

有梦想是不够的，在追逐梦想道路上可贵的是坚持不懈的毅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铁军在战场上和敌人厮杀，不用尽最后一颗子弹、不流尽最后一滴血决不倒下，其奋勇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敬佩；其顽强的意志力、强大的抗压能力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令人惊叹。这种精神和品质是走向成功的关键，应为当代大学生所传承和发扬。

孙兴洋说：“以‘铁军精神’育人的本质是塑造大学生坚强的人格”。

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吃不起苦，做事没有恒心和毅力，遇到挫折和困难往往选择半途而废。做任何事情贵在坚持，不经历黑暗怎么见黎明，不经历阵痛怎么迎接新生。在逐梦途中总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经验不足的大学生，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可能会耗费比别人跟大的力气，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也许在全力以赴后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但不拼一把肯定没有结果。有句话一直激励着我：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5、学习铁军精神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形成正确的三观

铁军有一大优秀品质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它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战乱时期资源紧张，不管是衣食方面还是武器弹药方面。铁军战士把节俭精神发挥到极致，不浪费一丁点粮食，衣服缝缝补补继续穿。游击队歌中唱道“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这也是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

现代人几乎都没体验过贫苦，如今我们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人们淡忘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美德。大学生中铺张浪费、奢侈安逸的风气愈来愈盛，这导致他们热衷于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上的富足，产生不思进取的不良现象或形成错误的人生追求。发扬这一铁军精神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胡锦涛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即使将来我们的国家发达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艰苦奋斗精神也不能丢。这种自力更生、积极向上的精神是正确引导大学生走向成功的指南针，也是引导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明灯。

6、学习铁军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培养大学生创新与实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品质

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等新战略体现了铁军精神中的创新思维，干农活补给粮草体现了铁军精神中的实干品质，铁军精神既有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一面，也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一面，只有这两方面完美的结合，才能有发展和进步，这些品质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

当今世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社会以及公司单位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为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大学生应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善于思考、有创新意识，还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然而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一些大学生有好高骛远的毛病，通常会比较浮躁，难以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地做事。但是，只有在平常“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中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底蕴和广博的见识，去发现和创新。

大学生在学校里学习是为将来在社会上工作实践做准备，大学四年的学习对将来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应运用铁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学好理论这一基本功的基础上开展一些社会实践，把课本知识和亲身体会结合起来，积累经验教训。

除此之外，铁军的严明的纪律性也是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习的方面，遵纪守法、道德自觉、不触犯法律高压对于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大学生来说，是一项必须做到的义务，也是开展其他活动的先决条件。

总之，学习、践行铁军精神对我们当代大学生品质养成和人格塑造具有重大意义，对我们未来的发展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日。铁军精神是在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中形成的，重温铁军精神意义重大，特别对当代大学生的培养影响深远。我们不仅要铭记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斗争，更应传承其不朽之精神，为民族进步和个人发展继续奋斗。

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及其反应

李华文

【摘要】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战后的中国民众展现出一幅百感交集的心理情感画面。欢喜与狂欢是民众获知胜利后做出的第一反应，随之则是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与憧憬。然而，随着各种社会乱象的相继迸发，民众的失望乃至绝望之感也愈发明显。在此心理状态的转换过程中，民众对于这个已经变化却又没有根本变化的战后世界，表现出一如既往的茫然与惶惑。概而言之，战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是矛盾对立却又真实自然的，这与当时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相互对应。

【关键词】中国民众； 心理状态； 抗战胜利； 复杂多样

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族共同苦难与共同记忆。国内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及认识，早已超出学界范围而延伸至坊间里巷，也超出了人们对历史现象本身的考察，而演化为一个全民探讨的社会议题。就学术界而言，关于抗战历史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囊括了战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大后方建设等方方面面。

然而在众多学术研究中，有关战时民众心理状态的探讨，则较少为学界所关注。个中缘由，除民众心理偏主观推测而难以真实把握之外，也与传统史学研究偏重宏伟叙事模式与精英阶层活动的学术习惯有关。但坦率地说，战时民众心态的问题，理应是抗战史研究中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视野需要下移的缘故，更在于历史本身：历史固然是大事件、大人物异彩纷呈的画面播映，也是小事情、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细节展示。比之官方的报道、宣传、描绘，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惧与爱恨情仇别等情绪情感反应，往往能更全面地反映纷乱繁杂的历史原貌，也更为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及后来者所权衡考量。基此，探讨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问题，便显得具

有学术探索价值及现实警醒作用。

一、漫卷诗书喜欲狂：胜利之际的喜悦与狂欢

“剑外忽闻收冀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名作，在1945年的8月，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与街头巷尾。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与兴奋。无他，抗战胜利了，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了！多年以来的梦想，生者与死者共同的夙愿，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对亿万中国百姓而言，惊喜成了他们的第一反应，喜极而泣随之而来，之后便是彻夜的狂欢。作为胜利者，他们需要场合和仪式，来为这场渴望已久的胜利进行庆祝。

在湖南芷江，日本投降的消息顿时令这座湘西古城热闹欢腾起来。正如记者看到的那样：

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兴地喊着“日本投降了”！又是跳，又是跑的，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头脑。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尽情地跳啦、唱啦、走啦。路边摆杂货摊的、水果摊的，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唱，欢迎大家任意来拿，随便来吃。^①芷江是正面战场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的重要战略点，又是中国受降的第一站，如今有多大的欢乐，便意味着过去承载了多大的苦难。若非亲身经历，后人很难体会到“抗战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所带来的喜极而泣的心情。

在陪都重庆，胜利的消息传来，“千千万万的市民涌到街头，一片海涛的欢呼，连珠炮串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中国民众的亢奋之情也感染了同属反法西斯阵营的在华美军：“街上一吉普车、一吉普车的美国兵竖起了大拇指，在市民的呼声中也发狂的呼喊……一个狂欢的美国兵把联合国旗抢下就走”。^②

在北平，自七七事变起，至此已有八个年头。期间，多少人付出性命身

^① 张彦：《日本投降那一天》，见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芷江受降》，岳麓书社，1997年，第295页。

^② 《山城沉浸于狂欢中》，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0日。

家，遍尝流离之苦。而今胜利已至，个中滋味，岂是只言片语所能表达清楚的。热泪狂欢成了最合适的庆祝方式。8月15日深夜，“街上巷尾很快挤满了人，大家眉开眼看，欣喜若狂，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所有学生都把学校附近建筑工地的木材给劈了当火把”，“大家在整个山上点火吧，到处跑着去庆祝，高兴地都跟疯了似的”。^①

在延安，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消息传来，当地军民兴奋得难以入眠。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描述了当晚（8月10日）的情形：

消息像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向街上奔走，向广场奔走……有人在传递火把，有人举着火把来了。拿着火把的都出发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愈来愈多了……日本投降了，没有话比这更动人，更美丽！^②

此刻，对于承负着深重苦难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任何逻辑性的言语行动都是多余的，唯有无意识的欢呼雀跃才能宣泄此时心中的狂热与亢奋。

在广西桂林，日本投降的消息便传遍了全城。一片沸腾成了这座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全城军民狂欢至深夜，手枪、机枪、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九、十、十一，连三日捷报消息频频而来，各界狂欢”。^③日本的投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他们再也不用过担心受怕、朝不保夕的日子了！

在上海，久违的阳光与欢乐的笑语，重新回到了这十里洋场之上。“灿烂的国旗在街头巷隅飘扬着，迎着青天白日高高的悬起，成了一个国旗的世界。欢欣的呼喊，声震天宇。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哀的喜悦”。^④日占时期的上海滩依旧歌舞升平，但那却是在日军刺刀逼迫下的一种“繁荣”假象，期间参杂着无数的血雨腥风。如今抗战胜利，外辱已清，倒是真正地彻夜狂

① 引文资料为抗战老兵赵勇田和许植口述回忆，见光炜、周进主编《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口述》，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90页，第93页。

② 艾青：《人民的狂欢节》，见刘晓峰主编：《永远的八一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39页。

③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倥偬戎马上将军》（下），（台北）龙文出版社，2001年，第721页。

④ 《重见光明》，《上海妇女》（创刊号），1945年第1期，第40页。

欢了一把。

在东北，8月15日那天，自伪满新京（长春）至漠河边陲，中国民众不再噤若寒蝉、唯唯诺诺，而是四处奔走呼号，歇斯底里地狂笑、狂呼、狂欢。整个东三省，自九一八之后便再没有这般热闹过了！“人们自发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纷纷走上街头，高兴地喊着：‘日本鬼子完蛋了！祖国光复了！’”。

“一切都解禁了，市场上什么东西都出来了。大米、白面自不待言，其他生活必需品，如猪羊牛肉、白糖点心、布匹服装等应有尽有”。^①对东北民众而言，难以入眠的不仅是今夜，更是过去十四年的耻辱与抗争。

在湖北宜昌，“鞭炮是尽情地燃放，直到商店脱销，酒是尽情地痛饮，直到餐馆宣布酒已卖完”；在四川遂宁，“全市惊喜若狂，火炬鞭炮通宵不绝”；在晋中平原，“人民沸腾了，到处是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在福建某镇，“通宵达旦的鞭炮声、欢视声、钟声、歌声”，使人“坠入一种因过分喜悦而起的迷惘中”^②……

此时此刻，最为高兴、最为亢奋的当是那群被掳至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这是他们重见天日的日子。从此，再也不用担心曝尸异域，归国团聚成了摆在眼前的事实。正如战俘自己回忆的那样：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一会相视齐笑，一会相拥齐笑，真不知如何来形容我们那时的快活”！^③待及归国之际，“各自的老乡街坊和对脾气的朋友喝起酒来，整个房内都是猜拳声、碰杯声、欢笑声、吵闹声，混为一体，分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话语”。^④

更有甚者，有人趁着抗战胜利的喜庆劲头，办理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如

① 刘晓峰主编：《永远的八一五》，中华书局，2005年，第87页；高丕琨：《在苏联战俘营》，见文裴编：《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332页。

② 刘宏治：《难忘的“8·10狂欢之夜”》，见《宜昌文史资料》（第16辑），1995年，第317页；《调查统计·各地金融及商情备忘》，《金融周刊》，1945年第1卷第20期，第12-15页；武人骥：《日本投降后的晋中平原》，见《山西文史资料》（第23辑），1982年，第103页；秋隐：《抗战胜利致使中站》，《福建妇女》，1945年第6卷第3-4期，第12页。

③ 《被俘的战士群荣归祖国怀抱》，《申报》，1946年3月22日。

④ 郭善兴：《被日本掳去北海道当劳工的回忆》，见本书编委会编：《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第三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31页。

重庆的王贻荪与贵阳的杜润枰，这对情侣便在9月20日的胜利纪念月里喜结连理。也有人借此历史性标志时刻，给自己改了名字或生日，以示庆祝、纪念。如抗战老兵李建堂即将自己的生日从8月23日改为了8月15日。^①

事实上，比起政府庄重严肃的庆贺仪式来说，民众自发的欢庆活动则显得简单直白得多。大多数普通百姓对于抗战胜利带来的民族尊严与国家复兴是难以明了，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往后的日子里，自己和家人再不用在日本人明晃晃的刺刀下胆战心惊地生活，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走在中国大街小巷！他们用各种自己能够理解或不能理解的方式来庆祝这一伟大时刻。其中，最简单却又最实在的庆祝方式便是像过年一样，呼引亲朋，大吃一顿，大耍一场：

这一天（8·16），全城家家都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母亲和大娘在厨房忙了一个上午，做了一桌菜。父亲拿出了尘封多年的西凤酒……又拆开了一挂鞭炮，让我把鞭炮点着……全家人向祖先拜祭……正午时，全家一起落座，还请来前院阎大叔和阎大婶，大家欢天喜地地吃了一顿顺心饭。^②

二、本能的反应：对战败日人的愤怒与宽恕

中国民众在兴高采烈地庆祝祖国胜利的同时，也自然不会忘记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人是情感性动物，大悲大喜之后，需要寻找各种的宣泄方式，暴力亦是其中之一。尤其对背负国恨家仇长达十几年的中国民众来说，更是如此：血债必须血偿，日本人就是该死！这大概是当时大多数百姓真实而粗暴的想法。或许，民众对于3500万的人口伤亡和6000亿美元的巨经济损失难有体会，但他们对自身的家破人亡与颠沛流浪却有着真实的切肤之痛。^①这一点在被掳的中国战俘劳工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只有他们

^① 王正华：《关山万里情——家书中的战时生活（1937-1945）》，见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4-735页；《李建堂的回忆》，见光炜、周进主编：《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口述》，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② 李冷文：《日本投降当日见闻》，见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政治卷·卷四），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41页。

最清楚日军的残暴程度有多么恐怖。故此，他们在获知抗战胜利而欢呼雀跃的同时，亦不能忘记向日军索还血泪之仇。

工矿及集中营的军警看守，平时作威作福惯了。日本战败消息传回后，他们成了中国劳工首先发泄怒火的对象：

我战俘因业已战败的日人，竟敢如此相欺，都极愤激，就用手边任何物体向日军投掷，终将日军十六人解除武装。^②

看到以前虐待我们的警察宪兵就要打，美军初不来干涉，等我们打了以后，才过来把敌人的警察宪兵拖开去。后来参加中国作战的日兵亦有些回来了，我们听见有对我们说中国话的日兵就要打，因为断定他们是打中国人的敌人。^③

人群中不知谁喊一声：“打龟孙子去，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一声把闷在人们心头的无名烈火一下子燃烧起来……200多位中国劳工手持铁棍、木棒、砖块、石头，像出笼的老虎一样，直向日本监工们扑去。他们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我们边追边打。^④

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中国劳工发泄仇恨的一时报复之举，往往来得快，去得也快。当然，情急之下，亦出现过“过界”的暴力报复事件。如劳工王永堂回忆的那样，他们与日本看守因悬挂国旗的问题起了冲突，打斗中，他们割掉了一个日本人的两个手指头。但此类事件不过是个别现象，大多数中国劳工在日本人主动低下头，而美军占领当局又给予较为良好的生活待遇，并承诺分批遣送归国后，他们大多能够在表面上放下仇恨，不再深究日人罪责（这也与他们的实际处境等因素有关）。

需加以说明的是，中国民众对日人的暴力泄愤之举，大多是在日中国战俘劳工所为，而国内的平民百姓基本没有此类举动。这倒不是因为国内民众

① 所引数据参见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下），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第508页。

② 《盟国纷纷抢救在日战俘，我国战俘竟无人营救》，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1日。

③ 《被俘的战士群荣归祖国怀抱》，《申报》，1946年3月22日。

④ 徐言认口述，张文焕整理：《不堪回首话当年》，见《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第三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81页。

心地仁慈，不想报复，而是投降后的在华日军依旧保持着不可一世的“皇军”气势及势力。以战后北平日军为例，他们不接受战俘的称谓，也未完全缴械，仍旧保留着部分武器。更甚者，中国军政长官巡视投降日军时，仍需带领一众荷枪实弹的士兵方能保证自己安全。^①此等情况之下，国内民众暴力泄愤之举自然少之又少。但这并不代表国内民众不发泄愤怒，他们只是将泄愤的对象转移到汉奸身上。一如老兵赵勇田所言，“老百姓抓住汉奸往死里打，我亲眼看到市民把汉奸扔到中南海里去”。^②搜捕并惩处汉奸成为一时紧要之事，往往无需政府调查，百姓自己便动起手来。

事实上，国内民众对于已经投降且不再为非作歹的日军，大多时候还是抱以人道主义同情态度的。正如一位看守南京投降日军的中国军官说的那样：“未来此受降时，本想见了日本鬼子就痛打一顿，方消心头之恨。及至见他们一个个像绵羊一般，狼狈不堪，非常可怜，又不禁仁慈起来。”而集中营内日军官兵的吃住状况更是良好，“每人每日可得米十两、面八两、肉二两、菜十六两……他们可以自己种菜……可以安静地养病”，且“除了修路筑工以外”，他们也不会遭受其他身体上的外加负荷。^③至于他们外出时，只要不再行凶作恶，也不会招致中国百姓的打骂。可以说，投降日军的基本生活远比一般中国民众要好上许多。这就与日军对我战俘劳工的处置形成巨大反差。其中，固然有国民政府以德报怨的政策宣导，及投降日军残存势力的潜在威胁，也与中国民众的宽恕态度及人道之情直接相关。关于国人这样一种人道同情态度的评价，自然是众说纷纭。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说法有其历史之合理性及警醒性，但仅就从尊重生命本身角度来说，民众的宽恕态度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另外，对于部分被掳至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而言，他们在狂欢与泄愤之余，也表达了与部分友好日人的不舍之情。这样一种现象较为罕见，但毕竟

① 子默：《沉默的访问：北平日军日侨集中营一瞥》，天津《大公报》，1945年12月5日。

② 抗战老兵赵勇田口述回忆，见光炜、周进主编：《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口述》，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94页。

③ 韩笑鹏：《南京日军集中营》，《申报》，1945年11月26日。

存在。比如劳工王永堂提及的他们与一对日本父女的友谊。那对父女是矿上的监工，但他们不像其他日人那样随意打骂虐待中国劳工，而是尽力改善劳工生活。以至日本战败后，矿上的中国劳工还拿着罐头、饼干、香烟等一大兜东西去看望那对父女。后来劳工归国，父女俩也是亲自送他们登船。正如王永堂说的，“这父女俩对我真不错，尽管有些日本人那么坏，但其中也有好人，我至今仍在心里感谢他们”。^①更甚者，有何中堂等一批中国劳工与工矿附近的日本女子暗生情愫，进而结为夫妻。战后归国时，造化弄人的历史大势让这批注定分离的年轻夫妇泪眼相对。此刻一别，大抵天各一方，余生难见。^②对于这种战争环境造成的畸形却又正常的感情，后来者大可在民族立场与政治信仰等多个方面加以评述，但却难以从情感道德本身角度去加以否定。

三、平淡的日子：平民大众的憧憬与惶惑

战争结束了，战后的狂欢也日趋平静。百姓开始憧憬并筹划和平后的美好生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蓝图过于宏伟飘渺，并非他们所关心、所理解的。他们在乎的不过是一个个简单实在的愿望。概括来说，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返回故土家园，守着家里老小，过平淡而知足的日子；二是不断改善自身物质生活状况，满足自己及家人的一些心愿；三是渴求国家和平稳定，再无战祸危及身家性命。

外出征战的兵士憧憬着解甲归田、归家团聚时的感人情形：“我们可以洋洋得意地回故乡了，就是在梦里，每个人都在喊，‘妈妈，我回来了！八年啦，多长的八年啦，我们已脱去黄毛，将转变为白发了’”。^③

因战争而分隔两地的情侣，则相互倾诉着思念之情，憧憬着久别重逢后

^① 《王永堂的回忆》，见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社会生活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4页。

^② 何中堂原稿，刘耀德整理：《泪洒东瀛》，见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社会生活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61页。

^③ 《抗战胜利了》，《家》，1946年第11期，第27页。

的温馨及甜蜜。一如重庆的王贻荪与贵阳的杜润枰，他们已在筹划婚姻大事。当然，更多的却只能像上海的张篷那样，天天留心着报纸，日日祈盼着心中的伊人能够早日归来。^①

而对于颠沛流浪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此时则大声呼喊“大减价”“大倾销”等口号，急急忙忙地将自认为多余的物品陈列于街头，半卖半送出去，以求尽早还乡，一解思乡之苦。^②

还有农民和商贩们，他们拍手欢呼道：“好了，我们的征调会减了”，战时的各种苛捐杂税也应该停征了。^③另外，由于各地物价纷趋下跌，众商贩无不满心憧憬，摩拳擦掌，准备为即将到来的美好日子奋斗一场。

可以说，对于战后生活，百姓大多觉得“抗战胜利以后，生活水准自必相当提高。从前为了生活，为了节省资源，穿着破衣服，现在我们是应该换衣服的时候了”。^④但是，民众的这种感觉普遍是模糊的、不明确的。他们在对战后世界满怀憧憬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的迷惑与彷徨。

首先，民众对于战争本身是否胜利结束便怀有疑问。在柳州，迟至八月底，当地的农民与士兵仍不敢确定日本是否真的战败了。在武汉、广州等地，手持武器的日军数量依旧惊人，甚至比国军和美军还多。甚至出现日军公然违反投降规定，肆意破坏机器、焚毁仓库、烧杀抢掠等现象。难道这是中国式的奇特胜利？难道祖国的胜利只是侥幸的，而非自我奋斗牺牲的真实战果？^⑤即便确定战争已经结束，可民众还在担心是不是还有下一场战争要爆发？国共两党是否要开战？美国是否要入侵中国，要不为什么平津两地

① 王正华：《关山万里情——家书中的战时生活（1937-1945）》，见《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4-735页；张篷：《怀女勇士》，《申报》，1946年2月14日。

② 《陪都鳞爪》，《国讯》，1945年第400期，第7页。

③ 《抗战胜利了》，《家》，1946年第11期，第27页；《市商会呈请停征战时消费特税》，《申报》，1945年9月2日。

④ 《今后的工作与任务》，《申报》，1946年1月28日。

⑤ [美] 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第625页，第676页；罗元铮总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四卷·钟山风雨〈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31页。

的美军比国军还多？^①诸类的疑惑还有很多，颇让民众难有明确答案。

其次，面对回得去和回不去的故土家园，百姓充满了百感交集的苦楚与惶惑。这一点在外出从军者和逃荒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很多人来说，故乡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即便回去了，也已物是人非、一片废墟。战前的繁华地带，及至战后，“大地上到处是荒芜的农田，遗弃了的乡镇和颠沛流离的人们”，而在“破碎瓦堆中常能见到刚刚死去的尸体”。^②此等情形，岂能让祈盼已久的归乡者心中郁结。更甚者，已无家可归，无亲朋可聚守：“我在日本干了大半年的活……全家跟着遭受磨难，家里土地荒了，妻子也改嫁了”。^③“等我回到家时，全家只剩下从陕西逃荒回来的老母亲一个人了，弟弟和妹妹早已因饥饿而夭亡”。^④

再次，战后的生活常常让民众感到难以适应，充满困惑。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出现积极向上的建设与复兴热潮。反之，各种庸散奢靡、得过且过的社会风气却在各大城镇迅速弥漫开来。比如在南京，“全市各处都显着冷落萧条，惟独夫子庙歌舞升平，各舞场都是舞池小，舞客多”。^⑤里面的灯红酒绿与外面的贫穷萧条形成强烈的反差，又如何让来来往往的民众相信这是一个复兴建设的年代？而对于那些小公务员来说，“签签到，看看报，抽抽烟，谈谈天”，无聊而琐碎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庸散麻木而又习以为常。难怪当时记者感叹道，“这个世界越被麻醉越好”。^⑥

在民众迷惑彷徨之余，各种祭神活动便多了起来。这种古老的鬼神信仰

① 燎原：《北平人民的怒火》，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8日。

② [美]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第624页。

③ 王留柱整理：《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口述实录》，见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社会生活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82页。

④ 李松林口述，萧铭执笔：《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日本当劳工的痛苦经历》，见毛德富主编：《百年记忆——河南文史资料大系》（社会生活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57页。

⑤ 梅焕藻：《南京近事》，天津《大公报》，1946年2月15日。

⑥ 《国民党高级政工自供 南京官吏荒淫无耻，亡国现象触目惊心》，《晋察冀日报》，1946年11月7日。

仪式，往往心理安慰作用大于其实际效果。作为一种闲暇活动本无不妥，但在战争年代下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寄托，则未免有逃避现实之嫌。抗战胜利后，更有若干民众在第一时间内杀猪宰羊，祭祖敬神，以谢天恩。更甚者，甚至将抗战胜利之荣光归功于神的施惠，“究竟有没有神？好像神已睡觉，不理他的子民呼求，实则神在天上，何曾一刻忘记我们”。^①固然，民众不可能全然相信所谓的鬼神之力，不过是寻求一种心理慰藉，但这也确实是现实茫然下底层百姓精神世界侧影的另一种写照。

概而言之，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彷徨迷惑，源于他们对战后中国时局与环境走向的不解，也是他们在自身渺小力量与社会现实碰撞后，做出的一种被动性反应。

四、悲喜一瞬间：国土重光后的失望与绝望

抗战胜利后，民众曾以为世界变了，往后的日子将好过了。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错觉。短暂的狂欢与无尽的困惑之后，各种社会乱象接踵而至，国民政府更是将战后的大接收演化为一场“大劫收”。乱世灾荒的世道依旧支配着大多数人的命运。战后的世界没有根本的不同，空气中弥漫起各种失望乃至绝望的气息。

从大接收到大劫收，百姓的心理防线遭到了一次致命性的打击。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便遭殃！在平津，民众最初对接收人员极为热情，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可接收人员一到，他们便失望了，并愤怒了。接收大员到来后，基本上只做一件事：抢！抢房子、车子、票子、女人、汽油、地盘，等等。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各路招牌的接收人员前去争抢。^②为此大打出手之事屡见不鲜。对此，时任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在日后予以了承认：“所谓的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的，实在是劫收”，“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

^① 周恒：《为抗战胜利感谢神》，《希望月刊》，1945年第17卷第10期，第17页。

^② 《汉奸攀亲结贵尽作新官，员生失业失学都沦苦海》，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8日。

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接收人员似乎要将在抗战中失去的油脂油膏一次性地从百姓身上搜刮回来！他们想方设法地制造搜刮钱财的机会。为此，不惜随意安插汉奸罪名，任意逮捕百姓以图赎金，一时社会上人人自危。有势力及名望者尚可求救于行营，赤脚百姓却只能够自求多福，因此家破人亡者不在少数。^①而真正的汉奸，却往往在金钱交易的庇佑下逃过一死。如伪北平商会会长邹泉荪即大言不惭道：“花钱赎罪是中国官场的惯例”，并最终获得保证：只要钱给足了，便可性命无忧。在当时的平津市面上，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为大小汉奸游说钻谋的职业“经纪人”。两相比较，百姓焉有不失望、不愤怒之理！用当时记者的话来说，北平人民的心理经历了“渴望—希望—失望—怨望—仇恨”这样一个扭曲的过程。^②

以海南岛的战后“劫收”为例。据曾任广州保警总队副队长一职的张家焯回忆，一个多月的接收，他们中饱私囊的物资计有：生胶近二千吨，车胎五千多套，布匹一万多匹，大米近百万斤，大小汽车三十余部，西药七十多箱，食用罐头数千箱，以及各种难以统计的零碎物品。^③当时的海南不过一贫穷落后之岛屿，按程序接收之余，尚可压榨出如此之多的油水，那么，平津苏沪等地区又会遭受何等劫难！难怪时人抨击国民政府：“接收京沪以来的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④更甚者，有民众指出，政府的敲诈勒索比日伪统治者还要可恶：“我十分遗憾，悔不该置全家于险境。现在国民党政府从西边迁回来，事实证明，不值得为这样的政府卖命”。^⑤

除此以外，战后一如既往的贫穷生活也让民众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战

① 政协广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内刊），1980年，第856-857页。

② 《汉奸攀亲结贵尽作新官，员生失业失学都沦苦海》，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11月18日。

③ 政协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19辑），1965年，第189页。

④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五册》（1944-194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307页。

⑤ [美] 格兰姆·贝克著，朱启明、赵叔翼译：《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第680页。

后的中国，天灾人祸依旧。且不说持续不止的兵灾匪患，仅自然灾害一项，便让百姓苦不堪言。据不完全统计，仅1946年一年间，全国便有5省46县遭受水灾，5省38县遭旱灾，7省55县遭蝗灾等。是年，全国受灾总人口更是达到57680000多人。^①数目不可不谓触目惊心！而国民政府在此善后救济中，却基本依赖联合国救济总署之力。但即便救济过程中不出现任何贪腐漏洞，联总的救济力度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总值约5.35亿美元的救济物资，平分到4.55多亿的中国人身上，每人不过分得约1.17美元的救济款。^②百姓若指望于此，无异竹篮打水。更何况，救济过程中，各种中饱私囊、与民争食甚至抢夺民食之事，更时有发生。当时便报道了一种令百姓难以接受的平糶方法：民众高价购买回来的平价粮，竟是混杂着泥块、砖头、马粪、沙子、破席条等杂物的“米面”。^③更甚者，如长沙宁乡等地，全村所得赈款不过三千元，而“招待”放赈人员的费用却达到五千余元，且全程由饥民抬轿接送。^④由此一来，百姓对政府的失望之情，不可谓不强烈。

灾荒还只是导致民众对现实生活绝望的冰山一角，更让人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是生死存亡面前的尊严扫地。饥饿成了绝大多数人难以忍受的事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遍了几十家米铺，全是升斗朝天，空空如也”。饥肠辘辘之下，卖妻鬻子或甘为娼妓者数不胜数。以桂林一地为例，“十斤米便可以真个销魂，十斤票也可以纵情淫欲……能够带回家里养得起的，便是你的老婆。拿了钱，她们还会千恩万谢……争相卖笑”。^⑤毫无疑问，正常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干这种尊严扫地的事，但在对现实绝望之后，为了活命，民众却不得不做。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有入室抢劫之盗贼，其目的仅是为

① 罗元铮总主编：《中华民国实录》（第五卷·资料统计〈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95页；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393页。

② 殷梦霞、李强选编：《民国善后救济史料汇编》（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52页。

③ 《故都剪影·非查办不可》，北平《解放》，1946年4月2日。

④ 方言：《1946年饥荒惨况》，见刘苏华、李长林选编：《湖南近现代社会事件史料选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6页。

⑤ 梁小中：《为了要活命卖灵肉》，《申报》，1946年5月4日。

了饱食一顿稀粥！^①

最让百姓感到绝望的还不是上文所述之事，而是走投无路之下的坐以待毙与人食人的惨象。据资料记载，湖南零陵一地，仅1946年2至4月间，便有万余人死于饥饿和疾疫。衡阳一地，仅1月份，便有10余户人家集体自杀，河流和池塘内到处漂流着无名的死尸。而在祁阳，竟有人刨食树旁新近殍埋的死尸，以图活命。^②绝望之下，唯有万念俱灰一词适合形容此时民众的心理状态。他们甚至产生一种错觉：国土重光后的世界似乎与日占时期的世界并无不同。从满怀希望到普遍绝望，理想幻灭后，难道真如报纸上说的那样：“这年头，人命不值钱，老百姓活该倒霉？”^③

五、别样的感觉：台湾民众的欢喜与失望

抗战的胜利标志着自甲午战后日本抢占之台湾等领土将重归于祖国怀抱。光复一词，在这一年传遍了整个台湾岛。大陆民众在战后表现出来的欢喜、兴奋、失望、困惑、绝望等各种情绪情感，同样弥漫于台湾的大街小巷。同时，部分台湾民众还因抗战的胜利而流露出阵阵的不安与忧虑。这一点既有现实利益冲突的考量，也有五十年日治时期的历史遗留影响。

首先，对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抗战的胜利意味着日本殖民时代的结束，父祖辈及自己多年来回归祖国的心愿得以偿了。这如何不是令人值得欢喜兴奋的事情！一如时人所言：“今重归祖国怀抱，五十一年来抗日志士的志愿，业已获偿，志士英灵当获安慰”。^④

当日本投降消息确定下来时，整个台湾岛都沸腾起来。台北市民为了庆

① 《替强盗可怜 抢薄粥》，《申报》，1946年5月4日。

② 方言：《1946年饥荒惨况》；《人间最大惨剧》，湖南《国民日报》，1946年5月25日。见刘苏华、李长林选编：《湖南近现代社会事件史料选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65页，第1069页。

③ 陈滢：《春秋·墓地一角》，《申报》，1946年8月26日。

④ 黄玉齐主编：《台湾年鉴》（6），（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第1997页。

祝胜利，“将常年匿迹的花灯、花篮、绣彩拿出来装饰，并大放鞭炮，全市化为欢呼漩涡”，而在台日人则大都出来街上，排成两列，低头不语。台人吴濁流回忆起当年情形，激动得说道：“五十年间的皇民运动，只仅一天就吹走了”。^①待及台湾首次庆祝双十节，“夜间演戏，放炮舞厅，人心振奋到极点”。可以说，台湾民众的欢喜知情绝不亚于大陆百姓，并因五十年殖民统治的结束而更显几分喜极而泣之感。一首唱遍当时大街小巷的歌谣，颇能反映出是时台湾民众的欢喜心情：“台湾今日庆升平，仰着青天白日清。堂堂旗鼓往东瀛，和东人方遍地生。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②

然而，和大陆民众一样，胜利的喜悦只是暂时的，台湾民众对战后社会的不满与失望接踵而至。与大陆的接收不一样，台湾是重新回归祖国。国民政府对此颇为重视，派出以陈仪为首的军政人员赴台接管。新届台湾当局亦做出“不偷懒、不撒谎、不揩油”的三不政策，表示为台湾发展竭尽全力。^③但事实上，接管人员一入台，便令台湾民众普遍感到失望、不满，乃至愤怒。首当其冲的便是入台国军的形象及行为问题。台民一开始对接管部队还是充满了期待的：“（台北市内）三十万市民夹道欢迎，大多市民从晨八时起，即携带饭盆……扶老携幼，拥至车站街头，准备久候”。^④毕竟是五十年来第一次目睹祖国军队进驻台湾，此等振奋人心之事自然勾起无数市民的兴趣。但是，作为精锐部队的国军70军士兵，却呈现出一幅邋邋散散的画面：

士兵头上戴的不是竹篾编的斗笠，就是破烂的帽子（日本兵戴的是挺硬的战门帽），身穿笨厚的棉袄（日本兵的军服苗条），脚穿的不是破鞋就是草屐（日本兵都是踏地有声的皮鞋）。而最奇怪的莫过于背大锅、带雨伞、

① 吴濁流：《无花果》，（台北）前卫出版社，1992年，第160页，第169页。转自戚嘉林：《台湾史》（全五册），（台北）国家图书馆出版，1998年，第1925页，第1940页。

② 此歌词为当时台南师范学校汉文教师陈保宗所作，歌名为《欢迎歌——庆祝台湾光复》，见戚嘉林：《台湾史》（全五册），（台北）国家图书馆出版，1998年，第1931页。

③ 许极燉：《台湾近代发展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第476页。

④ 黄玉齐主编：《台湾年鉴》（6），（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1年，第2000-2001页。

挑木篓……有的老兵，也有十几岁未成年的“团仔兵”，把枪杆当扁担，拖拖拉拉地行进，哪像部队……队列内甚至有拉着幼童的士兵，再仔细观察，竟有一只眼睛的……坐在广场上，安置中国式饭锅，开始忙着炊煮，后用听不懂的语言，边吵边嚷吃起饭来……见屋里没人就进去拿东西。坐车不买票，搭火车不走正门，而从栅栏跳进去，上火车则从车窗钻进去……一般民家鸡笼、鸭笼时常无故失踪^①……

很明显，台湾民众早已习惯了装备良好、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对慵懒散漫、装备简陋的国军，根本就难以接受，甚至有些看不起。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所以台人很难想像到这样一批泥脚子兵，到了最后，竟然可以击溃精良的日军。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国军军纪之庸散难束与满身的兵痞风气，的确很难让人留下良好的印象。仅此而言，台人的感觉大体不假。

真正让台湾民众感到愤怒的则是接管人员的贪腐牟利之风，这一点和大陆的“大劫收”并无不同。贸易局局长于百溪中饱公家物资，折款数千万(台币)，并利用职权倒卖物资，做起进出口生意；专卖局局长任维钧弄出个“食盐1万担被抢，鸦片被白蚁吃掉70余公斤，糖损耗数十万斤”的谎言，为自己贪腐行为狡辩；台北某县县长陆桂祥伙同辖区官员，侵吞接管物资，折款数亿(台币)。甚至连台行政长官公署亦被指责纵任15万吨白糖流向大陆，并从中吃拿巨额回扣，等等。^②诸类事情还有很多。国民政府贪腐成性的官僚系统，令其在接管台湾之初便失去了部分民心。至后来爆发“二·二八”事件，亦有历史之伏笔可查。

此外，台湾民众在抗战胜利后，还存有些许不安及忧虑。由于长期日化统治，在少部分台人眼中，“中国是父祖之国的祖国”，而不一定是自己的祖国。相反，他们对日本却有着深厚的感情。战争结束时，在台日人及家属达38万多人(不含日本驻台十一方面军)，其中不少都与台湾本地居民结成家庭，并生育子女。^①而且战时，也确实有一支台人组成的日军“台湾混成旅团”

^① 许极燉：《台湾近代发展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第461页，第480页。

^② 许极燉：《台湾近代发展史》，(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第476-477页

参与战争，他们多少算是日本帮凶。如今日本战败，这部分台人算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故此，少部分台人对日本战败是有着复杂感情的，其中不乏失落、惋惜之感。另外，日治时期的台湾在某些方面也确实获得了较为良好的发展。比如在城镇基础设施上，“都市建设尚具规范，高处放眼，仍尚轮廓优美，树木青葱，街道宽平，建筑错落有致”。^②少部分台人确实也习惯了日治时期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这亦在意料之中。但是，怀有类似想法的台人，毕竟是极少数的。

在此，需加以提及的是港澳民众对抗战胜利的态度问题。总的来说，他们和大陆民众一样，是相当高兴的。一如港民回忆的那样，“那时候每个人什么也顾不上，只管说‘胜利了！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我们放爆竹和打锣鼓庆祝”；“宣布和平的那一刻，很多人都走到街上，看见日军便追着他们打”，等等。^③但比起大陆民众来，港民的欢呼雀跃更缺少民族及国家情感的成份。已高度英伦化的香港，更像是英联邦而非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虽然事实上截然相反）。故此，港民的兴奋更多时候只是因为战乱已停息，又可以恢复到战前有序稳定的生活了。在这一点上，港民比大陆民众有着更为实用的价值取向。澳门民众的反应亦与港人大体一致。但因战时港澳政权的中立立场，致使当地民众的欢喜之情稍显平淡一些。

六、结语

总的来说，抗战胜利后中国民众的心理状态大致经历了一个自欢喜兴奋至辛酸失望的转换过程，而茫然迷惑则一直贯穿其中。初时，民众大多觉得战后的世界不一样了，有希望了。但他们随即发现，这种变化并不能改变他

① 戚嘉林：《台湾史》（全五册），（台北）国家图书馆出版，1998年三版，第1957页，第1972页。

② 戚嘉林：《台湾史》（全五册），（台北）国家图书馆出版，1998年三版，第1980页。

③ 引文材料为港民郑秀鸾、梁秀莲、麦锡邦等人口述回忆，见刘志鹏、周家建编：《吞声忍气——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再版，第208页，第231页，第249页。

们受苦受难的命运，这个吃人的世道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来，未及民众细想，国共内战的炮火便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国共逐鹿之际，中国民众或主动、或被动，再一次在情感态度的天平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然后奔向新的方向，进入新的世界。

本来抗战的胜利给予了国民政府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机。若趁此挟战时之余威与民心，妥善处理好战后社会民生问题，进而获得百姓的认可与拥护，则往后国共党争问题或可以另一种方式了之。但事与愿违，国民政府腐烂的官僚系统与明争暗斗的党政军体系，已呈病入膏肓之势，并非个别有识志士或中兴将臣可以逆转，即便是国府顶层也是知之而难以解之。以致自战后“大劫收”之后，国民政府便在民心天平上显出颓势。相反，共产党则抓住了民众最为关心的土地与吃饭问题，并通过土改的方式赢得民心。这对最后的时局走向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民心的倾向，事实上又是政府社会民生政策的执行与民众反馈的结果。

周总理对南昌起义的评价

张秋兵

【摘要】面对南昌起义时，周总理总是检讨起义失败原因，不谈起义功劳；推崇战友，反对宣传自己；鼓励当面批评，多次自我批评。反映出周恩来自我批评的作风和谦虚谨慎的美德。

【关键词】周恩来 南昌起义 自我批评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南昌起义，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指出：“南昌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33年7月1日，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1933年8月1日，周恩来出席红一方面军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阅兵式和前方军事比赛大会，作总结报告。这天，周恩来还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一等红星奖章。^①

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军旗时指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文革”初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日期改为9月9日，即秋收起义的时间，毛泽东坚决反对。1967年，毛泽东对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① 《周恩来年谱1898--1949》[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的第一枪。”^①并要杨成武将这段话的内容向周恩来汇报。1969年6月28至30日，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恩来等的历史功绩。^②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南昌起义时，都采用“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提法。

那么，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是如何对待南昌起义的呢？建国初期的特殊政治环境、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特殊地位、国务院总理的特殊身份使周恩来多次不得不面对南昌起义。面对南昌起义，不管是在重要的中央会议上，还是在轻松的宴会上；不管是正式动笔写稿，还是私下的随意讲话；不管是在“文革”前，还是在“文革”中；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已身患癌症，周恩来总理总是对失败教训说得更多，对其伟大意义说得少；对战友的功劳大谈特谈，对自己的业绩避而不谈；对当面批评欢迎鼓励，对自我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反映出周恩来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和谦虚谨慎的美德。

修改八一宣传提纲，说明失败原因

1957年8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解放军报》刊登了《八一起义》连环画，这是军报第一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连环画宣传提纲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应《解放军报》之约而起草的。当时对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还没有定论，提纲中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解放军报社对此非常慎重，用红笔圈出，呈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审阅，指示传阅朱老总、贺老总、陈老总。朱老总说：“八一起义，我的人马主要作一些协调保障工作，作用不大，应排在叶挺将军之后。”周恩来批示，刘伯承同志在起义中任参谋团参谋长，工作认真负责，做了大量军事工作，功勋卓著，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名字，排在朱德之后。

宣传提纲共21条，周恩来对其中的10条作了修改或补充，包括标点符号。重要修改（凡有下划线的字，都是周恩来亲笔修改的）有以下四处。1. 补

^① 1984年11月20日杨成武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谈话笔录 藏该馆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6页。

充了起义的主要力量：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等同志在南昌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举行起义。2. 补充了起义的其他领导人：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半夜二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3. 补充了起义失败的原因：起义军胜利后，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致起义军部队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汕头地区的时候，在汤坑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后来敌人越来越多，加以敌人军舰向汕头猛击，结果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4. 补充了革命的正确路线：当起义军向南挺进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了秋收起义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①

审查军博展览，鼓励批评并自我批评

1959年军事博物馆预展期间，周恩来亲自审阅军博的陈列计划，还亲临现场审查展览内容。在《南昌起义》的版面前，当讲解员讲道：“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周恩来当即提出：“哪是我领导？是党的领导，应该说是党的领导！”又对陪同审查的军博领导说：“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同志，也都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嘛！”并亲笔写了一个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名单交给了馆领导。当讲解员又讲到南昌起义部队由于没有和江西农民运动相结合，孤军南下，因而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时，周恩来马上给予鼓励：“批评得好，批评得对！”当时，年轻的讲解员听了有点不知所措，周恩来郑重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我有责任，没有想到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还是搞以城市为中心，当时也是没有经验。你们要把这件事讲清楚。”^②

^① 《南昌起义资料》[M]，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至3页。

^② 李天印：《领袖将帅们与军博的故事》[EB/OL]，《走进军事博物馆》网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解放军报社网络部联办 <http://www.chinamil.com.cn/item/jb/story/1.htm>

周恩来特批了军博建馆所需的 2800 万元经费和军徽、馆标所用的 700 两黄金。开展向军博献宝的活动时，周恩来捐出了珍藏 26 年的一等红星奖章。

历次会议，反思经验教训

1960 年 7 月 14 至 16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委会委托，作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说：“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张太雷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①

像这样在高规格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检讨南昌起义失败原因，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早已为之。1944 年 3 月 3 至 4 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深刻反思了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指出：“‘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②

1971 年 5 月 10 日，周恩来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向主管教育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讲述党的历史，提出：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谈到一些党史人物和事件时说：陈独秀对建党有功，不能抹煞。又说：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误。^③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6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M]，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3 页。

③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6 页。

参观八一纪念馆，赞扬战友、推崇主席

1961年3月，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在报批时，曾受到周恩来的“阻挠”：“文物局当年的同志还记得，在一碰到有关周恩来的文物时，就很难处理。比如在1960年上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八一南昌起义旧址，他几次都要去掉，因为这是他所领导的。但是这一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诞生纪念地，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列的。”^①

196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参观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即八一起义纪念馆。周恩来不谈及自己，却深情回忆战友，并要求宣传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1961年，周恩来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对战友的评价

朱德	刘伯承	贺龙	叶挺
1. 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 2. 他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物交往，掌握敌情，为起义战斗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当时没有人任主任，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2. 起义时，刘伯承同志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1. 在这前一天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已决定由贺龙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我是去告诉他这个决定，并征求他的意见。 2. 鉴于贺龙同志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起义军南下途中，我们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3. 贺龙是个好同志。	1. 叶挺同志率领的铁军是一支非常著名的能战斗的部队。铁军来到南昌参加起义时，受到南昌人民的热烈欢迎。 2. 叶挺所率第二十四师在战斗中担负歼灭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敌军，解决卫戍司令部，占领敌方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二十四师顺利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是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

^① 罗哲文：《缅怀周恩来总理对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的关怀与丰功伟绩》[J]，《古建园林技术》，1998年第3期，第16页。

在参观到第四陈列室时，周恩来第一次谈到自己，说：“当时也是没经验，只晓得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国际指示要建立根据地，而我们只想建立城市根据地，搞大城市起义，先后在上海、南昌、广州搞了三次。上海武装起义，是工人起义，失败了；南昌起义，是军队起义，也失败了；广州起义，是工人与军队结合的起义，还是失败了。工人、军队起义都试验过了，都失败了，还没有认识到要搞农村起义。”又说：“我们走了，人民群众是不高兴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讲到井冈山。”“我给你们提个要求，讲解内容一定要讲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工作人员请周恩来题词时，周恩来说：“我拿回去，写好了再给你们。”^①

拒看话剧《八一风暴》，鼓励京剧创新

最早将南昌起义搬上舞台的，是江西省话剧团1958年创作的《八一风暴》。1959年9月，《八一风暴》在北京向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9月16日，周恩来设宴招待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来京的全体成员。出席宴会的有邓颖超、贺龙、陈毅等。同周恩来在一桌的有刘云和歌舞演员石坚等。吃饭时，石坚请周恩来看《八一风暴》。周恩来说：“写我的我不看，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刘云补充说：“总理在戏中不出场，请总理看戏，提提意见。”周恩来有几分严肃地说：“要歌颂毛主席，不能歌颂我。”

1959年底，张家口市京剧团将这出话剧改编为同名京剧，1963年8月20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演出，周恩来观看后与演出人员合影，说：“这出戏是江青同志推荐我看的，我问她有影射吗？（指剧中的党代表方大来影射的是总理）她说没有影射。今天看了戏还是有影射嘛。”合影留念时，大家请周恩来到中间去，周恩来却站到扮演杜震山的演员（杜震山的历史原型是贺龙）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南昌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周恩来在江西》[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至174页。

旁边说：“我挨着我们的师长，是我介绍他入党的。”

周恩来指出：“《八一风暴》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开了一个路子，京剧表演现代戏不容易，你们在表演艺术上有创造，方向对，这个戏还是第一次看。”“你们的表演很自然……在表演上突破了行当。这个戏在剪裁上还是可以研究的，前面松了些，后面紧凑，总之演得不错，时间压缩到两个半小时才好。今后你们的念白还可以注意些，你们的道白总的说还可以，但有的地方还像话剧，能不能多用京白，节奏上讲究一些，一定会更好。艺术上的创造应不断地研究、尝试。”^①

十年“文革”期间，《八一风暴》话剧被批判，京剧也被勒令停演。1977年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消息，“被四人帮打入冷宫10年之久的现代京剧《八一风暴》，最近在张家口市重新上演……”与此同时，江西省话剧团、总政话剧团等各地话剧院团陆续重演了话剧《八一风暴》。

策划《东方红》，不突出南昌起义

1964年，周恩来看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后，立即决定：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全国文艺精英，搞一台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大型晚会——《东方红》。为了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东方红》的排演，周恩来亲自担任了组织领导工作。

这部全景式表现当代中国革命历史包括秋收起义的艺术作品却没有表现南昌起义。事实上，创编小组最初思路，也要写南昌起义，却被周恩来坚决否定了。周恩来指出，这部革命史诗一定要突出表现毛泽东对当代革命的正确领导和卓越贡献。有一次，陈毅对他说：“你这个总导演太霸道了，其他领导同志的事迹都表现了，唯独你自己的事，一点也没有。提意见，你还不听。”^②最后，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周恩来才勉强同意了在朗诵词中加上绝无仅有的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① 刘云 晓雄 涓迅：《话剧与京剧〈八一风暴〉的幕后》[J]，《百年潮》，2007年第6期，第43至45页。

^② 王建丰：《周恩来的谦逊美德》[J]，《党史文苑》，1998年第4期，第10页。

总结教训，强调建立根据地的作用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6月7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①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6月9日，周恩来又修改、补充了提纲，形成二稿。6月10日，将此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至12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参加会议。6月10日，在谈到南昌起义时，周恩来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这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周恩来强调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就是没有“就地闹革命”。“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的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还说：就在南下以后，经过会昌一战，伤员不少，“如果在那个地方深入土地革命，就会在农村安置不走嘛，留在会昌、筠门岭、瑞金、寻乌，那就很好嘛，靠近闽赣边嘛。当时没有这个思想。”^②。

^①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8到529页。

^② 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1972年6月10日，手稿、记录稿

将士风采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

吴东峰

谨将此文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献给所有在这支英勇部队奋战和牺牲过的前辈和战友们！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历史被遗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不能忘记曾经在中国黄土地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开国将帅，他们虽然渐行渐远，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极致品格，依然凸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凸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许多年轻的记者问我：“你采访了那么多的开国将军，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战创，在我采访的二百多位开国将帅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负过伤。如果把他们身上的弹创累积起来，比任何国家将军身上的弹创都要多！肯定可以获世界吉尼斯记录。”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军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下面的几组数字是我在采访中逐步积累的，也是很不完全的有待于增补的数字，但它们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将帅战创的情况：

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林彪：负伤 1 次战创 1 个；刘伯承：负伤 9 次战创 10 多个；陈毅负伤 1 次战创 1 个；贺龙：负伤 1 次；罗荣桓：负伤 1 次战创 2 个；徐向前：负伤 2 次战创 2 个；聂荣臻负伤 1 次。十位元帅七位负过伤，累记战创 16 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粟裕：负伤 6 次重伤 2 次战创 4 个；徐海东：负伤 9 次战创 20 余个；陈赓：

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共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5个。

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各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罕见情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二百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使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无论是军事指挥员，还是政工干部、后勤干部；无论是一线指挥员，还是机关工作者；无论是以性格勇猛著称的猛士型将领还是博学多才的秀才型将领，几乎很少有将军身上没有战创的。据不完全统计，我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开国将军们身上的累累战创，反映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时代，是翻天覆地的时代。开国将军们大多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他们的上半生也就是青年和壮年时期，几乎与二十世纪上半叶并轨而行。

开国将军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了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

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怎么知道的？”刘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

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还没遇见一个像他这样勇敢的人。”

在刘伯承一生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伤；颅顶一伤；右眼一伤，使其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伤，险些丧命；左臀部一伤；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伤，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伤；右手侧面一伤。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半个世纪。此时，开国将军们才走向社会，对生活充满着憧憬，而战争破坏了他们的安宁生活，破灭了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美梦。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军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弹创大多数是在红军时期残留下的。

罗应怀中将是红四方面军的打旗兵。那个年代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将军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四肢中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就是这条腿，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只有我一个。”

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又升任副连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了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谭政大将曾经这样回忆过长征路上红军大学第一期开学时的情况。第一期学员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第二科为团、营一级的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的干部。谭政将军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三十八人虽然在三科中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飏、贺晋平、陈

士渠等和林彪、黄永胜。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二十七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

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

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异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肢和下肢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

在采访中更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龙书金将军 1939 年左上肢骨头打断后，一直未能接上。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开始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国共两党分裂而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建国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苏边境之战、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从辛亥革命起，大多有三十多年的战斗经历；而且是从未间断过，经历的时间之长，罕见；次数之多，罕见；其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也是罕见的。浴血奋战，身经百战毫不夸张，而且是上千战。战争年代的短兵相接，肉搏，面对面拼刺刀，血流成河。试看哪一个国家的将军们像他们那样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长的战争，那么惨烈的战争？！

残酷激烈、瞬息万变的战争，演绎出千奇百样的战创奇观。令人震惊的战创形态，反映了开国将帅们万死千伤，腥风血雨的人生之路，奋斗之路。

颜文斌少将在一千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上下共有 18 处战伤，为 10 次负伤、3 次开刀所致。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曾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当时卫生员将他绑于一棵树

上，以小刀割开皮肉，硬将弹头片撬出。将军说：“他妈的，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由前面进，由后面出。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瓢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上部前后两个弹洞，是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中弹时不清楚，只觉得腿发软，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约数小时……

像严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负两次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也就是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刘昌毅将军亲临前线，遇敌炸弹袭击，十多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了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及手术器械，请卫生部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方案也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胡奇才中将作战有蛮勇，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得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战斗中，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上部中了炸子儿，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将军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战斗，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将军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至今他的事迹仍鲜为人知，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我问老将军身上负了几次伤，有几个弹创时，他扒开自己的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说：“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年逾八十的许其孝将军讲到这里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开国将军们的成长之路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他们为将为帅的普遍的晋升规律。特别是红军时期，红军指挥员负伤特别多，战死也特别多。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先生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光牺牲的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开国将军们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了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生命的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23岁那年，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在一阵锣鼓声和呐喊声中，许世友将军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顶端涂着猪血，并用油炸过的长竹竿，第一个往上冲（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用竹竿把他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的许世友竟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他在战争年代负伤13次，身上有战创15个。将军建国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敌军一弹击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将军左腹，因失血过多，脸色惨白，昏迷一天一夜。当时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钱钧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三十三团团长与战士的对话声：“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于棺材中眨眼呢！当时大家高兴极了：“政委活过来了！政委活过来了！”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类似死而复生的经历。在红军时期的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将军也因此被装殓于棺木。在抬将军进棺时，他的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一枝手枪说：“连

长最喜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于是把手枪放在将军的手掌中。警卫员突然发现到将军的手指在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于是大家把将军从棺木抬出。经过几天调养后，刘昌毅将军又回到了战斗岗位。此后，刘昌毅将军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他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鼻梁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梁上的这一个“花生米”弹创是他生死经历中最轻的一个。

正因为开国将军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大彻大悟了。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力超常发挥，以死相拼的力量就远远大于优良的装备和从容的智慧。他们不但是战争的强者，而且更是人生的强者。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一群人。

1936年冬天，国民党对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大举清剿一个多月。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腿部负伤的陈毅加上罹病行动不便，在梅岭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到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慷慨陈辞，写下了《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
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
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
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种曾经生死的炼狱，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危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在北京怀仁堂拍案而起，奋起抗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开国将帅们不但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且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还经历着病痛的折磨。九死一生的亲生经历，又使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光阴和质量，拥有一种不灭的青春活力

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负伤，均创左臂，骨折肉绽，筋露其外，微微颤动。将军以断臂之躯，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建国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领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一举扭转了我国石油工业长期落后的面貌，而且为以后原油产量上一亿吨，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军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左齐少将在1938年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平时时期，他仍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

练书法，并在 79 岁高龄时，他的名字被收入《中国书画篆刻名人录》，1990 年还分别在济南、北京举办了《左齐左笔书法展》。

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 65 年，直到 78 岁时才动手术取出来。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浊气呼出来，增强肺活量，活跃脑细胞，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国防而战》《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命运之神》等 7 本书。

罗瑞卿大将 23 岁时就经历过生死问题。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敌一颗子弹从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刚强和执倔。1978 年 4 月，罗瑞卿将军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将军复出后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 72 岁要当个 27 岁来过。”

1978 年初，罗瑞卿将军向党中央写了出国治腿的报告。他曾听一位德国医生介绍，如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许多。但这种手术对一位 70 多岁并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将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同年 8 月，72 岁高龄的将军不顾家人的多次劝阻，毅然决定出国治腿。将军说：“我一生三次摸过阎王鼻子，每次去报到，他都不要我。这次他也不会要我的。”1978 年 8 月 2 日，在联邦德国医院波恩的一所医院，为罗瑞卿安装人造股骨的手术顺利完成，但由于突发心肌梗塞，将军永远倒下了。此时，离罗瑞卿将军出任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

近十多年来，我所采访的 200 多名开国将帅们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在临终前那种珍惜人生，看透生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开国将帅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死亡的体验。每一次生与死的考验，都使自己获得了凤凰浴火似的新生，即使面对病痛，面对死亡，他们也比一般人活得坚强。他们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 74 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六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有二十年的生命早就在九公山就预知了。”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将军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

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死。

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被告之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从容。凡有人来探视，他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地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而杨勇将军则反而安慰大家：“你们去吧，我要休息了。”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多活了5天。

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四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

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我们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到医院来看他。张爱萍问：“老聂，你怎么样？”首长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聂凤智真的得了肺癌时。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

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封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自从患了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五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在我们走进21世纪的今天，昔日曾经辉煌的开国将帅们正在消逝，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

我无法知道我们的后辈将会如何评价这一代开国将军。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与过去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战争的阴影依然存在，族群的撕裂、矛盾、冲突不断扩大，战争和动乱依然不断发生，而且规模的概率将越来越大，核威胁的阴影挥之不去，自然灾害频频降临，死亡和苦难仍然是人类无法破

解的课题。

90年来，开国将军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战争的危险，灾难的威胁，还存在着苦难和死亡，开国将军们的中国故事就不会过时，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中。

粟裕与浙南

郑昌儒

今年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优秀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粟裕同志诞辰 110 周年。在这里我们缅怀回顾一下粟裕在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率领浙南将士北上抗日所作的重要贡献和他与浙南老区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

—

1935 年 1 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遭敌重兵围攻失败，突围部队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先遣队的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粟、刘立即率领 500 多人的挺进师，挺进浙江，开展游击战争。进入浙西南的庆元、龙泉、遂昌、松阳、江山一带活动，实行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打了许多胜仗，很快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1935 年 8 月，国民党调集 63 个正规团的兵力“清剿”我红军和游击队。粟裕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以一部分兵力与敌周旋，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使敌疲于奔命。红军挺进师主力部队撤出浙西南中心区域后，与追踪敌人周旋于浙闽边地区。10 月 5 日，在福建寿宁郑家坑与闽东特委主要领导人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11 月 7 日，在泰顺白柯湾双方决定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刘英任书记兼政委，粟裕任组织部长、军区司令员，叶飞任宣传部长。挺进师即以平阳、泰顺、瑞安为中心的浙南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1936 年 9 月，红军挺进师与中共浙南委员会书记叶廷鹏率领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在瑞安、平阳交界的葛藤湖会师。从 1936 年 3 月至 1937 年 10 月间，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先后 4 次往返于浙南和浙西南之间。1937 年 9 月，正

在浙西南遂昌门阵一带坚持斗争的粟裕在得知国共两党和谈的消息后，立即给国民党遂昌县党部、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抗日建议书》，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9月19日，粟裕派出代表在遂昌门阵与遂昌县政府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停战协议，从而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10月18日，粟裕率部离开门阵，到平阳山门集中，与刘英胜利会合。11月，红军挺进师奉命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部队集中整编后的首要任务是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专门成立教导队，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刘英、粟裕为他们授课。

1938年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平阳山门举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共招收青年学生130多人。粟裕兼任校长。刘英、粟裕为学员们讲课。粟裕在总结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抗日战争新形势，亲自撰写了《游击战术讲授提纲》，从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游击队的任务、组织、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教育工作、游击队的补充和供给工作6个方面，详尽地阐述了有关开展游击战争的一系列问题。粟裕这个讲课提纲充实了我党我军有关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并较早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讲述了他在1935年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这是他对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十六字诀”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他还逐条讲解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游击战术的6条原则和作战、行军、宿营等一整套行动要领，粟裕此时年31岁，显示了这位青年红军将领的卓越军事才能。他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为他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深刻地教育了浙南的干部，使他们学会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得以胜利地坚持浙南的斗争。

二

1938年3月上旬，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抵达平阳山门，向刘英、粟裕传达了中共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的指示，要求浙江红军部队编入新四军第七团队，部队应及早出发。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

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浙南是“抗战和今后革命的一个战略支点”，一定要保持。经商定粟裕率部去皖南，刘英和一部分干部留下坚持浙江的革命斗争，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400余人，从平阳山门街出发，行军一个月，于4月18日抵达安徽歙县岩寺，来自浙南的部队改编为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史称“老三营”。粟裕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陈铁君任军部侦察科长，张文碧任第四团军法处长，余龙贵先后任第三营副营长、营长。这支由浙南子弟兵组编的“老三营”，成为华中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在粟裕指挥下，深入敌后、英勇抗击日寇，在新四军一些重要战斗中，续写了浙南将士光辉篇章。

为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先遣支队，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从皖南东进苏南实施战略侦察。“老三营”中部分浙南干部战士参加了先遣支队。如原红军挺进师通讯参谋主任江如枝任支队电台台长，玉环籍战士董南才任支队见习参谋。6月17日，在粟裕指挥下，在江苏韦岗伏击了日军运输车队，取得了新四军在江南对日战争的首战胜利。接着，“老三营”在粟裕指挥下，从皖南东进苏南的江宁、溧阳、芜湖、当涂、宣城、高淳、句容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打破了日军的围攻，与新四军兄弟部队进入茅山地区，积极参加创建和保卫茅山抗日根据地。7月，袭击了南京龙潭至下蜀的日军火车专列。1939年1月，在江宁横山反击了6路日军的进攻。1940年5月31日，在句容赤山设伏夹击日军南浦旅团吉田中队，共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130余人。在赤山“反扫荡”战斗中，“老三营”抢占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射击日军骑兵队，毙伤日军40余人。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爆发，陈毅、粟裕急令“老三营”火速过江，驰援黄桥。团政治部主任罗桂华和继任三营营长舒雨旺率“老三营”星夜渡江，跑步进入黄桥，插入顽军三十三师纵深，将顽军赶出黄桥，稳住阵地。此次黄桥自卫反击战共歼韩德勤顽军1.1万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粟裕为第一师师长。“老三营”与新四军第三纵队五团合并，组建为三旅八团，舒雨旺任副团长兼三营营长。12月在苏中如东县双灰山设伏，毙伤俘日伪军520余人。1942年9月，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八团各两个营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七团。“老三营”编入第

七团，余龙贵任团长。9月25日，新七团在南通县谢家渡全歼日军大队长以下70余人，歼伪军300余人。10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授予七团为“老虎团”的光荣称号。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车桥战役，三旅第七团担任主攻，连克日军十多座碉堡，不到一个小时，即突破日军城防。经过20小时激战，共歼灭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伪军483人。6月23日，该部在如皋中部耙齿凌与500余日伪军遭遇，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日伪军400余人。

1944年1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渡长江，挺进苏浙皖边浙江长兴一带。1945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浙东部队，粟裕为司令员，原浙南红军陈铁君任第一纵队参谋长，三旅由“老三营”扩编的第七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七支队。在粟裕的指挥下参加战斗，取得了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并建立了浙西抗日根据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新四军在浙东、浙西部队奉命北撤。苏浙军区第三纵队第七支队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一旅六十四团。盘踞在江苏高邮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0旅团一千余人和伪军第四十二师5000余人一直拒不缴械，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决定发起高邮战役。浙南将士所在的第八纵队第一旅六十四团会同六十八团在炮火掩护下攻上城墙，与日军白刃格斗，杀开一条血路，于次日凌晨攻入日军司令部，为高邮战役的胜利立下头功。高邮战役共歼日军1100余人，俘伪军3493人。高邮县城获得解放，这是新四军中浙南将士参加的对日最后一战。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中浙南将士编入华东野战军和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老三营”几经扩编最后编为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军。先后参加了宿北、鲁南、孟良崮、豫东、莱芜、淮海、渡江和京沪杭等著名战役，战功卓著。其后续部队一部至今仍驻守在北国边关，另一部则守着共和国首都。这支浙南红军英雄部队产生了粟裕大将这样杰出军事家，同时锻炼出了陈铁君、张文碧、刘亨云等12位将军。

粟裕率领浙南红军加入新四军北上抗日以后，仍然十分关心留在这里坚持斗争的干部战士。1942年，留在浙江任省委书记的刘英被捕牺牲，粟裕闻讯后千方百计找到烈士的遗孀和遗孤，把刘英的岳母、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江苏淮安，担负起抚养刘英的岳母和两个孩子的责任。刘英的岳母是个小脚老太太，走路不便，两个孩子还小，粟裕让人专门为他们准备一辆马车，遇

有敌情，便坐马车随大部队行动，保证他们的安全。

浙东部队北撤后，浙南地区与华中局的联系中断。浙南特委急需得到上级指示。1946年3月，特委决定派政治交通郑嘉顺、杨作浩两人去苏北找华中局。这时国民党正在集中兵力准备进攻苏北解放区，他们通过层层密布的岗哨到达淮安，得知华中局已改为华东局，与新四军军部迁到山东，在淮安另设立华中分局。华中分局负责人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曾山和粟裕一起接见并听取了汇报，对浙南地区党组织在红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尤其是皖南事变和省委机关遭破坏后，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继续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给予高度评价，并转达华中分局对浙南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亲切慰问。同时，他们对浙南地区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要做好“战”与“和”两手准备。粟裕还单独接见郑、杨两人，询问浙南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他说打算调查浙南沿海港口情况，从海上运些枪支、弹药给浙南；为保持浙南与华中分局联系，决定派技术最好的电台台长徐炳全去浙南建立电台，还打算陆续发给浙南地区一些活动经费。

三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一直心系浙南革命老区，不忘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时刻牵挂浙南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和建设情况。1954年夏天，平阳籍警卫战士林瑞珍和王家叶两人在北京担任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粟裕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得知他们是平阳人，林瑞珍是山门人，就十分关心地询问山门当年一起参加搞抗日救亡运动的老乡情况，山门建设情况，并请他们写信时向山门老乡们问好。

粟裕一直想去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打游击的老区看一看。1961年冬，他到温州参观了江心屿刘英烈士纪念馆，并向刘英烈士遗像鞠躬敬礼，敬献花圈以告慰刘英烈士的英灵。离温后，即到泰顺，参观了市容，并到烈士墓前默哀、致敬。他听取了县委领导的汇报，表示这次回泰顺主要是想回来看望英勇的泰顺人民，看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一起打游击的老红军、老战友，并提到老红军刘保生和红军山洞医院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县委当即把几位老战友请到

县城见面并合影。他向黄明星了解红军医院伤病员的情况，得知 30 多名伤病员除个别人外，都伤愈归队了。粟裕说：“这是你们的功劳，你们在敌后坚持战斗，辛苦了。”粟裕还谈到泰顺的经济资源丰富，如生姜、大理石可以设法开发。那时泰顺没有像样的招待所，临时从办公室腾出房间，购置一套新的被褥用具供他住宿。粟裕看了以后说：泰顺这么穷，许多群众缺衣少食，我睡在这样的房间能心安吗？如果不换掉，我就不睡觉！县里同志只好照他的意思办了。临别时，他向县委领导同志解释：我不是有意为难，让你们过不去，是想通过这件事，使你们的心同贫苦人民群众紧紧连在一起，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幸福生活。

粟裕离开泰顺前往平阳，到达矾山参观钒矿。这位矿领导怎么也没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首长就是当年在这里打游击化名“金米”的粟裕，经介绍他才恍然大悟，立即握住粟裕的手说：“老将军，你可回来了，你走后，我们这里的人民可想你啊！”粟裕到达平阳后，即嘱咐平阳县委办公室主任许新对说，一定要会会山门西山村林仰持（当时西山村党支部成员、农会主席、粟裕的交通员）和水门头村林书欣（水门头村党支部书记，兼做山门抗日干校的膳食工作）。当他们两人来到县城粟裕住处时，粟裕说：“红须二十多年脸相没有变”（红须是当年粟裕对林书欣的爱称）。林书欣、林仰持也说：“金米司令也一点没有变。”接着粟裕详细询问他俩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西山、水门头支部其他成员的情况，并问他俩有什么要求时，林仰持说想养一头良种猪，既解决自己的生活出路，又可以发展当地畜牧业。过后粟裕建议平阳县府调一头良种猪给他饲养。当天粟裕还请他俩一起吃饭，还和他俩、县委领导一起照相留念。

1979 年 9、10 月间，原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进京参加老革命根据地干部代表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庆典。粟裕知道后，派车把郑海啸接到家，并设宴款待。席上，粟裕说，1937 年 10 月挺进师部队在平阳北港集中整训，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我们的后勤供应、柴火油盐，大都靠你们筹办，真不容易呀！你是浙江革命老区的代表，代表老区的全体干部和人民。他要作陪的同志代他向郑海啸敬了三杯酒。

1979 年 10 月，粟裕收到一封反映革命老区落实政策、人民生活和经济

建设等方面的群众来信。他亲自给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写信说：“浙南是革命老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那里的革命人民曾经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和牺牲。……建议省委对老区的发展予以关注，并对革命烈士遗属和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予以帮助。”在他的亲切关怀和过问下，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省委办公厅给粟裕写信作了汇报。

1935年底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反击国民党第一次“清剿”战斗中，许多红军指战员和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领导人相继英勇牺牲。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很怀念陈凤生、陈丹山和卢子敬，惦记他们的家属，多次派其亲属、部下到老区慰问。1980年9月，革命老区松阳安岱后村的群众托人带去一公斤当地土特产笋尖。卧病在床的粟裕收到礼物，心情十分激动。召集全家子女晚辈在一起，深情地说，这是我们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浙江开辟的第一块根据地的安岱后村送来的礼物。真是“千里送笋尖，礼轻情意重”呀！我们革命、建设搞了几十年，老根据地人民还没有从经济上得到翻身，我们对不起他们呀！粟裕立即给村老支书陈炳良同志回信以表谢意，还寄了一箱糖果给安岱后村，村里每个人都吃到过，真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1981年，他在北京专门接见了遂昌县委党史研究室干部，对遂昌人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在他的关心下修建了门阵人民盼望已久的公路。1982年，他又为遂昌中学和遂昌中学的科学馆题字。同年11月，就遂昌门阵村群众来信要求将门阵村列入革命老区待遇，粟裕写信给省委领导建议对门阵按老区待遇，并落实有关政策。

粟裕早就想过等到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这场艰苦斗争好好写上一本书。由于长期抽不出时间而未能动笔，直到1980年他73岁时才着手准备撰写《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为了搜集材料，这年6月，他在杭州住了一个多星期，邀请在杭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老战友、老部下刘亨云、余龙贵、张文碧、张金发、郑海啸、林辉山、黄先河等人参加座谈，并一起合影留念。粟裕谈了浙南三年的一些情况后说，浙南一段战争，大家都应该写，以教育后代。大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实事求是，文责自负。那时郑嘉顺任温州地委书记，正在杭州参加省委扩大会，他找到郑嘉顺到他住处询问浙南老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情况。郑嘉顺谈到“文革”

期间原浙南的党员干部被诬为“浙南叛徒网”受到迫害的情况，他十分气愤地说：这是谁搞的？这批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考验的同志怎么会是“叛徒”呢！同年10月，粟裕委托身边工作人员吴克斌等同志访问平阳山门，搜集材料，并要求将大屯村口两棵大树拍照带回去。

粟裕忍着病痛，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回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革命回忆录。在1983年7月6日在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情况》增刊1号首次发表。回忆录忠实地记述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艰难曲折的历程和挺进师指战员、浙南广大干部群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科学地总结了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胜利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史料，是粟裕留给浙南人民的珍贵礼物。

粟裕生前曾经对人说过：“浙南是我的第二故乡。”1984年2月5日粟裕逝世后，遵照他生前的意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他频繁战斗的几个省市的土地上，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在一起。浙南地区的温州市江心屿革命烈士纪念馆前、平阳县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校园内、遂昌王村口镇的月光山上、龙泉烈士陵园内，都安放着粟裕同志的骨灰。每年清明节，青少年学生、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都会去给粟裕同志扫墓。粟裕的英名不仅在浙南，而且在整个浙江传颂。浙南人民永远怀念他的历史功绩。

叶挺的将才和诗魂

刘志宏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战时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时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1946年3月4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要求，始获自由。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叶挺将军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的军事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光辉的历史

叶挺，原名为询，字希夷。生于广东归善（今惠阳）周田村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同年10月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立志走军事救国的道路，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到福建漳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援闽粤军，在第1支队任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任粤军第1师少校参谋、工兵营营副、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2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调集重兵围攻孙中山的总统府时，奉命率部守卫总统府前院，与叛军激战竟日，掩护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脱险。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后，被派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1日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旋即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战役。不久奉命转往肇庆，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任团长。从此所部成为

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部队。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担任先遣队，于5月北上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部。6月间进至湖南安仁、攸县，击溃投靠吴佩孚的赣、粤部队4个团。后随第四军主力进攻醴陵、平江，猛打猛冲猛追，长驱直进，连战皆捷。汀泗桥战役中正面部队进攻受阻后，他率部翻越大山出其不意攻敌侧背，大败守敌，并乘胜追击20余公里，夺取咸宁县城。在北伐战争中，他多谋善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为四军赢得“铁军”称号起了重要作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升任第四军25师副师长、第11军24师师长。

1927年8月1日，他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积极参与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出任军长。1937年10月应召赴延安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抗战到底。1938年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等领导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2日，日军5000余人在空军配合下，分两路进攻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军有意避战，纵敌肆虐的情况下，他亲赴前线指挥军部直属部队，选择险要地形部署兵力，以节节堵截、相机反击、日夜袭扰的积极防御战法，消耗、疲惫敌人，经7昼夜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于8日晨将敌全线击退。继率部猛烈追击至泾县县城再度将敌击溃，收复县城。同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他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包围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驻皖南部队，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部队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叶挺临危不惧，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但终因寡不敌众，部队弹尽援绝，除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失散、牺牲和被俘。他自己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先后被转到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监禁五年零两个月。

面对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威逼利诱，他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并作《囚歌》明志，申明他不会“由狗的洞子爬出”，去接受“自由”，而只期待着“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5日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实现他多年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于7日复电，称赞他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决定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出席全军整编会议，因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不朽的诗魂

1942年夏秋间，长须及胸的叶挺尽管度过了一年半的囚徒生活，但精神尚好，意志坚定，表现出少有的英雄气概。10月16日是郭沫若50岁诞辰，他写下了“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向老朋友表达自己的祝贺。礼物送出后，他觉得两句贺词还欠理想，于是又修改了一次，把“寿强萧伯纳，骏逸人中龙”改为“寿强萧伯纳，功追高尔基”，托夫人李秀文带给郭沫若。郭沫若接到他的信，感动不已，满怀深厚的谢意，流下了感激的眼泪。

1942年11月21日深夜，叶挺在囚室面对昏黄的灯光，回顾自己过去的革命历程，联系眼前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不禁感情激昂。他挥笔写下了一首《囚歌》，以表达自己傲雪青松般的意志和坚贞不屈、斗争到底的决心：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囚歌》一诗浓缩着叶挺牢狱生涯的深切体验，是他对于生命、自由和尊严之辩证关系的悲壮思考，每一句都具有厚重的份量。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囚歌》的开始，叶挺以形象的语言，把囚禁在牢狱里的受难者的自由与尊严相分离的景况直陈出来。一方面，反动当局绝对不允许被囚者以自由之身保有人的节操和尊严；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诱感受难者以尊严的丧失换取行动的开阔空间。随后的“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寥寥八个字，把法西斯分子的骄狂、阴险、狰狞的嘴脸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然而，革命者所渴求的自由从来就不以屈尊为代价，更不会以奴颜婢膝去换得所谓的“自由”。士可杀不可辱，这早已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们律己的法则。“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诗人高傲地拒绝着反动派的诱惑。自由诚可贵，然而，失去了尊严的自由，又怎能俯就？被囚的勇士依旧是勇士，而自由的畜牲，永远是畜牲。自由的精灵被隔绝在法西斯的高墙之外，受难的人们时时渴求着自由的温存，却无法与之结合。牢狱从来就不是梦幻情调的温床，阴森、恐怖、死亡才是它的现实。弱者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骨气将在这里彻底消融，强者的凛然正气却可以在这里得到张扬。“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囚歌》的结尾，慷慨而悲壮。

对于自由的信徒、革命的斗士，死亡并不是什么骇人的东西。他们明白，在被囚的那一刻，他们已与死亡比邻而居。志士的被囚，对很多人来说，这便可能是他们整个抗争生涯的最后阶段。他们无惧于死亡，甚至乐于把这视为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叶挺高歌“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便大有此种意味。实际上，在他们选择成为自由斗士的开始，他们便已领悟到这选择与死亡之间存有割不断的脐带。“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事实也正如诗人自己所预言的，叶挺逝世后，他的英名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叶挺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此文发表在刚刚创

刊的《维民周刊》第四期上。但不幸，叶挺获释的第二天，4月8日飞机飞回延安在黑茶山失事，同机的有女儿叶眉，中共代表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郭沫若在他写的一首长诗《为多灾多难的人民而痛哭》的“哭希夷”一则中写道：“没想到你今天竟真的‘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了。我发表你的诗，朋友们说那竟成了你的‘诗讖’，不错，你的诗，天天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也愿意发出同样的一个‘诗讖’。永远，永远，永远盘旋到我这一低能幸福者，也‘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一天！”

1949年重庆解放后，在叶挺曾经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发现了《囚歌》，它与郭沫若同志所保存的文稿在字句上稍有不同。它是由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胡作霖谱曲的《囚歌》。1949年11月27日，在已经听到解放军向重庆进军的隆隆炮声的时候，这位铁窗歌手一边指挥，一边领唱：“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难友们齐声合唱：“……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在这悲壮的歌声中，一批批志士从容地走出牢房。在敌人还嫌屠杀进度太慢改为用冲锋枪向牢房密集扫射的时候，胡作霖挺身面对飞射过来的子弹，又一次高唱《囚歌》。他的胸膛已经被子弹穿透，他的双手仍然紧紧抓住牢门，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的枪口，掩护难友们从后窗突围……

《囚歌》还有一个姐妹篇《囚语》。叶挺在‘皖南事变’被无理扣押后，因为他深知蒋介石心狠手辣，早作了必死的准备。八天以后，也就是1941年1月21日，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了18页的《囚语》，回顾了自己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参加革命以来经受的危难，特别是对‘皖南事变’死难者的深切悲痛和对部属的思念之情，以及自己被囚禁后宁死不屈的坚强决心。《囚语》第一页头四句明志诗，就集中反映了《囚语》的主题。”《囚语》明志诗是：“不辞艰难那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

郭沫若在《叶挺将军的诗》一文中曾如此评价将军的《囚歌》：“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他的诗就是他自己。”郭沫若称颂这首诗说：这里燃烧着无限的激愤，但也放射着明澈的光辉，这才是真正的诗。我敬仰希夷（叶挺的字），事实上他就是我的一位精神上的老师。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

他对横逆永不屈服，而同时又有透辟的人生观使他自己超越在一切的苦难之上。五年的囚禁生活，假如没有这样的精神是不能忍耐的——然而希夷征服了这一切，现在果真是“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而他“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了。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其中有五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

浙南精英 开国少将

——纪念陈铁君诞辰 100 周年

钱克辉 林子周

陈铁君（1917年5月—1961年10月），又名陈铁军，字子良，小名廷亩。原平阳县五凤乡（今苍南县桥墩镇五凤社区）人。1934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南红军游击队队长、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坚持闽浙边游击战争三年。1938年3月与粟裕率部从平阳北上抗日，亲历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军部科长、华东军政大学教务长，参加了淮海、渡江、福州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中央军委训练部处长、副局长、代局长等职。是建国初期授予少将军衔的温州籍第一位将军。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少年聪慧 投笔从戎

1917年5月19日，陈铁君出生于浙江平阳县桥墩五岱山（今苍南县桥墩镇五凤社区）十三亩。陈铁君上辈世代务农，他们三兄弟的名字分别是：老大廷耕、老二廷陇、老三廷亩（铁君）。

陈铁君排行第三，因天资聪颖，从小得父亲的喜爱。陈铁君9岁那年，跟随当地的私塾先生陈蕴乡读蒙馆，后又被父亲送到国立江南宜山小学就读，希望他将来考取功名。

1932年，陈铁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温州瓯海中学，当时瓯海中学的教务长对陈铁君过人的天资感到十分惊讶，当他了解到陈铁君是偏远贫困山区的农家子弟时，更加赏识不已，半年之后亲自举荐陈铁君转读杭州安定中学。

在杭州安定中学，陈铁君一边奋发读书，一边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目睹国土惨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愤慨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抵抗，毅然投

笔从戎，矢志报效祖国。

1933年，考取国民党军政部南京化学兵分校（简称防化兵学校或学兵队），在南京学校与陈阜（1910—1997，平阳县麻步岭门头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最高法院院长等职）等人，以组织“读书会”的形式，吸收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10月，吴毓（1911—1943年，今苍南县南宋人，曾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烈士）从北平到南京同陈铁君一起回平阳与叶廷鹏会合。《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第92页，2002年10月北京第1版）记录如下：“组织了一支数十人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开始称肃反队），队长陈铁君。浙南红军游击队成立后，除消灭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惯匪王世雅部外；还先后袭击了平阳的国民党北港区署和宜山国民党（八岱宫）团防局，击毙国民党区长楼钟声，还歼灭当地反动武装，缴获长短枪数十支。1936年5月，他们成立了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书记叶廷鹏，组织委员吴毓、农运委员黄先河、军事委员陈铁君、宣传委员杨进……并在北港和瑞（安）平（阳）边开辟了一块纵横30里的秘密工作地区。”

青年时代的陈铁君，已经有非常突出的军事才能。

1937年年3月，吴毓从上海带回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等文件，因闽浙边临时省委被国民党军封锁，无法转达，他与在温州的黄先河、黄耕夫、周饮冰、陈铁君等四位同志，经研究之后，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名义，向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及福建、浙江省党政等部门，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

5月4日，吴毓以联络员的名义，在温只身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邓切会见，要求停战一周，保证共产党代表来去自由和人身安全。初步接触后，吴毓、黄先河、陈铁君三人利用停战期间，在地下党组织掩护下，安全通过封锁线到达平阳北港山区，向刘英递交了中央文件，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得到刘英的赞同。刘英派吴毓、陈铁君、董启文代表闽浙边临时省委，以中央“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作为和谈条件，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刘建绪的代表进行第一次和平谈判。谈判在平阳山门畴溪小学举行，我方以敏锐的洞察

力当场识破了国民党代表企图通过谈判达到“收编”和把“政工人员集中到南京受训”的阴谋。这次谈判，终告失败。

6月，陈铁君在青田的一次战斗中，因脚部受伤不幸被捕。国民党知道他是和谈代表，不敢贸然下手，将他解往衢州绥靖公署关押。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8月，日本侵略军直指上海、南京，局势危岌。刘建绪的部队陆续调往淞沪前线。7月25日，刘建绪将陈铁君释放，并亲自给刘英和时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闽北特委书记黄道写信，交陈铁君带回，表示愿意与红军举行和平谈判，以联合抗日；又将贺龙于前次谈判前劝谕刘建绪的信也交给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以表示诚意。

陈铁君自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以来，从“游击队长”到“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在浙南这片土地上出生入死，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为浙南的早期的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军事实践能力。

北上抗日 皖南集训

1937年8月24日全国形势发生变化，刘建绪接受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关于重开和平谈判的通电，派代表邓切在温州申江旅馆和我方代表吴毓、黄耕夫进行和平谈判，初步达成协议。陈铁君虽然没有参加，但他为这次成功谈判做了大量的有利工作。因为他从衢州绥靖公署带回了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公署主任刘建绪、贺龙等人许多重要的信件。

1937年10月，陈铁君由刘英、粟裕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旬，红军挺进师根据和谈协议内容，在平阳县山门集中完毕，共400多人，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司令员粟裕，政委刘英，副司令员陈铁君。

1938年3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400余人（连同第二批共500多人），由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陈铁君率领从平阳山门出发，经过瑞安、青田等县的边界，到达丽水大港头集中，开赴安徽南部地区，编入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中，陈铁君与民运科长夏征农（1904年1月—2008年10月，江西丰城市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辞海》主编等职）几经周折，终于脱险。在《夏征农皖南脱险记实》（《夏征农与大江南北》2009年5月）一书的64页这样记述着：“我们的军队在近十倍于我的敌人面前顽强拼杀了好几个昼夜。”许多人被冲散，与陈铁君、夏征农一起的，还有参谋处副处长张元寿（成功突围，曾任华野副参谋长，1947年3月牺牲）和他的警卫员，侦察参谋贾波（成功突围，曾任空1军参谋长、副军长等职）、女机要员周临水，一起隐蔽于丛林中。张元寿和警卫员先走，他们这一组只剩下4个人。此书的66页这样记述道：“想不到在这北风呼啸的严冬，野果和山泉竟能扶持我们活到第六天！这天听不到枪声、喊声，我们决定：下山！”当地的老百姓和教会人员非常支持新四军，在他们的帮助下终于脱险。此书第69页，还写道：“……我请他们去茂林（地名）买了两套便衣，我化装成茶商，陈铁君打扮成我的伙计……这位冯教友便带着我们这茶商伙计俩，从柳村出发步行到泾县城里。在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步行到芜湖。再从芜湖坐火车到南京；又从南京转车到上海……不久就由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派交通员把我们送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

盐城身影 鲜为人知

根据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主办的杂志《铁军》2015年08期《鲜为人知的新四军海防总队》（作者曹骅、陈海云）一文和相关文献资料的记载：1940年11月7日，刘少奇、黄克诚到江苏省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与陈毅、粟裕会晤，商讨解决华中地区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指挥以及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做好统战工作等问题。此后不久，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和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着手部署收编、降伏海匪工作，旨在建立一支隶属新四军领导指挥的海上抗日武装，把海洋变为抗日前哨，保卫海防和沿海根据地安全，保卫渔民海上生产，维护沿海社会秩序。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正式任命王维新为新四军海防总队总队长，陈铁君为政治部主任，谢汉臣为副总队长。下辖三个海防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

谢汉臣兼任第一大队长，沈月亭任第二大队长，何少章任第三大队长，崇宽任特务大队副大队长。总队部驻三龙镇小街陈恒昌家。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党史办出版的历史文献记录片《蛟龙出海》解说词写到：“陈铁君主任没有架子，和气待人，赢得了部队上下的尊重，由陈铁君主任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通报抗日斗争形势，告诫部队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违反军纪的进行批评教育。收编初期部队军风军纪得到一定的约束。战士们有困难和问题都找他谈，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陈主任……”

1941年7月下旬日军占领盐城后不久，谢汉臣叛变，他把一大队和三大队带到新丰，当上了伪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五旅旅长，何少章任伪十团团长；第二大队的沈月亭则带领部下到老黄河口一带，又当上了海匪，后被新四军消灭。这时海防总队只剩下特务大队。王维新和陈铁君私交比较好，谢汉臣叛变前，王维新讲他难以控制部队，暗示陈铁君要预防不测。陈铁君在谢汉臣叛变的前一天安全撤离。

日军占领盐城之后，军部机关转移，番号撤销。1942年11月，新四军重新成立苏中军区海防团，1943年11月编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但也有学者对以上内容提出质疑：因为新四军军史上没有记载“陈铁君任海防总队政治部主任”的内容。《鲜为人知的新四军海防总队》作者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当地老一辈的口述史。尽管如此，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陈铁君与战友们从皖南事变脱险后，到盐城参加新四军军部重建工作。他在苏北军部的时间很长，不排除他为海防团或者海防纵队做过重要的工作，成为当地老兵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1942年4月起，陈铁君历任新四军军部第五科科长、第七科科长，第1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2旅参谋长。1945年，陈铁君任苏浙军区一纵队、二纵队参谋长。参加指挥了天目山战役和华中地区1945年对日军反攻作战，捷报频传。

深研理论 注重训练

陈铁君从16岁考取国民党军政部南京化学兵分校之后，就开始学习战争的理论。18岁参加浙南游击队，一直到皖南事变，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他一边战斗、一边学习，努力总结作战经验，及时将作战碰到的问题进行认真细致地分析，并写成材料，用于军队教育和训练，成为军队中不可多得文武双全的人才。1938年3月他带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北上抗日，队伍到达皖南之后，他就在苏北负责军事教育。

老红军王烈评（1917—2009，福鼎县前歧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等职）在他的回忆录《披沙拣金——闽浙边革命斗争亲历记》（中国文献出版社，2006，第16页）一书中写到《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一节，文章说到：“（1938年12月，他从浙南出发，经过20多天，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队学习。）我们到军部的第二天，就被分配到教导队预备队……我们到预备队学习20来天后，才正式编入教导队……教导队是为各地培养政治军事干部，是按期举办的，每期时间半年。我们（参加的）第二期约有千人。教员有（今）苍南县五岱陈铁君，学员有今苍南县南宋的吴生平（女）、吴高谈、项银莲（女）……”

1946年12月至1947年8月，“三大战役”前夕，陈铁君一直在华东军政大学担任教育长职务。今天我们还可以查到1947年10月颁发的《华东军政大学·毕业鉴定书》，在“教育长”一栏目中，还有“陈铁君印”的篆刻印章。

原华东军政大学陈铁君的同事、政治部主任欧阳平等，在《缅怀张云逸校长》一文中写到：“1948年初，继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以后，于当年3月，我华野东线兵团发起了胶济线作战。在攻克张店、潍县后，连续向西作战，胜利地打下了泰安、兖州，矛头直指济南。这时，战略进攻开始后的作战表明，在向全国进军中，城市攻坚作战是摆在我军面前的新课题……为了搞好城市攻坚作战训练，陈铁君教育长亲自撰写了《步兵连对城市攻坚突击战术的总结报告》一文，拟作教材送张云逸同志审阅，张云逸同志立即复函指出：‘该报告可作为学校的教材，作为学员研

究的课本……’ ”。可见陈铁君的战术研究在全军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三大战役打响前夕，即 1948 年 8 月，陈铁君调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参谋长。1949 年 2 月起，任第三野战军第 7 兵团副参谋长、第 10 兵团副参谋长。参加了胶济路反击战，兖州、济南、淮海、渡江、福州、漳厦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任第 10 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52 年后调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军训部组织计划处处长，军训部军训计划局第一副局长、代局长等职。1955 年，任训练总监部计划和监察部副总长，获少将军衔，是温州第一位开国将军。

1961 年 10 月 23 日，陈铁君将军病逝于北京，年仅 44 周岁。他虽英年早逝，但他不畏艰难、百折不挠、永远跟着共产党的决心和认真学习、注重训练、从实战中不断总结经验的精神，成为共和国铸就军魂的一大精神财富。

周恩来称赞金贯真是浙江金龙

金爱伦

我的爷爷金贯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南杰出的革命战士。他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担任过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兼党团书记、党中央巡视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委等重要职务。为组建浙南特委，1930年5月从平阳返回温州后不幸被捕，壮烈牺牲于温州城区松台山麓，年仅28岁。

探索真理 实践真理

金贯真，原名家济，1902年12月15日生于永嘉县楠溪岩头一个农民家庭。家庭虽贫寒，父母还是千方百计送他上学。1909年起，先在岩头私塾读书，后入岩头高小。1919年2月，考进温州省立第十师范。他学习勤奋，并在进步教师的指导下，积极投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探索革命真理。常与人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将何以使社会灿烂光华？我将何以使人群快乐无涯？”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和蔡雄、苏渊雷等组织“血波社”“宏文会”等新文学研究团体，1923年秋，邀请朱自清先生担任指导。当时，朱自清先生已是有名的诗人和作家，看到金贯真写作的诗歌和文章，朱自清先生给了很高评价。金贯真还同楠溪的李得钊、金省真等同学一起，组织“青年策进会”“溪山学友会”，为在楠溪山乡开展新文化运动而努力。由于他品学兼优，坚持正义、追求真理、勇于斗争、校长金嵘轩为他改名金贯真，激励他为实践真理而奋斗终身。金嵘轩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浙南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就投身民主同盟，积极支持民主、爱国运动，大力传播革命进步文化。当时由于内有金嵘轩校长进步思想的灌输，外有《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文化书籍

的感染，金贯真的革命觉悟提升了。他的老师、共产党员谢文锦经常从上海给金贯真来信，鼓励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此时，金贯真除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外，还利用假期，团结和带领楠溪在温读书的学友深入山乡进行演出、宣传。有一次，亲自率领学友数 10 人，挑着道具箱笼，步行到沙头村，进行革命宣传演出。沙头是个通往楠溪大小源的咽喉之地，这里舴舺船上去下来，竹筏南来北往，沙滩上茅蓬草舍、旅馆客栈，船民客商来往不绝，是个革命宣传演出的好地方。岩头的金氏祠堂也是个革命宣传演出的好地方。他还筹集资金购买进步书刊，在岩头“文昌阁”筹办“溪山第一图书馆”，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1924 年，他受聘在十师附小任教。这年秋天，谢文锦和胡公冕相继抵温，从事革命活动。金贯真在他们的帮助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5 年春，谢文锦介绍爷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之后转为共产党党员，并成为浙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谢文锦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对金贯真的评语是：“人极诚实可靠，对于现社会的情况及现政治的状况颇能了解，并知道病源的所在及改革的方法，这是因为他多读我们出版物的结果，是一位难得的革命优秀人才。”

1925 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爷爷金贯真和“温独支”的其他成员，组织了“五卅惨案后援会”，领导和组织游行示威，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还发动募捐，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嗣后，得到谢文锦的帮助，金贯真和李得钊两人去上海，进上海大学听课。不久，党组织派金贯真到国民革命军参加军事训练。1926 年秋，他在北伐军中担任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兼党团书记。在北伐军中，他作战勇敢、计谋过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坚持原则 敢于斗争

1927 年秋，中央选派金贯真等百多人赴苏联学习，进入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时，王明等人控制学校党组织“共产党支部局”，他们看不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借苏共开展反托斗争之机，诬陷俞秀松、

金贯真等人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派，对他们进行打击陷害。他和俞秀松等坚持原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9年8月，金贯真等26人离苏回国。偏袒王明的“中大”校长米夫，以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名义，写信给我党中央，说这一批回国的人员中，多数有参加托洛斯基反对派活动的嫌疑。我党中央为了考察了解这批回国人员的政治态度，在上海开办了特别训练班，学习结束后，中央认为多数同志“没有托洛斯基反对派嫌疑的真确证据”，遂派金贯真为浙南巡视员。

巡视考察 忘我工作

1930年1月中旬，金贯真受命到达浙南，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怕艰险，忘我工作，深入各地进行巡视考察。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调查研究了温州、台州等城乡的社会情况。从1月中旬到2月底的40多天时间里，行程达数千里。在温州地区30多天，先后在永嘉、瑞安、平阳等地召开大小会议21次。在台州地区12天，在海门、黄岩、路桥、玉环、温岭等地分别召开中心县委会议2次，县、区及农村支部、工人支部、保卫团支部等大小会议14次。工作极为紧张、繁忙。他在给李得钊的信中说，“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有时搞不到吃的东西，还要提防敌特的盯梢、内奸的破坏和军警的盘查，生活、工作非常辛苦，但他的革命意志坚定。

我爷爷深切关怀和同情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在1930年2月28日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去年温属奇荒”，劳苦民众实无法可以生活下去。只有平阳的江南乡丰收，但‘陪荒’的痛苦比多荒的更厉害，米价和别处是不相上下的，因为地主将米都偷运到各县，致有钱买不到米来。佃农所收的东西除交新租外，还要交陈租。结果还是粮食十分缺乏。现在温州起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户口都已无米粮，有30余万人已完全陷于待毙的境地。国民党政府不管群众的苦痛，拼命地实行土地陈报加佃粮，加村里制特捐，加保卫团捐。怨声载道，群众斗争的情绪自然一天天提高起来”。当时，浙南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村村饿殍相枕籍，十村九室无炊烟”的惨状，而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官逼民反，1929年

11月，永嘉西楠溪一带84个村庄的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30余支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他在报告中详细叙述了饥民的闹荒斗争、驱逐土地陈报丈量员、烧毁土地陈报单以及揭竿而起进行暴动等革命行动的情况，并为此点赞叫好。他写道：“温州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在被捕和被杀同志中也可以看出来，在六七十被捕杀的同志中，虽经过残酷奇刑拷打，但始终没有一人说出一个同志和机关来。”他的巡视工作报告不仅生动朴实地反映当时浙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工作报告，也是一曲歌颂浙南农民革命运动“好得很”的热情赞歌。

党中央的重托，工农阶级兄弟的苦难生活和斗争热情，使爷爷金贯真忘我地工作，无暇顾及家里的亲人。1930年春节前夕，同志们劝他：“你离家五年多了，四处奔波，这次从苏联归来，该到家过一个团聚的年节了。”他说：“敌人花天酒地过年，正是我们工作的好时机。”后来我奶奶郑玉钗正月初二赶到温州，俩人各自诉说了别后情况，就在当天深夜，金贯真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然后对我奶奶说，“我有事要去。等温州解放了，那时接你来！明天你先回家吧！”说着，披衣起来，开门外出，迎着寒风，踏雪而去，又投入了紧张的革命斗争。谁曾料到，这次以胜利相见为约的分手，竟成了这对年轻夫妇的永别！

为党献身的红军好政委

1930年1月下旬，爷爷在瑞安肇平垟主持召开了温属七县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研究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并作出了发动闹荒斗争和建立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等重要决定。会后，举办了县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训练班。在会上爷爷深入浅出地宣传讲解共产主义理想与当前斗争任务以及路线、策略、工作方法，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

他还经常同工人、农民谈话。他常说，“他们确实是积极勇敢的，和他们个别谈话，他们实能解决实际问题，讲出许多实际的办法”，“要动员一切同志做群众工作。”他很强调注意培养训练干部。认为“首先要将区委和支书训练得好”，“要多分配给积极分子工作，多开活动分子大会，在斗争中

吸收同志(党员),在斗争中培养干部。”

他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要求“各支部要经常的做木炭队、白笔队、黑油队、标语队的工作”。他赞扬了“二月初间有个支部的同志将内河所有的桥间柱上都以黑油大书主要口号”，“甚至在敌保安司令部门口，都写出我们的口号来，县党部揭示板上我们的口号宣言贴了半日，方有警察去摘掉，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他对红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也曾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设想。1930年3月下旬，他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爷爷金贯真向党中央写了长达1.5万字的报告，详细阐述温台地区政治形势，农民武装暴动，党和群众组织等情况，并向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建议派胡公冕等人到浙南负责军事指挥。党中央于3月31日给浙南党发了关于工农兵运动的策略路线、建立红军、组织问题的指示信。信中要求：“党应当以浙南的永嘉、台州为中心，组织地方暴动，建立红军。”信最后指明：“特委工作的布置，已与金贯真同志当面讨论。”于是，他担负着组织地方暴动，组建浙南特委和建立红十三军之使命，从沪返温。4月上旬，他和中央军委派来的胡公冕、陈文杰等，以永嘉楠溪的五尺为据点，以楠溪的农民武装为基本队伍，并汇合瑞安、温岭、永康、缙云等县的农民武装，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为贯彻中央指示，搞好建军工作，纠正小股农民武装中存在的不良倾向，主持召开中共浙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对红十三军的军事、政治等工作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一是建立永嘉、台州、永康三个独立团，在扩大红军方面，计划将红军向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发展。二是发扬军事民主，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是加强党务工作。每分队建立党小组，每中队建立党支部，一星期开一次党员大会。四是提出政治纲领，主要内容是，1、杀豪绅、地主；2、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3、焚烧契据及土地陈报单；4、分殷户米谷财产给贫民；5、推倒村里制；6、建立苏维埃政权；7、组织工农纠察队、赤卫队。但由于爷爷会后不久被捕牺牲，加上立三路线的影响，红十三军成立后，集中出击中心城镇，上述各点未能完全付诸实施。

红十三军这支人民武装的崛起，有力地打击了当时浙南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封建势力。他们攻处州、打平阳、克缙云、夺瓯渠、战乌岩，活动于温、台、

处三州的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玉环、黄岩、仙居、缙云、永康、丽水、青田等县，后来还影响浙西浙北地区，队伍最多时曾发展到 6000 人，影响深远。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 1930 年 4 月 26 日苏维埃特号《全国红军概况》一文中，把红十三军列入当时全国十四支红军序列之一。苏联《真理报》还报道了红十三军攻打平阳的消息。

浙南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他们调集部队，对红十三军进行堵截“围剿”，并到处设暗探，派特务，悬重金，缉捕我红军将领。1930 年 5 月 20 日，为打平阳，爷爷亲自部署，到平阳预先布置攻城任务。当日完成任务返回温州，被特务跟踪包围，从小练过武的爷爷，对付几个特务本不成问题。没有想到有一个女特务躲在暗中，用木棍打在他的后脑上，导致他不幸被捕，被解送国民党永嘉县政府，一路上高呼革命口号。审问时县长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当土匪？”他大义凛然，怒斥群丑，“你们国民党才是土匪，我是为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使那些与人民为敌的豺狼们噤若寒蝉。他们深怕迟延有变，就在当天夜里秘密杀害了我爷爷，还割其头颅，把尸体分身投入河中，时年仅 28 岁。当时我的奶奶郑玉钗正怀着儿子金雪亮，她挺着大肚子寻找金贯真爷爷的遗骨无果，最后用金贯真爷爷的衣帽做了一个衣冠冢。

我爷爷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红旗》报 1930 年 6 月 11 日刊登了当时在中央军委、上海临时中央局担任重要工作的李得钊写的悼文，称“金贯真同志是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模范！”1930 年 8 月，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讲到王明、米夫过去对留苏回国同志的错误结论时说：“留苏回国的好多同志，表现很好，例如金贯真同志，浙江人民说他是‘浙江的金龙’。他已经为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贡献出年轻的生命，在浙江领导农民斗争中壮烈牺牲了。”1940 年，党中央派金省真给金贯真烈士的家属送赠了抚恤金，并转达党中央的慰问，鼓励亲属坚持革命，抚育好烈士遗孤。金贯真爷爷永远活在我们革命后代的心中。

吴毓与国共温州和谈

陈永华 杨 叶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各界人士“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呼声，终于同意对日抗战，并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战。但仍推行“北和南剿”的方针，指令闽赣浙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刘建绪纠集8个师10余万军队“围剿”浙闽边革命根据地，妄图彻底消灭红军挺进师为主体的浙南红军游击队。面对严峻形势，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红军将士与敌顽周旋奋战的同时，顾全全国抗战大局，力促国共两党温州和平谈判，建立浙南抗日统一战线。

促成国共两党温州和谈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时为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和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政治交通员吴毓。日前，笔者专访了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熟知温州瓯海党史的潘德清老人，倾听他对有关史实的口述，予以考证整理记述如下：

吴毓，1911年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南宋大埔村（今属苍南县）。从小聪明好学，曾就读于温州瓯海公学，18岁从温属联立商校毕业，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不久该校被取缔，又进上海君毅学院求学，其间目睹国民党统治腐败，社会黑暗，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萌生革命思想。后因家庭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回乡当小学教员，结识了共产党员叶廷鹏。受叶的影响，开始投身革命。1936年5月，叶廷鹏在平阳北港建立中共浙南临时革命委员会，吴毓负责组织工作。是年10月，奉命到上海受训，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结业后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和闽浙边临时省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员。12月，由刘英、粟裕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毓在上海时，浙南红军游击队正在闽浙边大山中与进剿的国民党刘建绪部队周旋苦战。他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洞察浙南时局将发生重大变动。遂于1936年3月，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到温州寻找闽浙边

临时省委。但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无法与省委联系，就与在温从事白区工作的黄耕夫、黄先河、周饮冰、陈铁君等同志一起商量，根据中共中央给国民党的电文精神，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倡议和平谈判。1937年3月25日，吴毓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边军区司令部名义，致刘建绪和国民党闽浙两省的党、政、军地方当局快邮代电，呼吁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停止内战，派代表进行谈判。国民党地方当局在5月2日的《浙瓯日报》上刊登《紧急启事》，表示愿意谈判。吴毓见到“启事”后，即于5月4日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联络员的身份会见国民党谈判代表，要求国民党方面停战一周，让他赴平阳根据地向省委汇报情况，委派谈判代表。从而启动了国共两党的温州和平谈判。

温州和谈进行了两次。第一次于1937年5月7日在平阳山门畴溪小学举行。吴毓为中共方首席代表，另有陈铁君、董启文。在这次谈判中，吴毓按中央指示，提出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改闽浙边区为特区，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一致抗日的建议。而国民党方面并无诚意，企图通过谈判将闽浙红军游击队全部吃掉，提出“闽浙红军应随时听候指挥与调遣，红军政工人员一律到南京受训分发”。吴毓当即据理驳斥，戳穿国民党方面表面停战谋和，实则要消灭对方的和谈假面具。严正指出：闽浙红军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不愿再打内战，要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方必须保证红军行军沿途的安全！对方无辞以答，双方激烈争辩，未达成协议。蒋介石在杭州发来“停抚进剿”手令，谈判破裂。

第一次和谈失败后，吴毓为闽浙边临时省委起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由上海地下党及时转到陕北，中共中央通过贺龙同志写信给刘建绪（两人系同学关系），以乡情旧谊动之，劝告他不要自相残杀，停止内战和红军携手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刘建绪主动提出重开谈判，并释放关在狱中的陈铁君以示诚意。吴毓即与陈铁君一起赶到瑞安东区找到刘英，转告刘建绪要再行和谈的情况。8月24日，吴毓再度作为首席代表与陈铁君、黄耕夫一起，同国民党代表在温州申江旅馆进行第二次温州和谈。这次谈判，吴毓根据临时省委指示，主动提出放弃首次谈判时所提的“将闽浙边区改为闽浙特区”的要求，使谈判进行得较为顺利，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达成5项协议。

此后9月16日下午，双方又在平阳山门街西山村一民主人士家继续谈判，这次谈判，由刘英亲自主持，国民党首席代表王裕先提出要闽浙红军编入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番号为“第十集团军第一路抗日游击队”，又在玩弄吃掉红军游击队的伎俩。吴毓根据刘英的示意婉言拒绝：这重大问题，要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于是将此问题留待以后再谈。谈判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终于达成并签了协议。此协议以8月24日的5项协议为基础，具体条文如下：

一、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根据任务编制；（注：后闽浙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闽浙抗日游击总队）

二、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的北港区；

三、红军军需与给养根据任务发给补充；

四、集中时间自九月十七日至十月一日止；

五、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六、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七、目前宣传工作，根据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原则进行宣传。

协议达成后，吴毓即起草报告《闽浙边红军历次与国民党四省边区主任刘建绪谈判的经过》，并受临时省委委派与龙跃一起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递交报告，向博古口头汇报谈判经过及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回根据地后即转达中央关于南方游击队将组建新四军，为免遭顽军袭击，没有中央调令闽浙红军游击队不得贸然下山的指示。

此后为督促谈判协议实施，国共双方协议在温州城区九柏园头17号设立闽浙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吴毓为主任，从而形成浙闽边区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局面。1937年12月新四军正式成立后，吴毓任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他以这一办事机构为依托，有效地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工作。1938年3月，遵照中共中央和东南局指示，根据和谈协议，闽浙抗日游击总队400余人陆续集中平阳北港，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走上抗日救国最前线。这是吴毓在浙江的抗战史中值得书写颂扬的篇章。

吴毓作为中共浙南党的重要活动家，在日本侵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关键时期，四处奔走力促国共两党温州和谈，在谈判中发挥其智慧和技巧，既

促成和谈成功又保持红军武装的独立性，为闽浙边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1942年吴毓任中共浙南特委纸山办事处主任和同他一起工作的中共党员永嘉郭溪宋岙（今属瓯海区）民主人士陈达人的长女陈禹铭结婚，婚后生下一子。1943年12月10日，儿子还在襁褓中，吴毓带领7名武工队员深入黄山小坑匪巢收编土匪，遭土匪暗算枪杀，首级被悬挂市区广场示众，牺牲时年仅32岁。

“国强民富圆美梦，毋忘英烈千秋功。”吴毓烈士在短暂的人生中，献身革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促成国共两党温州和谈，建立浙南抗日统一阵线的历史功绩，温州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永远活在温州人民的心中。

深切怀念丁魁梅同志

郑润琳

—

刘英烈士夫人丁魁梅同志（1916—1986），系浙江天台县东郊坑边村人。幼童时期入丹邱小学，后转入赤华女校。1928年进天台中学后，她多次在中共天台县委机关报《赤城》上发表文章，为妇女鸣不平。1935年秋，考入浙江大学附设高工染织科，一年后转入杭州师范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激于义愤，离校回乡参加天台县抗日救亡后援会与天台县民众抗日救国团，从事救亡运动。

1938年2月，县委书记齐德夫和丁学渊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城区委员，5月当选天台县委委员，任县委妇女部长、战时政工队第二区队长。7月调任中共台州特委妇女部长。10月任省妇委委员兼省委机要秘书。

二

1939年3月省委机关从温州秘密迁入丽水，开设兴华百货店为掩护^①。刘英、丁魁梅和王阿三^②、阿三母亲、阿三囡阿香，凑成“母亲、兄弟、孩子”一家五口“逃难”家庭，秘密租住离丽水城5里的厦河村保长王玉坤家。墙壁挂着刘英写的对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显示不问政治的清高之士。又贴一幅刘英水彩画《水中鱼乐图》，寓意地下党员与群众的鱼水情。整个房间简单朴素，一书厨旧书，楼下特意摆设碘酒、红汞、消炎药膏，以掩人耳目。刘英化名王志远，一位逃难的富商，头戴金丝草帽，身穿哗叽长衫，以“兴华百货商店”老板身份，出入省委各个秘密联络点，领导全省工作。晚间，丁魁梅用碘酒显影上级指示和情报，然后刘英起草文件，丁魁梅抄写，

由阿三送各联络点。

刘英按照曾山的来信约定，3月31日到金华，4月1日晚向周恩来汇报了浙江工作，折回丽水同省委常委又到金华，4月5日在金华江南旅社听取周恩来《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在三四个月中，刘英主持完成了省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房东王保长两个孩子因其毒疮被治愈，十分感激，认“王志远”老板为小叔。利用这种关系，请王保长复制印章和路条证明，更方便出入各个联络站开展工作。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在平阳凤卧乡召开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刘英选为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丁魁梅任省妇委委员。刘英、丁魁梅等12人选为出席“七大”代表。途至皖南，中央电令刘英等四人返浙。

省党代表大会后刘英重返丽水省委机关，哲生（王德珊）为商店账房，小郭（郑嘉顺）为店员伙计，负责省委秘书处保管、抄写机密文件，省委书记与各常委的联络，以及参与省委同中央东南局、各特委之间的联系。

刘英和丁魁梅由革命战友结为终身伴侣。10月16日，在温州举行婚礼。当天，刘英题词二首赠与魁梅战友——

“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握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与利诱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

“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集中一切力量，一切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革命与战争！”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于无产阶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革命情操。

1940年夏，刘英在厦河村继续完成了他在皖南尚未完成的《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丁魁梅帮助抄写，一页一页校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定居厦河村后，1941年初，接来寄养天台故乡的一岁女儿小英，刘英非常爱惜，亲了又亲，说我们有了革命后代了。一天晚上他抱着女儿对夫人说，女儿毕竟太小，要哭要哄要抱，我们分散了工作精力，日子长下去，对革命

工作难免有影响，还是送回天台请妈妈辛苦些吧！魁梅同志为了专心革命，为了千千万万的亲人，决然骨肉分离，对邻居说家里老妈妈想念小外孙女，没几天就送小英回天台了。③

1941年4月初，省委机关秘密迁回温州城区，秘密联络点小南门三兴、丰裕商店。

在厦河与刘英住房一墙之隔的敌“剿共”连长，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常邀坐相谈的王老板，竟是他们煞费心机捉拿的共产党省委书记。

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刘英为华中局委员。7月7日，中共中央任命刘英为闽浙赣三省特派员，负责指挥浙江、福建、江西三地区工作。

1942年2月8日，因叛徒告密，刘英被捕，5月18日于方岩马头山麓英勇就义，年仅37岁。在党的七大期间，周恩来对浙江代表说：“刘英同志在狱中表现很好。”

三

刘英被捕后，丁魁梅立即回家处理所有文件、密码、闽赣两省联络名单，用技术信函将省委遭破坏和刘英被捕告知各特委书记。信的大意是：大哥（刘英）突然患全身麻痹、不能行动的恶疾（意思失去自由）。同时说明自己处境极为困难，拟到伯父家（中央）求援。并要他们保重身体，分外小心。信交赵仁同志发送。她到黄岩，台州特委书记刘清扬听取汇报后，用一块白绸写了给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缝在她衣服里。她与特委宣传部长林尧乘船到上海，通过大公中学校友吴奇清（党员），找到华中局驻沪机关负责人杨斌，汇报详细情况。华中局电复，安排她立即与正在上海即将赴任浙东的工作谭启龙会面。因临近产期，组织上给她600元作为在上海休息和生育之用。谭启龙和夫人严永洁帮她找好住处。丁魁梅同志5月20日生下儿子刘锡荣④，把两个幼儿放在天台寄托母亲抚养，专心找党和部队。

1943年7月，丁魁梅为浙东区党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1945年，随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渡江北撤，受到陈毅、粟裕的接见。1946年，任华中

分局组织干事、组织科长。

在此期间，华中军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同志担心敌人加害刘英两幼儿，派专人秘密到浙江天台接丁魁梅老母亲带外孙女丁小英、外孙丁锡荣（建国后姐弟复姓刘），来到苏北淮安解放区华中局丁魁梅身边。蒋介石重点进攻苏北根据地，机关需要不断转移，她带着一老两少，随机关行动很艰苦。

1947年起，丁魁梅历任第三野战军后方总留守处政治组保卫科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妇女干部学校干部科长。1949年3月，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其后随军南下转业地方工作，任南京市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1952年9月，任南京织染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4年4月，任江苏省轻工业厅轻工业处处长、党组成员，轻工业局局长。1958年1月，调回浙江，任省委工交部干部处处长；9月，任省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工交干部处处长。1962年6月，任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十年动乱，隔离审查多年。文革结束后，任省人事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1986年4月18日22时25分，丁魁梅因患脑瘤，久治无效，在杭州逝世，终年71岁。骨灰专程护送永康方岩烈士陵园，与刘英烈士合墓。2004年7月，入选《当代百名天台人》。

丹心昭日月 大义薄云天

——金哲海烈士的革命一生

金中恒

在乐清市的革命斗争史册上，金哲海烈士是一位革命行为壮烈、形象高大的仁人志士。

金哲海，又名金光天（系革命斗争时期的化名），乐清市南塘镇鲤鱼山村人。191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雇农的家庭，自幼家境贫寒，但聪慧过人。虽只读过两年私塾，因学习刻苦，能读古文古诗，亦会作文写对；没有学过木工，能用一把锯子、一把劈刀做成木犁，没有师事裁缝，也会做出长衫。当其长到20岁时，因为长子，其父又体弱多病，全家十口的重担就落到了他尚为稚嫩的肩膀上。为了养家糊口，他跟人学过魔术，学过算命测字和风水阴阳，后又习武设立拳坛，广结朋友。因为为人豁达豪爽、侠骨柔肠、肯抱不平，且刚毅果断善于思考，青年时期，就受到当地贫苦群众的爱戴。

1938年，是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侵略战争的第二年，抗日高涨的浪潮席卷到了浙江和乐清。是年的三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闽浙边临时省委派遣中共党员黄义桃、邱清华等人到乐清建立党组织和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清江北岸的朴头村建立了中共乐清支部后，派遣邱清华等人到清江南岸的清江和南塘镇开展革命活动，邱清华等人选定群众基础较好的鲤鱼山村作为地下革命活动中心。在鲤鱼山村，他们首先以“乐清县抗日青年服务团”的名义进行宣传抗日救亡，揭露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的丑恶嘴脸，并动员鲤鱼山村的热血青年加入“乐清县抗日青年服务团”，为抗日救亡，保家卫国作出贡献。

早已对“三大敌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怀着强烈仇恨的金哲海，便踊跃报名参加。入队以后，因为工作积极，善于组织青年兄弟，很快成为“抗日青年服务团”的骨干分子。他按照邱清华等党组织领导的指示，领导鲤鱼山村20多名热血青年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和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不但

经常利用鲤鱼山禹王庙大戏台演出抗日现代话剧和文明戏，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行径，而且组织建立“儿童团”“妇女识字班”“农民子弟学校”，让穷苦农民学文化、学知识，提高阶级觉悟，把抗日救亡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1938年3月的一天，“抗日青年服务团”又一次在鲤鱼山禹王庙搞抗日宣传演出。开幕前由金哲海作演出介绍，突然小东塘村的黄中兵（系抗日青年服务团团员）气喘吁吁地跑到台上对金哲海说：“盐兵打死人了。”人命关天！金哲海随即向观众简单说明原委后，宣布演出暂停，并带领一班人赶赴出事现场。只见靠小东塘北面的“四十亩”（地域名称）边一条小河中，浮着一具脊背朝天的尸体，四周的水都被鲜血染红，惨不忍睹。金哲海与几个同志急忙下去捞上。因为刚死不久面目清晰，一看以后有人认得是鲤鱼山村何金球之妹夫黄康来（清江镇邳岙村人）。黄康来患有严重的血丝虫病，两条大腿肿得像水桶，身体十分衰弱，家境极其贫困。那天夜晚是他因抱病种了一些芥菜，去小东塘盐区买盐腌菜，想不到离开盐区不到半里路，就被盐警兵丁开枪打死在河里。何金球等亲族哭天抢地，泪流满面，在场的其他人也无不悲愤哀伤。金哲海带泪劝慰大家节哀，要团结起来争取严惩凶手。有人说：“哲海哥，我听人说中国人被盐兵打死是白死。因为中国的食盐的盐税缴给英国人，盐兵就是为英国人监管食盐，受英国人的保护，盐场挂的旗都是英国的国旗。现在中国政府很怕英国这些外国人，英国人哼一声，中国的官老爷都会吓得屁滚尿流。对盐兵的家族免‘壮丁’费，盐民免抓‘壮丁’。盐兵狗仗人势，打死人不用抵命，硬得很呢！这冤仇恐怕难报啊。”

金哲海听后义愤填膺，坚定地对大家说：“兄弟们，‘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不会有办不到的事的。”并立即进行安排，叫何金球搭棚停放尸体，另差人去请南岳镇屏凤铺村“老潘伯”前来守尸，自己马上回去向邱清华、李方成等领导汇报情况，请示如何打赢这一仗。经部署，金哲海亲自先找黄中兵详细了解事件真相，由李方成执笔代替死者家属写了诉讼呈状按好指印，即刻送往国民党乐清县法院。由于李方成在乐清有一定的人际关系，法院随即受理，答应在第二天派遣人马验尸办案。考虑到国民党盐务部门会做手脚，邱清华同李方成要金哲海一方面发动群众去现场观看助威，

另一方面做好事件目击人黄中兵和守尸人老潘伯的工作，叫黄中兵和老潘伯到时候实事求是大胆出面作证。

验尸之日，国民党乐清县法院刑庭果然来了包括庭长、随员、仵作（法医）及警察十多人，围观的群众也足足有上百人。那仵作装模作样地检查一番后，向庭长报告说：“尸体是系木壳枪伤，子弹从后背穿过心脏，只是血迹不多，好像死后所致。”此话一出，群众愕然，黄康来明明是被盐兵打死，怎么会“枪伤是死后所致”？那庭长正要开口，老潘伯从人群中挤到庭长面前，严肃发话说：“此话不实，怎么血迹不多，我来时死尸周边整条河水都是红的，你要死人流多少血？”庭长大吃一惊，拍案喊道：“你是什么人，敢在这里乱说话？”老潘伯从容地一手拿着旱烟筒，一手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捞尸守尸的人，难道不能作证吗？”在场的黄中兵也高声插话：“我是小东塘盐区的人，是我亲眼看到死者是被盐兵班长胡正魁追赶着用木壳枪打死的！”此时全场哗然，群众高喊：“不能包庇凶手，包庇有罪！”庭长看到群情激愤，只好草草收场。后来国民党乐清县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将凶手胡正魁判罪，并由国民党乐清县东山盐业税务所拿出一笔数量较大的钱作为黄康来家的抚恤金。

这一斗争的胜利，不仅大大提高了“抗日青年服务团”和金哲海的威望，也为抗日对敌斗争的革命事业燃旺了火焰。

1938年5月，中共乐清支部吸收金哲海等十几位农民抗日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中共鲤鱼山村支部，由金哲海担任党支部书记。由于鲤鱼山村党支部的建立及鲤鱼山村抗日青年服务团的革命和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影响，与鲤鱼山村邻近的清江镇泗塘、棉花塘村和南塘镇的梅岙、杨州村的抗日救亡工作也普遍开展起来，大批农民踊跃参加抗日青年服务团。在此基础上，中共乐清支部吸收了一批又一批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多个党支部、党小组。

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地下革命活动，金哲海领导的中共鲤鱼山村支部，在中共乐清中心支部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利用鲤鱼山村伪保长陶甄侵吞“壮丁”款，疯狂抓壮丁的事件，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斗争。他们组织派遣支部成员秘密访问贫苦农民，搜集陶甄为非作歹、贪赃

枉法的事实整理成书面材料，趁当时国民党乐清县政府进行所谓“澄清吏治”的时机，结合由共产党组织控制下的“乐清县政工队”的支持和帮助，终于把这个鲤鱼山村的“土皇帝”拉下了马。这一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清江、南塘两镇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在共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各村纷纷组织“抗日青年服务团”和开展“抗丁”“抗捐”“抗税”斗争，革命烈火越燃越旺，越燃越红。

1938年9月，“乐清抗日青年服务团清江办事处”会同金哲海领导下的中共鲤鱼山村支部，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和缜密组织，在鲤鱼山禹王庙召开了清江、南塘、南岳三个乡（镇）近千人的青年服务团团员大会。大会既进一步宣传了抗日斗争形势，又“请来”各地有贪赃枉法劣迹的国民党保长进行说理斗争和予以不点明的警告。一度使清江、南塘、南岳的反共反抗日日的顽固分子收敛了嚣张气焰，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人民群众和反抗日、反对共产党，也同时使革命斗争更进一步地蓬勃发展。

对此，国民党反动派恐慌至极。国民党乐清县党部严厉责备国民党清江镇镇长林淇，命令他严密监视和查办鲤鱼山村人民的革命行动和地下革命党人。林淇受责后即把国民党清江镇镇公所所属的“守望队”，从谢屏村移至鲤鱼山村禹王庙驻扎，又联合南塘、南岳两乡（镇）的守望队，八次包围鲤鱼山村，抓捕隐蔽在鲤鱼山村的邱清华、金哲海及其他地下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企图扑灭革命烈火。同时由于金哲海在南塘、清江、南岳地区的革命斗争锋芒渐渐显露，引起了国民党乐清县党部的极大注意。中共乐清党组织为保护革命的骨干力量，于1939年5月，安排金哲海到芙蓉镇以国民党芙蓉镇队副的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9年秋，党组织为了减轻佃农的负担，更深入发动群众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全面部署开展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二五”减租斗争。由于一是当时党的干部的缺乏，二是金哲海对“塘垟”地区的情况熟悉，党组织只好让金哲海临时兼管鹤浦乡（民国时期南塘与南岳地区合称鹤浦乡）的“二五”减租及其他工作。

“二五”减租矛头直指地主，引起依靠地租盘剥农民的田地拥有者的极大不安。在“塘垟”拥有最多土地的虹桥地主倪乐东，亲自跑到鲤鱼山村寻

找金哲海探问消息与打点减租。那一天倪乐东在当地田租代理人的陪同下来到金哲海家，正好哲海在家吃中饭，出于礼貌，金哲海把自己坐着的只有三条腿的矮凳子让出来对倪乐东说：“倪先生，请坐！”，但是倪乐东仍站着不动，金哲海就风趣地对倪乐东说：“倪先生，你是熟知诗书之人，我这条矮凳是有来处的，它是山上挖的一个老树桩，我去掉那些不正的权权丫丫，留下这三条腿，其形就像三脚金蟾蜍，不是有个古典说，三脚的金蟾蜍牵度刘海升天成仙吗？您坐坐有好处。”倪乐东见金哲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地道农民，出语双关谈吐不俗，心中十分惊讶，连忙说：“我坐我坐。”双方客套几句后，便切入正题。倪乐东说：“金老弟，听说你们今年‘二五’减租实行双‘二五’，这是不是违反上头的指令？这样做我们这些靠田租过活的人日子难过呀！”金哲海从容回答说：“倪先生此言差矣！今年减租实行‘双二五’乃是去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减租，又逢歉收，农民交了租谷，粮食所剩无几，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苦不堪言。你现在亲眼所见，我家的饮食是什么？主食别说米饭，连番薯丝熬成汤也吃不饱，菜蔬更不必说了。但是我桌子上是有‘四盘一汤’，可能倪先生会看不懂。都是些什么呢？第一盘叫‘两头脱’。是苋菜的梗腌的，因为皮硬肉软，吃时一咬硬壳肉从两头脱出来，故名；第二盘为‘吹唢呐’。是海里的‘两指摸’（圆蛭）腌的，吃时因为其壳很薄，用手或其他办法都无法打开，只能小心轻重恰当地吮吸取肉，就像吹唢呐一样，所以谑称其‘吹唢呐’；第三盘名‘戽田水’。是海涂上招潮蟹捣碎腌制所剩下的卤，吃时用筷子蘸蘸入口，因为常常外泼四溅，就像我们农民戽田水；第四盘更有可笑的‘满桌散’之名字。它是炒豆腐渣，因为豆腐渣颗粒细小松散，筷子往往夹不住，掉得满桌子都是，就被称作了满桌散；中间的汤是腌菜烧清汤，更为形象地叫它‘映灯光’。倪先生如果不厌弃，就请尝一尝。”倪乐东赶忙连说：“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金哲海看倪乐东思绪已乱，抓紧加剧攻势：“我听说倪先生是虹桥的有名富户，家有田地上千亩，女儿出嫁时嫁妆连绵三四里，你这样的家境总不会因为少收千把斤租谷而穷困了吧？而且我们实行‘双二五’减租，仅仅是今年，到明年仍以‘二五’为准。这完全符合孙中山先生和蒋委员长的指令，没有吃亏你们田主。”金哲海这一番无懈可击的话语噎得倪乐东张口结舌，便推说有要紧事急急忙忙离开了。

倪乐东是塘垌田主的头，这次塘垌之行与金哲海的交锋使他知道共产党有能人，不敢相抗，并告知其他田主说：“金哲海这个人本事大得很，不好惹”。这一年塘垌地区的‘二五’减租工作，在金哲海的领导下，取得了全面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然而当地地主夏哲明因为佃户金献寿（抗日积极分子）曾揭发他在二五减租期间瞒报田亩数，便怀恨在心，利用自己当保长的机会把他抓去坐牢后来被金献寿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

1940年初春，海匪活动猖獗，不断有地主、富户被绑架，夏哲明以预防海匪保护地方安全为名，购买了一批长短枪支弹药，并雇用家丁，费用按全村的田亩数进行摊派。因数额巨大，弄得家家户户叫苦不迭。鲤鱼山地下党支部在金哲海的领导下，一是发动农民分文不交，二是自己亲自出马与夏哲明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他词正理严地对夏哲明说“夏保长，海匪绑架的目的是要钱，所以绑的都是像你们这些殷富人家地主大户，绝对不会去绑穷苦农民，你这样做全村百姓是不会同意的，再说你也知道，鲤鱼山的穷苦农民连吃都吃不饱，从那里去弄那么多钱交给你买枪支？”夏哲明一是理亏，二是震慑于金哲海的威望，摊派“保卫费”之举只得作罢。

鉴于夏哲明在担任保长期间反对抗日和欺压当地百姓的不良行为，金哲海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利用当时国民党假惺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民主选举乡（镇）保长和保队副的机会，发动群众选举中共党员陈学波为保长，中共党员金德锦、陈岳云为保队副。从而把国民党这个基层政权从敌对方夺了回来。

1941年，因金强身份暴露转入隐蔽，金哲海重新回到鲤鱼山进行地下革命活动。那时被卸了保长职务的夏哲明并不死心，千方百计总想实行报复。是年开春，他叫长工黄四妹牵着牛背着犁到鲤鱼山村小山脚金氏兄弟的租田犁田，指手画脚地要他把一亩方方正正的田对着四角犁上一个“x”字，黄四妹不解其意，问主人“这是什么意思，哪有这么犁田的？”夏说：“叫你怎么样犁就怎么样犁，这亩田作废了！”黄四妹想了半天，才知道夏哲明这是要把这亩原是金献寿兄弟种的交租田“起了”（意为收回交租田，重新易主）。黄四妹跟金献寿兄弟都是苦出身的人，同病相怜，知道金氏兄弟被“起了”田，

就意味着今年的生活会无从着落，就跟夏哲明顶牛，说人家种子肥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做是太缺德，气得夏哲明大骂黄四妹吃里扒外。

后来夏哲明夫妇处心积虑算计黄四妹，想把他赶出家门。还要把他干了一年还没拿到手的工钱也赖掉。

金哲海知道黄四妹的事后非常重视，立即召开党支部和“抗日青年服务团”团员会议，商讨怎么打击地霸嚣张气焰，提高民众地位。经过认真讨论集思广益，决定实施两个方案。一是召集十来个长工一起到夏哲明家进行说理斗争，要他付清黄四妹的工钱；二是如果夏哲明不就范，就利用当前正是麦收季节，聚集十几位“抗日青年服务团”团员连夜把夏哲明家一块三亩面积的小麦收割藏好，然后由“抗日青年服务团”出面向夏哲明交涉。结果顽固的夏哲明对第一方案不同意，等到那三亩小麦在一夜间不翼而飞后，才知道团结了群众的力量，垂头丧气地主动寻找金哲海请求帮忙和解。这件事的顺利解决，大大鼓舞了革命人士与劳苦大众干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1944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乐清西乡，金哲海受命到“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工作。

因为游击队缺乏武器，游击队领导指示金哲海想办法或购买或收缴一批枪支弹药，以装备队伍。一日金哲海得知雁荡山叔南中学有用以护校的步枪6支，短枪1支。就与游击队员庄千寿设计收缴。他俩多次商量后，觉得学校学生多，天天要吃饭，一定需要大量的燃料，乔装樵夫到学校卖毛柴，实行智取定能得手。

那一天，他俩把短枪藏进毛柴，头戴斗笠，腰系麻绳，脚穿草鞋，挑着毛柴经小芙蓉，过四十九盘岭，颠悠悠地直奔叔南中学。到了学校大门，门卫拦住说：“卖柴的，这是前门，你应该从后门挑过去找炊事员。”金哲海沉着询问怎么走，在门卫的指点下他俩把柴挑到学校厨房。凑巧学校柴禾已用完，炊事员正为缺柴着急，见有人来卖柴十分高兴，就客气地谈好价钱，要他俩把柴再挑到柴房。乘此机会他俩迅速从柴内取出短枪塞进上衣，然后跟着炊事员到校长办公室取钱。到了校长办公室后，炊事员向校长报告了柴钱，就回身走了。校长也没说什么，准备打开抽屉取钱付款。正当那校长低头开抽屉之时，金哲海与庄千寿在瞬息之间抽出短枪，把枪口抵在校长的后

背，低声而威严地说：“校长先生，对不起，我俩想向你借几件东西，请你明智对待。”那校长脑子一片空白，乖乖站起转身，战战兢兢带着笑脸连连说：“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金哲海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的队员，当今日寇猖狂，屠我百姓，国民党军队有枪不抵抗，而抗日队伍缺乏枪支弹药，你们的枪支闲着没用，所以要你们把枪支先‘借’给我们打日本侵略者，你觉得怎么样？”那校长说：“应该，应该！只是我们只有6支步枪1支短枪，现在社会混乱，是不是把6支步枪送给你们，将短枪留给我作防身之用？”金哲海沉吟片刻后对那校长说：“难得你通情达理，能够真情配合，但是我也两个要求，一是你要支开一切外人，同我们一起把6支步枪藏好；二是把短枪子弹全部交出，空枪留给你，并由你送我们一段路程。同时还想提醒你，保家卫国，匹夫有责，请你不要有二心。”那校长说：“你们放心，我只是教书的人，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是深恶痛绝，你们去打日本人，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事情果然顺利，两人兵不血刃，轻松收缴到当时比宝贝还珍贵的6支步枪。

1945年6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撤出乐清县境，国民党反动派以“和谈”为烟幕，蓄谋准备发动罪恶的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浙江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了对“永乐游击区”进行“清剿”。

其间，清江镇的地下工作人员姚余根等人，向金哲海报告说，新调任国民党清江镇乡队副的汪正学十分猖狂，“抓壮丁”“收捐税”特别凶狠，常常无事找事地打人骂人欺压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纷纷要求地下党予以镇压。金哲海听后觉得事关重大，应该详细调查后，上报上级再作决定。

经调查汪正学是湖南人，在当国民党兵时逃出，来到乐清虹桥。为人性格暴躁，但不嫖不赌。汪与当国民党清江镇靖江村保长的汪得启（地下党员）是老乡，关系较好。据汪得启说汪正学老家很穷困，同时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参加特务组织的痕迹。

据此，金哲海特意召开了有关方面地下工作人员和地下党员会议，专题讨论汪正学问题。金哲海说：“我记得邱清华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说过，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人员要分清界限，属于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少数极端分子，要坚决予以打击，而对于一般人员应尽量策反，为我所用。凭我个人的想法，

汪正学出生贫苦，当乡队副可能想混碗饭吃，与一些坚决与共产党为敌的顽固分子有区别，是不是通过汪得启试探后晓以利害关系，让他觉悟过来做我们的内线。”经过一番认真争论，最后大家都同意金哲海的意见。后来金哲海和姚余根一起把此事向邱清华汇报，得到批准后，金哲海开始指令汪得启与陈隆松实施争取汪正学反正的计划。

汪得启是保长，汪正学是乡队副，在名义上两人是上下级的关系，汪得启便常常主动与汪正学接触试探；陈隆松是清江镇山头村人，与汪正学关系比较好，就经常以聊天的方式向汪正学谈论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与共产党为敌的人被镇压，没有好下场等等闲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探，发现汪正学心中对以前的做法有点后悔，害怕共产党会找他“算帐”，觉得当这个乡队副没有好结果。但又没地方去，就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混日子。了解了汪正学的动态以后，金哲海得到邱清华的同意，便设下“扬我军威，迫敌反正”之计，使汪正学成为我党的一名“卧底”。

那是1946年初秋的一个晚上，金哲海通知陈隆松约汪正学在清江镇靖江村西角头自然村姚余根家会面。大约7时左右，金哲海带领8名一式灰军装，肩挎驳壳枪的武工队员，威风凛凛地来到汪正学的跟前，分宾主坐下以后，金哲海指出了汪正学在清江的一些劣迹，又讲了他有悔过的表现，同时说明共产党欢迎他改过自新，希望他立功赎罪。

后来汪正学确实为我党做了许许多多有益的事情，起了自己内部人员起不了的作用。有一次，汪正学得知翁必如要集中一个大队（约300人枪）的兵力剿灭由郑梅兴率领驻于玉环县大青岛的第三中队，即把此情报秘密送给姚余根。情况紧急，姚余根连忙跑到鲤鱼山向金哲海报告，金哲海火速安排船只通知郑梅兴将部队转移，使翁必如部队扑了个空，避免了一次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在平常汪正学对抓“壮丁”、收苛捐杂税、追捕共产党等差事都敷衍了事。次数多了，渐渐被林洪和翁必如所怀疑。1946年11月，杀人成性的翁必如以通匪的罪名将汪正学枪杀。

1946年12月，浙江保安第四团一部突然包围鲤鱼山村，企图抓捕金哲海烈士及其他地下党员。因当地革命群众的保护，抓捕落空。

1947年7月，智勇双全的金哲海因其工作突出，被委任为中共虹桥区委

常委，负责清江、南塘、南岳地区的革命工作。此后他同陈权五、万少华、方林光、韩金辉等同志出生入死，战斗在虹桥，清江、南塘、南岳等白色恐怖国民党统治区里。尽管敌人曾经为抓捕他几十次包围各个他活动过的革命村庄，但金哲海毫不畏惧，经常出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坚持与敌人作殊死斗争。有一次敌人在清江镇泗塘村活动，突然发现敌陈济部队包围过来，躲避已经来不及了，便走进一家正做木犁的农户家里，不一会敌人包围过来，一个头目模样的敌兵指着他和木工工匠问：“你俩是做木的吗？”金哲海机智地回答：“是做木的。”敌兵考问犁的尺寸及有关木工的常识，金哲海沉着应答如流，敌兵见问不出破绽只得撤兵。

1948年2月的一天晚上，金哲海赴四都准备向中共虹桥区委汇报工作，当他走到清江镇三塘村茅竹山的路上时，发现敌兵包围了清江底村。他连忙躲进一户正做衣服的农家，敌兵进门搜查时问道：“你们有没有会算命拆字的？”金哲海镇定的地说：“我们是做衣服的，哪里会算命拆字？”敌兵并不死心，又问金哲海衣裤的尺寸和用料多少，金哲海毫无所碍一一作答，很似熟练裁缝老司，骗过敌人，化险为夷。

同年3月间，敌陈济部队又包围鲤鱼山村，抓捕金哲海。正值中共虹桥区委地下交通员傅德希获此情报，奉命步行到鲤鱼山村报信。因陈济部下的便探伪装我游击战士模样，傅误将敌人作自己人，后发现中敌诡计，转身逃跑，但为时已晚，被敌抓捕。敌人用严刑酷打，强迫傅供出金哲海的秘密住所，傅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正当敌人捉住傅德希双方扭打的时候，被鲤鱼山的地下党员看见，立即拉着金哲海迅速转移，得免毒手。但是金哲海的老父被万恶的敌人抓去，受尽酷刑，被折磨至残后，连生活都不能自理。

此段时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致使人力物力大量消耗，兵源枯竭。他们为了巩固后方，千方百计企图将地方革命武装斩尽杀绝。苦于兵力不足，便令驻在乐清各地的“税警”（盐兵）哨亭也兼盘查共产党活动的反革命勾当。金哲海奉命带领南塘镇鲤鱼山及扬州党支部20余人在一个晚间，偷袭南塘镇东山“税警哨亭”，缴来步枪两支。然后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到芙蓉镇“税警哨亭”袭击。其时哨亭无人，便一把火烧毁了这个反动的税警巢穴。当地群众闻讯，莫不拍手称快。没隔几天金哲海又率领原班人马，

赶赴玉环县大横床岛，铲除了当地作恶多端的地头蛇。后来再用巧计镇压了南塘镇小东塘村肆意敲诈盐民和破坏供应我“括苍”支队食盐线路、民愤很大的“盐师爷”。

金哲海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活动，一一被隐藏的特务查知，上报给了国民党乐清县党部，他们对金哲海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不仅严命特务时刻紧盯住金哲海，还派遣国民党浙保四团四处追捕金哲海，下死令给杀人魔王翁必如，限期拘捕金哲海归案。

同年11月26日，敌人再一次突然包围鲤鱼山村，抓捕金哲海，金哲海已到地活动，敌乱捕当地群众20多人和应届保长共产党员王运钱。并用重刑逼迫王运钱招出金哲海的去向，王坚贞不屈，只说：“我只是一个国民党的保长，金哲海的去向我怎么知道？”敌人恼羞成怒，将王运钱同志用刺刀活活刺死。王运钱为了金哲海和其他革命同志的安全，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9年1月24日（农历1948年12月26日），金哲海烈士到鲤鱼村支部部署春节前后地下党员的隐蔽工作后，和一位同志离开鲤鱼山村到其他地方安排工作。因为特务的告密，当他们到了清江镇北塘村桥头时，突然发现敌翁必如部队向鲤鱼山村开来。此时的金哲海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意识本来可以迅速回头，从北塘村经鲤鱼山向东北方向的泗塘村隐蔽，但他为了避免因他与地下革命而十二次遭国民党匪徒包围频受苦难的鲤鱼山村人民再次遭殃，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安全计划，而向东南方向的南塘镇的扬州村逃避，却料想不到，在北塘村与扬州村交界的小州自然村亦有相当多敌兵布防。他迅即转往扬州村避去。疾走了几步，猛然想到隐藏在鲤鱼山村小山自然村小河里的一只翘尾巴船中已隐藏着几位战友，考虑到他们的安全，他即命令同行的同志向小山自然村逃避，自己毅然朝明知有敌兵的西塘村方向奔走，并开枪向敌人射击。枪声吸引了包围的敌人，他们即形成半圆形包围圈开枪射击金哲海，金哲海一是孤身无援，二是身处毫无掩蔽物的泥泞河床，不幸壮烈牺牲。残暴的国民党匪徒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虹桥镇栏杆桥头，进行示众。

金哲海烈士是党的好男儿，他为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永远是人民的楷模。

红十三军双枪女英雄金秀英

刘定卿

八十年代，电影《红岩》中，有一位双枪老太婆，双手持枪，冲锋陷阵，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你可能没有想到在 85 年前，浙南红十三军里也有一位双枪女英雄，她的名字叫金秀英，她的传奇人生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鲜为人知，她的事迹引起了我的关注，经过调查走访有关知情人，终于将她的经历基本查清，现将情况介绍如下：

参加革命的经历

金秀英是永嘉五鸿前山龙潭坑人，她 17 岁时，长得秀丽，性格豪爽，做事勤快，胆大心细，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大姑娘。虽然小时包过脚，但未等成型，就把裹脚布放开了，所以她跑得很快，村里人称她为“假小子”。

金秀英已到了论嫁的年龄，有人给她提亲，男方是五鸿村青年胡协和。胡协和高高的个子，长得很魁伟。他的叔公胡邦宽是本村清朝光绪年间的武进士，胡协和就在他的培养下，练得一身好武功，到 18 岁时，一般三五个人一起上，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后来，胡邦宽把他推荐给胡公冕当警卫员，随胡公冕参加北伐，从此，胡协和走上了从军的道路。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胡公冕遭到通缉，胡公冕派胡协和回乡组织农民武装。不久，胡协和拉起了一支 20 多人的农民武装，成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眼中钉，官府曾多次追捕他，都是妻子金秀英机智掩护他。他觉得妻子是个得力的帮手，于是给她讲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金秀英说：“我是你的妻子，我支持你革命！”金秀英的父亲是龙潭坑当地的一户富裕人家，金秀英为了支持丈夫闹革命，她从娘家“拿”了（有说是偷了）120 个银元，给丈夫买枪。

金秀英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去霞渡潭警察分局缴枪。霞渡潭（今三角岩附

近)是楠溪水陆过往温州的咽喉。国民党政府在此设立第六警察分局,以控制“土匪”出入。1929年秋,永嘉楠溪灾情严重,加上连年内战,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农民纷纷揭竿而起。自从荆州盐民摧毁黄村瓯盐公所后,胡协和也趁势响应,准备去缴霞渡潭警察的枪,来武装自己的队伍。

1929年8月28日夜里,金秀英随胡协和、胡振盛、周洗枹、徐定魁等20多人,分乘三只小船埋伏在警察所附近。等到天明后趁警察在吃早饭时,四五个人扭住“小偷”以报案为由,涌进警察分局。胡协和突然用枪顶着一个当官的脑袋令他不许动,弟兄们趁机扔了两个土手雷,轰的一声,在外面等候的队员立即冲进了警察局,把正在用餐的警察武器全部缴械。这次行动共缴枪步枪23支、手枪1支,还有子弹4000发。这是金秀英第一次参战,经过这次战斗,金秀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半个月后,胡协和带了150多人袭击枫林村驻在八房祠堂里的省防军一个连,金秀英跟随丈夫一起出征。这次战斗毙敌两名,缴枪12支。枪弹多了以后,金秀英经常持双枪练习射击,打得很准。在战斗中,她经常持双枪参加战斗,双枪金秀英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

11月24日,胡协和领导的农民武装在黄南遭到省防军和民团的包围,在突围中,有23位战友当场牺牲,许多人躲在山石后犹豫不决。当时金秀英急了,大呼一声:“有种的跟我来!”说完就提着双枪冲下山岗,一路上,她左一枪,右一枪。后面几十名红军兄弟看到金秀英如此大胆,也都跟着冲出了包围。

在这次战斗中,金秀英负了伤。一颗子弹穿过右边的口袋,击到放在口袋里的一块银元,后嵌在右肋的皮肉上,血干后就牢牢地粘着衣襟。战友们用山水擦洗伤口,采集药草,敷在她的伤口上。那几天,她在岩洞和草丛里疗伤,敌人却在她疗伤的百米外反复搜山,好几次险被发现。

坎坷曲折的人生

1930年3月9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成立,金秀英随丈夫攻打处州,智取枫林。5月9日,红十三军第一团成立,胡协和任二大队大队长。从此,

金秀英随丈夫血战平阳，强夺缙云，鏖战乌岩……。

但是，在戎马倥偬中，既有歼灭敌人的痛快和兴奋，让人扬眉吐气；也有在战斗中感到悲伤和痛苦。在攻打平平时，有大批红军兄弟惨死在敌人的机枪下，她亲眼看到战友被打死的惨状，令人刻骨铭心。特别是红军去攻打平阳后，枫林民团和保安团 1000 多人趁机偷袭五湖村，放火烧了 350 余间红军的房子，全村一片残墙断壁，哀鸿遍野。

胡协和家的房子被烧毁后，他们只好住在溪岸对面的四份祠堂里，这个祠堂比较偏僻，过去村里族人去世了，就在这里围丧，甚至还有棺材停放在这里。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相依为伴，一起熬过来了。但是，那时候红军队伍里女同志很少，而且封建思想又很严重，在金秀英与男战友的交往过程中，难免会有人看不顺眼，风言风语也多了起来。到 9 月时，他们之间产生了误会，结果婚变分手。

金秀英与胡协和分手以后的情况，很少有人知道。到 10 月底红十三军失败后，她隐姓埋名，流浪他乡。到解放后的 40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她是怎样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

九十年代的某一天，永强老干部韩高堂偶然发现永强天柱寺附近的一座庵堂里，住着一个老尼姑，名叫金秀英，是永嘉楠溪人。听人说她年轻时参加过红十三军，解放后因生活所迫在此出家。韩高堂把这个发现告诉正在瓯海县民政局帮助工作的潘德清同志，他从 1986 年起一直在寻找红十三军的失散人员。当他听讲有这回事后，立即就约韩高堂一起去看望这位老红军。

当他们见到金秀英时，她已有七八十岁的模样，头发已泛白，在庵堂的门口摆着几筐草药。她虽然住在庵堂里，却没有剃发，倒像是一位居士。当潘德清问她是不是叫金秀英，有没有参加过红军时，她只是点了点头，只顾自己在整理草药。

潘德清似乎有点不相信，又问了一句：“是真的？还是假的？”金秀英生气了：“名字是爸妈取的，能改吗？是红军，你管饭吗？”

潘德清笑了，说：“阿婆，您若当过红军，政府一定管您吃饭。”

金秀英听到这话，她也笑了。于是，潘德清就问她为什么住在这里？她说这里有地方住，也给她吃，她就住在堂里了。潘德清又问她：“门口摆草

药摊儿干什么？”金秀英说：“我懂得草药，平时就上山采点草药摆在门口卖，以补贴堂里生活。”

在确定这位“出家人”就是金秀英后，潘德清又去看望了她一次，并带去了一些礼物，表示自己对革命前辈的敬意和慰问。时隔 20 多年，当潘德清回忆这件事时，眼睛里泛着泪水，他说一个老红军落魄到如此地步，真让人难过。

潘德清很快将金秀英的情况向永嘉县民政局反映，后来，永嘉县民政局派人来看望金秀英，并把她接到永嘉上塘环城北路三元堂敬老院居住。但后来我在走访中，有人说金秀英是信基督教的，还说她有一个女儿。这些情况与潘德清同志所说的几乎是南辕北辙。这其中是另有隐情？还是道听途说呢？我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晚年“出家”的秘密

2016 年正月初五，我在红二代胡明松同志的陪同下，与爱人一起去五鸿村走访，见过他的妈妈和弟弟胡光松。她妈妈那年 93 岁，丈夫胡协岩（胡黄岩）是红十三军战将胡协和的弟弟，15 岁时跟哥哥一起参加红军。这说明胡明松的妈妈与金秀英是妯娌关系，她对金秀英后来的情况很了解。于是，我再次在胡明松的陪同下，去五鸿村专门访问他的妈妈，请老妈妈说说金秀英的有关情况。老妈妈年纪虽大，但身体硬朗，一天到晚帮助儿子胡光松干活，她脑子很灵光，记性也好，金秀英过去的事，在他们的解释下，谜团很快就解开了。

老妈妈说：“金秀英原来是信佛的，在温州永强当尼姑，但她并不是真正信佛，也没有剃发，她没有吃，也没有地方住，堂里看她可怜就收留了她。后来被政府接到上塘敬老院后，她来看过我，我一家都奉信基督教，我就劝她信耶稣，说耶稣会救她。后来她就同我一起去礼拜堂了。”

儿子胡光松知道金秀英是他的大妈后，对她特别同情，在金秀英生前，他每个月都会主动去敬老院看望大妈，他说：“红十三军失败时，部队分散隐蔽，金秀英与我大伯也分了手。她后来去青田，在青田再次结婚，听说有

3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比我大，我是1952年出生的，说明金秀英在解放前还没有出家。后来2个儿子先后去世，只剩一个儿子和女儿，她又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随着年龄大了，没有办法再维持生活，只好去当尼姑。”

胡光松还说：“大妈性格很耿直，有什么事心里放不住，住在敬老院里，院里没有给她零花钱，她去看亲戚也没有钱买“盘手”（即礼品），让她很难堪。她知道县里红军失散人员都有政府的补贴，为此她很生气，就到县民政局找一把手，对着局长拍了桌子，责问：“我是老红军，我为什么没有红军补贴？”，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位女红军的脾气还是很大的。”

不久，有老红军认出她是红十三军的双枪女英雄金秀英，枪法很准，作战时经常手持两支短枪，冲锋陷阵，让敌人胆战心惊。从此，金秀英的事迹曝光，敬老院里不断有报社记者前来采访她，还把她的照片登在报上，红十三军双枪女英雄金秀英的事迹就此传颂开来。

金秀英晚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人民政府对她很关心和照顾，子女们也经常来看她。金秀英一直在敬老院里生活，于2002年去世，享年93岁。

新四军烈士田守尧陈洛涟伉俪

陈学文

田守尧、陈洛涟丰富的革命经历，短暂的人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毛泽东曾于1940年7月在延安接见八路军新编二旅旅长田守尧、八路军敌军工作训练队长谢振华(1916.9-2011.8, 1949年任三野38军军长、后任昆明军区政委、少将)他们在奉命赴华中解放区之前来到杨家岭向毛泽东辞行，毛与他们亲切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1943年春，党中央为了迎接抗日反攻的高潮，下令调遣新四军团级以上年轻有为的若干名干部赴延安培训，三师奉命派遣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1名团级以上干部赴延安，途中遭日寇阻击，彭、田等英勇牺牲。

长征途中初建奇功

田守尧，1915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新安区田墩村，家庭贫困，仅靠租种几亩田维生，兄弟姊妹五人，幼年失学，10岁替地主放牛。

1931年参加了河西武装暴动，在斗争中得到了初步锻炼和考验。当年12月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第25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次年入党，升为排长。1934年10月在河南党山战役中，英勇坚强，得到军首长徐海东的赏识，调他到军部交通队任指导员。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他在多次战斗中机智陷阵，提升为225团二营营长。1935年4月鄂豫陕省委成立，他与徐海东同时选为省委委员。为了迎接党中央与红一、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田守尧指挥225团二营与敌35团肉搏战中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保卫了全军安全渡过了泾川河。1935年9月红25军抵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的26军、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15军团，田守尧升任74师师长。1935年10月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在直罗镇全歼敌109师，田因战功卓著，11月30日参加了党中央在杨家岭

召开的祝捷大会。12月在刘志丹指挥下，在响水堡击溃国民党北线部队的进攻，保卫了驻瓦窑堡的党中央。1936年任第15军团78师师长。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田守尧率部转战鄂豫皖甘陕五省40余县，行程万余里，先后负伤6次。在长征中表现非凡，为难得的年轻将领（仅20余岁），深得徐海东、刘志丹、程子华、宋任穷等表彰。

平型关大捷中建功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34旅，下辖687、688两个团，田守尧任687团副团长。1937年9月25日，334旅奉命于平型关设伏，田守尧率687团先头部队与友军重创日军辎重队，取得首战平型关大捷，他再次负伤而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冒着剧痛指挥战斗，建立了不朽功勋。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电表彰：“687团副团长田守尧，在平型关战斗中果断机动，身先士卒，奋不顾身，身负重伤。”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争中重创日军嚣张气焰、振奋民族精神的著名战役。

1938年4月田守尧任687团团长，朱德总司令曾至该团视察，勉励他说：“守尧同志，我们对687团的新班子充分信任。”他率687团协同688团于张店歼灭日军千余人，再创平型关之役后又一出色战例，尔后参与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7月田升任344旅副旅长，10月奉命再次赴延安学习。1940年7月从延安赴华中任新二旅旅长，8月新二旅改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2支队，田任支队长，南下增援新四军。在黄克诚率领下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八旅，田任旅长，兼任盐阜军分区司令，打击日寇和伪军，剿除土匪，巩固了盐阜抗日根据地。

这里还须提到田守尧与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斗友谊。田虽出身贫苦工农干部，但他从小就酷爱学习，他的亲密战友，八旅政委吴信泉（开国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说：“他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工作之余总是手不释卷，看书看报，细心钻研……他已经知识化了。”（《给田守尧同志复仇》）原八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开国中将、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委）说：“田守尧同志是知识化的工农干部。……谈吐文雅有儒将之风。”（《悼田守尧同志》）

上二文均收录于《民族之光》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所以他对知识分子、作家很是亲近。周立波（1908-1979）时任抗日战地记者（他以《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小说二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1937年10月至12月，偕同美国记者卡尔逊一同在前线采访，曾采访过朱德徐向前刘伯承宋任穷贺龙聂荣臻王震陈赓等。田守尧接受护送任务，从此他们结成很深友谊，还救了周立波一命。周立波孙女周仰之：“周立波一直很怀念他，写过有关他的文章，在五七干校和我长谈中经常提到他，对他救命之恩念念不忘。”（吴成章《抗日山》，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6页）周立波一直对他感恩不已，视为救命恩人。他写道：“在娘子关前的大山上，我病倒时，田比什么人都关心我，我至今不能忘记。”“敦厚、驯良，既温和而又满含潜力的姿态。……把青春的精力和热情通通献给与了战斗，一切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田守尧同志》，刊于上书第87-90页）

小沙东海战：他永远活在盐阜老区人民的心中

田守尧自从任新四军三师八旅旅长以来，长期驻防于盐阜地区（三师与新四军军部驻在一起，兼有卫戍军部之责），扩军1000多人，帮助盐阜各县先后建立县大队、区中队、乡自卫队等抗日武装。据今之滨海县天赐场老区老人的回忆，田守尧与夫人陈洛涟，曾借住在徐丹村徐邦森家中。陈洛涟原为新四军军部参谋处参谋，为了锻炼自己，主动请求下乡做群众工作，曾一度调任阜宁县妇救会主任，兼区委书记。她深入群众，多次到浩荡小学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深得群众的欢迎。曾发展徐邦森（1961年任常州市粮食局副局长）、徐邦杰（天赐区第一任副区长）、戴秉兰、戴秉义入党，壮大了党组织。徐丹村徐平将军（海军政治学院副院长），2012年他90岁来到杭州，与我亲切会面。他是一位有心之人，深情地说：“陈洛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当年在他知道田陈牺牲时万分悲痛。这次特地书写了“忠厚传家”意味深长的书法赠送给我。徐丹人徐振理（1961年生，现为天赐镇干部）说：”自我记事那天起，长辈们茶余饭后常夸赞新四军驻地女干部陈洛涟，……我们这一代人是听有关陈洛涟故事中进入梦乡，听着有关陈洛涟的故事长大

成人的。”有关陈洛涟烈士事迹在温州烈士纪念馆和《温州市志》等都有详介，此不赘。《温州日报》记者潘虹曾实地调查后写了专文（见《温州日报》2015.8.21《文化周刊》）。她写道：陈洛涟“为了家国的永久安宁，为了更多人的甜蜜相守”而牺牲了自己。

1943年春，为了迎接抗日全国大反攻，党中央下令抽调新四军三师年青团级以上干部多名赴延安培训，三师师长黄克诚决定派遣师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等11名团级以上干部及随从人员（中含7名女干部）共51人组成赴延安学习干部队，由彭田二人担任正副队长于1943年3月初出发，这时正是日寇以25000兵力发动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赴延安干部队由八旅22团第1营护送过运河到淮海区，但日寇封锁了运河，只好折回盐阜，改变行军路线，舍陆路改海路，从江苏沿海乘五桅载重7千吨的木帆船，船上有20多名水手，拟从盐河口出发沿黄海北上，绕过连云港（敌封锁区），在赣榆县柘汪口上岸，再经山东转赴延安。3月16日乘船出发，风平浪静，船行平稳，大家充满着快乐和信心。次日风息而船也驶不动了，距柘汪口还有70-80里，船靠近连云港了，不一会日寇巡逻艇发现了木桅船，逐渐驶近。彭田很镇定做了战斗部署，敌艇鸣枪令帆船下帆待检查，船老大（掌舵手）老王答话是开往青岛的商船，日寇跳上船欲行“检查”，说时迟打得快，把上船的几个日本兵和汉奸翻译打死了。敌艇急忙驶开距木桅船三四百公尺的海面上立即用枪炮向木桅船狂射，彭雄同志中弹了。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三时，田守尧指挥干部队顽强抵抗，又有一些同志中弹牺牲了。木桅船被敌弹射穿进水了，战况十分危急。官兵们马上用棉被堵塞，田旅长下令立即处理掉携带的文件，船舱里满是混着血进舱的海水。妻子陈洛涟也中弹了，她按着伤口，坚强地鼓励战友：“到了我们最后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了！”田旅长看着新婚妻子受伤，自己又晕船，他强忍着痛苦坚持着战斗，果断地决定让木帆船靠岸。这次战斗持续到夕阳西下，敌艇悻悻地载着十多具尸体驶离木帆船，无法征服新四军的战士。船老大（掌舵手）、水手牺牲殆尽，战士们只好自己拉起船帆驾船前进。但是，由远而近驶来三艘敌巡逻艇向木帆船靠近时，用机枪向民船射击，在这危急关头，田旅长下令只能舍船涉水向岸边走去。他扶着受伤的妻子陈洛涟走在前头探路，不料一个巨浪向他们冲来，他们陷入水漕而

牺牲了。临危关头陈洛涟还不断挥手高呼后来者注意安全。刘白羽、周而复等《海上的遭遇》写道：“消瘦谦和田旅长，骁勇的年轻将领，一生为了革命事业，青春都消磨在战争里，挂过七次花，身体上布满枪弹的创伤。这次为了领导大家突出优势敌人的包围，牺牲了自己救出了大家，你的伟大的战斗精神，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像这样悲壮的斗争，像这样无畏的精神，在抗战史上是可歌可泣的。这是共产党人高贵的品质，凛然的气节，……将永恒地振奋着全国的人心。”（延安《解放日报》1944.3.4）

这次海上的遭遇，亦称小沙东海战，赴延安干部队牺牲了16位同志，其中有彭雄、田守尧等五位参加长征“身经百战”的老干部（《纪念小沙东烈士文》）。一共牺牲了44位（含船上水手等），不久在黄海之滨赣榆县马鞍山（今名抗日山）竖起了烈士纪念塔和烈士陵园，有刘少奇、陈毅题词：“浩气长存”，黄克诚题写了挽联，张爱萍写了悼文。曹荻秋挽曰：“盐阜著威名，敌后撑持，军民共仰；江淮思烈士，海滨凭吊，风木同悲。”新华社华中电讯：“此次牺牲实为我党我军及中华民族不可弥补之损失！”李人毅《平型关大捷》中以非常惋惜的笔调写道：“将星陨落了，田守尧没有走入共和国将军的行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306页）《人民日报》·《永远的丰碑》2005年10月10日以《艰难百战壮山河》为题报导了田守尧。2014年9月1日民政部公布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300名录，田守尧名列其中；抗日山烈士陵园为2014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地名录之一。

高尚气节，万古流芳

田守尧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年青将领，在长征中屡立战功，在抗日战争中首战平型关功勋卓著，得到朱德、彭德怀、左权、刘志丹、徐海东的嘉彰。在参与创建盐阜抗日根据地中，亦有很大贡献，深得老区人民的景仰。一生戎马，身上留着七八处弹痕，七次负伤，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仅28岁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的身上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正如他的战友、开国中将吴信泉所说：“他的优良作风和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品格，……英勇牺牲的精神，高尚的民族气节，也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有。”老区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他，每年清明节，盐阜老区、滨海县天赐场镇的徐振东、赵守维以及乡镇干部徐振理等，都会自动携带花圈去祭奠他们，体现了盐阜老区人民与新四军的血肉情缘，绵绵不绝。说起赵守维还有一段有趣故事：1943年田守尧赴延前夕，在赵守维家晚餐，席间才五岁的守维，天真活泼，田陈见了很喜爱，赴延同行者伍瑞卿（守维的姐夫）开玩笑说那就给你做义子吧，田陈颌首微笑，不料一语成箴，数十年来已届古稀的赵守维及其祖孙三代都去抗日山烈士陵园祭奠田陈。在陈洛涟故乡浙江乐清市北白象镇莲池头村由村民陈宣静等创办了陈洛涟抗日烈士纪念馆，让宗亲乡里缅怀为国牺牲的巾帼英雄。崇敬英烈，牢记革命，这是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也是我党光辉永照人间！

关榕烈士二三事

李大枢

关榕烈士（1924—1946）光荣牺牲已经 71 周年了。我有幸认识他的几名当年的学生——金国弟、金岩嫡、刘惠志和刘惠相。这几位老人如今都已 90 多岁了，但对当年关榕教他们学习的事，印象还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今天把几位老人知道的事一一讲述给大家，供参考。

关榕，1924 年 6 月出生在温州市信河街石坦巷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他父亲思想进步，在银行里颇有威望。全家十口人，兄弟三个、姐妹三个，还有爷爷奶奶，全靠他父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关榕从小就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所以他对贫苦人民很同情、很关心，对地主、外国的侵略者及反动派特别仇恨。他读中学时，就参加学校里的抗日救国活动，他和他的姐姐关少娴一起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党的指派下，到永强、大罗山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他朴实笃厚、钢强坚毅，满腔革命热忱，颇受同学们的爱戴，被同学们选为联立中学学生自治会的主席。

1940 年 7 月的一天夜里，姐弟俩被警察抓了去。是年冬天，他们逃出三青团特务的监视，到瑞安山区找到永瑞中心县委书记吴毓。吴派他姐弟俩到永嘉枫林镇沙岗小学教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关榕化名王垒。当时的沙岗小学办在沙岗东坊村西北角的季氏宗族的一个小祠堂里（这个祠堂如今还在），共有二位老师，三十多个农民子弟在校读书。白天，关榕教孩子们学文化，唱抗日救国的歌，讲贫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原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帝国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掠夺等等革命道理。晚上，与地下党员到贫苦农民家里宣传抗日的活动，号召贫苦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参加共产党，才能斗倒地主、反动派；全国人民要共同抗日，揭露汪精卫是汉奸等等。

1941 年春天，关榕姐弟俩被胡国洲引荐到山坑乡。姐姐关少娴在汤店小学教英语，关榕化名王一良，到郑庄小学教书。他一天只有一升米的工资，

他的生活非常艰苦，还要接待自己的革命同志。当年的汤店小学办在汤店村刘氏大宗里，共有五位老师，胡国洲、汤敏、陈友庆、徐云汉和滕世良。全校有学生一百多人，5个班。自从关少娴来了以后，又在刘氏大宗边上的小宗祠堂里办起了一个短期小学班。20多个农民子弟学习文化，学校不收学费，称为速成识字班。学校里的6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身边都有枪。白天教书，晚上到山坑乡各村活动，号召农民起来斗地主，闹减租减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老师们还教学生唱抗日歌，可惜三位老人都说记不得了。唯有金国弟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声有色地唱了起来：

汪精卫，到底怎么样？

日兵进入东三省。

输赢不离看（肯）。

紧急退散，长征路上走。

蒋氏乱兵打翻，

家家村里晓。

1941年4月，党又派关榕到溪下乡陈坑小学教书。当时的陈坑村曾在浙南红十三军时期，好多人参加过革命，所以群众基础很好，也是革命的根据地。小学办在金岩姆家的那座老大屋中间楼上。金国弟和金岩姆回忆起来，共有20多名学生。大家叫关榕为王老师。其余的同学是金光辉、金国南、金士德、金士发、金士亮、金立钟、金立波，还有阿道、阿生、阿村、方珠、会伍和麻云清、麻云桃等等。如今还健在的只有金国弟、金岩姆和金士德。

当年关榕在陈坑小学，对金国弟一家人感情最亲、也是最信任的，因为金国弟的父母亲对关榕最关心，经常叫关榕到他们家吃饭。那年的端午节，关榕被国弟父亲金有富请到家中吃粽子，他对国弟的父亲说：“大叔啊！我想叫国弟明天帮我把20斤米送到山坑乡的汤店学，给我的姐姐，你同意吗？”金有富连忙叫国弟说：“儿啊！王老师叫你挑米到汤店，那里很远。你中午到兴发你姑妈家吃午饭，然后再经过兴发那边的庐山、半坑、应坑，一直挑到汤店小学，路上不要与人搭话，切切牢记。”金国弟连连点头说：“我记住了，父亲不必担心。”

当天，国弟跟着关榕来到学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金国弟就起床洗净

脸吃早饭，然后挑起一担 20 来斤重的米担，从陈坑小学出发，经过弯弯曲曲的山间崎岖不平的山路，路过阳钟村、下岙村，中午挑到了兴发村。

金国弟把米担挑到姑妈家时，姑妈喜出望外地把金国弟迎进了家门，烧了好点心给国弟吃。饭后国弟对姑妈说：“我这担米是王老师叫我挑到山坑汤店小学王老师的姐姐那里，可我汤店未走过，姑妈领我一阵好吗？”他姑妈二话没说，领他挑到村头口，还指引了路径。国弟沿着他姑妈指的方向，又经过弯弯的下山山道，逶迤而去。一路上又绕过庐山村、半坑村、应坑村，傍晚时，终于把米挑到了汤店小学，交给了关榕的姐姐关少娴。关少娴竖起大拇指夸国弟说：“小兄弟，你真行，才十三岁敢走这么远的路，还挑着这么重的担子，一路辛苦啦！”她打来一盆水让国弟擦洗身上的汗水，又烧了满满的一碗鸡蛋面让国弟吃了当晚餐。国弟说至今还记得这碗面的味道——太鲜美了。

一夜无话。因为走了一天的山路，国弟倒头便睡着了。第二天原路返回。由于空手回家，特别轻松，太阳还有二丈高已经回到了陈坑小学。他向王老师交差后，关榕兴奋地抱起了国弟说：“你真是我的好学生，好兄弟啊！”

晚上，当国弟向父亲讲路上挑担的经过时，他父亲轻轻地对国弟说：“你今天给王老师挑的米里，藏着一把手枪，还有 50 多发的子弹。”国弟听了吓了一跳说：“啊唷，我的妈呀，好危险呀，幸好一路上无人问我，也无人检查我的米担。要不然死定了。”从此国弟对关榕更加尊敬了，知道王老师是个英雄人物，自己心中也更自豪。

8 月里的一天，关榕又叫国弟挑米到山坑乡的汤店小学。这次金国弟心中明白更加小心谨慎，遇上大人，只管低头挑担，路上那些大人见只是个孩子，也不多问，只擦肩而过。傍晚时又一路平安地把米送到汤店小学的关少娴手里。那一晚，金国弟向关少娴请教了好多革命道理，还学到了好多的新鲜事物，对中国革命定能成功充满了信心。

9 月里的一天晚上，关榕带来了他的弟弟关平，还有胡景城夫妇来到金国弟家。关榕叫金国弟到金山村的金天月、金连福家，叫他俩来开会。自己忙着又叫金国弟的父亲金有富到潘山头叫金少奶来开会。当大家在屋里开会时，金国弟和父母三人在茅棚厂外站岗放哨。若有人来时，他们在外面大声

与来人打招呼，好让屋里的人撤退隐蔽转移。

胡景斌三人在金国弟家住了三天三夜。白天他们在茅棚里休息，研究对敌政策；晚上叫周围四乡的地下党员开会，商量研究。具体谈什么事情，因为国弟他们都在外站岗放哨，所以一概不知，要想知道，只有问胡景斌了。

金国弟的父亲金有富，兄弟六个，他是老大，原来住在溪下村，为了逃壮丁，他只身带着全家逃到深山，那个地方叫兰河田，在深山冷岙之中，只有一座茅棚，所以非常有利于做革命联络点，故而胡景斌在此可以大胆放心地住下来，而且红十三军撤退到溪下时，金有富领导众乡亲，支援过红十三军的生活，当年红十三军战士们称溪下乡是红十三军的娘家地。故而，金国弟家是革命同志常来常往的好场所。

10月里，关榕又带来了胡景斌夫妇，还有李明等，一共七人在金国弟家住了七天七夜。他们一家人又里里外外地忙着：时而叫人，时而放哨，时而烧饭，时而挑水，时而送货送信。

1942年3月，关榕由于工作需要，升任为瓯北县委碧莲区特派员，活动范围更广，任务更多更重，后又升为指导员，故而在金国弟家落脚的时间更多。陈坑小学由于敌人的多次扫荡而停办了，革命指挥中心也转移到潘山头。关榕怕连累到金国弟全家的安全，直到光荣牺牲前，也未来过金国弟家，倒让金国弟全家人时时刻刻想念着他。

1946年，关榕被敌人残酷杀害，他们全家人整整偷偷地哭了三天三夜。

关榕烈士永垂不朽！

全中国革命英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本文根据金国弟、金岩姆、刘惠志、刘惠相口述记录整理。）

追忆父亲的抗战岁月

洪成樑

我的父亲洪汝兰，党内叫小洪，1917年9月出生于腾蛟镇龙尾社区吴小垟村。他在私塾学校读书五年，是偏僻的山区为数不多的有文化知识的青少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浙南红军游击队在龙尾山区开展革命活动，父亲受到革命的熏陶，懂得革命道理，15岁就给红军站岗送信，做力所能及的工作。1936年，中共浙南委员会领导授意，父亲去动员祖父慷慨解囊，他在吴小垟宫创办红军小学，任校长兼教师，供本村和邻村的儿童和青年到校读书。1936年春，他参加红军队伍，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吴小垟党支部书记。1937年7月，抗日烽火遍及全国各地，父亲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他亲历了抗日战争的全程，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在抗日烽火中磨砺，他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老同志给我讲述我的父亲在抗日斗争故事的余音，不时缭绕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宣传抗日遭到拘捕

1937年8月，国共谈判成功达成协议，形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我的叔叔退休干部洪汝德回忆：“那时，粟裕来到龙尾山区检查工作，在我们的家设立新四军新兵接收站，派老红军陈急冲同志负责接兵站工作。大哥汝兰在本村或到邻村动员青年参军，吴可其、洪玉暖、洪汝勉、林仁锐、白洪楼等人参加新四军新兵队训练半月后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夏天，父亲担任中共平安区委宣传委员，他扮作买油桐子客商，前往廿五坑（今属文成县），向学校师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该校长是国民党顽固派，他偷偷地溜走，告密其主子，带兵来抓人。父亲在返回途中，被国民党兵包围起来，敌军连长下令将他捆绑起来，带到国民党兵驻地，关押在平溪小山村。

抗日老战士白希曾说：“当时，我在龙尾小学读书，我们接到平安区委通知，龙尾和吴小垵两校师生前往营救。当年儿童团长洪玉华、副团长郑作富去凤卧小学借来几十件学生装。由陈朋老师带队，我和洪汝培（小洪之弟）带领两校50多名学生，穿着学生装，浩浩荡荡地到达平溪村，同敌连长进行说理斗争，责问他们宣传抗日有何罪？对方理屈词穷，不得不释放洪汝兰同志。”

在新四军教导队学习

1938年12月，经中共平阳县推荐，浙南特委决定派出洪汝兰、林瑞清同鼎平青年党员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这对渴求知识热爱学习的父亲，可是个大好机会，他高兴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父亲回到家里瞒着祖父说：“我去远方做生意，需要一些钱做本。”祖父也不问真相，就给他几十块银元。一行10人带着特委给他们准备了两张用密写药水写在草纸上介绍信，一张是特委写给新四军军部，另一张是给安徽歙县新四军兵站。他们从水头乘船出发，沿鳌江、瓯江北上，经丽水、金华、淳安等地。他们一路上机智地闯过了敌人一道又一道关卡，忍饥挨饿，跋山涉水，涉危履险，奔波10多天，辗转2000余里，终于到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新四军教导总队。

洪汝兰、林瑞清、王烈评被分编在教导总队二大队六中队。教导队培训分为两类型：一种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一种是以军事为主，政治为辅。六中队是政治队，军事和政治学习时间三七开。一方面学习理论《论持久战》、《游击战术》等；一方面进行步兵操练和野外军事演习等。父亲在教导队度过了既艰苦紧张，又心情愉快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生活，提高了政治和军事素质，增添了才干。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肩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重托，从重庆出发，由叶挺军长陪同专程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2月23日，新四军军部的干部和教导总队干部、学员共2000多人在章家渡码头附近欢迎周恩来和叶挺。3月6日教导队全体人员列队前往云岭陈家祠堂的军部大礼堂，聆听周恩来副主席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的报告。周副主席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同时，粟裕副司令抽空专程从前线回来找到洪汝兰、王烈评、吴生平等10多个当年跟他在浙南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同志开了座谈会。

王烈评对洪汝兰当年学习情况记忆犹新，他作详细地记述：“洪汝兰为人忠厚，诚恳待人，勤奋学习，热爱劳动。为了多学点文化知识，他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参加队里举办的文化补习课。在修建中村大操场中，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干着，争着扛木头，挑石块，装篮球架等，受到中队长田仲华的表扬。”

1939年7月初，父亲在教导队学习结业，回到平阳。当时正值省委召开党代会，他负责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反顽斗争针锋相对

1939年7月底，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父亲分配平安区任区委副书记兼武工组政委（指导员）。他和武工组长黄美金率领一支十儿人武装队伍在基本地区采用游击战术与国顽军展开周旋，使敌精疲力尽，不堪应付。敌人恼羞成怒，便烧毁我家房屋，逮捕我母子和叔叔等七人。

同年8月下旬，平阳遭受日机空袭。几乎与日军空袭平阳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平阳推行绥靖计划，掀起反共高潮，地方上的顽固派的走卒加倍地猖狂起来配合顽军搞白色恐怖。那时基本地区大部分被国顽军所控制，他们分兵封锁把守、天天搜山“清乡”，抓人杀人。政治形式十分险恶，我党一切活动只能在隐蔽环境中艰难地进行。于是平安区武工组根据县委的部署，开展严厉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1942年3月，平安区交通员白希绸路过岭门九垅地方，由于保长告密，被国顽军杀害。为了牺牲同志报仇，父亲他们研究决定武工组化装国民党便衣队，来到九垅水尾宫，让保长通知几个保甲长到水尾宫开会，要对反共有功人员进行奖励表彰。会上保甲长争先恐后“表功”，为了得到奖赏，把自己所干的坏事都主动说出来。武工组长黄美金让他们说够后，宣布其中几人的罪状，当场把他们就地枪决，其他保甲长才明白过来，个个哀求饶命，保证以后不敢干坏事。

麻步温笃斋任“县清乡队”大队长兼北港区区长，无恶不作，他杀害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1943年8月，父亲他们为消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进行周密研究，决定派胆大心细机智勇敢的武工队员去侦查温笃斋的行踪。平时温笃斋的行动十分诡秘，而且随身两个保镖，

个子大、枪法准，并带一个排的兵到处作恶。武工队为避免暴露目标，埋伏在麻步路边旁一片甘蔗园中。一天上午九时左右温笃斋和他的保镖从麻步街上走来，当他们走到埋伏地时，武工队立即开枪，温笃斋应枪倒地，两个保镖听到枪声又见其主子倒在血泊中，吓得抱头鼠窜逃命而去。当年武工队员林中回忆道：“我们乘胜追击冲进温笃斋家里，连杀三个负隅顽抗的便衣队员，其余人员束手就擒。缴了二支驳壳枪，一支手枪，三支长枪，胜利而归。”

武工组镇压了一些民愤极大，最死心踏地的顽固派的走狗，刹住了敌人的嚣张的气焰，为党和人民出了一口气，有利于地方党组织开展工作。

精细谋划 勇杀鬼子

1942年4月，县委组织干事（部长）吴可帮牺牲后，洪汝兰接任县委组织干事。同年年底，他来到西湾乡二沙村检查工作，召开党支部会议。他说：“当前革命斗争十分激烈，战斗频繁，国顽军装备精良，我们武工队装备简陋，敌我力量悬殊，什么地方可以搞到武器？”陈家崇近来在瑞安北龙岛捕鱼，刚从海岛回来。他说：“前几天，日军乘舰船从洞头去侵占瑞安，到了北龙岛海域时，一艘舰船发生机器故障，舰船搁浅，停泊修理。船上日军乘其他船只驶向瑞安，留下几名日兵看守。”

父亲听了高兴地说：“好，机会来了，我们想办法把日军武器搞到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人人献计献策，议论一番。最后他说：“我们化装为渔民去攻打日船。攻打前要做好准备，摸清敌情，才能行动，做到万无一失，打好这一仗。”研究决定由肖玉祥带领戴德铭、陈家崇、杨希昌、陈兰弟等人前往北龙攻打日军。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肖玉祥等5人驾驶一艘渔船驶往北龙岛，按原来作战方案进行实施。他们慢慢地靠近日船，一边捕鱼，一边观察敌船。日兵认为他们是渔民在捕鱼，也不以为然，毫无觉察。他们侦察了三天，查清敌船上只有2个日本兵，大家心中有了几分取胜的把握。第四天早晨，他们又把渔船驶近日船进行捕鱼作业，趁敌不备，大家一齐跳上日船，与日兵搏斗起来。他们都有一身武术，又有人力优势，很快制服了日兵，手起刀落，两

个日兵成了刀下鬼。然后，大家在船上大搜查，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支、手枪1支和大量军用物资。大家带着战利品，凯旋而归，首战告捷，振奋人心。大家欢欢喜喜迎接新春到来。

日军残害百姓 小洪抚慰家属

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日军节节败退。1945年5月下旬，驻温州日军先后占领瑞安、平阳，接应从福建北撤的日军。6月6日，日军残部抵达平阳境内，在灵溪、萧江等地扔下几条军犬（发疯的犬）。日军疯犬，在我县四处流窜，伤害百姓。一天，一条日军疯犬撕咬墨城乡山根村林岩钏家的小狗，小狗被咬得“汪汪”叫。他的大哥跑出门外，去追赶日犬，狂犬反扑过来，将其胸部咬伤。过了一段时间，他患上“狂犬病”，不时发作，失去理智。一天病发时，将其父的脚部咬伤，致使其父亲伤处生疮化脓，溃烂生了蛆虫，身体天天发高烧，一天天消瘦下去，因无药医治，不久他俩人先后被日军夺去生命，离开了灰暗的世界。

抗日老战士林岩钏说：“在我家多位亲人受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万分悲痛之时，时任中共平阳县委组织部长兼小南区委书记洪汝兰闻悉，特地来我家安慰我们。他愤怒地说：‘这都是日军侵略者犯下的罪恶，血债一定要血来偿还，我们要向敌人讨回血债。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挣扎起来，坚持斗争为亲人报仇雪恨。’他发动党支部帮我们做好善后工作。从此，我的弟弟岩清跟随小洪同志参加革命队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经中共浙南特委批准，平阳撤销了特派员制，恢复县委员会制，郑海啸任县委书记，我父亲洪汝兰任组织部长。

1947年7月，父亲从特委机关开会返回平阳途中，在瑞安飞云江湖石渡口遭到国民党便衣队的阻击，为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和党的机密，他纵身跳入飞云江，壮烈牺牲，时年30岁。1993年4月17日，原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步青为其题词：“纪念洪汝兰烈士忠心赤胆，千古流芳。”

红色记忆



挺进赣南的南昌起义部队

曾春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1927年8月1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与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等率领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打响的第一枪，也是创建的第一支人民军队。

播撒革命火种 宁都、石城除害

起义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原定在起义后“先取东江次取广州”的方针，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踏上了经抚州、赣南等地南进广东的征途。

起义部队经临川、宜黄，8月16日到达广昌。19日，起义部队离开广昌县城分左右两翼南进，二十军为左翼，当日到达广昌白水（今赤水），20日进入驿前，21日进入石城县境；十一军为右翼，当天到达头陂，20日进入宁都县境。22日，起义部队进入赣南宁都、石城县城。

起义部队进驻宁都县城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军长兼起义军代前敌总指挥叶挺，领导右翼军在县城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播撒革命火种，四处散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打到东江去，建设根据地”等内容的标语传单。起义军的政工人员还手执小红旗，沿街演讲，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鼓励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武装。起义部队扣押了一批尚在县城的土豪劣绅，紧接着又砸开了国民党宁都县当局的监狱大门，解救出被关押的革命群众。起义军农工委员会委员彭湃孤身一人在宁都驻地机智地抓获了5名暗探，为起义部队解除了威胁。起义军领导人叶挺、聂荣臻、李立三等人分别接见了宁都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并向他们了解当地革命斗争的情况、讲解革命

理论和革命前景，鼓励他们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以及随军南下。宁都县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则积极发动群众慰劳起义军，协助起义军开展筹粮筹款，仅3天时间，就筹集大米2000多担、大洋3000多块。8月24日，起义军离开宁都县城前往瑞金，途经长胜时，向长胜党组织赠送了2000银元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并要求长胜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组建农民协会，努力创造条件举行农民武装暴动。

起义部队进入石城县城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军长兼起义军代总指挥贺龙领导左翼军立即处决了县境内小松乡豪绅李学传、县城反动武装团长黄鼎怀和屏山镇国民党右派骨干分子陈乔等，为民除害，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同时，起义军还深入到农民、手工业者当中，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屏山镇裁缝工人杨庆荣经起义军的教育，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成为石城县党组织和革命武装的领导者。

横扫前进阻敌 瑞金、会昌激战

8月25日，南昌起义部队向瑞金开进。当天，起义部队第二十军首先在瑞金市壬田与国民党钱大钧部遭遇。朱德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作为前卫营，与钱大钧部两个团开始激战，一直坚持到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赶到，最终于次日清晨冲破敌人的防线，将钱大钧部的两个团击溃，取得了壬田战斗的胜利。此后，溃敌经瑞金向会昌方向仓皇逃跑，朱德率领起义军教导团第一、第二总队追敌至瑞金县境的谢坊乡才停止。

南昌起义部队在瑞金停留期间，还从缴获及国民党军丢弃文件中得知：敌钱大钧部的4个师1万余人已在会昌山一线占据有利地形并构筑工事；同时，桂系黄绍竑部也从信丰往会昌推进，企图堵截起义军南下广东并将其扼杀于会昌。

对此，前敌委员会为了避免继续南下时遭到敌人的背后袭击并彻底打破敌人的计划，经过周密部署，决定乘黄绍竑部尚未赶到、敌人兵力尚未集中会合之前，先破会昌之敌，再行南下。

会昌之战，起义部队的具体部署是：由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

和第二十五师为右纵队，绕道会昌西北面的西江、洛口，迂回敌后，主攻会昌西北的山头阵地；由朱德指挥的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和第六团为左纵队，向会昌城东北高地正面发动佯攻；而由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则为总预备队，驻守于瑞金附近，以策应和支援各方。此外，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亲赴前沿阵地，以协助叶挺、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第十一军的战斗。

8月30日早晨6时，会昌战斗打响。朱德首先命令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由于起义部队部署周密，各方配合得当，经过一天的激战，当日下午4时占领会昌县城。

瑞金壬田、会昌两次战斗共歼灭钱大钧部6000余人，其中俘虏900多人，缴枪2500多支，并缴获大批辎重物资。会昌战斗是起义部队南征途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磨练了新生的人民军队，扩大了政治影响。

义军重整旗鼓 展开“赣南四整”

9月2日，南昌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离开瑞金，东进福建，向潮汕开进，9月中旬进入广东境内。在潮汕作战失利后，10月下旬，部队转移到赣南。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落，军心不稳，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离队的、开小差的、逃跑的现象不断发生，部队减员很多，余部2200多人只剩下900多人。

因此，朱德等人积极采取措施，在赣南的安远、信丰、大余、崇义等县分别进行“整队、整纪、整军、整训”活动，史称“赣南四整”。

“整队”于10月22日傍晚在安远的天心圩进行。当晚，朱德在天心圩小河边沙滩上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会上，朱德抨击了悲观主义、逃跑主义的倾向，他指出，大革命是失败了，起义的主力也失败了，但是革命的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只要我们百折不挠、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的。经过思想教育，多数人克服了悲观失望情绪，有了共同的志向和明确的奋斗目标。随后，对部队进行精简，遣散随军的非战斗员，使队伍更加精干。

朱德严肃批评了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教育大家要遵守纪律。由朱德指定的名单，成立了“没收委员会”，规定一切缴获要归公，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反动官吏和土豪劣绅的财产，对缴获或没收的财物，由没收委员会处理和分发。25日，部队进入信丰县城后，少数人钻进饭馆大吃大喝，吃完一抹嘴走了；有的闯进当铺，把拉出导火索的手榴弹往柜头上一放，要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钱花；有的甚至跑进布店，把整匹的布抢到街上以两块银元一匹卖给老百姓。面对此状，朱德、陈毅当机立断，率部离开县城，行至信丰源和、丫叉桥之间的山垌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再次整顿纪律，会上宣布处决了3个严重破坏纪律和团结的，煽动逃跑、抢劫、勒索的，严重损害军誉的不良分子。

“整军”于10月底在大余县境进行。在大余，朱德、陈毅决定在此对军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整顿、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重新登记党员、团员，成立以陈毅为书记的党支部。党支部把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加强党组织对军队基层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领导。其次，对部队进行整编。全军缩编为1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纵队下辖4路大队。这样，部队编制充实，组织健全，便于统一指挥，利于作战。

“整训”于11月初在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进行。在这里，朱德、陈毅决定对起义军进行整训。首先继续对部队进行整编，在纵队之下重新编成3个步兵支队和1个特务大队、1个机炮大队，另将编余干部编为1个教导队。其次是继续整顿纪律，除重申不能损坏群众利益外，还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再次是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一次大课，小课天天上。并提出了新的战术问题，即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游击战争。与此同时，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分粮、分财物。

通过展开“整队、整纪、整军、整训”，使起义部队逐渐走向团结统一，大大提高了军事、政治素质，加强了组织纪律，从而完成了旧式军队向新型人民军队重大转变。

“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而作

张俊士

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

毛泽东作为有几亿人口大国的领袖，几百万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阶段能创作出这样多的军事战争史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法国汉学界称他为“东方诗神”，一位国际友人热情地赞誉他为“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为了隆重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国家决定在韶峰半山腰树起了一座永久性的丰碑——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这是毛泽东故乡一道雄伟壮美、高丽璀璨的风景区。

2007 年 11 月 12 日，我和老伴郑爱香以及毛泽东诗词爱好者戚卫东和他的女友毕诗梦同游湖南毛泽东故乡韶山冲，他俩知今博古，谈笑风生，使我们受益匪浅。

1993 年 11 月建成并对外开放的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占地 2 万平方米，50 块碑石全部由汉白玉、大理石、花岗岩和天然石组成。碑林之大、碑石之多、雕刻之精、造型之美、建筑之好，是当今世界所罕见。碑林依山走势、错落有致、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确是汇天下碑林之精华，融诗情画意于一体的旷世之作。特别是毛泽东那意境深邃，气势磅礴的诗词和他那洒脱无羁的狂草来书写自己的作品，让人感受到毛泽东诗词中彰显出来的英雄豪迈气概，更能体现出碑林超凡入圣，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近几年，我在参观韶山毛泽东诗词碑林的启迪下，又阅读了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诗词》，看一看、读一读、悟一悟，都能收到潜移默化的革命诗教，真觉得是百读不厌、回味无穷的享受。

今天，我特地将毛泽东诗词碑林看到的听到的和《毛泽东诗词》中读到

的有关军事战争的六首诗词及其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整理出来，作为向光荣的“八一”建军 90 周年献礼！

西江月·秋收起义

一九二七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而记实这一历史事件的《西江月·秋收起义》是毛泽东第一首军旅诗词。这首诗词，是他亲历战争风云的真实写照，是他讴歌人民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是划时代的不朽作品。

毛泽东生前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西江月·秋收起义》，或许是因为他对该作品不太满意。从诗词角度衡量，这首词算不上毛泽东诗词的精品之作。但是，纵观中国革命整个进程，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以及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作品，《西江月·秋收起义》在中共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江月·秋收起义》虽然只有短短 50 个字，却真实再现了秋收起义的历史，深刻揭示了农民暴动的根源，表达了对革命战争的无限赞美，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这首诗词明白易晓、平中见奇，词句男女老少皆懂，很符合工农战士的口吻，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境界。

1927 年，是中国人民饱经血和火洗礼的一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和血腥屠杀，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鲜血，掩埋好同志的尸首，他们又在继续战斗，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漫漫征途。

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了掌握军队以革命武装反

对反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毅然作出了三大决策——发动南昌起义、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组织农民秋收暴动。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因此，“八一”这个光荣的日子，就成为人民军队纪念日。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布《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四省党组织发动农民立即进行秋收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在8月16日至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湖南的秋收起义，应该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要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来号召和发动起义，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而湖南省委决定：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二步攻占长沙，但他预见到了攻打大城市难以实现的前景。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1927年9月，毛泽东又来到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组织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渡，下辖3个团，总共5000余人。会议还部署了从修水、安源、铜鼓山分三路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决定亲自到铜鼓山指挥秋收起义，当他到了浏阳附近一个村子，那里有一伙地主武装——民团将他逮捕。同时被抓的还有护送毛泽东的潘心元、易子义和许多“共党可疑分子”押送一起走。从民团口气里得知，他们将被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对团丁说：“我是过路人，赶回家中有急事，你们把我押到那里有什么好处？当官有领赏，你们领什么赏，连顿酒钱都不够。”团丁打量一下毛泽东不作声。待团丁走过来时，毛泽东便不慌不忙将二块银元塞过去，团丁眼珠朝后一溜，已经将钱藏进口袋里去了。“拿钱买命”的招数还真灵。那团丁又朝其他“犯人”吆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而毛泽东乘机奋力朝后跑去，等他跑远了，民团那班

人才叫骂着装装样子赶路了。毛泽东后来戏称：“二块银元救了我的一条命。”

毛泽东靠着他的沉着、勇敢和机智，以气势惊人，胆识过人，死里逃生，又来到了铜鼓山革命队伍中，担负起秋收起义的组织领导重任。

9月9日，秋收起义暴发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胜利地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收编起义部队中的邱国轩部叛变，向我军袭击，战斗失利，遂向浏阳方向转移。10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在连连胜利的形势下，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未及时撤出浏阳，起义军严重失利。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三团投入战斗，相继歼灭反动武装一部。14日，起义军遭到敌人两个团的围攻，被迫撤退，9月23日，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并建立官兵平等和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这是数千年来中外军队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制度，为人民军队注重人性化，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开创了千古先例。

毛泽东率领秋收部队离开三湾村时，清点一下，还有将近1000人，700多只枝枪，48匹马，于是把原来的一个师编为一个团，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艰苦转战一个多月，行程四千多里，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西江月·井冈山

一九二八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始终是毛泽东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首

词不仅赞颂了黄洋界保卫战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而且歌颂整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歌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路线的伟大胜利。当时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到一个营，凭险反击，击溃敌军，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把秋收起义部队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那么到什么地方才比较合适呢？毛泽东指着一张地图说：“这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适宜做我们的落脚点。”

罗霄山脉地处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四省的交界处，其中段地势险要，峭壁耸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远离大城市，群众基础较好，敌人力量比较薄弱，而革命声势可以直接影响到湘赣两省，有很大的战略优势与政治意义。于是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号角吹响了……

井冈山在江西省宁冈、遂川、永新和湖南省酃县四县交界的群山丛中，周围有五百多里，毛泽东就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砦市顺利会师。会师当天，毛泽东特意穿了一套新军装，还挎上了驳壳枪，去迎接朱德的到来。井冈山会师，极大地振奋了军威士气，大大地增强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革命武装力量。随后，两支军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42岁的朱德任军长，34岁的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时期密切合作的战斗生涯。不久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红军第四军。“朱毛红军”从此就叫开了。

1928年8月，由于红军28团、29团的某些人受“左”倾主义的影响，脱离了毛泽东的指挥，盲目挺进湘南，准备进攻湘敌吴尚的第八军时，兵力遭受重创。29团伤亡严重，溃不成军；28团虽然损失不大，但无意返回井冈山。

毛泽东得知28团和29团失利的消息后，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加强我军内部团结，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亲自率领红军第三十一团的第三营前往湘南接应，留下三十一团第一营守卫井冈山。1928年8月30日，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各一部，乘红四军主力还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向井冈山进犯。

当时红军不足一营，凭借黄洋界天险奋勇抵抗，红军弹药不足，就利用茅竹削了大量的尖利竹签，埋在半山腰和草地丛中。尽管敌人穿着布鞋上山，也能把他们乱窜的脚板穿透，坐地待死；有的红军用绳子拴住大石块做武器，被大石块撞到的敌人不是死就是伤，溃不成军。这一仗从早晨一直打到下午，敌人数次冲锋都被红军打退。8月31日中午，红军从茨坪把南昌带来的一门迫击炮放在山顶瞭望哨工事边，下午四点钟左右，敌人又开始向红军进攻，而红军刚抬来的迫击炮只有3发炮弹，因放置过久有些潮湿，前两发没有打响，第三发打响了，炮弹正好落在敌军指挥所，敌军死伤很多。他们以为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主力回来了，于是拼命逃回酃县，红军胜利完成了黄洋界保卫战。

9月8日，毛泽东率南征红军回到井冈山麓黄坳，便听到这一消息。26日，南征红军回到井冈山，毛泽东兴奋不已，写下了这首诗词。这是一首井冈山，黄洋界一次惊心动魄的武装斗争的描述，是一幅生动鲜明的战场速写，更是一首雄壮真实的革命史诗。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一九三一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住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词是描写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第二次反“围剿”必将取得更大胜利的情景。特别是活捉气焰嚣张敌师长张辉瓒，语言生动传神。这种简洁的叙述、形象的描绘，既易懂又富有文采，实在很动人。同时是借用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传说，表现手法可谓是活用典故的典范。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1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狂妄扬言一定要“剃掉朱毛”，将红军战士砍其头、饮其血、

挖其心、食其肉、削其骨、寝其皮，企图彻底摧毁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序幕由此拉开。

面对来势凶猛的国民党十万精兵，毛泽东和朱德经研究，制定了巧妙的“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指挥红军东渡赣江，退往苏区中心，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和迷惑敌人，主动继续“诱敌深入”，准备在苏区腹地宁都的黄坡、小布一带设伏歼敌。

12月25日，红军得到情报，张辉瓒师正在趾高气扬，一路冒进而来……

毛泽东和朱德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高兴。毛泽东说：“好，只要张辉瓒师一出动，事情就好办喽！”朱德说：“好，我们就拿他这个大头开刀。”

两个“好”字，注定了张辉瓒师必败的命运。

30日清晨，龙冈大雾笼罩，张辉瓒部进入浓雾弥漫、山路狭窄的龙冈山区，埋伏在龙冈周围的红军齐向敌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一颗颗愤怒的子弹射向群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狼狈不堪，死伤无数。

张辉瓒见大势已去，匆匆忙忙换上士兵服装，一个劲儿往树丛中钻。当红军和赤卫队战士抓住他时，还自称：“兄弟是‘书记官’‘书记官’……”，企图蒙混过关。后来，红军指挥员疑惑地盯住他打量，这家伙越来越紧张，指挥员突然问那些俘虏兵：“你们知道他是谁？”立即有几个人站出来揭发：“他就是师长张辉瓒。”有勇无谋，穷凶极恶的张辉瓒就这样被我红军捉拿。

红军把张辉瓒押到毛泽东临时住所，毛泽东就说：“张师长，说起来我还是老乡，你太狠心了，到处说要剃掉朱毛，想不到朱毛今天剃你的光头。”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只用一个星期，就歼敌1.5万人，缴枪1.2余万支，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使国民党精心布设的“围剿”红军计划瞬间土崩瓦解，落荒而逃。有趣的是，鲁涤平接到张辉瓒的报告，说他们已经“旗开得胜”，就要“马到成功”，于是就准备大摆宴席，迎接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凯旋归来”，大喝“庆功酒”。正在热闹时，他的副官气喘吁吁跑来，失声失色地报告：“张、张总指挥，被、被共军处决了……”。

鲁涤平一怔，好比五雷轰顶，半天不作声，他的庆功酒没喝到嘴边，只得浇洒倒了地上，为他的“铁军师”和前线总指挥哀悼。

菩萨蛮·大柏地
一九三三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首词是毛泽东对大柏地最凶险的“死地之战”的追忆。词意是美丽的彩虹出现在天边，好像有谁手持彩绸带在空中挥舞。雨后初晴，夕阳之下，群山苍翠。看到残留在村前墙壁上的弹痕，不由得想起当年红军激战歼敌的情景。正是经过这场战火洗礼的河山，今天看来才更加美丽可爱。

毛泽东写这首词的时候，在职务上已离开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也就是被贬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历了人生道路上起起落落，然而每一次考验他总是能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广博的胸怀、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一般人在被贬时往往会悲观失望，但是毛泽东在路过大柏地时，回想当年的大柏地之战如何陷于死地而后生，对于革命的必胜信念更加坚定。这是何等的气魄！不久，中央某些领导人还是不得不向毛泽东认错，毛泽东赢得了红军将士普遍敬佩。这对于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向赣南、闽西进军。2月10日（正值春节）至11日，红军在大柏地一带宿营，国民党赣军刘士毅部追踪而来。陈毅命令红军一纵队二支队队长肖克、党代表胡士俭率队阻击，敌军暂时不敢轻举妄动，而胡士俭不幸牺牲。这天正是除夕，因大柏地群众不了解红军，所以逃跑一空。这时，红军将士饥寒交迫，追敌又无法摆脱，大年除夕只能面对黑房冷灶，一肚子怨气，有的怪军长“无能”，有的乱叫“拼了算了”。

当夜召开前敌委员会，朱德在会上引导大家分析敌我形势，通过分析，集体的智慧和经验使大家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敌人气焰骄横，必然轻进。这就是敌我形势有了转化的条件，何况刘士毅师在遂川曾被我红四军打败过。

此次他们孤军深入，态势很不利，红军虽然疲惫不堪，人地生疏，弹药不足，但久屈必伸，求战心切；此地虽无群众助战，但地势有利，朱德曾到大柏地观察过地形，认为可以设置伏击圈，毛泽东也微笑点头。在分析敌情会上，林彪讲了三条意见：大体是说我军已经五战已败，伤亡惨重，缺粮又缺弹药，敌人兵力又多我三倍。他主张不打。毛泽东的主张是：不打也得打。理由是：地形有利于我，可打伏击战。不打也是死，必须拼一下。再说，敌人连战连胜，十分骄气傲慢，连侦察兵都不派就前进。因此毛泽东拍板：血战到底。毛泽东这种非凡的见解，使红军将士耳目一新，深获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赞同。

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支队伍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中设伏，一支队伍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中设伏，再有一支队伍配置在东、西两侧间以正面堵击，还令一支队伍为总预备队留守大柏地由朱德军长亲自掌握。

2月11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如今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不虚发，打完了子弹的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仍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正是炮火连天最危急的关头，朱德临危不惧，冒着枪林弹雨，带领警卫排冲上隘口，但是毛泽东从望远镜里看到，还是顶不住敌人的火力。于是毛泽东、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带领其余人员又冲上去，穷追猛打，再加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杀，战局才得扭转。此时此刻，刘士毅见状吓坏了，大呼红军大部队上来了，他不顾两个团被包了饺子，自己拼命带走一个团仓皇出逃，才保住了小命。

通过这次决死一战，红军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俘获敌团长萧致平和副团长钟恒，获人、枪各800余，水旱机关枪6架。这是撤出井冈山以来的首次胜仗。经过这一仗，红四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挽救了红军的命运，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

战前，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前敌委书记毛泽东亲自批

准可以动用群众家中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回村见条子将信将疑。后来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红军的行动感天动地，老百姓不由得潸然泪下。

1933年夏正值国民党将要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毛泽东来到瑞金，路过大柏地，健步登上附近山岭，当时正逢雨后放晴，回想起当年取胜的大柏地战斗，触景生情，托今追昔，写下了这首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的战斗史诗。

大柏地之战，堪称红军最艰苦的一战，也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上阵冲锋的一场惨烈的恶战。

大柏地之战，挽救了红军的命运，弱小的红军，由弱变强，用诗一般的浪漫激情，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话剧。

五律·喜闻捷报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

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
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中秋节那天，毛泽东漫步于神泉堡附近的黄河边上，回想起这一年来战局的重大变化，想起当年撤出延安的第一仗青化砭战役的胜利以及我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养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等节节胜利，想到我军对西北战场主动权的完全控制，不禁思绪万千，表达了对第二故乡延安和延安父老乡亲、妻子儿女的思念和关切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对捷报频传、解放战争继续取胜更加深切的期待。

解放军西北野战团在1947年3月18日夜撤出延安以后，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由于采取机动灵活、避我之短，抑敌之长的“蘑菇”战术，解放

军在撤出延安后短短的45天之内，就打出了好几个胜仗，中秋节前收复蟠龙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得到收复蟠龙的消息引发了诗兴而写此诗。

蟠龙战役，是1947年5月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对陕西省北部国民党军重要补给基地延安县蟠龙镇进行的攻坚战。蟠龙战役连同在此之前的青化砭战役、养马河战役的三大战役都三战三捷，共歼国民党军1.4万余人，从而稳定了陕北战局，为转入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7年4月养马河战役后，敌军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屡遭扑空，于4月20日窜回蟠龙、永坪补给。这时，我军主力在永坪东北地区隐蔽休整。26日，敌军北上，企图在榆林守敌的配合下，围攻我军于佳县、吴堡一带或逼我军主力东渡黄河。我军将计就计，令三五九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诈败佯输，诱敌主力9个旅北上绥德。

国民党军第一战备司令长官胡宗南以整编第1、第29军共9个旅的兵力，于26日由蟠龙、永坪地区分两路向绥德地区急进，仅留整编师第1师第167旅及陕西保安第3总队等部守备其补给基地——蟠龙。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乘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之机，准备进攻孤立据点蟠龙。

当时我军以一些部队伪装主力，引诱胡宗南集团主力继续北上，以另一部队组织南进支队威胁其侧后，集中4个旅的兵力攻取蟠龙，并令教导旅位于蟠龙以南，另一旅位于永坪以东准备阻敌主力回援。30日，各攻击部队隐蔽进入蟠龙镇附近待命。

1947年5月2日，胡宗南部集团主力进占绥德。当日黄昏，西北野战部队对蟠龙守军突然发起攻击，守军凭借外围高地和坚固工事进行抗击。到4日16时，西北野战部队夺取蟠龙东山守军主阵地，黄昏攻占全部外围阵地，接着发起总攻，战至24时一举成功，攻克蟠龙镇，全歼守军6700余人，缴获面粉1.2万余袋，服装4万余套及大批武器、弹药等。

蟠龙战役的胜利，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部队，补充了装备，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一九四九年四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词气势恢宏盖世，语气铿锵有力，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它的词意是：

南京突然掀起了暴风骤雨，百万大军突破天险渡过长江。

以龙盘虎踞著称的古都南京，它比任何时候都美好，翻天覆地地巨大变化，人人为之欢欣鼓舞。

我们应当趁这大好时机去痛追残敌，切不可学楚霸王，使革命半途而废，而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

天如果有生命、有情感的话，也会因不堪像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而衰老，人类社会的正常规律是不断的变化，犹如沧海变成桑田一样。

南京解放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标志着国民党以至几千年反动统治的历史彻底结束。

这时的毛泽东已胸有成竹。在歼灭蒋军主力的战略决战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已发展到高峰。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他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的军队无敌于天下，他导演了中国革命史上一首首威武雄壮的革命史诗。

1949年4月20日午夜，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人民解放军中、东、西三集团从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长江北岸，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舳舻相接，风从响应，以排山倒海之势强渡长江。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3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开始后，江面上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有征无战，出奇制胜控制了战局。本来国民党军队在长江防线还可以支撑那么几天，现在却出现了风云突变，兵败如山倒的残局。江阴要塞7000余兵和炮台总台长唐秉林、游击炮团团团长王德熔、守备总队长李云蔡等起义，反戈一击，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致使国民党海军无法进入这段江域而坐以待毙，劫数难逃。

接着，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领1200余名官兵、25艘舰艇在南京附近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西向解放军投降；江阴江面上拒绝投降的国民党军舰“新安号”，立即被解放军炮火击中起火……

23日夜，解放军占领蒋家王朝的巢穴——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宣告彻底覆灭，胜利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蒋伪“总统府”的上空。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诗篇，这场气势磅礴、排山倒海的渡江战役，生动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军事家那种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战略眼光和多谋善断的伟大胆略。

4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房间里起床后，手里拿着《人民日报》号外，从屋里来到院落的凉亭里，坐在藤椅上看起报纸来。因为报纸上登的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因为“他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因为他率领革命队伍从井冈山一路横扫千军打到南京，把星星之火燃遍中华大地，将要缔造的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所以他的心情一直很好。

毛泽东看完报纸就回到办公室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贺电，接着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可是，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还不够满意，随手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幸亏秘书田家英在清理纸篓时，拣回这张手稿保存起来。1963年他为毛泽东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时，把这张手稿抄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说：“我还写过这么一首诗！写得还可以，收进去吧。”1963年12月5日，毛泽东致田家英信中说：“钟山风雨一诗，似可加入诗词集，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后来就收入了当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

当年，中央军委曾用电报将这首词发到各路南下大军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首战争史诗，是一首千古绝唱永载史册的经典之作，它由沈亚威谱曲而成的这首雄壮的战斗凯歌，将永远响彻在中华大地上空，回声嘹亮，长唱不衰！

青史言冲丹心 革命语励后代

陈战 叶际飞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至今，已有九十六年的历史了。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 28 年斗争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中间经受过 1927 年和 1934 年两次大失败的教训，最后夺取了全面胜利。我们永嘉的革命斗争同全国有些相似，今天，我们以这四个时期为基本线索，谈谈我们永嘉的斗争历史，教育楠溪的下一代。

温州党组织的创建和前期活动

建党初期，我县潘坑的谢文锦和五尺的胡公冕就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1922 年春，谢文锦、胡公冕和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等同志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胡公冕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团体的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同志的接见。1932 年秋，鲍罗廷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谢文锦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做出了贡献。

1924 年秋，谢文锦受中央委派，到家乡发展党团组织。他以探亲访友为名，先后到岩头、五尺、表山、潘坑等边远山区宣传革命真理，揭露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指出只有彻底推翻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获得新生，于是他首先介绍表山的郑恻尘和五尺的胡识因参加了共产党。再发展赤岭的林平海，庄竞秋和胡惠民。1924 年 12 月建立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共五人。然后发展了岩头的金贯真，金演周、港头的李得钊、李立敬、东角屿的金省真、外垟的金石声、芙蓉的陈继民、苍坡的李迈迁、蓬溪的谢选先、溪口的戴宣庭等为党员。到 1926 年底，共发展了 50 人。

与此同时，胡公冕同志受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到江苏、浙江一带招收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胡公冕到温州，在“温独支”协助下，招收了温州的大批知识青年，永嘉就去了37人。北伐战争开始后，胡公冕担任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金贯真是总政治部秘书兼党团书记。金省真是宣传科长。北伐军到杭州后，胡公冕具体主持管理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委派了许多县的主要领导和浙江铁路总工会（杭州到上海）主席。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从南昌到上海勾结了帝国主义，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支配下，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毫无思想准备，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谢文锦同志在南京被杀，郑恻尘同志在杭州遇害。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这样，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了。全国党组织遭破坏，党员从五万七千人减少到一万来人。温州独立支部亦同时遭到破坏，支部书记陈仲雷被捕，蔡雄同志牺牲，温州的革命斗争同全国一样处于低潮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离开武装斗争，就不会有共产党的地位，也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为了挽救革命，党中央毅然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土地革命红十三军斗争如火如荼

8月7日，当时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把革命的重点转到农村。在农村领导土地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一方面，发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首先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另一方面，选派120多人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培训。在这期赴苏学习的骨干中，

永嘉有金贯真、金省真、金演周、金石声、李得钊、李立敬、胡识因、徐时惠、谢文侯等 11 人。

1928 年 1 月，省委派郑馨同志到温州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把革命重点从城市转入西楠溪，在农村发展党员和组织武装斗争。1928 年春，党还派林平海同志到温州，组织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的联合大暴动。由于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好，暴动没有成功。林平海同志在平阳光荣牺牲。后来雷高升、李振声到西内区（即碧莲、四川）、钟山（桥下一带）和菇溪组织农会，发展党组织和建立农民赤卫队。1929 年夏天，西楠溪的农民武装蓬勃兴起。

当时大、小源交汇地方，有楠溪咽喉之称的霞渡潭，驻扎着永嘉警察局霞渡潭分局 20 多名警察，他们横行霸道，敲诈勒索，欺压人民，我党为了扫除这个障碍，派胡协和带领 30 多人，于 8 月 28 日夜，开赴霞渡潭埋伏下来，次晨趁敌人吃早饭之机，冲进警察分局，缴获步枪 23 支，手抢一支，当场枪决了罪恶累累的分局长，教育释放了其他警察。霞渡潭的暴动胜利，揭开了党领导永嘉人民武装斗争的序幕。

同年 9 月上旬，碧莲的荆州（包括昆阳、梧岙）一带的担盐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盐警的敲诈，在革命势力的影响下，自动组织四五百人，冲进瓯盐公所，捣毁了他们的办公场所。火烧了瓯盐公所，打死盐警二人，缴获短枪二支，国民党县党部听到消息，十分恐慌，马上召集第四团长，县长，参议长等四大头头开会，研究对策。但慑于农民革命运动的声势，反动政府不敢阻挠和镇压，只得下令撤消盐税关卡。

荆州暴动胜利后，各地农民革命运动迅速掀起，武装力量日益壮大。9 月 14 日，武装攻打驻枫林的省防军第二连，打死敌人 2 名，缴获枪支 12 支。这次战斗虽未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但农民武装部队能打败省防军，就更加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11 月间，碧莲、永临有 84 个村几千人手扎红布，揭竿而起，赶走了昆阳警察局警察，打死了民团团丁 7 人，分了部分地主豪绅的财产。

在西楠溪各地农民武装迅速发展的时候，为了统一领导武装斗争，永嘉中心县委决定，把各地的武装汇集到（四川）溪下（包括仙居的金永洪、朱福真、陈云岐等人的队伍），成立了红军游击队总部。国民党第四团和缙云团练

闻讯开到上董，乘我立足未稳攻打溪下。我红军总部派胡协和、周新抛带队伍打退了国民党第四团和缙云团练，缴获步枪 10 支。这时，整个西楠溪处于红军游击队的控制之下，形势大好。

国民党反动政府要镇压农民革命，立即调集省防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兵分三路包剿我总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考虑到农民武装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和战斗考验，因此决定乘敌人未到之前就将部队主动撤离，当我部队撤到黄南口时，受到敌人包围狙击。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战斗中牺牲了 23 人。部分农民武装被敌人诱捕。西内区的五个领导人先后牺牲了 3 人。整个总部分散了，红军游击队转向隐蔽，党组织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转入地下活动。

1930 年 1 月 9 日，党中央指派金贯真为温台巡视员，来温了解革命斗争情况。后来向党中央报告，要求派胡公冕等得力的军事干部来开展浙南武装斗争。同时召开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作出了楠溪和平阳的江南作为浙南开展游击斗争的根据地的决定。又派李振声、王国桢、雷高升到西楠溪同谢文侯部密切配合，在黄皮叉口打了一次胜仗，缴获了 13 支步枪，打死打伤一批敌人，俘虏九人。3 月 7 日，胡公冕、刘蜚雄、金国祥等人受中央军委指派，经海门、黄岩到了潘坑、白岩地方和红军游击队会合。胡公冕同志到达永嘉以后 3 月 9 日，把西楠溪各支队伍集中到溪下的黄皮寺，建立了浙南红军总指挥部，由胡公冕担任总指挥，刘蜚雄担任参谋长，金国祥主持经济工作。下面建立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雷高声；第二支队队长胡协和，第三支队队长谢文侯。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攻打大城市，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浙南红军总指挥部刚成立，就急于要夺取城市。首先选择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处州，打下处州，在政治上能影响全局，军事上可与浙西武装配合，有形成“赤色浙江”的可能。于是，决定 3 月 8 日攻打处州城。由于侦察失误，打下警察局后，敌人营部一个连的兵力从后门逃走，占领了制高点，加上民团和缉私队的武装向我射击。红军大部分使用的是火药枪，又碰到下雨，火药失效，战斗持续了五小时后，伤亡很大，形势对我不利，胡公冕下令撤离。敌人立即调温州甘清池，缙云的第七团及金华的部队尾追红军。到了青田海溪，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与敌人激战八小时，歼敌 23 人，

打死敌连长一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不能硬拼，把队伍撤到永、青、仙交界的大垟山区与敌周旋数日后，主力队伍回到五尺，其他各支队伍分散到各地方隐蔽下来，等待命令。

3月下旬，金贯真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中央于3月31日给浙南党组织指示：“建立浙南特委和组建红军第十三军”。金贯真返回永嘉后，就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四月中旬召开了有温属各县负责人参加的中心县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会上正式作出决议，将浙南红军游击队改为红十三军第一独立团，台州游击队改为第二独立团，永康、缙云为第三独立团。4月15日，中央正式授予浙南红军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成为当时全国十四支红军之一。

于是，中心县委决定，将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枫林进行建军。但枫林的反动头子徐端甫疯狂组织反动武装进行抵抗，我部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攻打下枫林。五月九日在枫林正式成立红十三军。胡公冕为军长、金贯真为政委、陈文杰为政治部主任，刘蜚雄为参谋长。下设政治处、参谋处、经济处，李振声协助政治处工作，金国祥、金显通负责经济处，金伯荣任秘书兼会计。同时建立第一独立团，雷高声为第一团团长，军部和一团的活动驻点在五尺。其他各团后来陆续建立。

红十三军建立不久，就计划要夺取温州城市。打温州，必须先夺取瑞安、平阳。于是决定由军长胡公冕率领队伍到表山做战前准备。政委金贯真带一批政工人员先赴瑞安、平阳，做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以接应红军进城。1930年5月15日，红军大部队从表山出发，经青田平桥口时，遇到敌人的阻击，由于我军作战勇敢，迅速打败了敌人。当时红军纪律严明，无赖出身的李陀四私自外出敲诈勒索，破坏军纪，影响极坏，在枫林就地宣布处决了。打家劫舍出身的周新抛，看到红军纪律如此严明，思想十分惧怕。于是，当部队到青田陈宫时，带他原来的旧部不告而别，离开红军到潮港一带进行抢劫，成为叛匪。

大部队到瑞安陶山时，派出的三个联络员被警察抓捕扣留，于是只得先缴了陶山警察所的枪支，镇压了警察所长，这就惊动了城内的敌人。部队到铜钱后，军部派雷高声等人到瑞安城里联络，因为敌人已有准备，攻下瑞安

县城的可能性很少。军部决定暂栖瑞安，部队在郑贤唐和瑞安南区、西区（就是现在的文成），平阳江南这些赤卫队的配合下，以排山倒海之势逼近平阳县城。部队从西、南门攻城。由于行动较迅速，部队很快占领平阳县城。缴来平阳县政府的大印，释放了在押的群众，红军攻下平阳县城，不仅全国有影响，而且苏联《真理报》上也刊登过这一消息，引起世界瞩目。但由于没有作战经验制高点被敌人的主力队伍先占领了，战斗一直从上午打到下午三点钟，我军共牺牲了192人。

在进攻平阳期间，我军遭到三大损失。一是政委金贯真在瑞安、平阳部署工作后回到温州途中，被敌警察局侦探长徐镇庭跟踪，二十日下午三时，在温州虞师里负伤被捕，晚上七时壮烈牺牲；二是由于红军主力远离五尺，敌人第四团在枫林徐端甫和民团的配合下，乘机火烧五尺、岩头、苍坡等红军根据地的房屋。五尺几乎成为一片废墟。三是我后援队伍在东皋遭到敌人包剿，牺牲近120人，李世兄、金仲光等负责人阵亡，有十余人被杀了头。红军撤回五尺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敌人暴行，从而更加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不少人又踊跃参加了红军，决心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为了重振红军，胡公冕把军权交给一团团长雷高声指挥，自己到上海向中央请示，要求增派干部加强对红十三军的领导。

当时，地主武装陈明钱部和第十三地的反动民团（号称小日本）乘红军外出的时候，在永临、碧莲一带大肆搜抄红军家属。红军领导人雷高声同胡协和、章佐光、徐岩星、麻脸关等人商量，一定要除掉这个反动武装的据点。在雷高声的指挥下，董佐光率上董、应界坑一路队伍，胡协和率领大源八支武装；雷高声指挥廿四垅、茶坑、下徐一带的农民武装，包围了李茅十三地，迅速消灭了地主武装，并于6月30日枪决了陈乾鸣。这时，受浙南特委指派的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率部于六月底到达白泉、大若坑和红军主力会师，研讨如何做好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尔后组织在现在的岩头中学进行整训。

6月27日，红军队伍821人在徐定魁、谢用卿、周明存的指挥下，攻打黄岩县城，由于途中受到黄岩敌人的狙击，部队撤退。经过隘门岭到石坦山时，遭到大荆蒋叔南的反动民团的伏击。因为我军武器不好，再加长途行军，给养无法接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战数日，无法突围，战斗中牺牲471人，

徐定魁、周明存当场战死，谢用卿被捕，后押到杭州陆军监狱。

1930年8月31日，部队经过整顿，并和第三独立团联系后，在雷高声、陈文杰、李振声的指挥下，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攻下了缙云县城，赶跑了伪县长，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武器。释放了群众和121名共产党员，并开展了政治宣传，开仓济贫，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通过这次战斗，使我军增加了大量武器装备，开始有了手提机枪，从而士气高涨，并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缙云县的解放，影响比平阳更大。当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以《浙南红军占领缙云》为题，发布了这则消息。这时，胡公冕从上海回到温州，传达了中央指示，根据中央靠城市武装暴动，才有一省或几省政权胜利的指示精神，浙南红军部署了集中兵力攻打温州城市。敌人得知消息后，调兵加强了防务。温州党组织火速派李振声的哥哥，送情报到温溪轮船埠头。胡公冕接情报后，改变了攻城计划，率部沿江而下直捣西溪。因西溪的后渠是地主反动武装的堡垒。九月九日，红军攻下后渠后，红军主力回到表山。陈文杰同志身患重病，暂留在上董休养。因董佐在打缙云时，违反红军纪律，曾被陈文杰批评过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勾结叛匪周新抛，出卖了陈文杰。致使陈文杰同志被捕，惨遭杀害。

这时，中央军委派苏联留学回国的五位同志，分批到达红十三军总部，建立了总部政治工作制度和教导队，把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列入军事骨干。还在黄南、仙居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做好长期打游击的准备。

几天以后，黄岩县委委员，游击队负责人戴元谱要求总部攻打黄岩的乌岩镇和黄岩县城，帮助开辟黄岩游击根据地。军部认为攻下乌岩镇，即使红军在台州扩大影响，又有可能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于是，部队由表山出发，二十一日到达宁溪。我军兵分三路，一、二两路军巡回包剿，三路军直捣乌岩，不时攻下乌岩镇。缴获了不少武器，补充了给养。驻黄岩县城的省防军和国防军得知以后，连夜部署，并调集温、处、台等部分军队围剿我部。我部突围、回到永嘉休整。

红十三军在浙南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注意，立即成立了有四个省组成的“剿总”，派李杰三率领三、四、五、七共四个团兵力，在地方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向红十三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

根据当时这样的形势，为了保存红军主力，军部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留胡衍真，潘善琴等人坚持在五尺活动，雷高声、戴元谱率部分头在永、仙、黄边界进行游击活动：胡协和、谢文侯下山以投降为名打入国民党内部，在适当时候组织兵变，其余武装队伍分散原地隐蔽，胡公冕同留苏回国人员返回上海。待机再起。至此，红十三军大规模的攻城镇的武装活动基本停止。

1931年6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被敌人杀害，中央机关转入隐蔽，周恩来同志去中央苏区工作了。这时期胡公冕同刘蜚雄离开上海回温州，因雷高声带队伍仍在永嘉、仙、黄边境与敌周旋，他带刘蜚雄等人到温州搞兵运，由于叛徒告密，兵运工作失败，30多名进步士兵被捕遭杀害，胡公冕等脱险到上海去了。

1932年春，敌人采用双管齐下的办法，剿灭红十三军，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鲁泽平亲自部署，一方面派大兵压境，继续剿灭给红军以军事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利用楠溪山的“绅士”周子彦、周仲波出面，用封官、保证队伍给养为诱饵，劝雷高声带队伍下山投降，同时还利用雷高声的亲戚、朋友做雷高声的工作。因为当时国民党大兵压境，红军的回旋余地日益缩小。群众怕受连累遭殃，而不敢支援红军，处境已十分困难，为了争取时间，雷高声打算用假受“招安”，以取得武器给养，待机再起。他向敌方提出：1、部队下山投靠后不能分散；2、队伍留岩头不去温州。敌人要诱骗红军下山，所以表示同意上述条件，并通报取消了通缉令。于是，在五月二十二日雷高声带领七十多人的队伍到达岩头，因洪水阻隔，其余队伍无法集中。二十三日敌人设下圈套，叫十六名红军骨干集中东宗祠堂开会，战士在岩头小学“照相”。雷高声等十六名骨干进入东宗祠堂时，敌人突然用武装包围，开枪射击，戴元谱等九人当场被枪杀，雷高声等七人被绑，小学操场听见枪声，也用机枪向红军战士扫射，共牺牲22人。

岩头东宗事件，红军主要领导骨干惨遭杀害，红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尔后，分散在各地的红军都遭到国民党的清剿。胡秀转入地下也在仙居溪口被捕。全军5505人，阵亡605人，被杀害374人，被捕关押334人。同时，党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永嘉的革命斗争再度转入低潮。

红十三军失败了，但革命的力量没有被杀绝，留下的红军战士继续从事

地下活动。这种继续革命的精神，深深地鼓舞着根据地人民。当时楠溪一带的群众留传着一首歌谣：杀了老雷，还有平西，杀了黄金，还有青枝，打死家业，还有中飞。

抗日战争烽火燃遍永嘉大地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发生了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用和平方式解决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抗日救亡运动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这年八月十八日，在隘门岭战斗中被捕入狱的谢用卿同志获释回家后，根据狱中党组织的指示，在家乡蓬溪、下家岙开展地下活动，吸收了李岩水、谢白波、谢选奎等人建立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十月二十四日，在岩头小学成立永嘉县战时青年服务团西楠溪分团。接着成立了五尺、芙蓉、苍坡、蓬溪、枫林等地的支团，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就这样迅速兴起。分团在枫林办起了各种学习班，1937年冬到1938年春，徐寿考、徐顺性、谢选奎、谢明送等一批同志选送到闽浙边临时省委举办的三门抗日救亡干校学习。后来，谢选奎等七位同志到延安，孙绍奎（孙平）、胡景城等回到永嘉，恢复西楠溪的党组织。1938年11月，西楠溪中心区委在下家岙成立，谢用卿担任书记，一九四零年春，改组楠溪中心区委，区委书记徐顺性，组织委员徐寿考、宣传委员谢顺兴，领导着沙头、碧莲、岩头、枫林等四个区的工作。并派潘宗泽负责沙头区，胡国洲负责岩头区，徐顺性负责枫林区、汤秀泉负责碧莲区。这时，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四零年底党员发展到600多人，建立了70多个支部。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以后，形势又趋紧张，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1942年二月八日，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遭破坏，省委书记刘英同

志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白色恐怖笼罩着温州。浙南特委为了加强江北地区的领导，决定建立瓯北县委，胡景斌任县委书记，徐顺性为组织部长，徐寿考为宣传部长，领导瓯北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组织群众抗日。

1943年春，建立浙南特委驻江北办事处，吴毓同志担任主任，领导瓯北、乐清、玉环等地的人民进行斗争。

国民党为了镇压革命势力，11月间，在枫林成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处第十四督剿处。派曹集云为主任，曹集云一到枫林，就部署连夜行军，攻打岭头，岭头的人民武装在潘云、陈继岳同志的领导下，早有充分准备。因此，当敌人的枪声一响，就遭到我周围人民武装的反包围。经过一场激战，曹集云兵败撤退。

11月敌人在江南一带开始“清乡”，永嘉县委书记范亦宸、组织部长夏巨珍被捕后，成了可耻的叛徒，并成了敌人“肃奸队”的重要成员，带队到江边地区清剿活动，使我党许多党员被迫到国民党县党部自新，这就严重威胁着我党组织的安全。为了避免叛徒的抓捕，留下的部分同志只得退到永、仙交界处，开辟第二战线对付敌人。永仙交界一带是土匪余汝苟活动地盘。为了把这股武装土匪争取过来，吴毓同志派郑九芝去做工作后，带徐顺胜、陈继岳、潘统云等七位游击队骨干，赴小坑和土匪余汝苟谈判。而余汝苟见到我们带去的马壳枪较好，突然变形，动起杀心。我们去的七位同志，当场就被杀害6人。虽然我们很快消灭了余汝苟这股土匪，但是永嘉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已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由于吴毓同志和瓯北县委组织部长徐顺性等主要骨干都牺牲了，县委也失去了同浙南特委的联系，国民党清剿又步步逼紧，县委派徐寿考同志到浙东党委请示工作。浙东党委指示将一批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党员骨干调到四明山打游击。县委转移张溪与黄岩一带坚持斗争，仅留下金强同志领导发展的党支部在罗家寮地区活动，未有损失，其余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这是党组织的第三次损失。

1944年7月，瓯北县委通过关榕同志跟浙南特委取得了联系。从此，上级党组织加强了对我县的领导、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了。9月9日，温州第三次被日本人占领，国民党温州专署、永嘉县政府、浙江保安第四团及其护

航队等部退到楠溪，聚集枫林，使西楠溪人民感到日夜不安。这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对国民党不抵抗日寇，残酷迫害群众，不断奋起反抗。提出了“反对不抗日的军队，组织人力物力，坚持抗战到底。”我党派去向浙东党委汇报工作的汪瑞烈同志，带着浙东党委的指示又回来了，瓯北县委根据当时形势和浙东党委指示，组织屿北青壮年民兵，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掀起。反共顽固分子潘善藏，陈香文借抗日的招牌，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大肆进行反共活动，围剿我县委机关和屿北抗日民兵组织。

1945年3月2日，潘善藏带匪兵二三十人，夜间偷袭我驻屿北县委机关，当地民兵正在汪高寿、汪家成家集体睡觉，敌人的捣门声和犬吠声惊醒了他们，民兵汪学池先发一枪，敌人不知虚实，就仓惶出逃。胡景斌得知消息后，即派关榕、汪吉仁俩同志赶到屿北，他自己率领闪坑、源头等地的民兵参战。屿北民兵在关榕、汪吉仁的领导下，乘胜击败了地头蛇潘善藏的部队，我武装追到岩坦。岩坦警察所人员也弃枪逃跑，缴来了十多支步枪。从此，揭开了“屿北武装起义”的序幕。

“屿北武装起义”震动了括苍山地区。为此，县委决定在屿北成立了游击中队，汪普生为中队长，关榕为指导员，这就是以后的永乐抗日游击自卫总队第九中队的前身。

3月8日，国民党调集强大兵力，第一次进犯屿北，由于我军严阵以待和群众的呐喊助威，敌人不敢贸然进山。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三、四点钟，仍相互对峙着，这时我县委派汪普生率60多名战士绕过敌人正面战线，占领三面山制高点，居高临下猛烈扫射；李川仁率50多人从外围攻击。毙敌13人，敌见势不妙在新丘放了火后即向岩头溃退，丢下10多支枪和一些弹药。第二天，我们打开了国民党在溪口的粮仓，救济贫民。

接着，我军又成立以谢用佐同志为中队长，金强同志为政治指导员的第十一中队。在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兴起的时候为了加强党对永乐抗日武装队伍的统一领导，浙东区党委派余龙贵来负责军事工作；3月30日宣布成立瓯北中心县委，胡景斌任书记，余龙贵、邱清华为委员，将永乐两县革命武装队伍合编为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余龙贵任总队长，胡景斌任政委，周丕振为副总队长，邱清华为政治部主任。下设有十个中队（乐清六个、永嘉四个）

这支抗日武装主要活动在原红十三军战斗过的地方,即永嘉、乐清、黄岩、仙居、缙云、青田交界,活动范围曾一度扩大到括苍山麓、临海等地。

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的发展和壮大,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不安,他们派三十三师师长周淘漉为总指挥,坐镇枫林,调三十三师一个团、二十一师一部,二十八军学兵营,还有浙保三团,四团以及自卫队六千多人,号称一万大军,分三路向乐清的泽基、张庄、南充,永嘉的罗家寮和屿北进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的部队主动撤出了敌人清剿的范围,到浙东山区去了。敌人便火烧了罗家寮和屿北以及陈岙五百八十多间房屋。屿北地区的财产被洗劫一空。

解放战争勇斗敌顽坚持到解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时,国民党部队都回到城里去了,浙南特委决定将永乐中心县委改名为党务指导委员会,胡景斌同志调特委工作,中心县委工作由邱清华同志负责。

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为了顾全大局,我党在长江以南部队全部北撤。这样,长江以南地区的公开武装不多了,浙南仅留我们永乐这支部队,目标非常突出,国民党乘机调兵向我进攻,形势又开始恶化。十月下旬,特委派曾绍文到瓯北,做部队精简工作,并将部队改名为地区武装工作队。将江北地区的骨干分成四支武工队进行活动。关榕带领一支队伍在永乐边界活动;汪瑞烈、万文达带领的队伍活动在屿北地区;胡国洲、郑中卿带领一支队伍在五尺地区坚持斗争;谢用佐带领的队伍活动在蓬溪地区,经精简回乡的骨干坚持在家乡做党务工作。

这时,裘士杰乘机以屿北地区为中心,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杀害了十多位同志,还强迫抗日武装人员和当地民兵向国民党办理自新手续,这次被迫自新的有五百多人。

1946年下半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大规模的内战。

解放战争一开始,我们浙南地区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国民党就派中统少

将特务吴万玉坐镇枫林，成立所谓的“绥靖处”，清剿永乐地区和黄岩、仙居、缙云、青田等县的共产党组织。杀人魔王吴万玉在枫林期间曾狂言：“宁可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共产党人。”从1946年11月25日至第二年的五月上旬，被吴万玉杀害的有29人，割去耳朵的就6人，心肝被挖了的有3人，被活活烧死的有林岩水一人，被强迫拉去自新的八百五十七人中，大部是无故的群众。

我举二例，便可其手段之残忍。

一次，吴万玉亲自提审谢白波的妻子。吴问：“你丈夫是共产党？”答：“不知道”问：“现在什么地方？”答：“不知道。”吴万玉听了几个不知道，气得面色铁青，就命令打手把她捺倒，用木棍毒打，要她招供。但回答仍是不知道，结果打得更凶更狠，竟把她臂部打得发烂。今天还留有伤疤。

另一次，一个卖猪儿的人谈论卖猪儿，讲到“猪部”二字，就被吴万玉的便衣队抓去了。要他讲出支部有几个人，这个人被打得没办法，只好将楠溪几个卖猪儿的人都报出来。敌人将他们全部抓来，严刑拷打。还将岩下寺和尚的“写缘簿”和“田租簿”上的名单都作为共产党员抓来用刑、杀头。所以，群众称枫林是人间地狱，形容枫林天主堂是“阎罗王”。

这时，我瓯北党组织在徐寿考等同志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直到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部队开始败退。我武装又开始在蓬溪、屿北、五尺等地区积极活动起来，并逐渐扩大到廿四垅地区。这年夏天，消灭了潘善藏的部队和金喜的部队，镇压了桥下的反动分子戚永龙，整个永嘉的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到1949年4月10日，我县全境基本解放。5月2日，双溪县人民政府在岩头成立。胡国洲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长，5月11日在碧莲接收了陈林云的部队。标志着我县的全境解放取得全面胜利。

青史言冲丹心 革命语励后代

上面全面地阐述了永嘉县的革命斗争历程。字字青史言，句句革命语，它从全国的一个点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28年的革命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付出很大代价的。今天，我们讲永嘉革命斗争历程的目的是，一方面，使楠溪革命后代了解永嘉革命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通过介绍革命斗争历史，

激励楠溪下一代的革命斗志，以革命前辈为榜样，牢固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以丹心冲向中国共产党、爱着中国共产党、献给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先烈后代不要忘记先烈们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如果没有先烈们的流血牺牲，没有老区人民的无私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少要来得迟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语励后代，我们楠溪先烈的下一代，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跟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促进永嘉经济发展，促进温州“人的发展”“人的幸福”和“人类的文明共同进步”，共创浙江辉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

江海风云汇青史

——记浙南游击根据地和出征的抗日壮士

吴松金

浙南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地区，早在1924年12月，中国共产党就在温州建立了独立党部，领导温州所属各县党的工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摧残，被迫停止活动。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平阳以叶挺鹏为首的共产党人仍坚持继续斗争，他们在1927年、1928年、1930年相继组织了三次攻打平阳县城的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对派的嚣张气焰。1931年除夕夜，叶廷鹏等五人在平阳麻步岭门头成立了中共浙南委员会，叶廷鹏任书记，并建立浙南红军游击队。1932年1月、2月，党中央巡视员金贯真在瑞安肇平垟相继召开浙南七县联席会议和中共永嘉中心县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研究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工作。并决定永嘉西楠溪、瑞安西区、平阳江南为浙南游击战争中心区域，要求在这一带组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秋，在闽东革命风暴影响下，中共浙南委员会乘国民党组织农会之机，在平阳江南、北港两地建立了40多个农会，广泛开展“二五”减租和没收地主财产等斗争。1935年春，叶廷鹏等在平阳凤卧乡金岙底村开会，决定中共浙南委员会改称中共浙南特委，重建平阳县委，建立平西区委、瑞安县委。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一方面依靠农民赤卫队的有生力量协同战斗，一方面由游击队组成若干个战斗小组突击作战，先后出击敌人六次均取得胜利，震慑了敌胆，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巩固了游击区。浙南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已遍及平阳顺溪、南雁、山门、凤卧、腾蛟、鹤溪，瑞安的安阳、双桂、石龙、马屿等55个乡镇，1003个自然村，建立地下交通站265个。为红军挺进师进驻平阳，扩大浙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红七军团和赣东北红十

军合编成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重重包围,激战中军团长寻淮州牺牲,方志敏被捕,红军损失十分惨重。粟裕、刘英率领突围部队到达赣东北苏区,与中共闽浙赣省委会合。2月初,根据中央指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计538人,粟裕临危受命为师长,刘英为政委。2月下旬,挺进师从江西德兴地区出发,3月1日,挺进师在铅山石塘街与国民党靖卫团遭遇战斗中,电台被毁,从此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挺进师取道闽北向浙江进军,会合浙西南革命力量,在短短的4个月中,在松阳、遂昌、江山、浦城、龙泉五县之间创建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1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扩展到北抵杭江铁路、南至浙闽边界北段,西及闽赣边境,东至丽水、宣平的广大地区。9月19日,国民党军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清剿”,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第一次反“清剿”斗争失败了。10月5日,挺进师突出重围,由近千人减员到300来人,在福建寿宁郑家坑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会合。后经瑞安县从腾蛟首次进入平阳境内,从此拉开了浙南和浙闽边境三年游击战争的帷幕。

11月7日,挺进师与中共闽东特委在泰顺县白柯湾召开联合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统一领导浙江和闽东的革命斗争。刘英任临时省委书记兼临时省军区政委,粟裕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兼临时省军区司令员。11月下旬,刘英、粟裕率挺进师二入平阳。1936年2月2日,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峰文召开会议,决定临时省委与挺进师主力分开活动。挺进师主力组成浙西南独立师,3月,粟裕率主力经分水关进入平阳,袭击了国民党莒溪据点,随后又袭击了桥墩、观美守敌,然后向浙西南进发,去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临时省委在浙南开辟游击根据地。1936年7月中旬,粟裕率独立师300多人,由浙西南出发返回浙南,从永康、武义、宣平、松阳、景宁一路南下,于下旬到达瑞安西区,中共浙南特委委员黄先河在公阳找到金米同志(粟裕的化名)司令部住处,5天后在夏家山找到可夫同志(刘英的化名)。8月,浙南特委书记叶廷鹏派杨进等已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拿到党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等6个文件。龙跃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从1934年7月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中央的文件我们没有见过。1935年2月间从闽浙赣苏区出来后,连中央的简报、电报

也没有看到了。这次我们得到的几份中央文献，不但内容十分重要，而且非常及时地指导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得到这些文件如获至宝，省委正在开扩大会议，这几个中央文件正好成了省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方针。”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迅速作出了政策调整，把工农红军闽浙边军区改为人民红军闽浙边军区，工农红军挺进师改为人民红军挺进师，后来又改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委员会。红军经费来源由打土豪和向富户罚款，改为向地主和富户募捐。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携起手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9月，粟裕率挺进师200多人与叶廷鹏、陈铁君率领的浙南红军游击队80多人在葛藤湖胜利会师。浙南根据地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谱写了“雁山鳌水哺育铁军劲旅，平阳山门铸就红色丰碑”的历史诗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采取“北抚南剿”方针，任命刘建绪为闽浙赣皖四省“清剿”主任，在平阳设立闽浙边“清剿”指挥部，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清剿”，企图在6个月内“肃清”红军挺进师和红军游击队。中共浙南特委和浙南红军游击队在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的领导与支持下，带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多次帮助临时省委、红军挺进师脱离险境，使之得免于难。在敌人对浙南游击根据地长达八个月的“围剿”的残酷恶劣环境中，正是有中共浙南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及当地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掩护，省委书记刘英和临时省委机关得以迂回在平阳与五云山之间，坚持领导当地的革命斗争，并打开了新的局面。他们经历了“百丘转危为安”、“樟垵击敌”“鼎平脱险”“蔡垵突围”等重重危机，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原以鼎、泰、瑞、平边区为基础的浙南游击根据地，向鳌江以北扩展，同以五云山、梅山为中心的飞云江南北两岸，以纸山为中心的永、青、瑞三角地区以及西部泰、瑞、景、丽地区互相联接，并延伸到瓯江北岸，形成了东西南北纵横约200公里的浙南游击根据地。连同浙西南、金衢盆地以及台州一部分游击区，红军挺进师游击区范围已达30多个县。龙跃在《坚持浙南十四年》中指出：“浙南游击根据地是以红军挺进师为主，加上鼎平地下党和一部分

地区以及平阳叶廷鹏、郑海啸等同志活动的地区等三股力量汇合起来建成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根据地主要包括福鼎、平阳、瑞安、泰顺的绝大部分地区，霞浦、青田、景宁各一部分以及云和、丽水边界地区，纵横数百里。”临时省委、浙南特委、红军挺进师、浙南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参与和大力支持，谱写了许多军民鱼水情深、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1937年3月，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挺进师与闽浙边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粟裕遂率部在遂昌、金华交界的门阵地区展开活动，并建立了以门阵为中心的沿铁路线方圆近百里的根据地，这是继浙西南、浙南之后，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又一个游击根据地。

粟裕自1934年7月离开中央苏区以后，毛泽东主席一直关心着这位智勇双全的青年将领，苦于失去联系，三年来没有粟裕的消息，当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央接上关系后，党中央毛主席就来电询问粟裕的情况，这时临时省委和粟裕也失去了联系，派人多次寻找也没有他的音讯，只好电告党中央：“粟裕同志可能已经牺牲。”1937年陕北召开苏区代表会议，洛甫（张闻天）在致开幕词时首先悼念在各个战线上英勇牺牲的烈士，宣布的名单中就有粟裕。直到1938年2月中旬，闽浙边临时省委派龙跃等赴南昌新四军军部向副军长项英汇报工作和请示今后行动，并专门介绍了粟裕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情况，告知他粟裕已经回到省委，正在同刘英一起培训干部、训练部队。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即把“粟裕还在”的喜讯报告给延安，毛主席闻讯十分高兴。

由红军挺进师200多人、浙南红军游击队100多人，加上在平阳北港招募的200多人组成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这500多人的吃住等问题都是由浙南特委和瑞平县委依靠当地群众妥善解决的。挺进师二纵队政委张文碧在《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生活》中说：“我们住过山门街、大屯村，这时山门街的党支部搞得很好，山门一带的人民阶级觉悟很高，我们所以能够在紧张的局势下在那里较长时间的住下来，是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人民的。”许多亲身经历过那段峥嵘岁月的浙南红军游击队的老革命回忆说：“刘英、粟裕领导的红军挺进师初到平阳时人生地疏，语言不通，困难重重。在以叶廷鹏、郑海啸为首的浙南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挺进师很快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并打开了局面。”刘少奇在延安时也曾说过：“全国党的斗争

是浙江最残酷，因浙江是蒋介石的老窝。浙江是浙南斗争最残酷，浙南是平阳付出代价最大。”

为了实现北上抗日、救亡救国，临时省委和挺进师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公署主任刘建绪在1937年5月7日、7月7日、先后展开了几次谈判，几乎是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边打边谈。8月24日，双方代表终于在温州申江旅馆达成共识，闽浙边临时省委代表在坚持共产党独立、保持红军武装独立和批评自由等原则下签订了五项协议。8月27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浙军区司令部发布通告，要求各部队迅速集中，以期早日实现北上抗日。28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为巩固和平、坚决抗敌告全国各界男女同胞书》，表明了浙南红军与全国军民团结御敌的态度和决心。分散在浙西南和浙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和挺进师人员都集中到平阳北港，人数约为500人。相当于1935年挺进师入浙时的人数，但原七军团、红十军团的老战士大多已牺牲了。部队人员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充实了许多新成分，有浙南红军游击队的100多人、有闽浙边的工农子弟，有来自上海、温州等城市的知识青年，部队装备虽然仍很落后，但官兵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提高了，作战经验丰富了、战斗力也加强了。按照中央指示和国共合作抗日协议，1937年11月上旬，临时省委和闽浙军区在平阳水办村马仙宫召开了部队整编大会，以挺进师原来的支队建制为基础，分编为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接着在凤林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粟裕讲了国共合作和部队改变番号的意义，要坚决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服从命令，加强训练，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当要将军帽上的红五星换成青天白日帽徽，指战员们从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大家情绪有些波动。为此，龙跃在会上说：“我们原来的红五星帽子是光荣的，现在改变番号换上这顶新帽子是为了国共合作，同全国军队一起共同抗日，但我们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不能丢，大家要把红五星帽子保存好。”粟裕宣布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委。

1938年1月，临时省委、临时省军区在山门举办抗日救亡干校和党政干部培训班，粟裕任校长，干校学习抗大校风，实行军事化管理，培养抗日救国的军事和政治干部人才。参加学习的是来自温州各县各界的青年男女，学

员人数达 300 多人，为浙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许多中坚革命力量，在以后的抗日救国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月 6 日，新四军军部移迁南昌。军部接连两次给闽浙边临时省委来电，催调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去皖南集中。由于此前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秦邦宪已指示要凭他的亲笔信方能调动闽浙边部队，后经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统一意见并作了专门决定。项英遂委托东南局副局长兼组织部长曾山专程前往平阳传达和部署。3 月上旬，曾山一路辗转来到平阳，刘英、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总队指战员和抗日干校教师学员列队在凤岭山口欢迎曾山。5 日上午，在临时省委大屯驻地刘英办公室，召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会议，曾山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工作决议和东南分局指示精神，对浙南三年的游击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会议决定：（1）浙江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集中地点在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要抓紧出发；（2）浙南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南继续坚持斗争；（3）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曾山提出，临时省委的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位带队去前方，一位留下来继续领导浙江的工作。3 月 6 日，曾山和临时省委领导进一步研究了部队和地方的问题，决定由粟裕率部北上抗日，省委书记刘英和龙跃等留在浙江坚持工作。

3 月上旬，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山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粟裕任团队长，改编后人员为 400 多人，长短枪 121 支，轻机枪 3 挺、重机枪 1 挺。3 月 15 日，抗日救亡干校结业，大多数学员被分配到浙江各地，有 33 名学员组成随军服务团，随部队开赴前线。3 月 18 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七团队 500 热血壮士由平阳山门举行北上抗日誓师暨瑞平县委欢送大会。部队在粟裕率领下出发时，在溪旁叮步上，出现了青年妇女送丈夫、年迈父母送儿子上前线的动人景象。经过几天的行军，到达丽水县大港头，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碧湖会见了粟裕，他预祝新四军开赴前线旗开得胜，为国家为黎民多立战功，并兑现了 3 月上旬他与刘英达成的承诺，由省政府拨给新四军五万发子弹，1000 套军装。25 日部队抵达遂昌，这里是挺进师的主要游击根据地，遂昌人民闻讯赶来迎送。27 日，粟裕迫使

遂昌县政府释放了 20 名政治犯，由他带回部队参加抗日。4 月 18 日，部队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加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二支队副司令员。6 月中旬，三营挺进江南敌后，成为华中战场上的一支让敌伪闻名丧胆的抗日劲旅。为了落实党中央毛主席“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的战略部署，1938 年 4 月，新四军军部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抽调指战员组成先遣队，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皖南东进江苏省南部，老三营部分平阳籍干部战士参加了先遣队。4 月 28 日粟裕率队从岩寺出发，5 月 19 日进入江苏敌后战场。6 月 17 日，在丹徒韦岗境内伏击日军，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和大尉梅泽武四郎等官兵 13 人、伤日军 8 人、击毁日军汽车 4 辆、缴获长短枪 20 余支，打击了日军攻陷南京、上海后的嚣张气焰，取得了新四军在江南对日战斗的首战胜利。为此，陈毅司令题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争敌胆寒，镇江城下初相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粟裕司令也题《江南处女战》诗一首：“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7 月，粟裕率军袭击了南京龙潭的日军火车专列；8 月下旬，日军第三师团 5400 余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分八路围攻我四团老三营所在地安徽当涂县小丹地区，三营与兄弟部队在当涂和溧水打破日军的围攻。10 月 1 日，余龙贵等率三营到达溧水县李巷附近的邹家山，与四团团部和二营六连及直属队会师，然后转至句容郭家庙接替一团防务。之后，三营与二营挺进溧水、溧阳敌后，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939 年 1 月 8 日，日军对横山根据地发起六路进攻，四团三营再次打破敌人围攻，跳出包围圈。

1939 年 11 月 7 日，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水县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指挥第一支队二团、新六团和第二支队四团、挺进纵队及江南抗日义勇军。1940 年 1 月上旬，以原第二支队机关为基础，在句容县组建了新四军新的二支队，5 月初在溧阳组建了新四团。从此，老三营由原来的一支分成了两支，一支延续了原老三营的建制，另一支是以九连组建的新部队。5 月 14 日，四团三营和支队直属队在句容赤山设伏，全歼日军南浦旅团吉田中队，在江南抗日战场首次缴获日军九二式步兵炮。7 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粟裕率指挥

部所属主力渡过长江，进驻黄桥镇。10月，国民党3万余顽军分三路进攻黄桥，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所部仅1800人守卫黄桥，战斗打的异常激烈。粟裕急令“老三营”火速过江，驰援黄桥，三营长舒雨旺率部星夜渡江，跑步进入黄桥，夜袭顽军33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将其赶出黄桥。黄桥决战的胜利，为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和6个团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血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副军长项英及7000余指战员壮烈牺牲，叶挺被捕，仅2000余人突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新四军军部，全军扩建为7个师，粟裕为第一师师长。1941年12月8日，老三营所在的八团在如东县双灰山设伏，毙伤俘日伪军520余人，其中日军俘虏30余人，首创苏中战场生俘日军的记录。9月，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八团各二个营（其中一个为老三营）和特务营合编为第七团，余龙贵为团长。随后在南通县二弯镇谢家渡，全歼日军大队长以下80余人，打出了军威，震慑了日伪军。代军长陈毅授予七团“老虎团”的光荣称号。1944年3月，新四军一师发起车桥战役，七团担任主攻，连克日军50多座碉堡，仅用25分钟就破城而入。6月23日，七团在如皋耙齿凌附近与日伪军500余人遭遇，经3个多小时血战，全歼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100余人、伪军300余人，俘虏日军小队长以下14人。1944年12月，粟裕率新四军一师所部从苏北南下苏浙皖边，1945年1月6日与王必成率领的新四军十六旅会师。2月，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所部参加了天目山三次反顽军战役，取得了全面胜利。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0月至11月，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渡江北上，整编为华中野战军。在我军历史上，挺进师编入新四军的二支建制部队先后参加了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著名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这是一支铁军，是一支战无不克的百战雄师。从平阳山门出征的500壮士中涌现出一批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粟裕为我军第一大将，并有陈铁君、张文碧、刘亨云、王永瑞、彭德清、王直、

黄玉庭、罗桂华、熊兆仁、张云龙、刘春山、张强生 12 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另外有 109 人为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永远长眠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一直关心着山门老区和人民群众，粟裕将军和一大批在浙南游击根据地战斗过或从这块土地出去的将士和革命老同志也十分关心老区的建设和发展，他们深爱着这块土地，粟裕将军的一部分骨灰也埋在山门红军纪念园，他永远和山门在一起。

今年是建军 90 周年，谨以此文纪念浙南红军先驱和逝去的先烈和先辈们！最后录粟裕将军的一首诗以作为永远的缅怀和纪念。该诗作于 1980 年 5 月，名为《题江海风云》：“武装斗争廿余年，转战频繁几万千。英雄业绩烈士血，可歌可泣壮诗篇。吾辈不能忘过去，创业艰辛忆先贤。江海风云汇青史，激励人民永向前。”

军民奋战 共歼顽敌

——藤桥战斗的作用和影响

李岳松

【内容提要】在歼灭国民党交警总队 1200 余人的战斗中，浙南游击纵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主力的作用，藤桥地区广大民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兵的作用主要是：发现敌情、迅速报告，及时阻击、拖住敌人，军民奋战、共歼顽敌，紧追不舍、逃敌被俘。藤桥战斗胜利影响深远：不但消除了解放全国的隐患，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战斗士气，更是确保了刚刚诞生的温州新政权。广大民兵不怕牺牲、勇于参战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教育着后人。

【关键词】：游击纵队，广大民兵紧密配合藤桥战斗胜利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一股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交通警察第一总队，沿浙赣铁路，途经诸暨火车站时掺杂着国民党诸暨县政府人员和诸暨火车站路警共 1200 余人，从金华逃窜到永嘉壬田。5月14日凌晨偷渡瓯江，越西洲窜进横山村，妄想转向温州下海脱逃台湾。当获悉温州已经解放，企图改道从金岙翻过山洲岭，经藤桥取道瑞安逃往福建方向。

这是一支受过美国特警队的严格训练，并拥有一套先进的美国武器装备，一贯为非作歹、对革命破坏力极大的反动武装特务部队。它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于 1937 年亲手组建，曾先后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属于蒋介石的“御林军”，被称为蒋陪身的一把犀利“匕首”，参加过袭击新四军的反革命“皖南事变”。不料逃经藤桥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在藤桥广大民兵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一举被歼灭。除 30 多人击毙外，其余全部被我军生俘。共缴获火箭筒 5 具、轻重机枪 20 余挺、短枪 40 余支、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 850 余支，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藤桥民兵在歼敌战斗中的作用

这支反革命武装在浙南藤桥被彻底歼灭，没让其下海逃脱，为全国的解放事业消除了隐患。藤桥战斗的胜利，浙南游击纵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主力的作用，而藤桥地区广大的民兵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多年前，笔者采访了这场战斗的指挥之一邱清华和亲身经历者离休干部林宝昌、徐兴岩等，以及通过后来的调查归纳，藤桥民兵在这场战斗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发现敌情，迅速报告。1949年5月14日上午8时许，家住双潮潮埠街开水产商店的徐岩宗（西坑人，1930年为游击队员并参加红十三军），满头大汗地跑到西坑村，向正在家的中共藤桥区委委员徐成聪和民兵大队大队长徐兴岩报告，说早上有上千国民党部队从永嘉壬田渡过瓯江到横山后朝驿头方向过来……

徐成聪和徐兴岩听了徐岩宗的报告，当即分析敌情去向，敌情就是“命令”，立即向藤桥区委报告，并组织民兵前往阵地，先阻击敌人。

他俩分头紧急通知全村党员和基干民兵，不到十几分钟，全村40多位基干武装民兵集合起来准备出发时，又跑来80多位村民，个个都争着要去打国民党反动部队，有的肩扛火药枪、有的手举劈柴的大刀，有的揸着棒头枪……

当敌军偷渡西洲时，当地民兵一发现，即火速向藤桥区委紧急报告。藤桥区委接到报告后，马上派员通知各乡村，动员组织民兵上阵阻击；同时，区委立即向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报告，司令部及时调兵遣将，赶赴藤桥战区。区委要求当天刚去司令部报到的区委委员郑华火速返回藤桥组织指挥民兵参战。司令部视军情紧急，当即命令郑华返回。区委书记白正会率领机关干部赶赴山洲岭，一边为阻击敌军做好战斗准备，一边指挥各地民兵在交通要道分别布下阵地：山洲岭附近的樟村、枫林岙、前林等村民兵400余人和藤桥附近的埭马、山根、油岙、金马等村民兵300余人，先后赶到山洲岭背布防工事；双潮的东坑、西坑、利八坑村及岙底的田塘头、白脚坳、江心田村和藤桥石垟等山村数百民兵分别驻守在敌兵必经之路的山洲岭至安头岭、东岙山头一带严阵以待。及时阻击敌军，为游击纵队赶往战区赢得时间。

2. 及时阻击、拖住敌人。徐成聪和徐兴岩带着 120 多人，沿着崎岖的山路赶到潮埠村的大垅头时，获悉敌军已到了东岙下面的坟头岭，于是徐兴岩急忙带着民兵朝东岙追去。年富力强的徐顺锡、徐存忠、金米旺等 10 多人，分别抬着两门重达 100 多斤的土铁炮，俗称“猪母娘炮”，炮筒内装铁砂、铁屑，筒口用泥土封住，虽然射程只有几十米，但杀伤力很大。民兵居高临下，敌人正向东岙方向移动，这时敌人朝着民兵开枪。操作土炮的两支小分队躲在隐蔽处，分别向敌连放 9 炮，震得敌人心惊肉跳。扛鸟枪的温钊弟不断变换地点一连向敌开了六七枪。其他民兵也在不同的隐蔽阵地向敌人射击。敌军听到震耳欲聋的炮声，误以为遇到共产党的正规部队，一时不敢再贸然继续前进。但敌方毕竟武器精良，又经过专业训练，在阻击中，前林村民兵被敌包围，幸有石垟、岙底民兵奋身增援才解围脱险。

到近中午时，正当敌强我弱、双方对峙的十分危急关头，我浙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两个中队在大队长何经直的带领下，从青田县赶到阵地增援阻击。如果不是西坑民兵与国民党交警总队首先交火，何经直一时难以判定敌人所处的准确位置。为保护西坑村群众的安全，徐兴岩向何大队长简要汇报了当时敌情后，决定留下 40 多位基干民兵一起战斗，其余自发前来的 80 多位群众，动员他们撤下阵地回家，避免因没有作战经验的村民遭受不必要的伤亡。

正当西坑群众撤离时，敌人向我方阵地发起冲锋。这时军民合作，共同与敌激战几个小时，打得敌人无法前进，只好退回东岙山下的麦田里。这一仗敌伤亡惨重，我方分队长潘得金等两人光荣牺牲，战士 3 人负伤，民兵徐昌庭等 4 人负伤。这时，徐成聪因区委有事先回去，鉴于敌人败退路线不明，何经直与徐兴岩决定，由徐兴岩率西坑民兵撤至东坑，以防止敌人经东坑向外逃跑；青田人民武装部则监视敌人动态。

天黑后，敌人借机退至驿头等地宿营。为了赢得时间，拖住敌人，民兵在藤桥区委统一指挥下，坚守在林路坳头和山洲岭头等交通要道，同时占据周围的大小山头；二支队一大队的两个中队立即对敌人的宿营地形成钳形包围的战斗部署，准备次日凌晨发起攻击。

3. 军民奋战、共同歼敌。狡猾的敌人，趁当日深夜避开我军锋芒，绕过横山街，向东逃窜。敌军翻越庄岩岭，经过上戍，于 15 日晨转到藤桥，企图

向瑞安方向逃窜。我军和民兵察觉后，立即行动，二支队二大队翻山越岭，连夜行军，抄小路疾进追击，直插藤桥南面的石鼓山，抢先占领制高点。另一路以东坑、西坑、白脚坳、田塘头、江心田、藤桥等地民兵为主体，抄小路经小岙岭，占领了藤桥西北面的黄田山等四个尖顶山头。14日下午，第三支队长周丕振奉命率领驻温州城区的该支队第一、第二大队昼夜兼程，赶往藤桥，协同歼敌。三支队一大队一中队控制石埠马鞍山。一大队二中队和支队部在桥头南岸及东南、东北一带布防。这时由廖义融带领的永嘉县警卫队抵达阵地，统一布防在石鼓山附近和下庄一带。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邱清华率三支队三大队，从温州翠微山太平寺出发星夜急速行军，到15日上午8时许，提前抵达藤桥战地。部分民兵进入石鼓山与游击纵队二支队一大队一起占领阵地。至此，我方投入总兵力达1500多人；参加围歼的民兵达2100人，在藤桥布下了天罗地网。

上午9时后，几支部队在广大民兵的密切配合下，趁机对敌发起猛烈的攻击，把敌总队截作两段，敌主力部队900多人退至北岸，余下300多人逃脱，向泽雅石坳山窜去。三支队二大队和民兵紧跟追击。敌主力被拦截藤桥后，气急败坏的敌军指挥官，抓了大塘村的村民林昌林要他带路，昌林故意将敌军从藤桥江北岸带进了石埠村迂回曲折的沙园水竹林里，弯曲的藤桥江和茂密的竹林使敌人迷路了，敌人恼怒地将林昌林杀害后，又退回北岸，固守藤桥头。残敌腹背被围困在北岸，进退无门，无法逃脱。

敌军为了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急忙修筑工事，设地堡，以北岸桥头为阵地，架设8挺重机枪，13挺轻机枪，重兵把守，摆设决战架势。

我方作战指挥部设在藤桥头南岸胡公庙里（20世纪80年代拆除，建藤桥供销社饭店），与北岸敌人隔江相对。下午2时，周丕振、邱清华在胡公庙里召开有一大队大队长黄乐平、三大队大队长万文达，以及参谋人员参加的决战会，具体分析战况，全面部署作战计划，决心全歼敌人于北岸。

下午4时30分，周支队长率部向敌军发起总攻，顿时四面八方枪声大作。踞守在石鼓山阵地的我军以密集的火力，向敌猛射，我军火力十分激烈。敌人以为石鼓山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于是敌军把主要火力集中向石鼓山开火。此刻，黄乐平趁机率二中队从寺西村渡江到后垵码道，从东北向西南包抄。

当我军逼近敌人据点，驻守北岸桥头的敌兵惊慌失措。周支队长抓住良机，连发3发六〇炮，击中敌桥头的重机枪掩体。周支队长趁机命令突击队开始攻桥，发起冲锋。冲锋过桥时，桥面动荡摇晃。一战士中弹，跌入江中，上岸后继续参战。战士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战，显示我军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担任主攻的八中队一分队和警卫排短枪班，在七中队轻重机枪、六〇炮的掩护下冒着弹雨，英勇冲锋，终于击毙敌桥头阵地重机枪手，余敌弃枪逃跑，我部迅速占领北岸桥头阵地。接着周丕振，邱清华率部突击进入战斗的核心阵地，采取多种形式的围攻和重点突击相结合，逐步缩小包围圈，并集中主要兵力，攻击敌指挥部。我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地形和掩身，与敌展开了逐巷、逐屋的战斗，全村淹没在枪林弹雨的烟幕之中。当我先头指战员在靠近敌指挥所的一民房时，我部集中机枪猛烈向敌指挥所扫射，敌军官被我大量杀伤，乱成一团，余敌在藤桥江两岸群众高呼“缴枪不杀”的助威声中，终于坚持不住，在窗口摇起了白旗，向我缴械投降。

4. 紧追不舍、逃敌被俘。15日早晨，敌人在藤桥石鼓山下被二支队一大队和民兵拦截后，其先头部队二三百人如漏网之鱼向西南方向逃去。藤桥区委委员林宝昌发现后，随即带领一支由埭马、底山根等村的叶宝池、叶宝林，杨章启、杨章福、周德福等12名党员民兵队伍，奋起紧追。他们抄山路边追边打，一直追到戈恬石坳山，敌占据大路南侧的石坳山山顶，我民兵沿大路北面追到山腰，与敌相距200余米时，双方各自利用掩体短兵相战，战斗激烈。在这紧急关头，泽雅的古耸、茅竹岭等地民兵300余人，在裴阿贵率领下抵达阵地助战，许多群众也纷纷上山来为我军出力助威。午后，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的的一个分队前来增援。战斗到下午四点左右，敌人被我民兵的土炮，土枪打死6人，其中一名连长，打伤多人。“洋枪兵”被土炮打怕了，便慌慌张张掉头逃跑，其中一小股30余人朝天长对面的脑底山逃。我军乘胜追击，敌人因地形不熟，逃到脑底山时，前面尽是悬崖绝壁，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眼见已是绝路，便全部缴械投降，当场缴获卡宾枪和冲锋枪30多支，汤姆式手枪一支，子弹200余发。余下200来人涉过溪流，窜犯石马山，盘踞在周岙对面板障岩山顶。

此时，板障岩西南面大小山头已被石榜山、西岸、黄坑、水碓坑等村民

兵占领。由朱大翠带领的永嘉县委警卫班赶到，敌人被我围困在孤山顶上成了惊弓之鸟。11时，朱大翠组织警卫班和民兵向敌开火，激战2小时左右，慑于我民兵土炮的威力和漫山遍野的“缴枪不杀”的吼声下，便派出一名军官来与我部接洽，表示愿意缴械投降。此时，浙南游击总队独立大队400多人在大队长颜庆富、教导员黄加斌的带领下恰好赶到，敌人被迫无条件放下武器，全部投降下山。永嘉县委警卫班在民兵的协助下将所有俘虏押送到瞿溪后屿堂

5. 藤桥广大民兵紧密配合游击纵队参战是取得藤桥战斗胜利的基础。这支素有国民党“袖珍王牌军”之称的受过美军特警严格训练的特务部队，他们意想不到千里溃逃到温州藤桥，竟会败在地方游击纵队和民兵手里。战后，时任泽临（藤桥）区委书记白正会同志非常高兴地说：这次战斗，西坑村的民兵和群众表现得十分出色，如果不是他们与国民党交警总队首先交上火，从青田出发的何经直率领的部队一时难以判断敌人所处的准确位置。西坑民兵向敌人打响了第一炮，既挡住敌人改变了逃跑的路线，又为浙南游击纵队赶到赢得了歼敌的宝贵时间，西坑民兵立了一大功。由于广大民兵层层阻击，四周山头到处是高呼助威的民众，拖住了敌人，才为我军赢得了占领制高点的时间，赢得了决战部队和最高指挥员的赶到，赢得了对敌包围歼灭的机会。在整个藤桥战斗过程中，广大民兵群众不仅及时报告敌情，还不计报酬进行送饭送水、运送护理伤员、阵地喊话助威、清扫战场、协助押送、管理俘虏等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表现了崇高的革命觉悟。

全歼国民党交警总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

1. 消除了隐患。在藤桥全歼国民党交警总队，没让“王牌军”下海逃脱，为全国的解放事业消除了一个隐患，也给那些欲求下海逃脱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军队一个沉重的打击。

2. 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战斗士气，为加快全国解放增添了一份力量。藤桥战斗是我浙南游击纵队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歼敌人数最多、缴获武器最精良、军用物资最丰富、耗时最短、我军牺牲最少的一次大获全胜的战斗。

这支反革命武装的“袖珍王牌军”在浙南藤桥被彻底歼灭说明：军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藤桥战斗的胜利，标志着“王牌军”不可战胜谎言的破灭，增强了人民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强意志和全国必将解放的信心和决心。该战在全省乃至全国，是一次小规模战例中全歼训练有数武器精良的一个典型。

3. 确保了新生政权。这支反革命武装在浙南藤桥被彻底歼灭，避免了温州人民受到伤害，确保了刚刚诞生的温州人民的新政权。

4. 广大民兵不怕牺牲、勇于参战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教育后人。在这场战斗中，民兵虽无牺牲，但也多人负伤。参战民兵手里拿着是土枪土炮，有的仅拿劈柴的砍刀和棒头刀，面对的是美式武器装备精良的特务警察部队。广大民兵如果没有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积极勇敢的可贵精神，是不可能去参加战斗的。藤桥民兵的事迹感人，可歌可泣。藤桥战斗的胜利，是温州军民献给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份厚礼！

红军挺进师在凤林村

郑志兴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冲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宣传和推动抗日，193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第七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北上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编成红十军团，在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北上。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遭强敌围攻，伤亡惨重，军团长寻淮洲在战斗中牺牲，方志敏等被俘，余部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领导下，冲出重围回到闽浙赣苏区。2月，按中共中央电令，以抗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吸引和打击敌人。1935年11月，粟裕、刘英带领红军挺进师首次进入平阳。1936年9月，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200多人，在瑞（安）平（阳）边界山区葛藤湖、包洋地方，与叶廷鹏、黄先河、郑海啸等领导的浙南红军游击队会师。从此，平阳人民革命斗争与红军挺进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三年游击战争，直至北上抗日。

红军挺进师进入凤林村

红军挺进师与浙南红军游击队会师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在浙南和浙闽边工作获得了新的发展，使浙江的统治阶级感到震惊和不安。

粟裕和刘英率领红军挺进师刚到浙江时，国民党反动派听说粟裕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左手负伤致残的消息；他们还打听到刘英在怀玉山战斗中右手负伤致残。于是造谣说刘、粟两人只有“一双手”，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就是这“一双手”，打得他们人仰马翻，将大半个浙江闹得天翻地覆，这大概也是国民党反动派万万没有想到的。

1936年11月，蒋介石从湖南调来了刘建绪的第四路军进驻闽浙赣皖边区，并在浙江省江山设立“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绥靖主任公署”（“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为了掩人耳目，去掉了“绥靖”二字）。1937年1月，刘建绪在衢州召开“驻剿”部队指挥官和四省边区60多个县的县长参加会议，部署对闽浙赣皖四省边区红军游击队的“清剿”，调动军队有6个师、2个独立旅，连同地方保安团共计43个团，约10万人。妄图把红军挺进师逼向东南一隅，而后在浙南飞云江以南，福鼎沙埕以北的濒海地区以平阳为重点聚歼之。他们在平阳设立“闽浙边清剿指挥部”，在平阳境内的军队有一个正规师，再加上地方的反动武装共约1万多人。

面对强大敌人的“清剿”，1937年2月中旬，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牛童湾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会后，粟裕率挺进师主力去浙西南地区活动，刘英带领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挺进师教导团短枪队30多人，从福鼎、泰顺山区转移到平阳北港，与中共浙南委员会书记叶廷鹏和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等人会合。中共浙南委员会要求闽浙边临时省委对其领导。3月，闽浙边临时省委作出决定，中共浙南委员会并入龙跃为书记的中共浙南特委；浙南红军游击队编入红军挺进师；中共平阳县委书记与瑞安县委书记合并，成立瑞平县委，郑海啸任书记。为密切配合省委机关活动，郑海啸随刘英在平阳北港的凤林、赤砂、大屯、龙尾、包洋、吴小洋等山村活动。

凤林村在平阳县西北面山区，是郑海啸的家乡。1927年春，郑海啸等凤林村农民，受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温独支）成员张培农、叶廷鹏等成立平阳县农民协会的鼓舞，组织了凤林村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斗争。1930年开始，叶廷鹏等到凤林村开展革命工作，1933年，郑海啸秘密组织了凤林村赤卫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建立中共凤林支部，郑海啸任书记。

刘英来到凤林村，郑海啸布置当地党支部全力配合，把红军分散到农民家里，并教育全村群众严守秘密，掩护他们活动。由于红军初到凤林村，听不懂群众说的闽南话，借东西和办什么事，只能用手势比划，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一次，刘英向群众借柴刀，想帮助他们劈柴。可是群众听不懂刘英的普通话，拿给他的却是一把菜刀。又一次，一位红军战士用两个指头比划

着向老大妈借剪刀剪布补衣服。老大妈以为他要抽香烟，一边摇着头说没有，一边拿给他的却是一枝旱烟管和一袋旱烟。刘英想，北港地方群众大都说闽南话，不解决语言问题，怎能做群众工作？他真诚地要郑海啸教他说闽南话，并不时在笔记本上注上音。在工作中，刘英用刚学会的半生不熟的闽南话与群众交谈，并虚心地请群众纠正他的发音。从而，他和群众常常引发出阵阵欢乐的笑声。如果遇上村子里像郑志西、郑学超等会说普通话的群众，刘英非常高兴，谈起来滔滔不绝。刘英不怕困难，随时随地认真学习，很快地学会了生活中常用的闽南话。刘英不顾疲劳地忘我工作，利用一切机会，随时向群众进行革命道理宣传教育，使大家懂得穷人要翻身，就得跟共产党走，起来闹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

刘英在凤林村，白天，郑海啸或党支部安排党员陪他到山上察看地形，勘查路线。他一边看一边画上图，在山地上找农民谈话，刚开始时，不了解情况的农民还以为他是看风水先生。晚上，郑海啸带他到群众家中了解社情民俗，和群众谈心。群众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刘英总是尽量设法及时帮助解决。如村里有个孤寡老人生了病，刘英立即叫卫生员来给他看，打针送药，很快就治好了他的病。而且还送给他几个银元，安排生活，这使全村群众都十分感动。

凤林村群众历来有习武的习惯，郑海啸等人在村里正式办了个拳馆，每天晚上，几十个青年跟着师父学打棍棒和南拳，郑海啸就是从这个拳馆里学会武术的。郑海啸有时带刘英到拳馆参观，刘英平易近人，态度谦和，对青年学习武术很感兴趣，常常站在一旁认真地观看。当时，大家还不知道他是红军挺进师的首长，认为他是郑海啸的客人，邀请他“露”一手。盛情难却，刘英叫个红军战士上去表演了一套北拳。南拳北腿，红军战士的腿功，使学武的青年们大开眼界，获得一阵掌声。从而，拳馆里的学拳青年与红军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刘英等在凤林村，受到村里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郑海啸的陪同下，刘英在北港山村活动了近一个月，3月下旬在蔡洋山被一个营的敌人包围。突围后，转移瑞安沙门山。以后，刘英带领省委机关又多次来到凤林村活动。

集中改编 北上抗日

1937年9月1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协议正式签定后，9月25日，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带领省委机关和部分红军200多人进驻凤林村，写信并派员分赴各地寻找粟裕、张文碧等分布在浙西南、浙东南方面的红军部队集中。此时，在浙西南活动的粟裕派谢文清与国民党遂昌县政府进行了谈判。

刘英和省委机关驻在满洋六份内大屋，这是一座两进木结构的平房，左右两个厢房，围成个“口”字形的用卵石铺成的院落，屋子大门外又是用卵石铺就的大晒场，整座房子显得十分古朴。房屋坐西朝东，共有20多间，约建于清嘉庆年间，距今200多年。大屋右厢房第三间是刘英的办公室兼卧室，内有一张木梯可上楼角，刘英常在楼角里召开秘密会议。大屋前座每间窗户两旁的板壁上，从左到右写上了“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誓雪国耻”12个白底红字，每个字有箩筐那么大，十分醒目。省委机关进驻凤林村后，龙跃带领中共浙南特委机关也来到凤林村，驻在满洋郑竟成家中，中共瑞平县委机关驻在黄三孀家的大厅里。

过了数日，张文碧带领的红军小分队首先来到凤林村，接着舒雨旺带领红军数十人也来了。凤林村，对于张文碧和舒雨旺两支队伍来说，他们仿佛是回到了家。1937年1月开始，国民党军队10万余人，对红军进行八个月的“围剿”。2月，张文碧带领部队从云和赶到平阳北港找粟裕和刘英。这时，敌人正在大举“围剿”，连许多山村也住上国民党军队，在各主要道路上日夜放哨站岗。张文碧找不到粟裕和刘英，通过凤林交通站找到了郑海啸。由于形势紧张，郑海啸帮张文碧把部队隐蔽下来。张文碧的部队大多是福鼎人，会说闽南话，郑海啸安排他们分散住在凤林村的农民家里。群众把他们作为家中一员，白天一起上山劳动，晚上和壮丁们一同睡在密林中的岩洞里或悬崖下；张文碧和不会说闽南话的红军战士，就与郑海啸一起行动。后来，郑海啸通过廿五坑（今文成县）地方党组织，帮助张文碧在瑞安东坑找到了刘英。刘英要张文碧继续找粟裕，由于敌人岗哨密布，盘查很严，张文碧只好折回，又与郑海啸在凤卧乡等地山区活动。不久，红军挺进师舒雨旺带领数十人队

伍也来到凤林村找刘英，他们身上的钱已花光了，给养成了问题，郑海啸和张文碧设法借到100块银元给了舒雨旺，帮助解决部队困难。红军挺进师战士们说：只要找到郑海啸，就不愁住和吃；有的红军战士还说：只要到了凤林村，就像到了自己的家。

9月23日，粟裕带领在浙西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挺进师从遂昌门阵出发，10月也来到凤林村。于是，红军挺进师部队全部集中，司令部驻在满洋郑学超家。这座房子原来的正屋和两座厢房共十多间，外面砌了一条卵石围墙，里面成为一个大院落。六份内大屋右厢房第一间为粟裕的办公室兼卧室（后移住在郑学格家），第二间为刘英和粟裕共同的会客室。经过八个月的反“围剿”艰苦斗争，红军挺进师2800余人只剩下300多人，地方干部60余人，原红军挺进师成员不过百人，其余都是浙南、浙西南和闽浙边的农家子弟。红军挺进师在凤林村口石头宫设立哨所，派出一个班战士驻守在石头宫内，日夜站岗放哨，每星期换防一次。同时，在冠尖山顶设立瞭望哨，也驻上一个班战士。红军食堂办在满洋四份屋内，有几匹军马养在凤林郑家祖屋旁。

根据和平谈判协议精神，红军挺进师集中后，在六份内屋前的大晒场上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龙跃为大会主席，宣布将红军挺进师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粟裕任总队长，陈铁君任副总队长，刘英任政治委员，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教导队，分别由范连辉、舒雨旺、周瑞球、刘亨云等人负责。在改变番号大会上，刘英和粟裕都讲了话，说明国共合作和部队改变番号的意義，号召大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服从命令听指挥；加紧训练，准备开赴前线杀敌。红军挺进师的帽徽原来是红五角星的，改编后发给大家的帽子是“青天白日”的帽徽，有的红军战士思想不通。龙跃在大会上说：“我们原来的红五星帽徽是光荣的，现在改变番号换上这顶新帽子，是为了国共合作，同国民党军队一起抗日。但我们光荣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不能忘记，大家要把红五角星帽徽的帽子好好保存起来，不要丢失了”，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大会上，全体指战员精神饱满，“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

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响彻凤林山村。

队伍整训 扩军宣传

红军挺进师在凤林村改编后，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动员接收爱国青年参军，在凤林冠尖成立了新兵队；派出工作组到各游击区收容伤病员。同时，全体红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政治、文化和积极进行军事训练，每天“三操四讲”（注），有时搞军事演习，十分紧张。“三操四讲”是以连队为单位进行的，每天清早起床开始第一操，即绕山路跑步或爬山岭，直跑得满头大汗后回住所洗脸。早饭后上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战术课，学习时间在两个小时左右，这是第一讲。接着是第二操，进行射击和投掷训练，练射击时，真正枪支不多，大家轮流瞄准；投掷练习，因缺少手榴弹，用硬木头、石块代替。下午出操前作第二讲，指导员和连长讲话或作报告。接着进行第三操，练习刺杀，操练时，有以稻草人为对象的冲刺，也有战士拼刺对练。晚上，各班长向连长汇报一天训练情况，尔后集中听连长总结，讲评情况，表扬训练积极、成绩优良的战士，批评纠正个别不正确做法，这是第三讲。连长总结后，分班讨论，即为第四讲。战士们通过紧张的“三操四讲”和军事演习，迅速提高政治觉悟、文化知识和军事技能，为开赴抗日前线作好准备。

红军指战员自觉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在课余时间，红军主动帮助农民割稻、晒番薯丝、砍柴、挑水、种菜和打扫环境卫生，还派出人员每天早晨指导附近乡村农民抗日自卫队操练，与群众融洽在一起。此外，组织人员访贫问苦，作社会调查，刷写标语，宣传抗日，教群众唱革命歌曲等。红军还平整了石头宫下凤林溪的溪滩，搭个大讲台。大讲台搭成后的第一个会议，是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司令部召开群众抗日动员大会。参加会议的除红军代表 30 多人和附近村庄少数群众外，大都是凤林村群众，共有 500 多人。刘英和粟裕在会上讲了话，数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实行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的暴行，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坚决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去。凤林村群众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宣传动员抗日的会议，而且又是第一次听到刘英和粟裕两位红军首长在大会上深入浅出的富有

启发性、鼓动性的讲话，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此后，红军在凤林溪滩上经常晚上开群众大会和演出抗日文艺节目，群众称为“红军戏”或“文明戏”。每次开群众大会，刘英或粟裕都要郑海啸上台讲话。郑海啸是本地人，说的是闽南话，不用翻译，向群众讲抗日形势、政策和拥军等内容，他讲话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演“红军戏”，除演出在全国流传很广的《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外，还由红军战士傅狂波、王泰然等编写一些结合抗日内容的快板、表演唱等节目，一演就是二三个小时。傅狂波经常扮演老头，郑香山扮演老太婆，程美兴扮演小姑娘。程美兴扮演的小姑娘角色，惟妙惟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人索性叫他“程美英”了。凤林小学也积极配合演出，经常上台表演的有郑明德等人。红军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发群众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每当开群众大会和演出文艺节目的晚上，村里村外、山上山下，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到凤林村的溪滩上，听红军演讲和观看红军演戏。村里没有电灯，演戏是用煤气灯照明的，为了方便群众来看戏，哪里路不好，红军就修到哪里，还在村口石头宫哨所和村里大路旁，挂上明亮的煤气灯，凤林村一片欢腾。每次开会和演出，红军教导队队长刘亨云带着战士前前后后维持秩序，照顾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小孩。

听红军宣传演讲革命道理和国内外时事新闻，也成为村里群众的生活需求与习惯。每天晚上，大家吃了饭后，就纷纷自动地聚集在省委机关驻地的六份内大屋前的溪滩上，听吴毓、郑海啸等红军干部宣传抗日道理和报告前方抗战消息，凤林村与全国各地的抗日形势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11月，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浙南特委机关从凤林满洋迁到冠尖，刘英住在郑志斌家的地板间，龙跃住在郑永烈家。红军卫生室设在郑志吾家，卫生员常为群众看病送药。瑞平县委机关也从凤林迁到冠尖郑志亮家，县委书记郑海啸由于兼顾缝制红军被服工作，与缝纫组一起住在郑永梢家，郑永梢具体帮助红军服装制作工作。这时，只有几十户的冠尖也一下子热闹起来了。白天，红军在大厅里听政治报告、学习文化或到山上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傍晚，他们到郑永梢屋后平埔开阔地上的红军操场做游戏。各地要求参加红军的青年，在父母或妻子等亲人的陪同下，纷纷来到凤林冠尖。他们被批准

入伍后，高兴地来到由教导队刘亨云和地方干部郑竟成负责的新兵队报到。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新兵队驻在冠尖郑友浓屋子的大厅里，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后，先后分配到各个连队。

还有原来在国民党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外地党员，或由上级介绍来浙江工作的同志，也先后到凤林和冠尖找党的关系。其中有张贵卿、张三扬、陈雨笠、宿士平等，他们都由闽浙边临时省委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工作。

每到夜晚，红军在冠尖岭头的树上挂上明亮的煤气灯，与山下的凤林村灯火相辉映，山上山下一片光明。

同月，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派原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邓切、代表詹行烈，专程从衢州来到凤林村，刘英和粟裕在六份内大屋接见了他们。邓切通报了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工作即将结束，已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关系转交给当地政府，抗日游击总队开拔之前，每月由平阳县政府发给 14000 元经费。此外，还有许多国民党官员来凤林村了解和检查抗日游击队集中整训情况。

红军挺进师集中改编整训，不但迅速提高指战员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文化素质，而且广泛地开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高了群众思想觉悟，掀起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和要求参加红军的热潮，扩充了红军抗日队伍。

临时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平谈判获得成功，这是闽浙边临时省委坚决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胜利。从而结束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和国民党军队对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八个月残酷“围剿”。在新的形势下，1937年9月1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写了给党中央的报告，派吴毓、龙跃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并请示今后的工作。

闽浙边临时省委为加强地方党组织和军队建设，部署新的工作任务，在进驻凤林村时，就开始筹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10月18日，吴毓、龙跃从

南京回到省委机关驻地凤林村,11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在凤林村六份内大屋召开。参加会议的除省委委员外,还有部队连级和地方法县级上的主要干部,温州白区地下党也有三位同志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

(1)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省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和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中央代表博古给刘英的亲笔信。党中央指示的主要内容是: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持党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对国民党任何挑衅和进攻,必须坚决进行自卫。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应抓紧时间,大力进行训练,防止国民党的收买、利诱、分化阴谋,以便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博古给刘英的亲笔信,其主要精神与党中央《关于南方各省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相一致。他要吴毓、龙跃回去后告诉刘英:部队集中后,不要下山,或者住在山边,以防国民党阴谋袭击。在新四军组成之前,没有他的亲笔信,别人来调动部队,不要听他们的命令。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在省委扩大会上,结合闽浙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讨论了具体的执行方案。

(2)粟裕作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刘英作三年游击战争最后八个月的斗争总结和抗日战争新形势的报告。在艰难曲折的三年游击中,红军挺进师曾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且又孤军作战,经受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正规军几次大规模的“围剿”。但刘英、粟裕等领导人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领导才能,他们先后经历了从正规军到游击队和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最后,不仅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而且保留了革命的种子,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刘英和粟裕在报告中还提出在抗战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恢复和整顿各地党组织。

(3)增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委员。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原来的省委委员只剩下刘英、粟裕、谢文清、龙跃4人,会上增补了陈昌会、林辉山、张麒麟为省委委员。

(4)调整各级党组织,重新配备了干部:龙跃仍任中共浙南特委书记;刘清扬任中共台州特委书记;恢复福鼎、鼎平、泰顺3个县委,建立中共浙闽边区委,郑丹甫任书记,负责指导上述3个县的工作;重建中共浙西南特委,张麒麟任书记;建立中共青景丽中心县委,陈昌会任书记;撤销以周建生(注)

为书记的原中共平阳县委书记，将瑞平县委改名为中共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任书记；筹建中共永嘉县委和瑞安县委。

（5）讨论建党工作。为在八个月反“围剿”中坚持斗争但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以及一部份在敌人“围剿”中被迫自首自新的党员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予以恢复党籍；积极发展党员，特别是在八个月反“围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人员吸收到党内。会上，为郑丹甫、黄先河、黄耕夫、林辉山、郑海啸等补行入党仪式。

（6）培训抗日干部。决定继续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其他各种干部训练班，并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开办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7）讨论扩充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和解决部队被服问题。

会议持续近一个月时间，为确保省委扩大会议安全，中途先后两次转移到凤卧金岙和玉青岩召开。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是1935年11月省委在泰顺县白柯湾成立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国民党军队八个月的残酷“围剿”后，在较安定的环境中举行。会议结束后，各地干部立即分别回到各自的工作地区；浙西南和浙东南两个特委干部还需要留下与省委领导研究具体工作，在凤林村过了1938年元旦后才回到各自地区工作。各级党委充份利用和平谈判成功的有利时机，适应新的形势，大力落实省委第十二次扩大会的会议精神。省委以最大的力量，创办党的训练班，恢复各地工作，加紧部队训练，开办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及训练群众抗日救亡自卫队等。

开办军政干训班

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一个伟大战略转变，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每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特别是负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党政军干部，如何正确认识民族解放战争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如何重新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党的政策，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能够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是当时每个同志都渴望解决的问题，也是领导上必须抓紧时间使之得到解决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因此，从红军挺进师集中改编整训到出发赴抗日前线的这一段

时间里，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司令部除了加紧练兵外，刘英和粟裕还亲自主持在凤林、玉青岩、大屯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都是部队连级和地方县级以上的干部。此外，刘英还主持在冠尖郑志斌家里办地方干部学习班，浙南特委也在冠尖办过干部学习班。各地来培训的干部，经培训后回到各自的地区工作时，闽浙边临时省委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司令部”的名义，发给他们一个护照，使他们有一定的合法身份，可以公开地开展工作。

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于1937年11月在凤林村六份内大屋开办，参加学习对象以军队干部为主共20人，龙跃、张金发也参加学习。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习时间约半个月，教学内容有三个大题目：一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二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关系；三是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内容及相互关系。重要课程如《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方针、办法与前途》等，都印有学习提纲。如《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的学习提纲，是刘英在凤林村专为军政干部训练班编写的，全文约9000字。用问答式提出：什么叫民族矛盾；什么叫国内矛盾；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与国内矛盾发生了什么变化等共20个问题，较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任务。

军政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学习积极性很高，没有课桌椅，大家以门板或长凳当作写字台，以石块为凳子。有的学员干脆坐在地上，屁股下只垫张旧报纸或一把稻草。没有课本，只有一些油印资料，大家认真听课，在膝盖上仔细作笔记。在讨论中，只要有不同的意见，就展开争论，往往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吃饭时端着饭碗还在争个不休，直把问题搞清楚为止。通过学习，学员们粗浅地懂得矛盾是统一体中两个对立面。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就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同时，大家还明白了共产党员应是国际主义者，但又必须是爱国主义者、民族战争论者。其口号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为祖国而战，为民族独立而战。只有民族得到了解放，国家保持独立完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问题。经过训练班学习的学员，政治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军政干部训练班结束后，

多数人回原单位工作，也有少数留在省委机关。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成为军队和地方各级机关的重要领导干部。

1937年12月，闽浙边临时省委在凤林村旁山郑经鸿家开办爱国青年抗日救亡训练班，学员来自凤卧乡等地的进步青少年，共约20多人，凤林村参加学习的知识青年有郑学壤、郑学雄、郑学敕、郑志乐、郑经鸿、郑经玺等。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刘英、粟裕分别给学员们上过课。1938年元旦过后，训练班随省委机关搬迁到大屯村。3月，刘英随曾山去东南分局汇报请示工作后，爱国青年抗日救亡训练班先后移到玉青岩周尔信家和冠尖郑友浓家继续学习1个月。最后，在冠尖郑永梢屋后的红军操场上，进行实弹射击后结束。学习班的学员，有部分在学习中途参加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北上抗日，编入新四军。其他学员在学习班结束后，大都参加了地方工作。

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抓紧军事训练和干部培养时，也十分注意对部队少年的教育和培养。10月，省委在凤林村将1936年以来跟随红军挺进师闹革命的34个少年编了个“红小鬼”班，如邓福坦、廖义融等都是当时“红小鬼”班的成员。省委专门安排人员给他们上课和训练，如张文碧、陈铁君、吴毓等都为“红小鬼”班上过军事课和文化课，刘英也抽出时间给“红小鬼”班上政治课。刘英上第一课时，向他们提出三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当红军？准备怎样当好红军？参加红军不等于加入了共产党，你们现在都不是共产党员，准备怎么办？“红小鬼”班学员在省委直接关怀和培养下，很快成长起来，有几个年龄较大的随粟裕北上抗日，编入新四军；留下来的，后来大都成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军民鱼水情

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红军挺进师部队和浙南特委、瑞平县委机关人员进驻凤林村后，有许多客人也来到凤林村。如全省各特委、县委来向省委请示汇报工作的同志；同情支持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和主张抗日的进步份子；来了解抗日游击总队整训情况的国民党官员；更多的是各地共产党员、共青团

员和知识青年及抗日自卫队队员来要求参加红军的，住满了全村民房，每天约有上千人吃饭。省委把机关的后勤工作，交给浙南特委书记龙跃和瑞平县委书记郑海啸负责。县委依靠当地党支部组织，发动党员带领群众做好拥军工作，解决部队和机关人员住、吃、穿等生活问题。

县委还以当地群众郑志吾在杭州时目睹的日军暴行，和他亲身经历的日军集体屠杀从死里逃生的事实，教育群众做好拥军工作。郑志吾和弟弟从冠尖迁居到长兴县一个山村开荒种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入侵杭嘉湖地区，郑志吾兄弟俩同被掳去，与几百个群众集中在一个庙宇里，日军用机枪向群众扫射。顿时，庙宇里尸体成堆，地上血流成河，郑志吾的弟弟被日军杀害了，而他却神话般地活了下来。郑志吾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后，掩埋了弟弟的尸体，一路上要饭，经历了千辛万苦才逃回到家乡。国仇家恨，郑志吾的现身说法，更激起群众对日军的仇恨，和对坚决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它所领导红军的拥护与支持。

1937年，凤林村党员带头，做好群众工作，动员全村男女老少，大力开展拥军活动。大家热情邀请红军住进自己的家，还以自己的家能住进红军为光荣。群众千方百计腾出不很宽敞的房子给红军住宿，卸下门板、搬来篾簞和稻草为红军铺床，让出灶台供红军煮饭烧菜。红军和群众是共饮一口井水，同住一幢屋，合用一个灶台和烧一个柴仓里的柴草，军民就像一家人。

多年的游击生活，红军生活十分艰苦，许多战士的被服破了，鞋袜烂了，极需更换补充。凤林抗日妇女联合会黄三嫦、翁桂英、施巨兰和郑明德等，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发动全村妇女赶做布鞋慰劳红军。妇女们立即行动起来，拿出旧衣服，找来零星布块，日夜纳鞋底做鞋面，而且还暗暗地相互比赛，看谁的手艺精而又做得快。仅半个月，几百双的布鞋就做成了。抗日妇女联合会把布鞋登记集中后，送给红军，每个指战员发一双还余下好多。

红军在凤林村集中改编时已是10月份了，天气开始转冷。红军还没有棉衣和棉被，有的指战员缺少换洗衣服。县委派人买来棉布和棉花，请来二十多位手艺精的裁缝师傅，带缝纫机到冠尖郑永梢家赶做被服。当地党支部动员妇女协助缝钮扣眼和钉纽扣，几百套衣服和棉被很快就缝制完成，及时发给了下去。另外，还准备一部分留给新来的战士。

凤林村党支部还发动党员带领农民抗日自卫队和群众，上山下地多砍柴草多种蔬菜慰劳红军。群众拥军热情很高，把最干燥的柴草送给红军烧，把最新鲜的蔬菜送给红军尝新。凤林村是个山区，山多田少缺大米，县委常派人到水头街、鳌江等地采购粮食和副食品。但采购物资又须靠人力从水头街挑运到凤林村，群众只要有个通知，就立即放下自己的手头农活，带着扁担、箩筐或绳索，成群结队地前往搬运。特别是在夜里，山路上运输红军物资群众队伍的灯笼、火把映红了半月天，显现了十分壮观的景象。

1937年12月31日，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在凤林村过新年。多年的游击生活，同志们常年分散在各地，现在集中在一起过年，感到无比的高兴。各连队用伙食结余增加几个菜，请房主人一起会餐。房主人宰了鸡鸭，拔来新鲜蔬菜，拿出自酿的糯米酒，招待自己的子弟兵。军民围成一桌，边吃边谈，气氛十分融洽，亲如一家。晚上，凤林村溪滩戏台上高挂煤气灯，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司令部召开联欢晚会，凤林村和附近村庄的群众都赶来参加。刘英、粟裕在会上讲话，称赞凤林村群众拥军工作做得好，感谢凤卧乡群众对红军的支持。会后，演出“红军戏”等文艺节目，凤林小学师生也参加演出。

1938年元旦过后第三天，闽浙边临时省委机关和红军挺进师司令部从凤林移驻大屯村。

红军战士 奔赴战场

1937年10月2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湘、鄂、赣、闽、粤、豫、浙、皖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统一了意见后，派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专程到平阳，在大屯村向刘英、粟裕传达了如下意见，大意是：（1）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为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应尽早出发；（2）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3）为了适应新形势，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

后为正式省委；（4）原闽浙边临时省委两位主要领导人，一个带队去前方，一个留下继续领导浙江工作。经商量决定，粟裕率部去皖南，参加新四军战斗行列；刘英和谢文清、龙跃、张麒麟、林辉山、郑丹甫、吴毓、叶廷鹏、郑海啸等一部分干部及三个短枪班武装留下坚持浙南革命阵地。

曾山在大屯村时，刘英交代郑海啸负责对曾山的安全保卫工作。郑海啸布置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对曾山的住处严守秘密，安排农民抗日自卫队和抗日妇女联合会及儿童抗日救亡团，在村口路旁轮流站岗放哨，密切注意可疑行人。外地村庄生人，没有郑海啸的“路条”，不得进入大屯村。郑海啸对曾山的伙食要另行安排，但曾山说什么也不同意，一定要与驻在大屯的抗日游击总队战士们一起吃饭。曾山知道郑海啸是平阳本地人后，很高兴地向郑海啸了解平阳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及群众生活情况。曾山经过了解考察，对郑海啸的工作表示很满意，赞同刘英说的“郑海啸是浙南群众领袖”。曾山在大屯住了五天，回东南分局时，邀郑海啸引领，和刘英一起特地经过凤林村，看望部分驻在郑学超家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指战员，在六份内大屋会见部分共产党员和老交通员，并作亲切交谈，然后到郑海啸家。一路上，曾山受到凤林村群众热烈的欢迎，并受到郑海啸和郑学超家属的热情接待。

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要北上抗日，凤林村党组织发动党员带领群众做好欢送工作。群众立即行动起来，有的捣糖糕，有的做冻米糖，有的练锣鼓和吹奏乐器；妇女党支部动员全村妇女连夜赶做布鞋和绣花袋，年纪大的妇女眼力不好不能做绣花袋，忙着替子弟兵拆洗被服。3月18日，粟裕率领由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七团队从山门出发到达凤卧水尾宫，另三路子弟兵分别从凤林、大屯、马头岗出发也到水尾宫会合。新四军第七团队全部集中后，在水尾宫召开北上抗日誓师大会暨瑞平县委欢送大会。当地共产党员和农民抗日自卫队及群众纷纷赶来参加，还有新四军第七团队战士的家属和凤林小学师生也参加了会议。郑海啸代表瑞平县委和群体在会上致欢送词，粟裕代表全体指战员表示坚决抗战的决心。会议结束后，群众敲锣打鼓吹唢呐放鞭炮，热烈欢送子弟兵上前线杀敌。指战员们沿着碇步过凤卧溪时，站在溪旁碇步下的凤林村群众代表，把早已准备好的冻米糖、熟鸡蛋、糖糕和布鞋等，一袋一袋塞在每位指战员手中。

北上抗日部队经凤林村时，男女老少倾村而出，挤满了道路两旁欢送。他们握着子弟兵的手，依依惜别。新四军郑志涨等几个凤林村的战士亲属，对自己的亲人一遍又一遍地嘱咐，不要挂念家中的事，要勇敢杀敌。郑志涨等频频点头，说决不会让大家失望。粟裕、陈铁君、张文碧等指战员向送行群众一边不停地挥手，一边不断地说：再见！再见！群众跟在队伍的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进了内塘村，直至部队上了马迹岭看不见了才回去。为了革命事业，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凤林村群众和红军挺进师一道经历了千辛万苦，结下了鱼水深情。

溪山烽火

——溪口村的红色纪实

李顺林

溪口村古名合溪村，因位于楠溪江上游的潘坑港与黄南港汇合处而得名，是一个有 1110 多户、3500 多人的大村。该村山水清幽，风景迤迳。上个世纪中期，村口的船埠头是楠溪江中游段舟筏运输第一埠。这里商铺林立，商贾云集，十分繁荣。在南宋时还曾出过戴氏“一门四世六进士”的世家，创办私塾“明文书院”；李氏“四进士”、“三退大屋”及“净水池”的生态建设，使得溪口村成为楠溪江中上游最具文化底蕴的特色古村之一。村落总体布局井然有序，村中有良好的水系，规整的街巷网，民居建筑具有浓郁的明代建筑特色，誉称“溪山邹鲁”“明文里”。有戴氏“明文书院”和李氏“三退大屋”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6 年 1 月 17 日，溪口乡人民政府呈报永嘉县人民政府的《要求批复老区乡的申请报告》中说：“溪口乡位于楠溪江上游。早在二战时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十三军的策源地之一。一九二四年，戴宝椿在谢文锦的介绍下，首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溪口一带传播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种子，为红十三军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 年，在红军军长胡公冕同志的领导下，溪口地方的戴家业、戴中蜚（忠飞）组织了一百多人的红军队伍，南岸周新潘（洗枹）成立了八十多人的武装队伍，苍山郑九耀（完）同五尺胡协和带领五十多人的红军队伍，以南岸港一带为根据地，在全县开展革命活动，曾先后配合红十三军总部攻打过缙云、枫林、平阳等县城，解放了数千万群众，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政权。据初步统计：战斗中阵亡的有十名（应为 11 名），被捕杀害的十七名，遭到敌人追捕逃亡在外的有三十多人……”

自 1928 年在党的领导下，溪口农民开始拿起枪杆子，拉起革命队伍，经历了血风腥雨，坚持武装斗争，一直到 1949 年浙南解放，溪口村的革命斗争

历史在永嘉的革命历史有着光辉的一页，是一个革命老区村。

早期革命者戴宝椿

戴宝椿(1892——1958)字萱庭，永嘉县岩坦镇溪口村人。1911年与同学夏承焘一起从永嘉县高等小学堂毕业，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第十中学，1916年考取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后回温州担任艺文中学教师，1924年转任温州女师及永嘉县高等小学的教务兼音乐教师，著名的人民音乐家陈田鹤就是他的学生之一。他是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温州早期的革命者，对温州早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军队建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民国期间温州政界与文化界的知名人物。

1924年，戴宝椿被推选为永嘉县参议员。当年12月，由温州早期共产党员谢文锦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谢文锦呈中共中央的鉴定意见中说：“戴宝椿很有学生主义的倾向。人极诚恳，富活动性，现在该校党部做事，颇能负责，可暂指定戴宝椿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书记。”1925年初，任弼时暂指定戴宝椿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温州支部书记。不久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温州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为红十三军奠基人之一。

1926年，北伐军攻克杭州，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胡公冕电召戴宝椿紧急赴杭，委派戴宝椿为青田县政治监督员，与该县县长共同处理青田县党政事宜。在青田工作数月，因病回温。不久，赴沪住在英租界其亲友家里治疗休养。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戴宝椿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因其身在上海养病得以幸免。

1929年1月，戴宝椿化名戴小聆，携长女戴咏雪和自己的学生吴文瑛(后任瓯江小学校长)去马来西亚。戴宝椿在马来西亚任雪茂州加浦市树人学校校长，后担任吉隆坡国民学校教师。1935年12月回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1940年，戴宝椿担任永嘉县地方农民银行协理。

建国后，戴宝椿在温州港务局任职，后因病魔缠身，在家休养。他经常向回国探亲的华侨宣传党的政策，并向党政机关反映华侨的要求和希望。

戴宝椿次子戴潮声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当过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

中华日报总编辑和驻美特派员，与北美世界日报的顾问及编译，退休后定居纽约。

1958年，戴宝椿在温州病逝，享年67岁。

戴中飞拉起农民武装队伍

1928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馨和浙南特区委员会书记林平海等人在浙江的永嘉、瑞安、平阳等县组织发动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对各县作了周密的部署，会上成立了“浙南联合起义总指挥部”，郑馨任总指挥。永嘉暴动由王屏周负责，会后派雷高升、李振声到楠溪组织农民武装。1928年冬，溪口戴忠飞发动溪口、东岙、岩坦等地的穷苦农民，拉起一支几十人（后发展到80来人）的武装队伍，驻地为溪口、东岙等地，联合南岸周洗枹、苍山郑九完武装队伍在岩坦港、南岸港一带活动。

攻打枫林浙保四团

1929年8月，霞渡潭坳警察局的钉子拔了以后，国民党便派浙保四团第二连进驻楠溪重镇枫林八房祠堂，对付楠溪农民的武装队伍。胡协和做好一名在浙保四团二连当兵的胡盟兄弟工作，作为内应，接着召集南岸周洗枹、五尺胡衍真、溪口戴家业、岩坦戴龙山、北山戴盛余、港头周启佑，还有抱岙、枫林等的农民武装队伍在南岸村前面高山上的双尖宫召开会议，筹划攻打枫林八房祠堂浙保国民党部队的事。9月14日夜，上述队伍150多人由胡协和带领，到了枫林八房祠堂前门，三名内应破墙递出12支步枪，结果被国民党部队发现，当场牺牲一位内应。双方激战，农民队伍毙敌两人。战斗几个小时到天亮，胡协和率领队伍主动撤退回双尖宫，国民党敌军追到双尖宫，双方战斗，但无伤亡，敌人烧了双尖宫10来间禅房。胡协和队伍退到表山胡坑，又与追敌发生战斗，敌军烧了民房三座。胡协和队伍转移到100多里的黄山村，将敌甩掉。

戴家业武装队伍编入红十三军第二大队

1930年3月，胡公冕到西楠溪组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当时屿北的汪瑞烈立即去五尺找到胡公冕，说自己一批武装队伍，要求参加红军胡公冕表示欢迎。汪回来后，到溪口与内兄戴家业商量，决定由戴家业带领队伍参加雷高升部。1930年5月9日下午，红军攻下枫林，10日在枫林勉园正式宣布红十三军成立，溪口武装队伍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团第二大队，楠溪大源五个中队，中队长李寿庆、戴加业、陈瑞兰、戴隆山、周洗枹。这支纯粹农民出身的队伍，在雷高升的指挥下，组织纪律性比较好，作战也很勇敢顽强。

戴家业武装队伍参加攻打平阳县城战斗

1930年5月23日夜，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戴家业队伍所在的红一团和瑞安北区、南区赤卫队共1600多人冒雨渡飞云江向平阳进发，到达平阳已是24日上午7点多多了，江南、万全等地农民赤卫队600多人配合红一团攻入平阳县城。守城敌人慌乱一团，国民党平阳县县长叶燕荪越墙逃跑，红军战士很快占领县政府，夺了县政府大印，并打开监狱释放了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及部分群众。但是攻打北部城隍庙国民党驻军的战斗，因领路人不熟悉路道，认错了路，把五显庙误认为城隍庙贻误了战机。敌人有了喘息的时间，筑起工事占领城内制高点，向红军猛扑，红军和赤卫队和敌人浴血奋战到下午3点时，腹空弹尽，伤亡惨重。为了减少伤亡，军长下令撤出战斗，但有一部分队伍因接不到命令而及时撤出。3时后城门关闭，敌人搜捕红军，192名红军指战员被杀害，血洒平阳城。

参加悲壮的东章战斗，6人壮烈牺牲

1930年6月1日，红十三军第一团港头片部队，从苍坡、港头、溪口等地调集红军战士200来人，在李世勋及金仲光、戴家业、李楠的带领下，分

别秘密向东港（今花坦）进发，准备夜袭廊下警察所。各部队先在花坦会合。据侦察员报告，廊下警察所早有察觉，已有布防，并且武器精良，一时恐怕难以取胜。于是李世勋与干部们商量，决定放弃攻打廊下警察所的计划，确定新的战斗目标，改道去外港（古庙港）东章村，抓捕国民党永嘉县参议员朱远云（乳名朱岩云）。朱远云是楠溪有名的大财主，拥有良田上千亩和多处山场林木，温州城内还有几十间商铺，每年收租稻谷上千担。朱远云为人刻薄，诡诈奸刁，高利盘剥，巧取豪夺，激起广大佃农的公愤，但碍于形势，佃农们只是敢怒不敢言。自从担任国民党永嘉县参议员以后，他变本加厉，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欺压百姓。

东章村，位于楠溪江支流古庙溪上游，有 300 多户人家，村舍大部分依山傍水。村北高山绵亘，与花坦东升、繁荣两村接壤；村南层峦叠翠，山坡陡险；村东面峡谷幽幽，黄泥圳、乌龙川村是通往乐清县四都、虹桥等地必经之路；村西山口顺溪渐开，一马平川，直达古庙口埠。

红军当夜宿营花坦，第二天黎明前翻越花坦门前山（又名繁荣），直逼东章村。红军一到东章村，与内应的外港（古庙港）游击队，立刻包围朱远云的巢穴。朱远云闻讯狼狈翻越遁逃，逃到后屋好友朱景楷家暂时躲藏。结果是朱远云妻用缓兵之计，朱远云的心腹朱庆昌，朱远东（又名远东姆）二人，带着驻在枫林镇的国民党清池部队省防军第一连配合廊下团练计 300 余人，联手“进剿”驻东章的红军十三军李世勋，金仲光部。金仲光部与敌军展开英勇激烈的战斗，但由于对地形不熟悉，闯到了死角地带——中路黄崖头下峡谷，红军战士完全陷入绝境。红军战士临危不惧，英勇还击，全力寻找突围路线，大部分红军战士在激战中利用树木林丛遮掩，从美丽崖宕头下之间的夹缝中冲了出去，向陡门潘洋方向撤退。在这场战斗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武器装备相差太远，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红军指挥员李世勋等 56 名红军战士在这场恶战中壮烈牺牲，部队损失惨重。溪口戴家业武装队伍中戴卡德、李东山姆、戴瑞福、金家群、戴显还、戴金銮等 6 人壮烈牺牲。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东章大地。

溪口武装队伍参加攻打缙云战斗

为扩大革命声势发展武装斗争，军部研究决定：红一团向西攻打缙云县城。为迷惑国民党守军，红军扬言再攻处州，缙云守军毫无戒备。

1930年8月31日，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陈文杰，红一团团长雷高升率部抵达缙云县城铁索桥南桥头时，发现桥北已被国民党消防军一个连占领，敌人用机枪封锁桥面。原来缙云县城确实没有驻军，国民党省防军获知浙南红军要打处州（丽水）城，连忙将原驻在壶镇的机枪连调往丽水守城，机枪连经过缙云，得息红军要攻缙云县城，即赶紧守住铁索桥北桥头。面对意外情况，陈文杰、雷高升指挥红军卧倒，向桥北敌人射击，一面挑选20多名枪法好的红军战士组成敢死队匍匐桥面滚爬前进。打死敌人机枪手后，红军队伍猛冲过去，拿下敌人据点。敌人丢下武器和尸体，仓皇往北逃窜。红军冲入国民党县政府，县长郑禧和大小官员已混入溃兵中逃往永康。县府大门插上红十三军军旗，夺了县府大印，烧了县署文契，打开县狱，释放了共产党员、红军、农会干部和群众200余名。此时，得悉国民党调集浙保三团来缙云“围剿”红军，陈文杰、雷高升研究决定放弃打永康计划，于第三天中午率部撤离缙云县城，当敌军从四面八方缙云袭来时，红军部队已远走高飞了。缙云大捷，是红十三军成立以来最漂亮的一战，击毙伤敌人多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50余支，木壳枪20多支，子弹九担及其他物资。9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道了“浙南红军占领缙云”的消息。

1931年5月，雷高升、王国桢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雷高升、王国桢回到浙南，重组武装。10月16日，王国桢在瑞安城区飞云江渡口被捕，12月10日在温州英勇就义。雷高升回到浙南后，会合五尺的胡协和、胡黄金，港头的周启佑，溪口的戴家业，石染的章华，与黄岩的戴元谱，永康的楼其团取得联系，集中红军干部、战士100多人到仙居龙潭头，与金永洪游击队会合，发动群众，构筑工事，建立武装根据地，多次击退省保安队和民团的“进剿”，控制了永、仙、黄、缙、青、康等县边境地区，游击活动区域不断扩大。

岩头东宗事件，戴家业牺牲

1932年1月，国民党“温台剿匪指挥部”成立，国民党一三五旅旅长李杰三任指挥官，敌军2000多人将雷高升的红一团余部困在人烟稀少且极度贫穷的少横坑。在“进剿”难胜的情况下，国民党采取“剿抗兼施”的办法，特意密令浙保四团朱炳熙团长诱捕雷高升部。两次诱捕不成，第三次双方发生激烈战斗。后来敌军利用周子庠与雷高升师生关系进山劝降，并紧缩包围圈，使雷高升部生活陷于绝境。在此情况下，敌军以许诺在岩头供职，维持地方治安，按例发饷，保持单独编制为诱饵，致使雷高升丧失警惕而上钩。雷高升打算东山再起，故暂且同意下山。5月22日，雷高升带部队70多人到岩头听候“收编”。当天晚上，戴中飞从温州赶来报告雷高升，说老百姓听到消息，省防军透出明天要抓雷高升。但雷不相信，失去警惕，致使大难临头。5月23日上午，雷高升的部队在岩头东宗接受收编，新参加的红军，在岩头小学拍照留念放饷银遣散回家；老红军留在东宗，武器集中放在墙边，收编后发给新的。雷高升等14人放下武器，换上新装到里面五分祠堂听训话，但戴元谱不肯放枪，大声说“人不离枪，枪不离人”。当雷进去时，即被捆绑，戴元谱拔枪即被杀害。当场被枪杀的有戴家业、章华、章茂宏、戴元谱、胡黄金、戴祥银、周启佑、陈云岐（即仙居老七）、汤克忠等9人，雷高升等6人被擒，章平西、戴忠飞等逃脱，逃乱中，周寿宝、章金发、陈时淦、等12人被机枪扫射牺牲，雷高升等7人押至温州，雷高升于6月25日在资福山就义。

重整红军，戴忠飞等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岩头“东宗事件”后，溪口、张溪、岭头一带戴忠飞、李寿庆、钱瑞熬、陈妙德、郑九完等仍坚持在永嘉、仙居、黄岩三县边境开展武装斗争。

蒙难脱险的卓平西、戴忠飞继续组织武装斗争。当时，浙南人民编了一首歌谣：“打死家业有中飞，打死黄金（指五尺胡黄金）有草鸡，打死高升有平西，……”，意思是说，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1932年7月初，胡公冕

带领徐挽澜、徐象连、朱柱、滕时顺等，在岩头镇西岸村长垅山金信科家中召开各路红军负责人会议，拟在岩头、温州搞兵运，重整红军。汪瑞烈代表岩坦港红军参加核心会议。会后，戴忠飞、郑九完等人立即组织了人马。但由于多种原因，岩头、温州两次兵运都未成功。胡公冕离开楠溪时，嘱咐汪瑞烈以黄南乡黄山村为中心，建立永、仙、黄根据地，坚持斗争。

温州兵运失败以后，国民党当局在红军根据地各乡都建立团练，搜捕红军。1932年10月，汪瑞烈在岩坦镇东岙村的东岙殿召开紧急会议，传达胡公冕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以黄山为中心的永、仙、黄边区，经过四年的武装斗争，群众基础好，山高林密，采取分散隐蔽，完全可以进行反“围剿”。同时决定，还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一师第一纵队的番号，下设大队、中队、小队，汪瑞烈为纵队长，戴忠飞为副纵队长。大部分人员散隐蔽，留陈妙得、钱瑞熬等20多人在永、仙、黄边区开展武装斗争。并积极与五尺港等处红军秘密联络，相互呼应。

勇斗民团，为民除害

“东宗事件”后，戴忠飞兄弟三人等红军余部分散隐蔽在岩坦、溪口、五尺、表山、潘坑等山村，开展斗争，等待时机，狠狠打击当地民团和永嘉县自卫团。

小舟垌战斗。1933年清明节前夕，永嘉县自卫团头目陈华奉命到溪口“围剿”红军游击队。戴忠飞等人早一天获悉情报。早上，戴忠飞等骨干红军战士10多人，集中埋伏在小舟垌村的一片麦垌里，另有10来名战士分散埋伏，见机行事。是日上午八时许，自卫团先遣队路经小舟垌，戴忠飞命令开枪射击，先遣队四散逃窜，狼狈不堪。后陈华的骨干队伍赶到，集中兵力向红军还击。为减少伤亡，戴忠飞命令大家从速分散撤退。当追兵逼近时，戴忠飞发现自己的枪已没有子弹了，几个团兵围拢过来抓他，忠飞力气大又懂武术，拼力挣脱。之后，他转移到双尖官的山湾里，再择路转移到了潘坑，隐蔽数日后，返回溪口。

1932年冬到1933年冬，国民党在红军根据地内拉拢流氓地痞，建立团练。由于红军领导人措施有力，大部分团练纷纷瓦解或按兵不动，仅有两支队伍与红军为敌：一支是碧莲区应坑乡陈华“九乡团”，他们在碧莲区杀害红军不下200人；另一支是戴福权直接控制的溪口民团，团总戴象帅及其下属屿北、五尺水西团练，对永、仙、黄边区威胁很大。这两个民团人数多，武器好，杀人不眨眼。

1933年冬，汪瑞烈在屿北焦坑底娘娘宫召开红军中队长以上的骨干会议，研究如何坚持永、仙、黄边区根据地的斗争，研究如何镇压戴象帅、郑吕富、汪宣丰等3个团总。大家的意见，先除两个小的，再除大的。会后，汪瑞烈亲赴五尺，与五尺红军负责人的胡衍真、胡进盛、胡象浪等人联系，采取统一行动。

镇压郑吕富。1934年2月27日（农历正月十四日），五尺乡水东村演社戏。五尺红军趁机严密部署，由戴忠飞带领30多人先埋伏在五尺地方，当戏将要上演时，这30多人装成五尺群众到水东看戏，并控制宗祠门口。由周定鹤、周碎虎等6人进宗祠隔壁的赌场，靠近郑吕富身边，当时，郑吕富做庄推牌九，正抬头边推边叫“天”，周定鹤举起木壳枪，对准他的后脑“砰”一声，郑吕富即倒地毙命。镇压了郑吕富后，接着，红军在屿北风打亭杀死汪宣丰，并缴获手枪一支。

郑吕富、汪宣丰被红军镇压以后，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国民党政府调一个连的兵力驻扎岩坦闪坑地方。这时，汪瑞烈、汪吉仁等领导人先后北上，隐蔽外地，总负责交给戴忠飞、郑九完（原溪口乡分水村人）。

镇压戴象帅。1935年5月，汪瑞烈在建德县被国民党军逮捕释放回家后，为配合红军入浙，便去黄岩板寮找郑九完商量，计划镇压戴象帅等团总，刹刹国民党的威风。

1935年秋的一天，汪瑞烈得悉国民党溪口民团团总戴象帅去温州开会的情报，就立即部署行动计划。戴忠飞派几个人赴温探听戴象帅返回出船时间，另派几个人在沙头埠头暗探戴象帅上岸后有几人的护送。汪瑞烈和郑九完各带一批武装人员分别潜入下曰川，后雇一只蚱蜢船，停在龙河渡滩头，武装人

员隐蔽在船上。情报得知戴象帅从烘头直奔岩头转溪口或从龙河过渡经枫林再转溪口，在龙河渡都可对其下手。沙头的情报传到，说戴象帅坐轿，只有两名警卫人员，各带一支木壳枪。据此，安排郑九完、滕友呈两人先埋伏在龙河渡船屋中，当戴象帅下轿上船的当儿，郑、滕二人迅速逼近埠头，将戴象帅打死在船边。戴的警卫人员立即跳下水，此时，郑高喊：“缴枪不杀”。戴的警卫将枪丢在岩上，频频叩头求饶。郑等人把戴象帅尸体翻个身，从他身上搜出一支手枪。

戴象帅被镇压，对溪口民团是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永嘉县党部书记戴福权大为震惊，并认为溪口这一咽喉之地不可丢，便选择戴象帅的大儿子戴奉献接任父职为溪口民团团总。1936年春，戴奉献张贴告示，悬赏120银元缉拿戴忠飞。1936年8月，戴忠飞隐蔽在岩坦大岭头，被戴奉献的亲信抓住，当下被枪杀。

镇压戴奉献。1936年的春天，戴奉献率领团丁30多人，深夜到黄岩板寮打死郑九完的儿子，郑九完冲出包围，脱离危险。事件发生后，汪瑞烈等红军战士便研究镇压戴奉献的问题。大家认为要做好溪口当地群众工作，待机下手，铲除戴奉献。1937年的春天，溪口地方演戏，戴奉献带着警卫人员戴盛纳及戴献妹去看戏，当戏演到正本时，红军郑九完等冲进戏场打死戴奉献，打伤戴盛纳，戴献妹脱逃，收缴团丁的武器。并没收戴奉献的财产，全部分给贫苦群众。接着，派武装人员追捕戴献妹，至江北岸（现瓯北镇），将戴献妹击毙。

保卫瓯北县委

1943年8月，瓯北县委机关从五尺的南岙地方移驻岩坦的屿北村，住在汪瑞锐的家中，胡景斌同志确定由汪瑞烈保卫县委机关。汪瑞烈根据自己坚持斗争的经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将他原有的组织关系，组织一个保卫县委机关的情报网，重要网点是岩坦、溪口、黄南、潘坑、张溪及黄岩的连岭、仙居的上涨等乡镇。溪口等地群众基础好，保卫人员工作得力。因为情报工作做得好，所以使瓯北县委在以屿北为中心的永、仙、黄、边区

渡过十分艰难的险境。

溪口交通站

溪口村早在 1930-1932 年的红十三军时期，就设立了交通站，隶属于红十三军，负责人：戴家业、戴中飞。并且溪口村戴家兜在潘坑村设立交通站，负责人：戴家兜、谢岩送、杨国光。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括苍中心县委及中共楠溪区委和中共楠溪中心区委，因斗争需要在永嘉瓯北地区设立众多的交通站，岩坦港、张溪港就有杏岙、西山、溪口、源头、蛙蟆垄、吴山头、龙潭背、闪坑、黄南、深龙、大学、南正、桧染等，它们都为括苍地区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的交通站（全县 100 多个）。1945-1949 年，溪口交通站设在戴春景母家，交通站负责人戴家巧。

在漫长的斗争中，交通站和交通员担负起各级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的秘密通信联系，收集与传递情报，传递文件、命令、指示和革命刊物，掩护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和护送干部进出游击区，掩护和救治伤病员，转运和保存武装弹药以及其他物资等任务。这是一条无形的战线，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

捣毁溪口、岩坦两个碉堡

1945 年 3 月，中共屿北中心区委以屿北和罗家寮等地的民兵为基本骨干，共计约 150 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此举威震永嘉东北部。而驻扎在枫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此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先后组织了五次大规模清剿，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其中的第五次竟调集 6000 余兵力，妄图将我军杀尽灭绝。由于我军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战术，使敌人既找不到主力，又得不到半点“赢门”。

然而，反动派并不罢休。他们为了消灭岩坦、屿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于 1947 年上半年就在溪口、岩坦、屿北三地建造了三个碉堡。每个碉堡都靠近祠堂，可驻几个连的兵力，实施全面封锁的“剿共”活动。他们对凡去屿北、黄南等的行人都一一进行盘问和搜查。这也激起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愤怒和强烈反抗。对此，时任屿北中心区委负责人的胡国洲同志经调查研究和周详考虑，于1947年农历8月15日（中秋节）傍晚，带领县武工队队长郑康平等十几个人来到蛙蟆垅村（现属岩坦镇）召开会议，并布置新任务。参加会议的有党员、民兵和进步青年，共计30多人。会上胡国洲同志说：“溪口、岩坦、屿北三座碉堡是我们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拦路虎’，它不仅切断温州、瓯北的信息，而且我军的生活必需品及药品也无法运进。如果碉堡不铲除，我军就无法开展活动。群众也无法生活。”胡国洲同志紧接着又说：“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按排计划‘清剿’我们，我们仅能反‘清剿’，只能争取战斗中的主动权。现在不同，由我们按排计划打他们了。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捣溪口、岩坦两个碉堡，给敌人一个下马威！”最后，国洲同志叫戴德木和胡顺雷先到溪口通知戴家巧和戴春景两个党员带工具上山。

第一个碉堡在溪口村门前山的山背上。该碉堡高约5—6米，内有木架支撑，四面用黄泥拌石子夯压成墙。墙底脚宽约2米多，顶部宽约1米多。碉堡共分三层，一、二层设置射击眼，第三层为瞭望台。当时堡内虽无敌军，但为了防止突发事故，由武工队队员分兵两路放哨，不让任何人进出。并由蛙蟆垅村党员、民兵、青年配合溪口村的党员戴家巧和戴春景用锄头狠狠地捣。但因墙体结构十分坚固，花了半小时仅捣下一尺左右。经过研究，决定由溪口村的同志去借榨粉干用的硬木棍子十几条，将硬木棍的一头插入射击眼中，用力撬墙。直到半夜12时，才彻底捣毁第一个碉堡。

第二个碉堡建在岩坦村前面的太坪坦，其结构大小与第一个相似，唯墙体不同，是用石头砌的，一般工具用不上，只能徒手去拆。即先拆掉椽瓦，继拆木架，再拆石头墙。在拆到二层时，突然一墙倒塌，一个民兵被压在石头下面。还有几个民兵手攀在椽头上，脚下已踏空。历经奋力抢救，才转危为安。接着继续奋战一阵，当碉堡全部拆光时，已是早晨鸡叫五更。

两个碉堡终于给捣毁了，当地群众拍手称快，并传言说捣碉堡那夜，游击队可能有几千人。反动派听见风声，就不敢在溪口、岩坦、屿北胆大妄为地作威作福了。从此，大长了我军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医务组曾驻溪口村铁炉基大湾

1948年秋，括苍支队主动频繁出击作战，伤病员多，中共括苍中心县委决定重新建立2个医务组，一个在永嘉境内流动，另一个在永乐边境流动。因战斗的需要，医务组经常搬迁，驻过岩坦白岩前，蛙蟆垄，陈山，茶园坑，铁炉基大湾（现岩坦镇溪一村西约2公里），乌鸾孔，鹤盛谷庄的蛙蟆窟，甸岭下的下弯山和岭头等处。溪口铁炉基（也叫铁犁基）在潘坑港的溪口至南岸的正中间的溪边，大湾乃铁炉基的东首一条山湾，山湾两边山势险峻，森林茂密，是驻设医务组的好去处。溪口村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群众支持革命，信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说大湾离溪口岩坦很近，但无人告密，这里是十分安全的，医务组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很安全的时期。

溪口村的党组织

1946年4月，中共乐清中心县委成立，领导永嘉、乐清（含玉环）等地党的工作。中心县委确定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在隐蔽斗争中积极发展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等。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永嘉（瓯北）党的工作把党支部工作放在首位，认真整顿和恢复被破坏地区党的组织，同时做好新地区的党的发展工作。到1947年8月底，永嘉（瓯北）共有支部89个，党员753人。到1948年2月，永嘉（瓯北）境内有党支部172个，党员1525人。到1948年12月，中共楠溪中心区委党员统计数为2226人。

溪口村的党组织就在这个时候建立。1947年，戴家球在溪口村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首任书记戴春景（1947.5—1947.10）。第二任书记戴碎表（1947.11—1948.8），第三任书记李阿光（1948.9—）。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溪口人民在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反动武装和地主劣绅展开激烈斗争，最终获得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

溪口区政府的成立

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和解放浙南全境，1949年4月14日，浙南地委决定建立中共双溪县委，5月，永嘉县委、各区人民政府正式建立，胡国洲任县委书记兼县长。中共双溪县委下辖溪口、枫林、鹤盛、罗浮、碧莲、永临等6个区委，溪口区委书记戴洪法，并兼任区委。溪口区委、区公所设在大地主李中豪屋院内（现岩坦镇溪二村李永务屋院内）。

双溪县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永嘉人民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农民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取代了国民党的乡保组织，行使人民政权的职能。

溪口村，永嘉县民政局认定的烈士有12人，其中二战时期红军十三军战士为11人，他们分别是：1930年4月东章战斗中牺牲的戴卡德、李东山姆、戴瑞福、金家祥、戴显还、戴金銮等6人；1930年6月东宗事件中牺牲的戴家业；1930年在青田平桥口战斗中牺牲的戴金銮；1934年2月在潘坑周山战斗中牺牲的戴家兜；1936年8月在南京陆军监狱牺牲的戴老伍；1936年8月在岩坦叶坑牺牲的戴中飞。1950年3月在大岙牺牲的戴显麻（生前系浙江警备旅三团七连战士）。我们永远缅怀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而献出宝贵的生命伟大精神！

一个小山村的革命历程

——记永嘉张溪陈周村

李志德

陈周，原名陈庄，现属永嘉岩坦镇，民国时期隶属于杏岙乡第四保，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出了贡献，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戴珊来到陈庄村活动，组织红军。

戴珊，原名戴龙山，永嘉县岩坦村人，号称老鼠山，年轻时曾在在溪口乡南岸村殿边攀一株 20 余米高且挺直的松树而得名。1929 年间，他在岩坦村组织土著农民武装，进行打富济富。经常和小长坑的李寿庆隐蔽在三面山金家宽家开展活动。戴珊在张溪上岙村建立基地，与石阵潘熙堂、小长坑李寿庆、林坑钱瑞鳌、南正陈妙德等结交为朋友，活动在张溪的小长坑、陈庄、张溪、林坑、石阵、深固坑等地。1930 年 3 月，胡公冕在岩坦、溪口两乡之间的“双尖宫”召开会议，组建子枪大队和火枪大队（人员 300 多，枪 200 支），戴珊前往参加。3 月 9 日，西楠溪的红军游击队，集中在永、仙、缙交界的黄皮寺整编，戴珊部编入红军总指挥部第二支队胡协和属下三军第一团（后提师）第二支队，戴珊任中队长，陈庄村的 5 位战士亦成为红十三军戴珊部队的战士。从此陈周村开始在永嘉山区有着革命的声誉。

1945 年 3 月中旬，根据浙南特委委员孙经邃在乐清泽基村召集乐清、瓯北两县党的负责人及浙东区党委指派的负责军事工作的余龙贵，共同商定将乐清、瓯北两县的抗日武装队伍合编建立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的意见，鹤盛的“金荣（谢用佐化名）部队”和张溪 10 多名武装民兵集中在原张溪乡陈庄村下祠堂整编。陈庄整编属于胡景斌领导的中共瓯北县委的一件大事。胡担任瓯北县委书记期间，创立了永嘉四支中队，即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 9 中、第 11 中、第 13 中、第 14 中。其中，第 11 中队在张溪陈庄成立。成立后，1945 年 7 月，第 11 中队并入第 1 中队；9 月，第 11 中队又重新从“1 中”分出，改称第 7 中队。

陈庄整编，时间约一个星期，在陈庄下祠堂进行。目的将鹤盛谢用佐率领的抗日武装队伍（即金荣部队）四五十人与张溪的民兵武装十多人合编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 11 中队。整编的这几天，陈庄热闹非凡，党的领导人胡景斌、余龙贵和张溪地区党的领导陈顺德、陈德妹、陈瑞恩及黄山陈周凤部都集中陈庄，他们在贤岭头设立岗哨，确保建军的安全。整编结果：两支队伍合编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 11 中队，中队长谢用佐，政治指导员关榕，副中队长陈德妹，文化教员潘统轩，司务长谢岩寿。下设 1 个分队，分队长谢周吉。

当月，第 11 中队鹤盛的部队四五十战士在中队长谢用佐带领下又一次来到陈庄，驻扎在陈庄的新屋（原周定宗老屋，解放后被火烧毁）里。翌日，陈庄陈官山、陈方周（当即给 1 支步枪）、周启钦（当炊事员）、陈明国四人向谢用佐申请参加其部队，谢用佐当即答复同意。当夜，部队陈庄出发到西坑德岙，因胡景斌自乐清回来，部队接胡景斌回永嘉。出发时，部队分别发给陈官山 1 支俄快、陈方周 1 支步枪、陈明国 1 支步枪、周启钦因炊事员未发枪。

陈庄的这 4 位永乐总队的第 11 中战士，参加了屿北宫和青草尖的战斗。

屿北宫战斗，谢用佐带领战士守候在闪坑后山，敌军在风打亭的降上向 11 中队开火。开始，11 中未有还击，9 中从三面山开下一个排炮，冲锋号吹响，11 中发起冲锋，于是敌军逃跑。这时，陈官山和汪祥壁两人直冲到屿北宫，因屿北殿山上的敌军未退，重机枪扫出，祥壁和官山见状立即跳进坑沟里，沿坑边撤离到焦坑底。

青草尖战斗十分激烈，时间 1945 年 5 月 1 日上午。胡景斌率领第 9 中部队和第 11 中队的部份战士，与国民党 33 师、21 师战斗。这次战斗，陈庄的陈官山埋伏在罗塘降，炊事员周启钦留在高余茅屋里帮助做午饭。上午九时，当 21 师、33 师由大脑头进入罗塘降，包围青草尖开枪向我罗塘降的部队扫射时，在青草尖放哨的 11 中战士陈明国被敌包围，战斗约一个小时才冲出了重围。总队长余龙贵和张溪陈宝双两人被敌军包围，因距离近，敌军来不及开枪。结果，陈孔岩发现，独身冲了进去，将敌击退，余龙贵和陈宝双二人突出重围。

9月，陈官山在黄岩溪精减回家，周启钦在仙居昔下战斗之后精减回家，陈明国在黄山精减回家。尔后，陈官山重回11中队随张溪的队伍行动，参加了鲤溪叶坑的歼匪战斗。另外，陈庄陈清金，永乐总队第9中战士，1945年12月精减回家，1947年括苍区队成立重回部队，至1954年退伍回乡。

1946年6月，屿北区委委员万文达（因当时武工队再次精减，转入到地方帮助做党的支部恢复和发展工作），在陈瑞恩陪同下来到陈庄村陈官山家中，介绍陈官山、周银妹、周清金、陈连福4人加入共产党，建立了陈庄村党小组，组长陈官山。1947年7月，因陈官山去枫林自新，戴洪发和金贤新二人来陈庄陈官山家介绍陈海国、陈茂岸、陈秋东入党，重新介绍陈官山入党，改组陈庄村党支部，陈海国担任支部书记。11月，戴洪发、金贤新在陈官山家介绍陈官山妻子戴秀英入党。1948年2月，周洪文、李顺英、周兰花、陈时猴等4人由陈官山、金贤新介绍入党；8月，陈茂州由陈官山介绍入党，1949年初，周那孙、周纯乐入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陈庄村入党的党员共15人。其中，陈连福于1949年入赘鲍江脱党，周那孙于1950年脱党，周兰花于解放后脱党，陈秋东部队退伍党籍未转脱党。

1948年7月，为了开展“秋收斗争”工作，巩固和发展农民联合会，张溪和鲤溪两地集中了鲤溪地区的鲤溪、深固、上泛、山背、垟头、杏岙、福佑、抱岙、施家岙和张溪地区的张溪、下潘、金竹溪、桧染、上岙、小长坑等村干部，在陈庄村上祠堂举办干部培训班。

培训班由张溪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陈瑞恩和福佑的鲍余利主持，每村2人参加，计有陈孔岩、陈宝双、陈官山、周银妹、陈明道、李堂敏、陈银表、陈友余、潘传寿等计30多人。培训班的后勤生活由陈庄村陈茂州、陈茂岸等党员负责。

这次培训班培训时间半个月，主要内容是传达浙南特委《关于开展秋收斗争的指示》，学习《农联会章程问答》，部署开展农村的阶级分析，研究土地丈量、禁烟、救济等事宜。

1948年8月，陈庄村农民联合会在下峰降成立，主任陈官山，会员陈茂州、周洪文、周银妹、陈官山、陈海国、周纯乐、周那孙等8人，会费每人交钞票2角，作于买纸笔之用。

成立农会，当时已成为农民的迫切愿望。因群众得到充分发动，减租减息斗争开展得积极而热烈，张溪的地主收租处处遭到反对。

陈庄村农会成立后，农会主任参加乡里召开的农会会议回来，贯彻乡里召开的减租减息会议精神时，党员、群众非常拥护，村民陈启达讲：“减租减息如真能减下去，我把我家的一只老母鸡宰杀给你们吃”。一日，张溪村地主张贞进来陈庄收租，被村民们抵制，村农会并向他宣传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张贞进听后，虽十分恼火，嘴上却说减租象摔跤，今天你赢，明天我赢，现在还未定局，然在实质性行动上地主收租已毫无办法，这一年地主未向陈庄的农民收取一粒租谷。就这样，减租减息实行以后，陈庄村农民除按规定不能参加农会的外，大部份农民都加入农会，会费每人交谷 10 斤。土改时，不再有人入农会，陈官山任命福佑乡乡长，村农会主任由周银姝接替，陈启达为副主任。

陈庄，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老区村，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 11 中队成立的地方，成立旧址尚在，非常值得我们纪念。

新四军军歌仍在回荡

南孔球

我成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员后，新四军驻地皖南为我所向往，那里是新四军将士洒过热血的土地，英雄事迹可歌可泣。一个金秋丹桂飘香的日子，我终于来到了皖南，圆了这个愿望。

我们驱车六七个小时到达皖南，皖南属丘陵地区，山青水秀，沿途青砖黑瓦的农家小院的徽派建筑时时映入眼帘，风格独异，令人击节点赞。到达泾县，我们立即奔向泾川镇水西山麓桃花台上的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仰望山顶高高的烈士纪念塔，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由纪念塔、主题广场、主碑纪念广场和无名烈士墓及皖南事变陈列馆组合而成。整个陵园以纪念碑为中心，结合山势，将各纪念建筑组合成一个完整有序、庄严肃穆的有机整体。皖南事变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主题广场是占地约 1000 平米的圆状形，背对纪念碑，纪念碑高大宏伟，高约 30 米，宽约 50 米，以大理石嵌镶似幕墙，上有邓小平的题词：“皖南事变死难烈士永垂不朽”，12 个大字熠熠生辉，耀人眼目。纪念碑后有室内无名烈士墓，呈 3 米圆形，中筑长 3 米，宽 1.8 米，高 20 厘米的汉白玉石盖，开有天窗，承天接地，烈士的浩气如日月长存，彪炳千秋。纪念碑后依山建有碑廊，铭刻新四军将领和国家领导人书写的诗文。叶挺手迹，有浩然正气，殉道精神；战友恩思，见老骥壮志，云水情怀；领袖题词，则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广场另一侧，有周恩来书写的大型刻碑：千古寄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主题广场和皖南事变陈列馆之间塑有新四军领导人叶挺等四人的群像，峨然挺立，目光炯炯，凸显为中华民族抗御外侮的凌云壮志。

迈上 300 多石级，登上山顶，似长剑烈士纪念塔高耸云天，庄严静穆，添加山的高度，塔为峰。碑正面是毛泽东的题写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另面是周恩来题写的“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基座有“抗敌”的字样。山顶开阔地依次排列着一座座烈士墓，他们长眠在此，却永这活在我们心里。

我们来到新四军军部旧址—云岭。云岭东接泾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风景秀丽。抗日战争有“北有太行硝烟，南有云岭烽火”之誉。新四军军长叶挺有诗赞曰：“去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7月陈毅元帅敬题“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馆名。从此，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正式建立。至今，新四军军部旧址是全国新四军纪念地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革命旧址群之一。

军部司令部是一座大夫弟的老屋，系一户地主的宅院，总面积2000平方米，军部暂借727平方米，驻过参谋处、秘书处、机要室，厅堂里挂着作战地图，简朴的会议上摆着当年的茶壶、茶杯，见证了当年岁月生活之艰难。大夫弟住过张云逸、李一氓、罗炳辉等将领及音乐家任光，宿舍简朴狭窄又清清爽爽，只有桌凳、木床、蚊帐。军部大会堂是陈姓祠堂，周恩来在此作过报告，内有周恩来的塑像，仿佛他的宏亮清越的声音仍在回响着。大会堂前草地上竖立着项英的雕像，此外还有修械所、政治部、教导队、战地服务团，中共中央东南局、烈士墓、叶挺桥等十处遗迹，并新增了《云岭碑园》、叶挺铜像广场、辅助陈列、专题展览等设施。馆内现存各种珍贵图片、文物、资料达4000余件。结合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以不同的形式再现当年新四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以及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悲壮一页。

走在皖南的热土上，新四军军歌仿佛在这里回荡着。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云岭，起伏碧绿的山峦环绕着的小盆地，天空湛蓝高远，大地稻禾金黄。往日的革命圣地，今日游人如织。我倘佯在云岭街巷、院落、广场、田埂、树下，追寻探问，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那新四军军歌雄壮高亢的旋律不禁脱口而出。

执着坚韧，顽强刚毅，胸怀远大，勇往直前的铁军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军歌千秋咏唱、万古流传。

虎口逃生记

梅 明

胡学民老人，原是温州市运输公司搬运工退休。解放前，他家住永嘉城区（今鹿城）西郭月湖头，祖辈在江北岸（今瓯北）种田，后移居城区谋生。提起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讲我有满肚子苦水要倒，真是仇深如海。还是说说那次从日军虎口逃生的经过吧。

温州第二次沦陷时（1942年7月），我才十四五岁，还算不上小后生吧，那时，我一边跟有名的阿寿拳师学艺习武，一边在太史码道当搬运工（苦力）。

记得大概是农历六月十五日的清晨，我们按照货主的吩咐，将新收购的茶叶运到城外西部山区藤桥埭头村的一座寺庙里储藏，因为日本兵占领了温州城区，放在码头不安全。要我们把货物装进舢舨船沿瓯江西上，直达戍浦江，一路上顺风顺水，原以为已脱离了沦陷区，平安无事了。

诘料，正当我们准备将茶叶搬进寺庙内，只见寺庙的大门紧闭，我们敲了好大一会的门，也无人答应，正欲往回走。突然间，一队戴着钢盔的日本兵气势汹汹赶过来，叽哩哇啦，端着枪把我们赶到一边，查看货物见是茶叶喜出形外。然后连人带货一起押回日本兵的营房。那一次是日本兵搞突然袭击，跑到藤桥乡下抢掠物资，并抓走我们青壮年当挑夫，将所抢的东西运到金华去。

这次，我们被抓的挑夫共30来人，每人挑150来斤的担子，由10来个日本兵荷枪实弹一路押送。第一天从温州城里出发，沿着古驿道向青田方向行进，一路上日本兵看得很紧，还一边叫喊着“快走，快走”，像赶牲口似的。一天下来，我们才走到青田县城附近，当天快黑时，日本兵命令我们歇担休息，准备在这里宿夜。这时，有一位叫“三洪”的挑夫悄悄说，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找个机会溜走，否则，就会活活累死的……可没过多久，日本兵吹起哨子，

说有人逃跑，持枪去追。可怜那个“三洪”，还是没有逃出魔鬼的手掌，他被击伤后，拖回宿营地，一个日本军曹（下级军官），手举明晃晃指挥刀“嗖嗖”二下，便砍下“三洪”的左右两臂，接着，又砍掉他的双腿，这就成了温州人所说的“冬瓜播”，鬼子见他未死，又丧心病狂地将他按倒在一个大石块上，然后搬来一块石板，放在他的脑袋上，一个日本兵站在上面，反复旋转或左右摇摆，将其活活折磨致死！

我们忍着悲痛，含着泪水默默地继续西上。大家心里明白：日本兵如此凶残，分明是要杀鸡敬猴的伎俩。见此悲惨的场景，尽管个个怒火填膺，恨不得要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日寇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而我们却手无寸铁，如硬拼岂不是以卵击石，白白送死吗？于是，大家强忍悲痛，无可奈何地打消了拼死的念头。翌日，天刚亮，我们又默默地挑着沉重担子上路了。

那时，正是烈日炎炎似火烧的“六月天”，大家冒着酷暑，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啃干粮。在鬼子的刺刀与皮鞭的威逼下，逢山过山、逢水涉水，沿着青、丽的茶盐古道，一步步挪动着灌铅似的双腿，气喘吁吁，汗流浹背地行进在起伏连绵的野山荒岭。沿途还看见路边尸骨横陈，这无疑也是日军暴行的罪证。

走着、走着，个个已是筋疲力尽，但仍然咬着牙关、苦撑着。当挑担过丽水县一个叫“桃花岭”的地方时，有一位难友（名字已忘了），原是小商贩出身，平时很少干过重活，也没出过远门，他的体力远不如我，只见他走着走着，“啊”地一声，突然倒地不起。我急忙放下担子去扶他时，只听他喃喃而言：“小老弟，我家住在信河街的飞鹏巷口，看来我是回不了家了，拜托你给我家报个信，说我是被鬼子害死的……”这时，来了两个日本兵，见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说他偷懒装死，便端起刺刀往他的腹部猛刺一刀，这小贩出身的挑夫，就这样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

可恶的鬼子又把死者挑的货物，分给其他挑夫来担，就又加重了我们的负担。这下，我心里彻底醒悟了，落到鬼子的虎口，早晚都是死，与其累死不如冒险逃跑，倘若逃跑成功，或许还能捡回一条命。主意一定，我就凭着自己年轻、机灵，平时装着很听话，处处讨好鬼子，使他们思想麻痹，放松看管。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长途跋涉，鬼子见快到日军大本营了，也就渐渐地放

松了看管，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在荒野处我假装肚疼，要解大便，有一个鬼子兵跟着我，站在旁边看着。我见他稍不留意，就凭着自己平时练过拳脚功夫，一下子将他击晕，也不管他到底是死是活，就钻进茂密的树林里，一个劲地拼命逃跑。

接着，后面传来鬼子的枪声，我不顾一切地只管往深山密林里钻、跑，终于逃出了鬼子的虎口。此后，夜睡破庙、饥吞野果，一路从东阳义乌，往回家的路上乞讨过来。此时离被抓做担夫，已约过了半年时间，也是西风凛冽三九严寒季节。我一到家，老母亲看见我是，衣不遮体，骨瘦如柴，母子俩抱头放声痛哭。后来，听说与我一起被抓的30个挑夫，仅我一人逃生回来，她老人家禁不住连连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军旅生涯



五个终身难忘的建军节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潘永淦

今年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纪念日，全国人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我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老兵，回顾自己三十年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其中有五个建军节使我终身难忘。

海岛大练兵

1952 年夏天，我所在的部队奉华东军区命令，从驻防宁波市江东区开赴舟山海岛大练兵。任务很明确，为加快解放浙江沿海尚未解放的几个岛屿，尔后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这次海岛大练兵，正值酷暑季节，白天气温均在 35℃ 左右，晚上蚊子很多，闹腾得睡不好觉，尽管客观条件艰苦，但部队练兵热潮犹如东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我在团政治处任干事，白天下到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晚上回机关处理业务工作。开始阶段，部队演练乘木船、机帆船，在炮兵、轻重机枪掩护下抢占滩头阵地，清除各类障碍物，接着演练攀悬崖、炸火力点，夺取前沿防御阵地；第二阶段演练纵深抗冲击，抢占制高点。构筑工事，掩护第二梯队投入战斗，确保登陆作战完全胜利。从班、排、连、营逐级轮番演练，整整演练了两个月，经上级实地考察，部队大练兵的各项科目，均符合实战要求。在这次海岛大练兵中，我咬着牙，憋着劲，白天下连队，晚上加班忙业务，特别是中途我患上虐疾病，一会儿发高烧，一会儿冷得发抖。医务室的军医反复催我回大陆医院治疗，都被我婉言谢绝，我对医生说：“打起仗来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病吃些药休息几天就会好的。”果然不到三天我就下连队和战士们一起演练。这次海岛大练兵，我不仅学到了海岛登陆作战的一些技术和战术，更重要的是锤炼了坚强的战斗意志。部

队返回原驻地，正赶上 1952 年的建军节，这一天，师、团两级均召开海岛大练兵总结大会，表彰大练兵中涌现出的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会上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这是我入伍三年第一次立了功，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

反击战大胜利

1953 年春天，我们部队冒着严寒跨过鸭绿江进驻战火纷飞的朝鲜咸兴地区，开展紧张的反空降、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6 月上旬，突然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命令，部队紧急开赴“三八”线，参加金城反击战。进军路上，部队战斗情绪异常高涨，尽管白天敌机反复骚扰，晚上敌军炮火不断封锁，我们硬是憋着劲往前赶，经过六昼夜的长途奔袭，突破三道封锁区，行程 500 多里，准时赶到金城前线参加这次反击战。

金城反击战，是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压轴之战。志愿军首先把这次反击战任务交给二十兵团。兵团统领 5 个军，还配备卡秋莎火箭炮师，共 20 多万人，战役在金城以南、北汉江至上索里之间约 25 公里宽的正面实施突击，以歼灭敌 4 个整装师为目标。要求参战部队 7 月上旬完成战役准备，7 月中旬伺机实施总攻。

7 月 13 日黄昏，天气闷热，金城前线我军 1000 多门大炮，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敌方阵地实施猛烈轰击，我卡秋莎火箭炮特别威风，对着敌方防御阵地发射了数个齐发，敌方阵地一片火海，炮火持续 30 分钟，我军三个突击集团同时向敌 25 公里的防线发起勇猛突击，不到一个小时，敌人的防线全部被突破，西线反击部队不到三个小时就把李承晚的王牌首都师白虎团一举全歼，击毙敌白虎团团长，生俘敌副师长。中线集团勇猛穿插，穷追猛打，分段歼敌，东线集团越过文登公路，强渡金城川，占领南面 5 个制高点，把美李侵略军牢牢地封锁在预定作战区域内，为全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次反击战，共歼敌 5 万多人，把战线向敌方推进 10 多公里，收复土地 250 平方公里，拉直了“三八”线。正当我军调整部署、构筑工事、修护公路、抢运弹药装备，准备实施再次大反击之际，美李侵略军预感局势对他们极为

不利，迫不及待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7月27日上午10时，双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并于当时10晚协定生效。

27日晚7时，我军前线万炮齐发，对准敌方阵地发出雷鸣般的轰击声，狠狠地再次教训一下敌人。7月28日早晨，战火纷飞的“三八”线终于迎来了和平曙光。目睹敌方阵地，一片狼藉，还活着的美李军抬的抬、拖的拖，将死伤者运下阵地去。

朝鲜停战后的第4天，我们在金城前线949.2高地庆祝反击战的大胜利，迎接1953年的“八一”建军节，战后我立了国际三等功，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攻克“卡一普”石洞

1959年春天，西藏达赖喇嘛在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的操纵下，煽动藏区大规模叛乱，我们部队奉军委命令，紧急开赴青藏高原执行平息叛乱的作战任务。青藏高原海拔均在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气候严寒、交通落后、后勤保障受限制，这对我们是严峻考验。为尽快平息叛乱，维护祖国边疆安宁，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12字方针，我们以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那种精神克难攻坚，第一阶段在长沙拱玛地区三个月的平叛战斗中歼灭叛匪1000多，解救藏族同胞3千余人，初战告捷。部队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和总结，平叛作战的信心大为提高。7月上旬，青海玉树平叛指挥部下达第二阶段平叛作战任务，首当其冲是尽快攻克“卡一普石洞”，拔掉这颗“钉子”。“卡一普石洞”位于玉树州府西北约40公里的昂西沟内，石洞就在沟南侧半山腰，上下两个自然形成的山洞，相隔约7米，洞内长约80多米，可储存粮食、弹药，还有泉水可使用，洞口修有防御工事，易守难攻。年初，骑兵部队曾追剿到昂西沟，200多叛匪凭借地形熟悉，迅速爬上南山溜进两个石洞，当骑兵部队赶到沟里，叛匪居高临下，从洞口工事里向沟里开火，造成部分官兵遭到伤亡。鉴于部队各有专长，指挥部把攻克“卡一普石洞”的任务交给我们步兵部队。7月中旬，我部二营在营长教导员的带领下，乘夜色悄悄进入昂西沟，先将东西两处山口严密封锁，不让

一个叛匪脱逃。天亮之际，洞中叛匪发觉已被解放军包围，疯狂地向沟里打枪扫射，为震慑叛匪的嚣张气焰，配合二营的无后座力炮对准敌洞口工事连发4发炮弹，敌洞口工事立即被摧垮，叛匪失去洞口工事，就钻进洞里固守顽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部队采取两手战法，一是组织阵地广播宣传，由二名藏语翻译向敌人广播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要求他们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二是组织两支精悍突击小分队，携带武器弹药和绳索，从侧后爬上南山顶部，拴牢绳索，一个个像神兵一样从天而降，迅速占领敌人洞口，一边向洞里喊话，宣传政策，一边向洞里扫射，投掷手榴弹，经过10多分钟较量，大部分叛匪举着白旗出洞投降，而少数骨干分子仍在洞内负隅顽抗，为教训这些顽固份子，我火焰喷射四分队朝两个洞里喷射了两发火焰，熊熊烈火就像两条火龙直往洞内钻去，被烧得焦头烂额的顽匪乖乖地出洞跪地投降。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叛匪自吹的“神赐宝洞”终于被攻克，洞内200多叛匪除11名被击毙，其余全部被我俘虏。

“卡一普石洞”被我攻克后，震撼了青藏高原，部队设在隆宝滩的收容接待站，每天从四面八方打着白旗前来投降自首的络绎不绝，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人，前后一个月接待站就接收了5000多叛匪和叛众前来投降自首，收缴了1000多件枪支和部分弹药，确保了玉树指挥部周边三个县的安宁。

“卡一普石洞”攻克之后，迎来了1959年的“八一”建军节，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在青藏高原度过这个难忘的建军节。我在这次攻坚战中深入第一线，积极协助攻坚部队做好准备工作，被指挥部评为三等功一次。

石家庄大比武

1962年下半年，部队掀起军事训练高潮，练技术、练战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1963年春天，北京军区发出通知，为检测军区所属部队训练成果，决定于当年七月份在石家庄高级军事步校举办五大军事技术大比武，通知要求军区所属5个军各选派三个建制连参加这次大比武，我所在的红军师某团第三连，被选中参加这次大比武。当时我刚从师部组织科下派到红三连任政治指导员，接到任务后，我和连长共同感到这个任务既光荣又担忧，光荣的

是我们能代表红军师参加北京军区大比武。担忧的是连队前些年从平叛地区刚回来，集中起来正规化的训练时间较短，军事技术基础又不扎实，能否圆满完成大比武这项光荣任务，心里确实没底。在师、团首长的鼓励支持下，全连130名官兵下了铁的决心，在比武之前有限的的时间里，科学安排训练计划，开展能者为师、官教兵、兵教官、互教互学的群众性练兵热潮，我长期在机关部门工作，军事技术基础较差，为了不拖全连后腿，我主动拜一排长为师，利用课余或节假日由他手把手给我辅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4个月的苦练加巧练，我的五大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连队的同志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们高兴地说，指导员都练出高水平，咱们红三连不会落在人家后面。

1963年7月10日，我们连齐装满员到达石家庄训练场，兄弟部队的14个尖子连队也先后到达，我们抓紧时间走访兄弟连队，向他们取经，同时熟悉训练场地，擦洗好武器，保养好身体。7月15日大比武正式开始，15支参赛连队威武整齐进入考核场。按照抽签顺序，我们连安排在16日上午8时30分参赛，按照连队编制的实名册，我和连长首先上场迎考，由于准备充分，临阵不慌，我们两人都取得优秀成绩，我们打出个开门红大大鼓舞了全连130名指战员，五个项目比赛全都取得优良成绩，7月17日大比武全部结束，经评委评审，我们连在这次大比武中总评第三名。“八一”建军节前夕，我们胜利返回部队营区，师、团首长和机关同志迎候在营区大门口，热烈祝贺我们取得大比武的胜利。这年的建军节我们在一片欢乐声中度过，年度我们连队还获得集体三等功的荣誉。

渤海湾上练蛟龙

1964年夏天，我所在的红军师奉命从山西大同开赴河北秦皇岛，任务是用两个月时间全师部队在渤海湾洋面上人人学会游泳泅渡本领。面对白浪滔天的渤海，许多同志惊吓不已，当时部队绝大部分成员是北方“旱鸭子”，从小没学过游泳，许多同志还未见过大海，现在要在两个月时间内“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谈何容易？

中央军委、北京军区的通知明确指出，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随时做

好渡海作战的准备，这是军队至高无尚的光荣使命，不能有半点含糊。当时我已调到团政治处任组织股长（营职），还担任政治处党支部书记，政治处主任交待我，机关干部的海上游泳训练由我组织实施，我是南方人，10年前舟山海岛大练兵时曾学过海上游泳，但由于时间长了，也忘得差不多了。现在面对14名机关干部，他们中三分之二压根儿没学过游泳。正在这时，一批从海南岛游泳培训的游泳教练员回到部队，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从中挑了一位教练员担任机关干部教员。从此海上游泳迅速开展起来，按照教学程序，先易后难，循序渐进。采取三先三后教学法（先在岸上练基本要领，后入海体验要领；先在浅水区学游泳，后到深水区练游泳；先游短距离，后逐步加长距离）。经过教练员科学耐心地施教，我们政治处14名机关干部用了一个半月时间，人人变成合格的海上“蛟龙”。

部队海上游泳接近尾声，迎来了1964年建军节，秦皇岛市的党政领导和社会团体敲锣打鼓来到部队驻地开展节日慰问，他们送来了鲜活的螃蟹和大对虾，送来了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这更加激励起部队苦练“海上蛟龙”的积极热情。8月10日，北京军区首长来部队视察，亲眼目睹北方“旱鸭子”变成水上蛟龙，很是赞赏。他们说，世上无难事，苦练出精兵，红军部队的光荣传统在部队里闪闪发光，必将在未来战场上创立新功勋。

8月15日，我们告别渤海湾，告别秦皇岛，胜利返回部队营区。

军旗高高飘扬在洞头岛上

张锡淑

在欢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我不禁回忆起自己 36 年的军旅生活。我于 1946 年 6 月（时年 15 岁）在家乡山东荣成参加八路军。入伍后，参加过威海、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浙西金华、建德等县的剿匪；参加过解放洞头及沿海岛屿的战斗。大小战斗先后百余次，多次负伤。1982 年从陆军 74 师船艇队政委（正团职）岗位上离休。我在部队成长锻炼的经历，有力地见证了人民军队由弱到强的辉煌历史。其中我参加第三次解放洞头战役，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洞头列岛，隶于浙江省温州市，位于浙南沿海，瓯江口外，距温州市 33 海里。海域面积 791 平方公里，陆地面积 103 平方公里，洞头主岛 24 平方公里，由 103 个大小岛屿和 250 个海礁组成。素有浙南门户、东海前哨之称，是军事上的战略重地。解放前夕，洞头列岛一片白色恐怖。随着大陆相继解放，蒋帮残余和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纷纷逃亡下海，盘踞海岛，经常破坏我浙南沿海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企图凭借险要地势，把它作为“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我军曾先后两次解放洞头，但敌人不甘心蒋家王朝的灭亡，逃了又来，死了重组。盘踞在岛上的有由地方军军官作战团与海霸海匪组成的浙南反共救国军，还有匪海防独立总队、自新大队等 6 股匪兵，其总数不过 1000 多人。

为了早日解放洞头等沿海岛屿，早在 1951 年春，我 105 师 315 团（我就是该团二营四连一排任排长）全体指战员掀起了杀敌立功的大练兵，开展了各项擂台赛的军事训练。海上航行、登陆抢占滩头阵地，夜间训练等进行了上百次上千次，战士们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练为战，战士的求战情绪更加强烈。到了年底，指战员按捺不住的求战心情，像火山一样激发出来，纷纷向连营团党委和首长写请战书，

强烈要求参加解放洞头等敌占岛屿的战斗。我们一排还写了血书，要坚决消灭敌人。

1952年元旦过后，浙江省军区兼第七兵团司令员张爱萍同志到乐清虹桥下达作战命令：由步兵103师309团和步兵105师315团进攻洞头岛，以309团为主攻，315团和温州军分区海防大队配合作战；并由温州军分区司令员夏云飞和105师参谋长刘金山（抗战时，著名的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等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两个团的作战行动。他还指出，围绕洞头岛，敌我先后进行四次拉锯，不能再有第五次了。

1952年1月11日下午5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解放洞头的最后一次战斗。进攻洞头的309团和315团分别在温州龙湾、乐清黄华码头和黄大岙集结，各自按作战方案相继乘船启航。当晚9时许，315团一营在霓屿、状元岙登陆上岛，迅速歼灭了匪徒，占领了阵地和制高点。但在清剿散匪时，二连指导员宫锡明遭到躲在洞里的顽匪的突射，光荣牺牲。二连战士立即组织火力封锁洞口，再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投入洞内将敌歼灭。二营也占领了半屏山和大瞿山，保障了309团两翼和侧后的安全。其机炮连一位副班长王义连被敌击中胸部而倒地，后坐起来将口袋里仅有1.5元交由班长作最后的一次党费，随后便牺牲了。

9时40分，309团分别在沙岙、鼻子尾、洞头码头登陆，然后迅速向北岙、寮顶方向推进，快速占领了有利地形。12日凌晨，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直插敌纵深，占领了北岙街、双龙、东沙等地，切断了东西部之敌的联系和退路。将岛上东部之敌压到北烟台山上，并将其围困。上午8时正，309团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大力向北烟台山顽敌发起猛攻。指战员们如猛虎出山、蛟龙入海、英勇冲锋，不到两个小时的战斗，歼敌50多人。敌司令王祥林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夺路逃窜到棺材岙，死守顽抗，并向大陈岛守敌胡宗南呼救。

12日下午3时，奉命增援的我315团三营抵达洞头岛。其七连、九连迅速占领了东北面的要点，进驻桐桥一带待命。其八连进入北烟台山观察海面上的敌情，监视竹屿岛上敌人的动静，并在烟台山南侧搜剿散匪。此时315团二营已占领了半屏山、大瞿山，并移兵进驻洞头本岛的东岙和东岙顶村。

至此只有棺材岙约 500 名顽敌在死守顽抗。棺材岙地处洞头岛最东北侧，观潮山与无名高地之间的一个山岙，仅有一条狭长的海礁与洞头主岛相连接，潮退才有径，可以说四面环海。山岙地势峻险，悬崖陡壁，山岙上道路狭小曲折，是一个“一人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之地。而且敌人还预先构筑了许多掩体的防守工事，明碉暗堡，火网密布，特别是隘口，重机枪火力封锁，难以通过。

309 团的八连、二连担任主攻棺材岙的战斗任务。八连是一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连队，有“钢八连”之称，连长赫锡三曾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是战火中锻炼成长的好指挥员，自他接受解放洞头的作战命令起，就决心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12 日下午 5 时和 13 日凌晨 2 时，八连、二连发起两次最猛烈的攻击，指战员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但是均遭敌火力的阻击而伤亡惨重。1 月 13 日下午 3 时，我军炮击观潮山，3 时半，八连、二连在火力的掩护下再次向棺材岙发起了进攻，但冲锋又受挫，战斗力损失过半，为了集中力量，八连组织一个突击排，营范教导员直接到突击排。晚 8 时发起冲锋。冲到岙底的三班、八班，生还的仅三班长刘长聚等 3 人。此时八连在第一线战斗人员，仅有 15 人。二连的排长马福禄、副排长张玉禄都牺牲在此。八连、二连共伤亡 70 多人，特别是党员、骨干力量损失更大，比参加济南、淮海战役伤亡的还多，是八连历次战斗中伤亡最多的一次。一排长王永泰、二排长李安帮、炮排副刘明亮，班长崔龙海、陈邦听、孙家启、曲日洪、王保胤，都先后阵亡。他们把最后一滴热血洒在宝岛上，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沙滩、染红了山崖、染红了海水，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

为了尽快歼灭残敌，防止胡宗南部队增援接应，“前指”决定调整作战部署，解决棺材岙作战任务交给我 315 团三营执行，并请求上级指派炮兵上岛配合作战。13 日下午，315 团团团长魏日才和政委王怀晋率三营排以上干部隐蔽地进入最前沿（即桐桥脚）勘察地形，侦察敌阵地。干部们亲眼目睹到 309 团进攻时牺牲的数十具遗体漂浮在海水滩边。顿时激起了干部们极大愤慨，激励了干部们歼敌的勇气和决心。七连连长李德成同志在接受团长交给主攻任务的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为牺牲战友报仇！”14 日，支援师炮营到达，并与 315 团团属炮兵连在桐桥一带构筑发射阵地。

15日下午3时，正值潮水将退完的时刻，我军向棺材岙守敌发起进攻，在师参谋长刘金山亲自指挥下，首先集中炮兵火力急袭，一颗颗的炮弹打得敌阵地硝烟四起，火光冲天，一个个敌暗堡被摧毁，敌兵鬼哭狼嚎，乱作一团。然后我军再向敌纵深延伸，七连为第一梯队主攻，在连长李德成（曾参加山东鲁西南多次战斗，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和浙西剿匪，乐清大功山战斗，多次立功受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的率领和当地数名老乡引路下，迅速穿过狭长的海礁道，从右翼冲上山脊，突破敌第一道防线。第二梯队九连紧紧跟上，从左翼迅速占领棺材岙左前方山头制高点，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掩护七连冲锋，一排长潘洪春带领全排战士冲上棺材岙最高峰，把八一军旗插到观潮山之巅，大家欢呼战斗胜利。敌人纷纷举枪投降，敌司令王祥林等束手就擒。仅用了1个小时20分就解决了战斗。

第三次解放洞头这一仗，共歼敌895人，其中击毙敌副司令郭任远以下287人，俘敌司令王祥林与队长马立庆以下608人，缴获迫击炮2门，火箭炮1门，轻重机枪21挺，高射机枪1挺，各类长短枪554支。

从1952年1月15日这一天起，洞头人民彻底解放了。为了永远纪念洞头解放，人民政府把“棺材岙”改名为“胜利岙”，在那条海礁曲径上建起的桥，命名为“胜利桥”，在那里还建立了军事博物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民军队的光辉业绩发扬光大。为了缅怀英灵，党和政府在北岙镇建起一座雄伟壮观的烈士陵园，让人民永远怀念烈士，继承烈士遗志，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

光阴荏苒，洞头解放已65年了。65年来洞头军民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在社会主义建设大道上不断前进。旧貌早已换新颜。今天洞头列岛已成为温州市重要的旅游休憩基地，随着五岛连桥工程的竣工和温州半岛工程的建设，洞头将以崭新的绰约风姿，逐渐成为一座海上国家公园。

（本文通过当年参战的老首长、老战友，309团八连长郝锡三、315团七连长李德成所了解的情况及本人的回忆写成的）

我是一个兵

章宏波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里有一支歌，头二句就是这样唱的！我确实也曾经是一个兵，在福建前线经历了七八年的部队生活。那是50年前的事了，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是伟大长城的一块砖，部队的的生活，给我留下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在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许许多多尘封的故事，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喜日子里，让我晒晒尘封的部队生活故事，更唤起我心中对部队的深厚感情，唤起我对部队的更加热爱。

历史拉回到1963年冬，我体检、政审合格，应征入伍，第一次穿上了绿军装，第一次坐上了汽车，第一次乘坐火车，到达了福建前线的军营里。

那时的福建前线，形势很紧张，大陆和台湾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双方互相炮击，台湾经常派遣特务登陆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带骚扰和破坏。我到部队后，在新兵连进行了一个月的队列训练后，很快就分配到连队投入紧张的战备训练，有时则称为临战训练。当兵是保卫祖国，一是要防止和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防止和击败蒋匪帮反攻大陆的阴谋……

初到部队，我感到一切很新鲜，除队列训练外，还要进行武器训练，俗话说讲是“当兵要会打枪”，部队称为“步枪射击训练，学会步枪射击要领。”首先是练瞄准，有立姿、有卧姿。经过训练，我才知道步枪瞄准要通过“缺口”和“准星”进行的，可现在是用瞄准器了。我的连队是重机枪连，装备有步枪、重机枪。由于我勤学苦练，在部队很快掌握了射击要领，我们班的实弹射击实现了满堂红，班长、战士个个优秀，我获得了一个小小笔记本的奖品，上面写着：“奖给思想领先、作风带头、勤学苦练，六四年第一次实弹射击满堂红的一机连一班战士章宏波同志。6583部队司令部，政治处，六四年四月十日”。这个在部队获奖的小小笔记本，我用过了，可现在还留着。那时，

福建前线部队，主要练海战，时刻准备解放台湾。当年夏天，我所在的部队就拉出军营，到罗源湾进行武装泅渡的海上训练，还到过三都海军基地进行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训练，进行千里行军等……就在我部在游泳训练的同时，一股蒋匪特务就在罗源湾登陆，被我边防部队歼灭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们部队隆重地举行庆祝活动，标志着我国国防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部队又开展关于原子弹的知识教育，开展了防原子弹和防化学武器的训练，……50多年后，我们已是核大国了！

1965年，福建前线我所在部队战备训练十分紧张，特别是“八·六”海战，我海军部队在广东和福建沿海一举击沉了国民党企图派遣特务登陆的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取得了胜利，海军部队受到了国防部的嘉奖。当年11月14日，国民党的美制炮舰“永昌”号，还有大型猎潜舰“永泰”号，窜入福建沿海骚扰，我海军东海舰队担任护渔的舰艇部队又一举击沉了“永昌”号和击伤“永泰”号，取得又一次海战的重大胜利，海军参战部队又受到了国防部的嘉奖。这时，也把我陆军部队的战备推上一个新高峰。台湾国民党军队妄图进行报复，我们的部队在这两场海战后，我所在部队的高炮、高射机枪、重机关枪，都日夜布防在部队驻地附近的山头阵地上，通讯连拉了军用电话，电话铃不时地响着，传来了指挥部的情报：几时几分，台湾某某机场几架军机起飞了，向福建前线飞来了……那时我们部队的训练，是临战训练了。有一次，国民党军队快速占领了我福建沿海的一个空白岛，驻上了军队。福州军区准备快速把它夺回来，我们连队党支部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有一些班长和战士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战时军队纪律的绝密文件也下发到了连队，我们连队很快全副武装，乘坐军车，开到黄歧半岛转乘军舰，准备出海作战。

大概是一二个小时后，指挥部传来不开战的指令，原因是：作战计划由福州军区报总参，总参请示国防部，当时周恩来总理说，福建前线的一枪一弹，都关系到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大局，一个小小的空白岛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动用陆、海、空三军夺岛，打胜仗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不必动用三军开战了！于是准备打仗成了战备训练，军车自行开走了，我们

部队作千里行军的拉练，走了好几天，才回到了驻地的军营。

战备训练稍有点放松。我们部队又被拉到福建前线的官坂，荷戈斩潮，围海造田，把大片的海涂变成了良田；又建水库，用淡水灌溉水稻田。那时，我已经担任连队的文书，在围海造田造水库时，我的工作是编辑工地黑板报，还拿着喇叭筒在工地上宣传鼓劲。一个冬天，我在编辑工地黑板报时，脚被冻僵了，有点疼，走路也不方便了，于是我放下手中笔，向一位战士要来一挑畚箕，也到劳动队伍中挑起土来，只挑了七八担，我的脚不僵了，不疼了，我继续去编辑工地黑板报了，我深深地感到，体力劳动会给人一种热量。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福建前线的军队一方面积极准备解放台湾，一方面是积极防御，防止台湾反攻大陆。有一年，我们部队在福州的大白岭高山上进行国防施工：修碉堡、建战壕、打坑道，碉堡连着战壕，战壕通往坑道。这国防工事，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牢固的建筑。我在施工中当材料员、司秤员，浇筑混凝土的成分都是过秤的，我从当年的笔记本查到其比例是：水泥 50 公斤、水 23.5 公斤、沙 76.46 公斤、大清水石子 140.36 公斤、中小清水石子 93.57 公斤。有时我也到施工一线，抡铁锤打修块石，一天打下来，手都肿痛了，晚上只得用毛巾浸开水烫敷手臂。

1966 年冬，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部队从原来野战部队转到了福州火车站，改为福州铁路的护路部队。我们连队把原来的重机关枪送到了福州军区司令部坑道内的武器仓库里去了，领回来一批五四式手枪装备连队，训练科目也改变为手枪射击、捕俘拳和擎敌拳等武术功夫，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铁路畅通：一是在火车站站岗放哨；二是在火车车厢执勤（45/46 次福州——北京、309/310 次福州——厦门）。我也常在火车上执勤，腰别五四式手机，在火车车厢内来回巡逻，维持秩序，防止和制止小偷，我感到当兵也挺英姿威武的。在此期间，连队还选我到团政治处培训当写作新闻的通讯员，也使我受益匪浅。回到连队，我积极投入通讯员写稿的工作，在车厢或在火车站执勤，把好人好事写成稿，投给火车站的广播站、《前线铁道报》、《福建日报》，当我写的稿子在广播上播出或在报纸上变成铅字印刷体，我心中也有一种喜悦。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样样都学。

我在这所大学校园里，是连队党支部把我培养成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还连续3年被评为“五好战士”，五好喜报由部队寄到我家，家里的父母很高兴。我在福州火车站时，我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在连队还辅导文化低的战士学习；在火车车厢里，还组织旅客学习；同时在火车站组织铁路职工家属学习。这样，我曾被福州铁路分局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参加了福州铁路分局的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的规格很高，住宾馆，吃得好，到开会会堂有专车接送，到会堂外步入会堂时，有铁路中小学的学生手握鲜花夹道欢迎，当军队的代表走过来时，他们呼着“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在当时，我从山区农村出来的人，破天荒头一回（一生也只这么一次）获得如此高规格的荣誉，这是部队培养的结果，令我一生铭记。

我超期服役退伍了，退伍时，铁路职工家属花了好几天时间，绣了一幅“永远忠于毛主席，赠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章宏波同志”的刺绣，这幅手工刺绣至今还保存着。退伍回到农村转入“1007”部队（当农民：一根扁担、两只粪桶、一把锄头）当地球修理工了。由于部队的培养，我有一定的基础，以后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村党支部书记，还被选为公社革委会委员（民兵代表）、乡人民代表。同时，还积极写稿投稿，常被《浙南大众》、温州人民广播电台、永嘉县广播站采用。1990年，永嘉县成立楠溪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我被聘为局秘书，要求我还要写些宣传稿件，后还被任命为《楠溪江风景名胜志》主编。由于有部队的培养，我工作有扎实基础，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我写的宣传楠溪江的稿件，好多被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国各地的大报、杂志采用，获得荣誉证书也有100多本，连续20年被《温州日报》评为写稿先进，连续8年被《浙江日报》评为写稿先进，获得奖励。这些成绩，都离不开部队对我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工作的基础。

在21世纪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李景上将（飞行员，百名将军书法家之一，中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顾问）和一位少将一起到楠溪江视察，我参与了接待陪同，我向将军作自我介绍：“在20世纪60年代，我也曾在福建前线当了七八年的兵。”李景上将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了。”晚餐时，我请上将给我题个字吧，他欣然应允。我从办公室拿了毛笔、墨汁、

宣纸去宾馆，可公安局内保科长、警员已警戒了，并说首长在休息，不可打扰。我向他们说明首长已答应给我题字的。科长同我熟识，看我手中拿着文房之宝，就放我进去了。我在将军的接待室桌子上放好毛笔、砚台，倒上墨汁，桌上铺上宣纸，将军欣然命笔，给我题写了：“云水风度，松柏精神。宏波同志惠存，龙年春月，李景上将”等字，并取出印章盖上“李景之印”和闲章“寄情”。上将还和我谈了许多当兵的事，上将说：“是毛主席叫我学开飞机的，我曾担任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曾驾驶战机在祖国海疆的蓝天上巡逻！……”我内心觉得，将军真了不起，是个大英雄呢！

我对战友、对首长、对部队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永远忘不了部队对我的教育和培养。现在人民解放军壮大了，军事科技现代化了，但我们退伍老兵还应当“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经过了大裁军，解放军的兵员减少了，但军事科技实现了现代化，军事力量更强大了。现今，我们是核大国，有专门的火箭军部队，具有强大的第二波核打击报复能力，使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当今，我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正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向建成一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军队迈进。人民解放军经过了90周年的艰苦奋斗和战争考验及现代化建设，我们人民军队更加强大了，成为了一支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这使我一个退伍兵感到由衷的骄傲和无限的自豪！

我作为一个退伍老兵，要振臂高呼：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从军经历颂“铁军”

胡文岳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0 周年，新四军成立 80 周年之际，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重要指示，深切地了解我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铁军”历史，回顾自己应征入伍，在革命大熔炉中茁壮成长的经历，更加深切地热爱赞颂我们党创建的人民军队。

1963 年 12 月，我应征入伍有幸到了江苏宜兴，分配到前身是新四军的陆军二十军五十八师一七三团三炮连当兵。

军旅生活培育了组织纪律性，吃苦耐劳的人生法宝。部队学习、军训、休息都有规章制度，很讲究时间，而且是“铁的”、“硬的”。我从一个过惯平民生活的青年，到部队做新战士很不习惯，如晚上站岗放哨轮到自己，从甜睡中让人推叫醒，太让人难受了。还有那个叫做“紧急集合”，不管你在深夜，不管你在休息清闲时光和同乡正在畅谈，一声声紧促催人的哨子声，要赶忙立即打起背包，拿起武器就出发。还有野营长途拉练，带干粮，背武器，一次到了本省安吉附近的山岭，天气热，肚子饿，我至今还记得。随身带着的干粮（炒米粉），在山脚一边走一边往嘴里送，吃时很香很香，要翻山越岭了，这时肚子饿得慌，因此炒米粉吃得是那樣的香喷喷，为了炼出铁脚板，部队经常长途行军磨炼，脚掌上磨出水泡了，卫生员用马尾宗毛在脚底水泡上穿刺放水，路途长远，水泡越多，我曾磨起过七个脚掌水泡，碰上路边沙石，水泡变血泡钻心地痛。

我从军之时，正是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之时，军队大搞军事训练，推广郭兴福军事训练法，我也被选拔到尖子班到山沟里集训，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温饱问题刚刚开始恢复时。我们的口粮也紧张，至今仍记得，到了军训集中点，团部有关领导说，为搞好你们的尖子技术军训，决定补贴每

人每天半斤口粮，……五年的军旅生活，使我懂得了组织纪律性，和吃苦耐劳是一个人立身社会的法宝，终生受用。

逐渐学会掌握新闻报导业务。使我为党的宣传工作具备了一项写作技能。入伍后不久，因我读过高中，连队的黑板报、学习园地、编写文艺小节目等都有我的份，一天，连指导员戴文亮找我谈话，布置一个任务，他说：小胡，营里放露天电影时，幻灯片上我们三炮连的新闻报导见报去年又是“0”蛋。你是高中生，我们连的“秀才”，你要努力，一定要在今年把“0”蛋打破。当时，什么是新闻报导我也不清楚，写文章做作文我是喜欢的，记得在柳中、乐中读书时，都是班级里的“语文课代表”，作文有点样子。怎样搞好新闻报导，文字变铅字印在报纸上，这可是要有一定的学问和技巧呀！我说指导员，让我试试看，我一定努力。打这以后，我注意连队里的好人好事，新鲜事，有什么写什么，一年写了近百篇文章，投向军报和驻地地方报社，有许多不是新闻报导的材料，但也有瞄准“靶子”的，一年下来，有13篇大小不一的“豆腐干”文章见了报，不管怎样终于打破了我连新闻报导多年“0”蛋记录，上升跃居到全营见报最多全团第二的连队，戴文亮指导员很高兴，在连队集中点名会上，笑容满面地表扬了我。当年，我们三炮连评上了“四好连队”我也评上了“五好战士”。

从这以后，团部、师部有新闻通讯报导集训都有我的名字，我在集训组稿中和战友们走进连队班排，走进军需后勤，到实地向战友们学习、采访，写新闻报导：在团新闻干事顾国雄指导下，写小故事、消息、学习体会、辩证法等等，在实践中学，在干中学，边学边干逐渐掌握新闻报导“十八般武艺”。

退伍时，由组织安排进入《杭州日报》做新闻记者编辑工作，工作五年后调回乐清柳市老家，在原柳市区公所、三山公社、湖璜、象阳乡、北白象镇、茗东乡、柳市镇，无论什么工作岗位，都拿起在军队中培育学会的新闻报导业务，感恩宣传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方针和所产生新事物、新气象、典型人物等。

如今保存着“剪报”的有：1978年12月18日《浙江日报》二版刊登“三个队长一条心”——记大港（北白象镇）六队民主选举生产队长后的新气象，（浙江）农村信息报95年2月15日“东方电器之都—柳市”，95年8月16

日“德力西获首家低压电器认证(新版)”，95年10月27日《浙江老年报》“太婆孙媳情”，1995年2月10日“侨胞为家乡献爱心”，浙江12家报纸一刊（东海杂志）《难忘故事散文大奖赛》，95年7月22日在“浙江市场导报”第一版刊登了“火箭上的铜管接头”。

在国家级报纸上发表的有：94年11月1日“正泰集团52人报读北京经济学院专修班”，95年8月9日“德力西获95全国首家低压电器认证”在《中国乡镇企业报》刊登；95年2月18日《农民日报》刊登了湖横乡的“见缝针巧种园，葡萄架下冬菜鲜”，还有最令人鼓舞的是，97年2月14日刊登在《乐清日报》一版2千5百多字的新闻通讯“改革春风活柳市”一稿，在97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题目是“春风拂柳市”，该文后又入编由中国工商出版社编辑的《跨世纪中国改革之路》一书，后又入编《柳市镇志》中。

我的新闻作品获国家级获奖作品的是：96年由中国科学院新闻研讨所举办的“跨世纪发展战略与新闻宣传研讨会”上《火箭上的铜管接头》新闻稿获二等奖；98年全国第四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春风化雨春柳市”新闻通讯获二等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联合在北京颁奖）；99年《今朝上园更好看》荣获第五届《中华大地之光》征文三等奖，2000年“薛宅村挂箱回收废电池”获中国县市新闻二等奖。

多年被乐清报社、温州报社、乐清电台、温州电台评为积极优秀通讯员，为党的宣传工作做了应做的工作；如今我仍在柳市镇老年人协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也负责新闻报导，加入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柳市组，继续我的工作，我曾誓言表态过，终生为党的宣传工作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为我要感恩，不忘党领导的历经千难万险，百炼成钢，为中华民族争气争光，是中华民族复兴做出不朽贡献的人民军队培育了我。

我是一名战士

——忆军营生活

李德夫

部队究竟比地方工作要紧张得多，久在地方工作的我，一下过军队生活，开始时确实不适应。那么，便注定了要付出许多常人难以面对的事物，便注定了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咀嚼思念的苦涩，我想，我是一名战士，当“大家”与“小家”的需要不能两全时；当对祖国的忠诚与亲人的关爱不能兼顾的时候，应更加深切地体现军人的奉献与付出的艰辛。

1949年5月12日，刚解放了的新平阳，我感到一切都很新鲜。在工作同志的引导下，我怀着满腔的革命热忱，遂于18日参加了平阳首期青年学生学习班学习，后被安排在县委宣传部搞宣传工作，当时16岁的我，成天跟在卢声亮部长后边跑，学领导宣传群众的工作方法及经验，学到很多知识及革命道理。同年6月份我又参加了平阳县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一个月后被分配至直属镇（今昆阳镇）工作。工作得身应手，胜任愉快。至同年12月，接到平阳组织部通知，奉调浙江省委安排。1950年1月，我被编入浙江军区第七兵团司令部机训队，便融入了这个特殊的战斗集体。这里男女一共300多人，全队分为四个区队，每个区队下分六个分队，每个分队12人，女的一共四个分队，分别插到各区队中共48人。从此一个既严肃又活泼、既紧张又团结的军营生活，展现在我的面前，要求很快的适应军营生活是一个战士的本份！

机训队驻扎在杭州北高峰北麓的老东岳庙中，老东岳原是个庙宇群，到处是庙堂，实有五步一庙十步一字的状况，开门就见庙堂，每庙宝殿都塑有各种姿态的佛像、神像，层出不穷，遍地皆是“泥塑菩萨”，东岳殿后建有18层地狱，洞中套洞，又暗又深，人一进去，阴风嗖嗖，令人毛骨悚然，不由打颤，顿感寒气逼人、阴森可怕，似乎走进了阎罗殿，魑魅魍魉，青面獠牙，令人十分害怕。虽然是唯物辩证法无神论的军人，也个个汗毛倒立。

机训队的最大活动场所，就是一个最大的殿堂，大殿及两厢长廊就是机

训队的餐厅了，其中一个大天井。大家生龙活虎精神抖擞，团队情神十分强，亲如同胞手足，分队长就是班长，负责军事、政治思想，副分队长协助掌握学习讨论。在日常生活中，分队长既是兄长，又是知心朋友，每当夜晚，或在树下、或在山间、或在月下、或在路边，皆留下了分队长与同志们谈话的身影，都每每看到他与同志促膝谈心的亲切流露，显出十分融洽的氛围，我的分队长是个老游击队员，说他老，他最多只有 23 岁的样子，他文化不高，但他在学习中归纳组织能力十分强，他自称“大老粗”，但他在政治觉悟上认识问题上都比大家成熟，他以身作则，关心体贴入微，甚至同志袜子破了，他主动为其补好，每次劳动，他身先士卒，埋头苦干，我是一名战士应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一点。

战士的住宿都在群众家中，当地群众数百年来都是靠菩萨吃饭的，每家都有好多空房子（以往都是给各地来的香客住宿），并且有好多空木床、木桌、凳、椅等。在过去香火极盛时，这些房子都住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膜拜香客。解放了这里冷落了。先后进驻了部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营，有好几支部队驻扎在这里。顿时使这地方热闹起来，每天所听到的全是军号声及口令声，此起彼伏，别有一番风景。

我生活在这个军营里，感到十分地新鲜，生活虽十分艰苦，却还能扛得过去，每天总是在很紧张中度过，人虽然在杭州，但你莫想去杭州一玩，要去只有集体去，单独去任何地方都是不允许的，因为我是一名战士，纪律性要紧！每天除了听报告、上大课、记笔记、讨论、发言、写心得，无尽地在反复轮番着，每个星期都要以区队为单位，举行一次集体大型学习会，指定一个人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讨论，要求每人必须发言，气氛热烈，有什么疑难问题，反映到大队，待下次上大课时统一解答。

早晨五点，起床号一响，立即打滚起床，先后 15 分钟，起床、穿衣、摺被、洗脸、大小便等，然后一直奔跑至操场，集合、早操、唱歌等二小时左右。7. 30 开饭，8. 00 开始学习，采取听大报告方式，回去以分队为单位组织讨论。每个分队有正副分队长掌握，每次讨论，都是分队长作简单小结，或者启示，讨论后能解答即席解答，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学习的内容是：中共党史、军事要领、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思想改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等。向党表决心，忠诚老实向党交心，做好素质提高，思想净化，创新美好的心灵。

每天早、中、晚吃饭时间一到，军号一响，先集中在大殿广场排好队列，由值班区队长负责，先唱歌，或传达什么精神，然后用膳，大家一齐涌入大殿中，一桌12人，12个人紧围住一桌，碗筷自带，菜只是一大面盘大杂烩，其中放把大勺子，每人用公筷盛菜，大家吃饭如打战，不到半个小时，一顿饭便完成了。每人都站着，根本没有一条凳子，香喷喷的饭菜是挺有营养的，顿顿油味十足，或者蔬菜萝卜之类，逢年过节皆有改善生活，进行大聚餐，满桌六个大面盘，吃了一盘端出一盘，还有酒类小饮，大家尽欢、尽情、尽饱。“八一节”，军人欢度自己的节日，进行隆重庆祝，并自编自导演了歌舞戏曲，特别是过春节，连着放假五天，均在营地度过，若要外出去杭城，则必须要三人同行，我游兴大减，还是睡觉为妙。战士平常每星期休息一天，整理内务、洗衣服、缝补衣服等，或写信给家中问好，写信是不用贴邮票军邮的，写好即交分队统一寄出。每天晚上，点着微光的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大家必须讨论到九点钟，然后就寝熄灯睡觉了。

学习如此紧张，但对于文娱活动开展也是十分活跃的，定期由大队组织，送大家去杭州影院看电影或看戏等，平时更多的是各区队，各分队自行开展，发挥大家文艺天才，都是结合学习自编自演，采取相声、快板、独脚戏、滑稽剧等，还演些古装戏，演古装戏最要紧是古装道具。没有道具，得要向“菩萨”借，每每从佛身上脱下袍及头冠，拿来穿上、戴上，待戏演好了，再给木雕神像穿上，不足为奇。每次演出，大家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我演艺差劲，爱面子观念重，放不开手脚，没有像那些活蹦乱跳的主儿，动作放得开。我表演动作十分拘谨，往往演些配角，老头、农民之类的角色，但我有自己的强项，我的文学功底足，写作艺术细胞较丰富，大多是作编剧，黑板报是每个分队的园地，出黑板报非我莫属，每期皆是我包下来，同时我善于写美术字及图画，更能给版块增加了美的色彩。

一年的军事生活，一年的部队感受，一年的磨砺成果，一年的紧张学习，不管寒冬与酷暑，战士们吃住在北高峰山麓下，依山傍水的营房（民居），终年与潺潺的岳溪结成了不解之缘，每当人们进入了香甜的梦乡之时，夜深灯

火阑珊之时,我不知多少次静听屋边泉水的叮咚,犹似天外飘来的一曲弦音呵!战士们饮的是山泉水,洗的是岳溪水,看多美的岳溪水呵!溪水弯弯日夜吟唱清音,战士的生活中也经历着弯弯的坎坷的征途,在弯弯中追寻憧憬。清澈见底的溪水,浅吟低唱,仿佛来自现实的整个生活,吟的是诗,唱的是歌。洗碗、洗筷、刷牙、洗脸、洗澡。洗了一年的冷水脸,洗了一年的冷水澡,特别在严冬时溪两边结满了冰凌,我双手将毛巾一伸进冰冷的溪水,令全身冷颤,我一个劲的往自己脸上擦,直至将脸擦的红红得,热热得才不觉得冷了,每次洗澡也如此,先冷后暖倒觉得十分的舒服。

说老实话,当时的溪涧水,从北高峰下来,全是山间流出的清冽秀水,没有半点污染,清澈透底,夏天冰凉冰凉,擦在身上真是沁人心脾呵!战士们终年没有接触过一点热水,连开水也是很少供应的,经常是喝的冷水,说也奇怪,大家也没灾没病,连去医务室也很少。人人心情舒畅,不觉日子过得飞快。

大生产运动开展了,那时由于国家经济困难,部队号召大家在吃菜上要自己动手自救。春天正是生产种菜的季节,大队向当地划来一片荒地,那时杭州郊区荒地很多,当时北高峰山下遍地长满芦草,一片荒野,坟塚荒丘散布到处可见。战士们就是在这些荒地中开出一片菜地,种洋芋、种菜、种南瓜、种豆荚等。这片菜地距离营地只3公里之遥,来去尽是方便,每逢星期天皆是集中管理菜地的时间,进行了施肥、除草,乐此不疲,二人抬着人粪去,有的扛着锄头走,集体操作,忙乎了一个半天,经过了大家细作耕耘后,蔬菜当年获得了大丰收,这些瓜菜都供给了自己的伙房,大家共享了丰收的喜悦。那时的山林,好像无人管理的状态,任你采割,不过山上正式的柴草都没有了,原因是已经被人采割过了,轮到战士们上山,只是砍些荆棘之类,全是当地人丢弃的东西拾回来,所以砍柴割草难度会更大,要求一人每天一挑柴,可我遇到难度更大了,我最怕荆棘,加上不得法门,每逢割草双手被刺得鲜血淋漓,苦不堪言,任务完不成,也只好自认落后,所以在劳动英雄榜上名落孙山了。但是我想,我是一个战士,看看那些女孩子也照样顶过去,难道男儿大丈夫就不能顶过去吗?就支撑着干下去,终于完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十年磨一剑,苦练出人才”做人应适应环境,适者生存,倒是真的,自己

已经骑上马了，只有往前跑去才是。可真有几个吃不了苦开了小差的，结果被拉了回来，好一阵斗呵！有一个开小差找不回来的，就当众宣布将他开除了，以儆效尤，可见部队纪律的严明。

春节是全国特大的节日，照样聚餐，按例放假，可节日站岗放哨更加强了，轮到我自己，刚好是子夜 12 点钟，正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美梦时，忽听，呼唤我起来！我被惊醒了，连忙张开惺忪的双眼，揉了一下，打滚起床，外面正下着大雪，一片白茫茫，室内烤着火炉，温暖如春，外面可是 0℃ 以下的呵！当我刚露头向屋外跑去，倏地一股刺骨的寒风从领口钻进来，直抵胸口，全身战悚。我是一名战士，遂一振作，扛着子弹上膛的步枪，站立在寒风飒飒的山岩的前面，猫着腰向雪地的周围环视一圈，抖擞精神，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二个小时。偶听到山雀掠过，或雪地小动物窜过，即刻引起了我的警惕，以为有人来，“哪一个”，“口令”！静了一会儿，断是没事了才罢休，我从中体味到第一次站哨的滋味了。

诗词采撷



吴 军

鹧鸪天·沙场阅兵有感

千里沙场大阅兵，壮严方阵筑长城。
边陲亮剑惊三界，天际鹰飞写九零。

军擅战，帅高明，骄傲自豪誉群英。
敌人胆敢来侵犯，横扫尘埃与宇清。

刘周晰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枪响南昌迎赤光，罗霄大纛破迷茫。
斗顽洒血悲湘水，驱寇抛颅壮太行。
得道雄师越天堑，背时旧制没汪洋。
更新青史仍明示，开国安澜仗武装！

八一枪声践主张，征程万里露锋芒。
旗扬北斗群星集，剑出东江百鬼惶。
九域安宁凭护卫，五洲变故待巡航。
长缨在手苍鹰远，止武还须国器强。

周崖冰

厦门鹭江酒楼迎新兵席上赋

楼外江天阔，渔歌入耳清。
韶华春二月，好梦宿三更。
投笔诸同学，负戈皆士兵。
燕然谁勒石，操守试忠贞！

赠 73819 部队官兵兼贺八一建军节

太平时节未闲身，万里江山守护人。
我亦当年行伍客，更知军旅事艰辛。

刘妙顺

沁园春·贺建军九十周年

遥想当年，破败河山，遍地虎狼。
看群雄奋起，狂澜欲挽；
先贤拯救，民族危亡。
义主三民，力除帝制，扶助农工立大纲。
城楼上，喜红旗招展，八一南昌。

延安业绩辉煌。赞星火燎原遍地光。
记长征万里，破围四剿；
抗倭八载，赤县千疮。
粉碎金陵，黄粱美梦，百万雄师逐霸王。
军威壮，望长城钢铁，屹立东方。

陈若曼

踏莎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秩华诞感赋

卫国金城，护民铁臂，风云叱咤英雄气。
枕戈达旦待戎机，赴汤蹈火情如炽。

九秩威严，诸师精锐，今朝歼敌多神器。
军魂长系党中央，顶天立地谁堪匹！

王一平建军九十周年沙场阅兵

八一沙场大阅兵，铁流滚滚骨铮铮。
草原齐奏阳和曲，戈壁高擎义勇旗。
海上蛟龙斩浪舞，空中神箭驾云行。
雄师亮剑扬天下，不忘初心再出征。

吴久籁

破阵子·沙场点兵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朱日和呈劲旅，雄风漫卷红旗。
八一立丰功伟绩，九十行华夏锦程，
沙场新点兵。

科技强军威武，人民笑脸和平。
必克凶狂顽敌犯，能卫安全利益明，
信期社稷兴。

【越调·凭栏人】荧屏观看驻港部队阅兵仪式

澄碧香江扬国旗，威武三军装备精。
银屏欣静听，苍穹狮吼声。

朱凌云

有感中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航母入水彩旗飞，艇舰重编壮国威。
冲破岛链圆旧梦，驰翔蓝海逐新机。

鹧鸪天·贺 055 型驱逐舰首舰下水

起锚乘风显巨姿，彩旗猎猎振军威。
岛链欲破美欧急，航舰齐驱台日悲。

持利剑，突重围，放飞蓝海志毋移。
今朝齐把弦歌奏，复兴中华义不辞。

倪定梓

贺建军九十周年

钢铁长城九十年，柴车兰缕敢翻天。
如无老将拼机智，焉得红旗铺满川。
继起强军兴国梦，直攻科技赖英贤。
凌烟阁上久垂远，沧海横流匿迹迁。

周玉湘

观朱日和大阅兵

猎猎旌旗熠熠红，点兵大漠竞英雄。
恢宏铁甲驰沙海，呼啸银鹰御烈风。
立体攻防虎添翼，五维演练电凌空。
神州几代强军路，步步艰辛初见功。

游井冈山有怀

井冈山色共云烟，五指峰峦高插天。
武略文韬多壮胆，南瓜红米饮清泉。
纵横马背征南北，游击涡漩过大川。
猎猎旌旗千载赤，英雄不朽世流传。

黄兴龙

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到三湾，岁月峥嵘斗志顽。
唤起工农千百万，旌旗招展满人间。

井冈星火

会师圣地井冈山，星火燎原奏凯还。
万国衣冠齐仰止，尧天舜日尽欢颜。

董建仁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南昌夜幕起硝烟，革命风潮动地牵。
斧劈三山妖雾杳，旗开五岳彩云翩。
民心向往呼声急，军纪严明斗志坚。
难数英雄多少血，换来华夏艳阳天。

翁汉西

水调歌头·建军九十周年阅兵感怀

战士立方阵，主席点雄兵。
红旗猎猎扬威，铁甲壮征程。
展翼银鹰并驾，群绘长空字画，
立志卫和平。共吼散迷雾，环宇滚雷声。

九十年，磨利剑，炼精英。
谁来犯我，身碎魂丢了残生。
十亿同胞团结，虎啸龙吟斩鬼，
何惧几狂鲸。今日大中国，无处不钢城。
阳光灿，立泰山威武，谁敢猖狂。

郑育权

建军九十周年抒怀

刀光剑气撼云天，威震山河九十年。
几度擒妖惊鬼魅，曾经平虏息狼烟。
军机呼啸风雷动，舰砲轰鸣海岳颠。
百尺竿头今又上，兵家强盛史无前。

吴瑾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感作

江右风云起浩波，沉浮欲主意如何。
星开日月高擎帜，地布天兵锐执戈。
社稷安危凭劲旅，轩辕新政启先河。
山川已若金汤固，但为和平赋壮歌。

谢丙礼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功垂北伐毁前盟，劫后南昌重举旌。
反剿五轮三万士，抗倭一发百团兵。
根缘黎庶鱼亲水，剑指豺貅血铸城。
九十年来风雨骤，初心不改护苍生。

张学智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赤旗经历几多关，枪响南昌战敌顽。
万里征途雄跨迈，三军阵势敢开颜。
上天入海何曾惧，斗恶除凶似等闲。
九秩初心红本色，不求称霸保江山。

胡国华

建军九十周年朱日和大阅兵

习总沙场大点兵，九零方阵碧霄生。
梯形坦克威如虎，列队轻车巧却精。
国有雄师何制胜，疆无猛器怎能赢？
英明决策强军路，展望歼机靖宇清。

翁仞袍

贺建军九十周年

枪起南昌路苦艰，瑞金受阅自开颜。
八年抗战东瀛败，三载纷争蒋老顽。
小米柴车惊世界，渡江智取振河山。
雄心壮志谁能敌，代有英豪守国关。

詹应彪

贺建军九十周年

巨龙沉睡几多年，八一南昌聚铁肩。
遵义红灯明道路，延安宝塔壮山川。
同舟踏破千层浪，展翅鹰扬万里天。
四海清平辕细柳，人民乐业日高眠。

陈其荣

八一建军节感吟

南昌起义惊华夏，浩荡东风扫旧尘。
蔽日旌旗红雨溅，斩荆战士壮心真。
绵绵火海军魂铸，漠漠硝烟虎豹呻。
血染山河何忍瞩，换来百福具齐臻。

傅更生

庆建军九十周年

南昌炮火一声隆，唤醒军民百万戎。
指引工农齐革命，推翻暴政建丰功。
援朝驱美惠施谊，还越除蛮正义崇。
九秩征途风雨驻，辉煌伟绩震长空。

林丽华

满江红·八一感怀

暴动南昌，如雷震、军旗猎猎。
砸枷锁，朱周挂帅，凯歌响彻。
万里长征呈壮举，八年抗战凝丹血。
恨豺狼，践踏我华疆，资源夺。

雄狮怒，民族崛。龙威武，金瓯铁。
赞英明领袖，几多豪杰。
东海巡航扬国力，南沙亮剑驱魔羯。
捍主权，今日壮河山，归天阙！

项冬女

鹧鸪天·贺建军九十周年

八一南昌响震雷，红旗漫卷势崔嵬。
三军号角民心振，万马扬蹄敌垒摧。

驱虎豹，扫尘埃。和平崛起气宏恢。
勿忘历史金瓯固，血铸丰碑赖俊才。

张维庚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神州趋板荡，志士化军兵。
宗旨三条律，艰难万里征。
跨江擒老虎，抗震系苍生。
九十红旗色，无疑血铸情。

八一举旌旗，南昌第一支。
关山燃火种，血肉筑汤池。
日丽黔黎望，风和草木知。
军威昭世界，簞食慰王师。

连查龙

贺建军九十周年

蒋氏毁盟革命危，南昌枪响举旌旗。
燎原星火农工聚，热血军人号角吹。
驻守边疆防外敌，肃清宇内练强师。
复兴前路多艰险，洗甲休兵未有期。

虞兴龙

贺国产航母首航下海

钢锋劈浪亮军威，雄似蛟龙披晓晖。
身镇海疆资保障，心怀家国试戎衣。
征途稳破狂涛袭，泊港岿然斗志飞。
谨记和平凭实力，梦圆诗溢赋忘归。

郑小良

人民军队

八一军旗热血撑，南征北战敌心惊。
拨开仗乱层层雾，收复和平座座城。
独特德操民族义，超凡品格弟兄情。
铮铮铁骨威名立，坦荡胸襟保国宁。

赵典栋

庆祝建军九十周年

八一风雷举世惊，英豪亿万迈长征。
斩鲸伏虎开宏业，四海欢腾庆太平。

温兴宽

贺建军九十周年

征程九十年，威武代相传。
灭寇燃烽火，安民仗铁肩。
雄师仁义远，善战美名先。
华夏有磐石，晴蓝一片天。

虞正宽

观建军九十周年大阅兵

建军九十仗高科，选址阅兵朱日和。
杂地沙漠棋有类，真枪实战史无多。
东瀛海域翻波浪，南国疆场越界坡。
喜看神州狮醒日，谁家小丑敢挥戈！

斗相邻宵小，护航征远，扬我中华正气。
好男儿、民族英雄，太平卫士！

董世舜

纪念建军九十周年

叱咤风云九十秋，中华危难压当头。
枪声怒启开天曲，军纪弘扬救国谋。
万里征程系生死，满腔热血润神州。
铁鞋踏碎王侯阙，足跡长存青史游。

王 春

瑞鹤仙·建军九十周年

一枪惊大地，赤县起春雷，东方呈瑞。
镰刀斩妖鬼，看燎原星火，雪山轻骑。
延安智慧，抗日寇、全民匹敌。
战平津、拉朽催枯，遍插五星新帜。

非易，百疮千孔，重建河山，伟功频立。
援朝护国，新神话，美军溃。

朱茂康

九十周年建军节抒怀

卫我江山豪气雄，三军将士众心同。
护洋舰劈千层浪，巡野鹰翔万仞空。
八一红旗飘玉宇，超高利器显威风。
斩邪降鬼金刚棒，万里神州映彩虹。

虞正宽

观建军九十周年大阅兵

建军九十仗高科，选址阅兵朱日和。
杂地沙漠棋有类，真枪实战史无多。
东瀛海域翻波浪，南国疆场越界坡。
喜看神州狮醒日，谁家小丑敢挥戈！

陈生荣

纪念建军 90 周年

南昌起义铸辉煌，
从此人民有武装。
军旗猎猎碧空耀，
战绩昭昭青史扬。
胜利全凭党指引，
千迴百转不迷航。
今朝再迈强军路，
铁甲雄狮谱新章。

编后记

在全国各族人民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日子里，由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共同编辑的《民族的脊梁——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抗战全面爆发暨新四军成立 80 周年》征文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它是我市广大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献给建军九十周年一份厚礼！

90 年前的八月一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登上了历史舞台，自此翻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80 年前的七月七日，卢沟桥畔的炮声，将一个沉睡的民族惊醒。中华儿女气壮山河抗击外族侵略，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80 年前的十月十二日，在全民族抗战的热潮中，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成立了。它与八路军遥相呼应，驰骋大江南北，纵横华中敌后，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纪念彪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伟大壮举；缅怀回顾人民军队 90 年的风雨征程；传承发扬先辈们的优秀品格和革命传统，鼓舞我们砥砺奋进。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开展上述主题的征文活动，并于 2017 年 3 月向全市各有关单位、部门和广大会员发出通知。

为组织好本次征文活动，党史研究室；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领导十分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有关事项；各市（县、区）党史研究部门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亦积极予以配合，发动广大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和会员积极撰稿，参与本次征文活动。

我国著名的温籍军旅作家吴东锋同志百忙之中专门为本次征文活动写来专稿——《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骨》，为本书增辉添彩，九十八岁高龄的

平阳籍新四军老战士施光华，不顾年迈体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奋笔书写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模范支柱作用》。

许多党史军史研究人员，解放军老战士、老同志纷纷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亲身的军旅经历来颂扬、讴歌伟大的人民军队，特别值得称赞的是一批年青的学子，他们虽然没有经历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但通过党史军史的学习、研究，使自己的理想信仰接受一次心灵上的洗礼和升华，从而写出了他们深刻体会文章。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截止2017年8月底，编写组共收到各种题材的征文67篇，及诗词二百余首，经评审组严谨认真地评审，筛选了32篇征文，和部分诗词入选本书。根据征文题材不同，分别例为《学习传承》《军旅生涯》、《将士风采》《红色记忆》《诗词采撷》等五个专题择优予以刊登。由于篇幅限制，对一人写了多篇的只选其中一篇；或与本次征文主题稍偏的尚未采用，将选送其它刊物候用。同时对文章中一些明显的笔误予以更正或删减。因水平有限，书中差误或不足，请读者不吝指教。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市诗词楹联学会、各市（县）党史研究室、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及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017年10月